目錄

七、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許

八、六月四日淩晨零點許

九、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十五分

十、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四十分許

十一、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許

十二、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

十三、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後

十四、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分許

十五、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

十六、六月四日淩晨兩點十分許

十七、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

十八、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

十九、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過後

二十、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

二十一、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五十分

二十二、六月四日凌晨五點鐘

二十三、六月四日凌晨五點三十分

二十四、六月四日清晨六點鐘

二十五、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

作者前言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已經過去十八年了。但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事實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爭議不斷。對於一起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爲痛心的事情。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鎮壓事件之後，捷克統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記這件事，而捷克獨立知識份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這件事。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共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回避六四血腥鎮壓的事實真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卻一直致力於"毋忘六四"的工作，儘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

本人作爲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之一，尤其是作爲一名在北京大學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中國古典文獻學者，有義務和責任爲該事件留下一份可靠而完整的歷史記錄。爲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個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遊過海灣，穿過密佈中共軍警的小島，爬過齊腰深的漫長海塗，遍體鱗傷地來到自由的彼岸。儘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慶幸，因爲終于獲得了自由發言的權利和機會，以履行自己作爲歷史見證人和古典文獻學者的神聖職責。

長期以來，本人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終於完成了本書的定稿工作，並將出版發行，了卻了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本人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就讀七年，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學位，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後來又在法律專門院校----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深知法律的尊嚴。在此，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本書的寫作嚴格遵循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傳統和規範，主要

記錄本人的親身經歷，但由於個人的親身經歷總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個曾經引起世界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書中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當事人的回憶和其他相關的資料，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注明了出處。

本書主要記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開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結束。這是迄今爲止最完整的一份記錄，也可以說是唯一一份記錄。

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數約五萬字。從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當代》雜誌、美國《北京之春》月刊、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世界週刊》、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欲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一書，先後摘錄發表了本書稿一萬餘字的內容，題爲《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或《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網站有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事件完整記錄的唯一一篇文章。本書目前的字數近三十萬字，內容更爲豐富詳實，份量遠遠超過上述的這一篇文章。

本書不僅完整地記錄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而且對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而突出的描述，例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天安門廣場到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離隊伍事件；學生領袖郭海峰“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一案的真相；醫務人員在槍林彈雨中捨生忘死搶救受傷者、記者冒著生命危險記錄歷史真相的英勇事蹟；積極抗命的解放軍陸軍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和消極抗命的解放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的故事；立功受獎、升官晉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等等。

本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或讀者感興趣、有疑問的問題，例如：

1）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本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毋需特別予以討論或說明，但由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許

多讀者也心存疑問，因此本書具體敍述了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雙學士學生程仁興等人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情況。

2）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坦克、裝甲車是否曾經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當時是否有學生。

3）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4）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承擔的任務和表現，具體記錄了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鎮壓過程中的情況，明確指出陸軍第 38 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殺人最多、最爲賣力，其次是空降兵第 15 軍。

5）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下達的情況。

本書在圍繞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這個主題的同時，對復興門、木樨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城樓附近等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主要地點所發生的情況，也有大量的敍述，期望讀者因此能夠對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一個較爲完整的瞭解。

本書還用相當多的篇幅敍述了北京各界民眾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情願的學生，奮不顧身地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英勇事蹟。爲此，北京各界民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如本人在書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所擁有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時至今日，本人仍然認爲，北京各界民眾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在完成本書寫作之際，本人特別要感謝的是不久前被中共

當局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判刑五年而入獄的香港資深記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時，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劉銳紹先生的熱情鼓勵和支持，寫出了關於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事件、字數約五萬字的文章，並在他主辦的香港《當代》雜誌上首次發表。後來，定居洛杉磯的華僑韓媽媽主動建議，並捐助了兩千美元的印刷費，由《當代》雜誌將這篇文章印成方便於送入中國大陸的小冊子。

最後，謹將本書獻給所有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犧牲者、受難者和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獻給我的八十高齡的母親。當年爲了六四事件死難者，爲了被捕入獄的好友同道，爲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呼籲營救，我捨棄了個人的大好前程，在一個只有攝氏七度的風雨之夜，九死一生地遊過海灣，抵達自由的彼岸。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終捨棄不了親情，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地大。十七年了，我不僅不能對母親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上一面都難以做到。我苦難深重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吳仁華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時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部分成員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九號學生宿舍樓第三層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會，研討當前的形勢及任務。

與會者有王軍濤（北京《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王丹（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之一）、老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師、著名詩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傳部部長）、甘陽（《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主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負責人之一、“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成員）、劉蘇里（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青年教師、“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聯絡部部長）、邵江(北京大學數學系一九八五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楊濤（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等人。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名義上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的一個非官方最高協調機構，由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爲首發起組建，成員組織包括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外地高校聯合會（簡稱“外高聯”）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北京市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等。【注釋 1】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會議上露面，引起了一位與會的香港知識份子（記憶中應該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邱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詢問了我的個人情況，並將我的姓名、工作單位、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記在了筆記本上。後來我瞭解到，包括邱延亮先生在內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隨意記錄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領袖人物和骨幹成員的個人資料，無形中爲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所展開的海外人道營救工作（所謂的“黃雀行動”）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檔案資料。

我不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成員，出席這次會議純屬偶然，因爲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下午臨時接受了王軍濤委託的一項任務，當天深夜完成任務後並沒有返回天安門廣場，而是隨同劉蘇里一起去向王軍濤彙報情況，遂與劉蘇里、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住宿在北京西郊的雅園飯店，翌日又隨同劉蘇里和王軍濤來到北京大學。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下午，我正在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的帳篷中休息，與我同校的青年教師劉蘇里前來找我，他說：“（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想瞭解詩人駱一禾去世的詳細情況，軍濤讓你與我一起去調查一下。軍濤說，你和駱一禾都是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應該可以找得到一些瞭解駱一禾情況的北大中文系同學。”

詩人駱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第一位死難者，但不大爲外界所知。駱一禾於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在校求學期間，他與法律系學生海子、西語系學生西川被人們並稱爲“北大三大詩人”，一九八三年六月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屬下的《十月》文學刊物擔任詩歌編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北京市各高校的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活動。五月十四日，駱一禾與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的妻子張芙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請願的學生。在聲援的人群中，身爲詩人的駱一禾一直顯得很興奮，由於情緒太激動了，竟然歡叫著癱倒在妻子的懷抱裏。很快，駱一禾被抬上一輛平板三輪車，在妻子的護送下，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在駱一禾倒下的那一刻，待在他身旁的有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厲以甯的兒子厲偉和一位擔任祥雲公司飲料銷售經理的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三級的學友。

駱一禾是突發性腦血管破裂，導致腦部大面積出血，雖經醫務人員全力搶救，還是成了植物人，一直沒有蘇醒過來，終因器官衰竭，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三十一分在天壇醫院不幸去世，年僅二十八歲。

中共當局極爲擔憂駱一禾的死訊會引起社會震動，給學生運動火上加油，爆發更強烈的抗議浪潮，於是對駱一禾的家人

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迫使他的家人不得不全力予以配合，嚴密封鎖了駱一禾的死訊。就連駱一禾的喪事也一再遭到拖延，最後在中國官方有關部門的嚴密控制下，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在八寶山火葬場舉行了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由詩人西川和其他友人拉著他的靈床走向火化室。由於當時的北京城尚處於戒嚴狀態，包括詩人老木在內的一些友人已經踏上逃亡之路，因此，許多友人都未能送駱一禾最後一程。

駱一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個姐姐：駱小予、駱小紅、駱小元。駱一禾的不幸去世，給他的家人帶來了極大的悲痛，他的大姐駱小予回憶說："這對我父親打擊很大，後來一次在看《秋海棠》的戲時，我父親哭得特別悲痛。我才知道父親是在藉此緩泄失去愛子的悲痛，他一直壓抑著自己，怕引起我媽媽難過。"在駱一禾不幸去世後不久，駱耕漠先生的眼睛就徹底看不見了。人世間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

駱耕漠先生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在中共體制內的資歷與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于光遠相當，曾經擔任過包括中國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內的許多重要職務。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十七歲高齡的駱耕漠老先生出版了三十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往事回憶》。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十二點零六分，駱耕漠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歲。

我與駱一禾雖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友，住在同一棟學生宿舍樓----第三十二號學生宿舍樓，但在校求學期間並無多少交往，初次深入交談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下旬在中國政法大學民間舉辦的詩人海子的追思會上。駱一禾作爲海子短暫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和海子詩歌最堅定的捍衛者，是海子追思會的主要發起人，也是海子追思會的主要發言人。

在海子追思會上，駱一禾曾經痛切而堅定地表示，他一定要將海子近二百萬字的詩作遺稿整理編輯出版，以盡到朋友的責任，以慰海子在天之靈。沒想到話音猶存，他竟然已追尋好友海子而去。駱一禾的這個願望，包括他本人詩集的編輯出版工作，最終還是由好友西川完成的。

駱一禾對好友海子的離去充滿不舍，他的絕筆，就是一篇

紀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寫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上，也就是在他昏倒於天安門廣場的前夜。

詩人海子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任教于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哲學教研室，因爲對中國現實社會深感失望，思想極端苦悶，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前往河北省秦皇島市的山海關臥軌自殺。對中國現實社會深感失望，思想極端苦悶，在當時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也正是大批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在一九八九年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子走得相當從容，走之前的幾天，他特意從位於北京市昌平縣（現爲北京市昌平區）的中國政法大學新校區進城，到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老校區找我，將不久前借閱的幾本私人藏書還給我。交談之中，我沒有發現他有一絲的異樣。

海子本名查海生，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也是一位天才型的詩人。一九七九年秋季，在他年僅十五歲的時候，從安徽省安慶城外的小鄉村----高河鎮查灣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海子學的是法律，教的卻是哲學，這也從另一側面顯示了他的才華。

一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友曾經著文指出："有人說，海子想死，因此他死得聖潔，天國是他的歸宿；而駱一禾拒絕死，因此死得遺憾，他多麼希望從天國的風景裏走回來，告訴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海子在那裏很快樂。"【注釋 2】然而，我一直不相信海子想死，在稍後爆發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多少個夜晚，我坐在星光下的天安門廣場，望著沸騰的人流，想念著海子。我抬頭望著天上的星星，不停地詢問：海子，如果你看見了今天的景象，你還會對中國的現實社會失望嗎？你的思想還會苦悶嗎？你還會自殺嗎？

許多海子的朋友都有著與我同樣的想法。詩人老木在成爲"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成員後，曾經十分動情地對北京大學校友王軍濤傾述說："如果這場民主運動早一些時候爆發，海子一定不會自殺！他將在這一偉大的運動中找到自己心靈的位置。"詩人老木與駱一禾曾經是大學同班同學，但因病休學一年，遂成爲一九八零級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夜晚，當我與劉蘇里結伴去調查駱一禾死難情況的時候，過程頗有些曲折，回程途中還差一點就被一幫預先設伏的公安武警“人贓俱獲”，逮個正著。幸虧身爲聯絡部部長的劉蘇里十分機警，在離開我的一位同學住家之際，特意存放了裝有通信錄等敏感物品的背包，囑咐我的同學翌日專程送到北京大學交還給他，我們倆才得以在公安武警的突然截查中躲過一劫。這是另外一個故事，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講，我們還是再回到六月三日下午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吧。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鑒於中共當局將動用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的跡象日趨明顯，北京局勢急劇惡化，加之劉曉波（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侯德健（著名作曲作詞家、臺灣校園歌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周舵（北京著名民營公司----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和高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北京師範大學《師大週報》前主編）等四位知識分子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下午四點鐘，開始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北側舉行四十八個小時至七十二個小時的絕食請願活動(侯德健因爲六天后在香港有唱片錄音工作，只能絕食四十八個小時)，天安門廣場的人流再次陡然增多，在六月二日劉曉波等人絕食請願的第一天，就吸引了逾二十萬人圍觀，秩序趨於紊亂，決定立即向天安門廣場增派一支特別糾察隊，任務是維護秩序，保護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於是，我在會上主動請纓，表示可以馬上趕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保證迅速組織並帶領一支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由於我在不久前的絕食請願期間曾經多次入院治療，當時正在休養之中，王軍濤有點擔心我的健康狀況，對我的請纓顯示出些許猶豫。劉蘇里當即表示可以全力協助我，當天下午他要去天安門廣場替換陳小平（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憲法教研室副主任、“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成員），擔負起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知識分子的生活、醫療照顧，以及對外聯絡、新聞發佈等任務。

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突出表現有目共睹，與會者對我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還是有信心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第一次有組織的遊行示威活動，就是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舉行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總部最初設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園，首任主席周勇軍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生。後來成立的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團的總部也設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對話團團長項小吉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國際法專業一九八六級碩士研究生。在以往的歷次學潮中，中國政法大學全都是風平浪靜，按兵不動，不要說上街遊行，校園內就連大字報也難得一見，遂有“第三神學院”之稱號。“第一神學院”指的是中共中央黨校，“第二神學院”指的是中國人民大學。

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與會者，雖然對北京急劇惡化的局勢有所瞭解，也預料到近期內中共當局很可能將採取武力鎮壓行動，但沒有人預料到中共當局會動用真槍實彈、坦克、裝甲車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更沒有人預料到當晚就會發生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的事件。因此，一直到我和劉蘇里結伴離開爲止，當天的會議並沒有討論有關鎮壓事宜。

據我所知，劉曉波等四名知識分子的絕食請願行動是自發的，由劉曉波以個人的名義倡議發起，並不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提議和決定，“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只是在劉曉波、周舵的要求下，應允承擔後勤支援、新聞發佈和協調工作。劉曉波和周舵都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成員。

當日，北京城的氣氛已經非常緊張，許多知識界的知名人士紛紛離開京城避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也是在討論知識份子接力絕食請願的可能性、議論第二批絕食請願知識分子的名單時，才發現許多知識界的知名人士已經失去行蹤，聯繫不上。

與會的詩人老木見狀，於是就主動表示他可以參加第二批知識分子絕食請願行動，但未被大家接受。拒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擔任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傳部部長的職務，本職工作繁忙；二是應該找一些更有知名度的知識分子參

加絕食請願行動，例如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共同總召集人之一）、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共同總召集人之一、“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之一），他們倆人當時都還堅持留在北京。

會議尚未結束，我與劉蘇里即匆匆動身趕回中國政法大學組建特別糾察隊。由於時間緊迫，我們倆顧不得以往保密的慣例，通過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站公開宣佈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最新決定，呼籲人們在聽到廣播通知後立即到教學大樓前報名參加特別糾察隊。

通知一經播出，隨即有許多學生紛紛趕來報名，我和劉蘇裏從中挑選了四十名男學生，每人發給一塊臨時由教學大樓上扯下來的舊橫幅撕成的紅布條，紮在頭上，作爲特別糾察隊隊員的標記。

正當整合隊伍之際，一位學生從北京市中心帶來了局勢進一步惡化的消息。當天下午兩點鐘左右，中共當局指令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一帶、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的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前採取武力行動，搶奪一輛遭到市民和學生攔截的彈藥車。這輛彈藥車偽裝成民用大轎車，滿載槍支彈藥，準備提供給於六月二日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部隊。

在搶奪彈藥車的過程中，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在使用電警棍、棍棒的同時，首次並且大量地使用了催淚彈，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大打出手。許多學生和市民受到傷害，被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前門西大街一零三號）治療。由於受傷者人數眾多，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的醫務人員忙碌到當天深夜十一點鐘過後才處理完畢。自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起，就堅持在新華門前和平請願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也被武力強行驅走。

參加搶奪彈藥車行動的軍警分別來自于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區公安分局。隸屬于警衛第 1 師的

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對外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或“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的部分官兵，在副大隊長程志強的率領下，也參加了這一次行動。陸軍第 27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部隊官兵從人民大會堂出發，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和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的部隊官兵從中南海出發。

這位學生從北京市中心帶回來的最新消息，讓大家開始感覺到局勢已經緊張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大規模的武力鎮壓行動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於是，當特別糾察隊臨行之際，許多聞訊而來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簇擁在校門口揮淚相送，現場彌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氛。

在局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特別糾察隊已經宛如敢死隊，前景堪虞，無形中增添了我的心理壓力，作爲特別糾察隊的領隊，又身爲教師，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將這些參加特別糾察隊的學生平安地帶回來。不遠處，我所熟悉的一位特別糾察隊隊員正在與他的女友依依難舍地道別，使我感觸良深，生離死別的感覺油然而生，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

說來也巧，就在臨行前十分鐘，我接到了來自遠方家鄉親人的長途電話。自從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爆發以來，家人雖然曾經多次急切地來電話或電報詢問，但都因爲我一直身處天安門廣場或新華門前，而始終未能聯繫上。當時中國的通訊很不發達，在我們青年教師的宿舍區沒有電話，我所在的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雖然有一部公用電話，但也不能直撥長途電話，如要撥打長途電話，必須先到位於學校辦公大樓內的電話總機室交付押金，再回到工作單位等待接通電話。

在長途電話中，我顧不得對焦慮已極的弟弟多做解釋，只是簡單地告訴他眼前北京的形勢非常緊張，武力鎮壓行動隨時都會發生，我馬上要帶領一支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如果萬一遭遇不測，拜託他代爲盡人子之孝。同時反復叮囑弟弟千萬別把真實情況告訴母親，免得多年來守寡撫育我們長大成人的老母親擔憂。

似乎是由於第六感覺，我不經意間瞧見了不遠處一個躲躲閃閃的身影，她是與我同校的一位年僅二十歲的年輕女教師。

我們平時來往密切，相互間存在著若有若無的情愫，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也有過一些令人難忘的記憶。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劉蘇里、陳小平共同帶領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隊伍從校園出發，與北京市其他高校的學生隊伍一起向天安門廣場進軍，準備參加翌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一路上，在幾個小時之內，她不停地讓她的學生給在隊伍最前列帶隊的我送香煙，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後，我才赫然發現每個口袋裏都裝滿了外國名牌香煙。（當年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薪水十分微薄，一個月的薪水僅夠買十盒外國名牌香煙。）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當得知北京市部分地區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時，身爲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的我，特意趕到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的帳篷中，堅持要她離去，到附近她的舅舅家過夜暫避。臨別時在長安街上的激情擁抱，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們倆還共度過一個溫馨而無眠的雨夜。五月底的一個夜晚，我們相約離開喧鬧的天安門廣場，沿著南長街漫步到故宮博物院的護城河邊，享受著久違了的寧靜。不知爲何，她突然談起痛苦而難忘的初戀，哭得十分傷心，令我有點不知所措。

此時，或多或少有著生離死別的感覺，我連忙主動過去與她相見。她說是聽到廣播通知後趕來的。我對她說：現在形勢非常緊張，感覺是很快就要出大事了，今天夜裏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拜託你都不要出校門，萬萬不能到天安門廣場找我。如果你到天安門廣場找我，不僅不能幫助我，反而會給我造成很大的壓力和負擔。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她說：只要你不在場，萬一情況不對，我沒有牽掛，可以獨自撒腿就跑，逃跑的速度一定會很快。她點頭答應了。

（當晚十點鐘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事件發生後，北京城內密集而持續的槍聲讓她坐立不安，雖然十分害怕，最終還是獨自騎著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找我去了。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早已被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包圍得水泄不通，誰也別想進得去，她圍繞天安門廣場四處亂竄，都快急瘋了。這是後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十分左右，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成員搭乘一輛途經學校東大門的大卡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當時北京各界民眾都非常支持學生運動，學生搭車十分方便。一面中國政法大學的校旗在車頭迎風獵獵飄揚，一路上不斷贏得沿途市民的掌聲和歡呼聲。我們每一個人都無不激動萬分，似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四十分許

沿途已見不到遊行隊伍，車速飛快。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四十分左右，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成員即抵達天安門廣場。經過劉蘇里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副總指揮李錄（南京大學物理系一九八五級學生）聯繫妥當之後，我帶領四十名特別糾察隊員於下午四點鐘左右接管了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糾察任務，分佈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出口處。紀念碑底座一共有三層，每一層都有一個面積不小的平臺。

在此之前，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一帶的糾察線已經鬆懈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無幾的工人糾察隊隊員三三兩兩地散佈著，閒雜人員幾乎可以來去自如。

儘管局勢已經急劇惡化，中共當局當天下午已經指使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在六部口和新華門前開始實施武力鎮壓行動，而且我們又擔負著保衛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重任，但我們與所有參加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一樣，仍然赤手空拳，沒有任何防衛的武器，因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宗旨始終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依然絲毫沒有以暴易暴的準備，所謂的保衛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也無非只是維護正常的秩序而已。

然而，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之後，中共當局爲了開脫自己血腥鎮壓和平請願學生的罪責，製造民眾暴亂在先、軍隊開槍鎮壓於後的假像，竟然不顧鐵的事實，一再造謠誣衊學生和市民企圖暴動。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相當於副總理）、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接受中共中央委託，在中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聲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

死裏打。”

陳希同上述的這一番話，完全是不顧事實真相的一派胡言。倘若真如他所說的那樣，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中國官方簡稱爲“高自聯”)和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中國官方簡稱爲“工自聯”)企圖暴動，在天安門廣場分發各類武器，那麼，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成員擔負著保衛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重任，無疑將優先獲得這類所謂的武器，這是最淺顯易見的道理。

而實際上，所有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們，包括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成員在內，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被解放軍戒嚴部隊以武力血腥驅趕出天安門廣場爲止，依然是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何況，一貫擅長于宣傳蠱惑的中共當局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以武力佔領天安門廣場之後，也並未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手中繳獲這類所謂的武器，可見陳希同所謂的武器純屬子虛烏有。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的確是有一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曾經拿起石塊、汽水瓶子、木棍等根本算不上武器的“武器”，以暴易暴，自衛反擊，但時間根本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點鐘左右，而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也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之後。何況這一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以暴易暴的行爲完全是自發的，並不是由於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號召所致。陳希同秉承中共當局的旨意，故意混淆時間先後，顛倒因果關係，並將以暴易暴的責任歸之於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顯然是爲了給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開槍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提供依據。

陳希同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錫銘，都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重要責任者。他們夥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人，激化矛盾，謊報軍情，極力促使鄧小平下定武力鎮壓的決心。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六點鐘左右，一群憤怒的學生和市民給我們送來了一名身穿便衣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此時，化裝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爲數眾多，他們的任務除了偵探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和市民

們的動態，尤其是偵探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動態，就是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實地勘察，爲部隊強行挺進天安門廣場，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做好準備。

根據中國軍方有關資料透露，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行動之前，各個進京部隊的軍、師、團一級指揮官都曾經奉命化裝進入北京市區及天安門廣場實地勘察進軍路線、交通人流、沿途社情。例如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某團副團長黃小平中校按照上級指示精神，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上午率領團司令部的炮兵股股長姚乃武、通信股股長遲洪勝、作戰訓練股股長賈文儒、政治處保衛幹事乙體順，全都身穿便裝，乘坐由司機苑繼國駕駛的北京牌吉普車, 來到天安門廣場和西長安街一帶實地勘察部隊開進路線，結果被民眾識破身份。【注釋 3】

此外，也有部分身穿便衣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是因爲在開進途中迷路而進入了天安門廣場。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開始，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部隊官兵，奉命身穿便裝、徒手、分批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陸軍第 24 集團軍的部隊官兵奉命身穿便裝、徒手、分批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準備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被送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時候，由於沿途一再受到許多學生和市民的嚴厲譴責，已經驚恐得失去常態，雙目失神，臉色慘白，語無倫次，但渾身上下並無絲毫受傷之處。我們按照一貫的宗旨，急忙將他保護在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的一個大帳篷裏，將他與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們隔離開，並隨即請來一位在絕食棚中照料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知識分子的醫生，我們知道，身穿白大褂的醫生有助於穩定他的情緒。

這名軍人起初仍不承認軍人身份，但從他的襯衣口袋裏找到了士兵證。我們在對他進行一番有關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真相和宗旨的說明之後，委託醫生伺機用救護車將他安全地送出了天安門廣場。

同樣的，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某團副團長黃小平中校在被民眾和學生識破軍人身份後，也被送到了天安門廣場，然後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一位學生領袖的安排下，指派專人護送，連人帶車安全地離開了天安門廣場。據中國軍方有關資料記錄，黃小平中校在脫身之後很快就與團司令部炮兵股股長姚乃武等人會合，並且馬上打電話與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聯繫，在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值班參謀的幫助下，又迅速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取得了聯繫，得知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奉命從北京城外向北京城內強行開進，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黃小平在署名文章中寫道："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十分興奮，感到中央決策正確。我們什麼傷痛、饑餓、疲勞都顧不上了。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艱難行程，我們終於在（六月）三日二十四時前找到了自己的部隊。"【注釋 4】

我所親身經歷的、放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這件事，就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點鐘以後，發生在所謂的非法組織----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所在地，然而，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但沒有遭遇到陳希同所稱的被"往死裏打"的命運，反而受到了應有的保護，並被安全地送出了天安門廣場。真不知道陳希同對這件事又會作何解釋。

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因爲身份暴露而被學生和市民截住，看起來似乎很不幸，但其實是幸運的。相較于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一些中國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其實才是不幸的，才是倒楣鬼。這些便衣人員奉命化裝混入天安門廣場，或分佈在北京市區各個交通要道的人群中，由於他們的真實身份沒有被學生和民眾所識破，因而一直在現場執行所謂的公務。他們或許知道當晚解放軍戒嚴部隊將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訊息，但可能也沒有料想到一向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竟然會使用真槍實彈對付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加之他們的上級也可能不知道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可以開槍的情況，沒有及時向他們發出撤離現場的通知，因此，這些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也慘死在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不分青紅皂白的槍口之下。

這些死亡的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就是陳希同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所說的，被解放軍戒嚴

部隊所誤傷的“正在現場執行公務的人員”。

這些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所執行的所謂“公務”主要有三項：一是趁機製造混亂和事端，爲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行動提供藉口；二是掌握現場民眾的動態，收集民眾的“犯罪”證據，爲血腥鎮壓行動過後的大逮捕行動做好準備工作；三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沿途接應不熟悉北京市區交通情況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爲迷路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指引前進方向，救援掉隊或受傷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

有知情者透露，事後，中國國家安全部和中國公安部曾經專門就執行“公務”的屬下人員“無辜”遇難之事向中共中央反映，對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的行爲表示強烈不滿，許多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人員也因此消極對待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逮捕行動。針對這種情況，中共當局命令解放軍戒嚴部隊在結束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後，迅速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屬下的各公安分局和公安派出所，主導抓捕所謂的非法組織骨幹分子、動亂分子和暴亂分子的行動。

據說，中共當局對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消極作爲很不滿，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王芳爲此承擔責任提前下臺。

爲了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行動，奉命在各個重要地點執行“公務”的國家安全系統和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爲數不少。山東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學生潘強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前，就曾經被兩位裝扮成一對年輕夫婦的國家安全系統或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盯上並遭出賣。

潘強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起，天安門廣場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先是人民大會堂西面湧出一大批軍隊，和勸說的北京市民發生衝突，被打傷的市民捂住血流如注的頭，到紀念碑報信。在我和幾位糾察隊員趕到時，衝突已停止，但當我們走入坐在地上的士兵中進行戒嚴真相宣傳時，仍感到軍隊士兵和軍官中相當大的敵意。

這時我無意中犯了一個也許影響我一生的錯誤。那時在圍觀的人群邊有一對年輕夫婦，象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樣爲學生鼓

掌助威。當時我象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外地學生一樣，將我的學生證用別針別在我的上衣口袋，以便有突發事件時，可以辨別身份。所以當那對‘夫婦’自稱是我的校友，要看我的學生證時，我不加思索地遞了過去。

後來我成爲北京市公安局在山東內部通輯的兩名學生之一（另一位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很活躍的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的許泉)，有幸上秦城監獄（獄友們戲稱‘秦大’）暫時居住，相信部分歸功於這對‘夫婦’的努力。”

潘強在回憶中，同時也提到了一位國家安全系統或公安系統的便衣人員同情學生的故事：

“我從大會堂西門回到天安門廣場山大(山東大學---作者注)駐地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七點鐘左右，天色已經有些昏暗了。我看見科社系（社會科學系---作者注）劉夢溪等同學不知從哪裏找來好幾根大木棍，拿在手中，一問才知他們在回天安門廣場的路上碰上一個便衣，那便衣流著淚告訴他們趕快回家，今天晚上一定會動手。便衣爲了證明他自己的身份，甚至從身上掏出了對講機。所以這些同學才決定準備木棒自衛。

我好不容易才勸阻他們放下這些無用的‘自衛武器’，因爲道理很簡單，對方是擁有自動武器的軍人，就算你可以打他一棍，他一扣扳機可以打出至少十發子彈，掃倒一片人。這時，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需要糾察隊換守位於紀念碑下的廣播站(學生絕食團廣播站----作者注)，於是包括外文系孟祥成等同學在內的十幾名山大人成了幾乎是清場前廣播站的最後一批糾察隊員。”【注釋 5】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六點三十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突然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發出第一項緊急通告。該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執行戒嚴任務，履行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社會安寧的神聖使命，得到了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近日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眾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堵截軍車，搶奪武器，毆

打幹部戰士，盤查、圍攻軍人，阻攔戒嚴部隊的行動，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的違法行爲，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們鄭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阻軍車，阻攔、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軍隊行動時間、方式、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幹預。我們堅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這項緊急通告中"軍隊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幹預"一語可圈可點，頗有含義。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市部分地區（包括整個北京市區）從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零點開始實行戒嚴以後，逾百萬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出動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可以說是全民"截"兵，幾乎所有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均遭到強力阻攔，無法進入北京市區，到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爲了避開學生和市民的阻攔，到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得不使用各種化裝方式，分批進入北京市區，已經根本顧不上軍人的形象及軍人的著裝規定。

這項使用了"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辭令的緊急通告，已經撕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自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深夜執行戒嚴令進駐北京後一直僞裝的"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虛假面目，開始顯露出進京執行武力鎮壓任務的真相，在在顯示一場血腥鎮壓行動即將開始。但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和廣大的學生們對此並未引起應有的警覺，一切仍按既定的計畫照常進行。

六月三日晚上七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七點鐘，根據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事先安排，我帶領一部分特別糾察隊員在紀念碑底座南側不遠處設置了糾察線。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將在此處召開一場新聞發佈會，內容主要是關於在六部口搶奪彈藥車事件中，一些北京市民和學生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暴力傷害的情況。【注釋 6】

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總指揮柴玲（北京大學生物系一九八七屆畢業生、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一九八七級碩士研究生）、副總指揮李錄、封從德（北京大學遙感研究所一九八六級碩士研究生）等學生領袖出席了這次新聞發佈會，李錄擔任新聞發佈會的主持人。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學生組織所召開的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在場的記者約有三十多位，絕大多數是中國記者。

柴玲首先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她強烈譴責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使用武力傷害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暴行，號召大家要不畏強暴，繼續堅持以和平方式抗爭到底。

曾經擔任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第二任主席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一九八八級學生）也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他號召所有的北京民眾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要堅持象以往一樣，與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站在一起，共同接受嚴峻的歷史性考驗。他同時希望記者朋友們要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堅守工作崗位，爲歷史留下真實的記錄。在我的記憶中，吾爾開希在發言之後還即席演唱了侯德健最新創作的一首歌曲。

許多受傷者出席了新聞發佈會，紛紛以親身經歷控訴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的暴行。其中，有一位受傷不輕的民眾坐著平板車趕來參加。這些民眾大都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因爲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武裝警察部隊官兵和公安人員搶奪六部口彈藥車而受傷的。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頭破血流、渾身血跡斑斑的北京測繪出

版社職員鄭魯濱的控訴發言。【注釋 7】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十五分，鄭魯濱在人民大會堂南側看見一群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武裝帶（軍用腰帶）猛力抽打學生和市民，便沖上去搶救一位被擊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他也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毒打，頭部被軍用鋼盔擊破，血流如注，白色襯衣幾乎全都被鮮血染成了紅色。（參見附錄照片）

根據當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兵力部署情況判斷,這些在人民大會堂南側施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隸屬于陸軍第 65 集團軍，他們當時奉命從人民大會堂沖出來，準備前往六部口參與搶奪彈藥車的行動。

鄭魯濱身爲中共黨員，他對在場的記者和民眾說：“我特意抓住鋼盔在軍人方陣內轉了一圈，請他們看看人民軍隊毆打人民的證據。我熱愛黨，按現在不許支持學生、不許上街的通令來看，我是違犯了黨紀，沒有跟黨保持一致，但我堅信李鵬決不代表党。”

新聞發佈會上，一樁樁血案證據確鑿，血淋淋的事實觸目驚心，圍觀旁聽的學生和市民們反應強烈，無不義憤塡膺，不時地爆發出一陣陣憤怒的口號聲。然而，又有誰能想到，這些血案僅僅是大流血事件的一個小小的開端而已，更大的血案尙在後頭呢！

中國的老百姓實在是太過於善良，或許是由於四十年來經受了中共當局太多的欺騙宣傳，對中共當局和鄧小平的本性缺乏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象魏京生那樣，早在十年前就看透了鄧小平獨裁者本性的先知先覺者，實在是微乎其微。在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期間，當全國上下一致爲再次複出政壇的鄧小平評功擺好，爲中共當局所提出的“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軍事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的四個現代化政策拍手叫好的時候，魏京生就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了一張題爲《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十分明確地指出，如果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今日深得人心的鄧小平很可能就會成爲下一個獨裁者。如今真的被魏京生不幸而言中，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下令調動軍隊進京並開槍殺害學生和民眾的正是鄧小平。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鐘左右，一支人數約百人的北京大學學生糾察隊來到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他們一律身穿胸前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白色 T 恤，衣著整齊，士氣高昂。這一支生力軍來得很及時，大大有助於減輕我們特別糾察隊的工作壓力，我不禁爲之一喜。由於侯德健的高知名度，引來了成千上萬的慕名者和好奇者，集聚在紀念碑底座下，不時地形成一波波洶湧的人潮，給我們特別糾察隊增添了極大的工作壓力。每當侯德健的身影出現在絕食棚外，總要引發一波洶湧的觀看人潮，以至於我們不得不限制侯德健的行動，請他儘量別在絕食棚外露面。

經過協商，由新到達的北京大學學生糾察隊接防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西、南三個方向的出口處，我們這支特別糾察隊則集中兵力佈防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面的出口處。此後，一直到六月四日清晨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用武力強行驅走爲止，我們這支特別糾察隊始終都處在這個位置。這個位置面對天安門城樓，是整個天安門廣場上視野最好的地方。

直到此時，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員們尚未吃上晚飯，雖然我直接出面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的一位負責人交涉，一再向他反映實際情況，並且強調指出，按照“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要求，我們這支特別糾察隊必須堅守到翌日中午，時間漫長，任務艱巨，相當辛苦，但依然久久未能供給晚飯。

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秩序相當混亂，雖然在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赴京學生代表的協助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經歷過一次全面性的整頓工作，統一搭起了由香港各界民眾所捐助的帳篷，表面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實際上的操作和管理仍很混亂，年輕的學生領袖們對管理人潮洶湧的天安門廣場有點力不從心。

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中下旬以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學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他們來自于全國各地的數百所大專院校，沒有統一而嚴密的組織，加之流動性又強，管理上的難度的確很大。據中國官方有關部門統計，當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活動之後，全國先後共有 332 所大專院校

的數十萬名學生赴京聲援。

據題爲《香港大專學生參與北京民運的過程》的文章透露，當時負責協助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進行天安門廣場整頓工作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女學生、國是學會前任幹事潘毅。她先與一些赴北京聲援的香港同學設計出一張天安門廣場整頓工作的規劃圖，其中包括數百個帳篷、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供應站、醫療救助中心、“民主女神”塑像、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以及講台的設立位置，然後由赴北京聲援的香港學生根據這張規劃圖，逐步重整天安門廣場秩序。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捐助的大批帳篷運抵北京，香港赴京學生代表遂發動赴北京聲援的外地學生搭建帳篷，短短兩天時間之內，就在天安門廣場南北地帶總共設立了三百多個新式帳篷，解決了天安門廣場上約一半學生的住宿問題。

我們這些擔負重任的特別糾察隊成員在挨餓，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卻將大量的盒飯供給以各種理由來到紀念碑底座遊蕩或探視的“閒散人員”。一些濃妝豔抹的女性坐在紀念碑底座臺階上吃得津津有味的，對特別糾察隊員們產生了強烈的刺激。我一方面極力安撫特別糾察隊員們的情緒，一方面再次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的那位負責人交涉，忍不住對他大發雷霆，甚至以撤走特別糾察隊相威脅，但依然無濟於事。

直到很晚以後，我們才在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香港物資供應站領到食物，每人一個小麵包，每兩個人一小瓶軟包裝汽水。香港物資供應站由香港赴京聲援的學生和市民所設置，主要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的赴京學生代表負責管理，他們帶來了香港各界團體和人士所捐助的部分款項和物資。

相比之下，許多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遭遇更糟糕，他們居無定所，許多人睡在草坪上或馬路邊，三餐無繼，一天最多能吃上兩餐，而且餐餐都是幹麵包，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全靠一股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熱情支撐著。天安門廣場上雖然也成立了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但並未對流動性很強的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實行有效的管理，提供有力

的後勤保障。“外高聯”與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之間，尤其是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之間，時不時還發生一些摩擦。

據我所知，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物資供應照理說不應該缺乏，因爲海內外的大量捐款以及各類捐助物品都紛紛湧向這裏。我的同事、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青年教師萬新金，拉著隋顯彬、陳揚等幾位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學生作爲骨幹，在天安門廣場上成立了北京市市民自治聯合會，據說，他們以北京市市民自治聯合會的名義，每餐都能從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領到二、三百份盒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五十分左右，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第二項緊急通告。該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當前北京的事態發展已十分嚴峻。極少數暴徒大肆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公然誣衊、圍攻、毆打和綁架解放軍戰士，搶奪軍火武器，圍堵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並企圖糾集各種勢力，隨時可能製造嚴重的暴亂。爲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決不能置之不理。爲此，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特此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根據中共當局歷來處理大規模群眾示威事件的慣例，這種性質緊急通告的播放，往往就是鎮壓行動開始的先兆。回顧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史稱“四五運動”），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吳德，即在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前夕，奉命發表過類似性質的廣播講話，其內容如下：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

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企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爲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回想當年，年少無知的我，曾與全國各地千千萬萬單純的青少年一樣，從內心裏擁護中共當局對所謂膽敢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首都北京借機鬧事的反革命分子採取鎮壓行動，可悲地信從並認同了中共當局相關的欺騙宣傳。而今，我卻置身於所謂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應該算是我的光榮，還是應該算是中共當局的悲哀。放眼望去，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一帶的人群，幾乎全都是被中共當局稱之爲“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青年一代，真是對中共當局四十年獨裁專制統治的莫大嘲諷與揭露。

通過第二項緊急通告，中共當局已經明白無誤地發出了血腥鎮壓行動即將開始的訊號，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應該能從中嗅到火藥味。但由於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市部分地區進入戒嚴狀態以來，天安門廣場上空一直回蕩著“狼來了！狼來了！”的呼喚，而“狼”卻始終沒有出現，也許是經歷了太多的虛驚，人們的神經已經麻木，因而天安門廣場上的絕大多數人並未對此項緊急通告引起足夠的警覺，絲毫也沒有察覺無情的屠刀已經懸臨頭頂。

縱觀寬闊的天安門廣場，依然人山人海，數以萬計的民眾像往常一樣，開心自在，尚在歡度著盛大的節日。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整整四十年了，中國民眾深受中共當局獨裁專制統治的壓抑，難得有一個公開而盡情地釋放情緒的機會。此時此

刻，人們或是興致勃勃地觀賞著豎立在天安門廣場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擁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側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知識分子所處的絕食棚前，齊聲而有節奏地呼喊著：“侯德健，出來！侯德健，出來！”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詞家侯德健之風采。

當時的北京城內曾盛傳著一句話：“先看女神後看猴（侯）。”“民主女神”塑像和絕食請願的侯德健儼然成爲北京城內吸引人的新景觀。“民主女神”塑像由中央美術學院的一群學生集體創作雕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六點鐘開始搭鷹架，五月三十日完工。“民主女神”塑像自豎立之日始，即成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重要象徵物。爲了減輕對糾察線的巨大壓力，我們不得不調整對侯德健的“禁令”，有限度地讓他從絕食棚裏出來與圍觀群眾見面。

一位年輕而亮麗的姑娘被阻攔在紀念碑底座下的糾察線之外，朝我揮手大聲喊叫：“吳哥！吳哥！”非常引人注目。我定睛一看，原來是北京人才考試與評價中心的辦公室主任劉丹紅。北京人才考試與評價中心是陳子明、王軍濤旗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相關團體，負責人是謝小慶（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滔的兒子），辦公地點設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內。劉丹紅解釋說，因爲哥哥（名字叫劉多斐，武漢大學中文系插班生）到北京出差，於是陪同他來天安門廣場看一看。我與劉丹紅雖然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但我並沒有破例讓她與她的哥哥進入紀念碑底座，只是隔著糾察線與她聊了一會。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陳子明、王軍濤被中共當局指控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由中國公安部發出了通緝令。爲了掩護“欽犯”王軍濤逃亡，劉多斐、劉丹紅兄妹以及大江高科技應用研究所所長鄔禮堂先生、華中師範大學科技開發公司總經理肖遠先生、華中師範大學資料員陳漢華女士等一批湖北省武漢市的血性漢子和巾幗英雄，付出了被捕入獄判刑等代價。俠女劉丹紅出獄後將整個過程寫成了《情義無價》一書，交由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感動了無數的讀者。

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在緊張氣氛中按照原訂計劃在“民主女神”塑像下舉行開學典禮儀式，宣告正式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張伯笠（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員）出任校長，項俊（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擔任教務長，並聘請嚴家其、劉賓雁（《人民日報》資深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擔任名譽校長。

出席開學典禮儀式並致詞的知名人士不是很多，其中包括嚴家其和作家老鬼、報告文學作家趙瑜等人。劉賓雁當時正在美國當訪問學者，未能出席開學典禮儀式。

老鬼本名馬波，時任《法制日報》記者，他與我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七級學生，當年以自傳體小說《血色黃昏》揚名文壇，他的母親是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著名女作家楊沫。

趙瑜當年以長篇報告文學《強國夢》而聞名，曾經獲得一九八八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

在開學典禮上，張伯笠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將從六月四日起在“民主女神”塑像下正式授課，課程內容包括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授課教師大多是海內外的知名學者、作家。每晚八點鐘至十點鐘，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將舉辦自由論壇，讓大家自由發言，討論問題。

張伯笠指出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使命是：衝破專制藩籬，向自由奔騰，擁抱法制，宣導民主……。它將爲以民主意識建設國家做好思想上和幹部來源上的準備，它將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對民眾的思想啓蒙任務。

張伯笠當場公佈了一份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名譽教授的名單，包括嚴家其、包遵信、劉賓雁、陳鼓應（臺灣學者、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李洪林（時任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劉再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李澤厚（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美學家）、于浩成（原中國公安部屬下的群眾出版社社長、著名法學家）、蘇曉康（時任北京廣播學院講師、電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鄭義（作

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說《老井》、《遠村》和電影文學劇本《楓》等)、老鬼、趙瑜、柯雲路(作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新星》等)、王魯湘(時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電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電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李陀(文學評論家)、蘇煒(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徐剛(詩人、時任《人民日報》記者)、范曾(畫家、時任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主任)、邱延亮(香港浸會大學教師)等人。

緊接著，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總指揮柴玲致賀詞。她在發言中說："越是黎明即將到來，黑暗就越是濃重，但黑暗之後將是一個全新的共和國的誕生！"柴玲充滿激情的發言再次激起了聽眾的亢奮情緒。

報告文學作家趙瑜在致賀詞的時候，運用典型的文學語言，把民族使命感一下子推到了莊嚴的頂點，他說："偌大的中國除了良心、公正和勇敢，什麼都不要！民主與自由是在萬眾一心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已然是一個光輝的象徵----直面鮮血與槍彈，中華民族要再生！爲此我祝賀！"

在開學典禮上發言的來賓，還有馬少方(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北京電影學院學生)代表大學生致賀詞，詩人老木代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致賀詞。

在所有來賓發言之後，當即由名譽校長嚴家其開講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第一課，主要內容是關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含義，以及他對今後中國局勢的看法。嚴家其在講話中再次呼籲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討論並廢除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所簽署的中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並呼籲罷免李鵬的國務院總理職務。嚴家其講了大概有四十五分鐘，在他講完以後，就是自由論壇的開始。

上述與會者的發言，激起在場數千名聽眾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全場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似乎民主運動再次迎來了新的高潮。

其實，從當天晚上八點鐘開始，北京城的形勢已經急劇惡

化，血腥鎮壓行動即將發生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不斷接獲從不同管道傳來的消息，大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已經奉命從各個方向強行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沿途開始使用暴力，軍民衝突不時發生。

一位學生前來天安門廣場報告說，在西長安街以西延長線上的萬壽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一帶的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的機關大院裏，其中包括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鐵道兵司令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解放軍總參謀部工程兵部的機關大院，以及解放軍 301 醫院(解放軍總醫院)、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原解放軍政治學院等軍事單位的機關大院裏，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全副武裝,整裝待發。在誓師動員大會上，全副武裝的部隊官兵齊聲怒吼，現場一片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慄。萬壽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均位於北京市海澱區，通常被稱爲北京西郊，不被視爲北京市區。

其間，也曾有自稱是解放軍現役軍人的人士或親赴天安門廣場，或打來匿名電話，明白無誤地告知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已經接獲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的命令，並及時向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轉達了清場命令，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將在今夜發生。

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對這些消息將信將疑，無法予以查證。不過，還是及時通過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發出了一項緊急呼籲，要求北京各高校的學生趕快返回校園傳達資訊，召集同學，一起來保衛天安門廣場。

據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北京大學學生邵江回憶透露，當時，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也接到了許多消息，已經掌握了武力鎮壓行動即將開始的蛛絲馬跡，不過，誰也沒有料想到武力鎮壓行動的殘暴程度，中共當局竟然會下令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無情地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賽萬提斯塑像所在的草坪上召開會議，針對北京急劇惡化的局勢，做出了一項決議，要求北京各高校的學生

自治會在當天各自動員兩千名學生趕赴天安門廣場增援。爲此，北京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還特意準備了八百件胸前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白色 T 恤，提供給趕赴天安門廣場增援的北大學生使用，以壯行色。

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確實有不少解放軍的現役軍人出於良知和正義感，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甘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千方百計地支持和幫助學生。許多預先知道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動態並向學生組織提供內部資訊的人士，本身就是解放軍的現役軍人，軍銜也不低，其中有的還是解放軍三總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或解放軍各軍兵種總部機關的校級軍官。一位海軍總部的現役軍人曾經主動來到中國政法大學校園，明確表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同時還爲學生運動獻計獻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中共當局有關部門將此列爲一件要案查辦，嚴厲追查這位海軍總部現役軍人的身份。爲了保護這位海軍總部的現役軍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民法教研室青年女教師費安玲經受了巨大的壓力和磨難。

在這些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解放軍現役軍人中，有一位背景特殊的女軍人，她就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已於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逝世）的女兒羅點點。羅點點本名羅峪平，時任海軍總醫院門診部主任，與中共軍界的高層人物及其子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她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被控向學生組織洩露軍事機密，於一九八九年七月被捕，秘密關押在北京郊區西山的一個軍事據點。

羅點點被控的一樁具體罪狀是，利用其父親羅瑞卿大將的軍界關係，聯絡一批軍界元老的遺孀，鼓動七位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批授銜的解放軍上將張愛萍（曾任中國國防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蕭克（曾任中國國防部副部長、中國軍事科學院院長）、葉飛（曾任海軍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李聚奎（曾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楊得志（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陳再道（曾任武漢軍區司令員、鐵道兵司令員）、宋時輪（曾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中國

軍事科學院院長），聯名上書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共中央軍委，明確反對動用解放軍部隊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

據一位知情者透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羅點點居中穿線，一天時間內就找到了十幾位當時尚在人世的一九五五年第一批授銜的解放軍老上將，徵集簽名。其中，有的人避而不見，有的人婉言拒絕，但張愛萍等七位上將毅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關鍵時刻，他們高風亮節，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當時，即將在北京"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前夕，這樣的聯名信在主張武力解決問題的鄧小平等人看來，是非常不合事宜的嚴重政治事件。

七位解放軍老上將的這封聯名信在當天晚上就被送到了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毫無疑問，立刻被扣壓下來，並沒有發表。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市爆發了自從實施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有逾百萬各界民眾參加。"七上將的聯名信"被印成傳單在這次遊行中廣泛散發，不過，其內容已經有一些走樣，中心思想變成了七名上將聯名上書中共中央軍委，反對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反對以李鵬爲首的"僞政府"，要求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會議，罷免鄧小平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但是，這七位連署簽名信的老上將，沒有人站出來急於表白自己，對聯名信和聯名信的內容予以否認，他們選擇了沉默，這時候的沉默真的比金子還貴重。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特地召開會議，專門清查七位老上將聯名上書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共中央軍委的"嚴重政治事件"。張愛萍將軍根本不屑於去參加會議，還讓人傳話給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讓歷史來證明六四事件的對錯。"楊得志將軍的表現正好相反，每會必到，而且非常實事求是地說："七個人上書中央，我簽了字。其實，我自己還親手寫了一封信，只是我這一份還未修改好，那封聯名信就已經報上面了。"楊得志將軍這一番話的意思非常明白：如果沒有七個人聯名上書，我自己也是要單獨上書的。

據說，羅點點被捕後，其母親郝治平四處奔波，多方求援，最終獲得鄧小平小女兒鄧榕的幫助，在關押近一年時間之後獲

釋，但軍籍無法保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羅點點與鄧榕一起在陝西省延長縣插隊落戶，同為落難的“紅色公主”，相互間曾經有過深厚的情誼。

張愛萍等七位老上將聯名上書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共中央軍委，在當年是一件影響重大的事件，特將該聯名信全文轉錄於下：

首都戒嚴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

鑒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入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張愛萍將軍一位幹女兒的家中，本身也是中國軍隊高級將領子女的她，對我證實了張愛萍將軍當年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反對動用解放軍部隊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而且這種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陳曉魯是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的小兒子（第三個兒子），為人非常好，在中共高級幹部子弟的圈子中是公認的好人。他與羅點點一樣，也是積極支持學生運動，反對動用解放軍部隊進京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陳曉魯雖然本身不是解放軍現役軍人，但是，他在軍界的人脈關係極其深厚，因為其父親陳毅是解放軍的十大元帥之一，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其岳父粟裕位列解放軍的十大將之首，曾任中國國防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長。

陳曉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被列為整肅對象，如果不是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著名“左王”王震出面擔保，也難逃被捕的命運。王震雖然極力主張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但念及與陳毅的舊情，還是出面保護了陳曉魯。據說，王震得知陳曉魯被軟禁在家中，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遂以探視的名義親赴陳曉魯家中(粟裕大將舊宅)，先是揮舞著拐杖將陳曉魯臭罵一頓，然後警告說：“下不為例！”

陳曉魯現任北京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其妻子的名字叫粟惠寧。

在《回顧與反思》一書中，記錄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的一段回憶，談到了當年一些解放軍現役軍官對學生的幫助和指導：

第二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作者注)上午，大量處理的是大量被捕(“被捕”一詞使用不當或不確，應該是“遭民眾圍困”----作者注)的軍人。當時被捕的軍人很多，還繳了很多械。但是，這個情況已經引起了我們嚴重的關注，認爲這是一場大行動的先兆。首先我們派出了政策推行部的幾乎全部人馬去到各個被捕軍人的地方，說服同學把他們放走，同時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這時有兩位中校主動向我們說明背後的意圖，還有一名將軍。按照這次談話的結果，我已經在腦子裏形成了一個看法，這是一次預演，這是一次故意的疲憊戰。氣氛開始被弄得越來越激烈，好像有一觸即發之感。這時就有了武器收繳，把所有的東西都收繳到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作者注)。我印象裏戰利品還真不少，破槍、破炮、子彈一大堆，大部分是鋼盔之類的，請專家看了看，沒有一樣開得動，刀子也生銹，槍也沒槍拴。

總之，這個情況已經變得非常明顯，這是一場故意的陰謀。根據當時這些判斷，立刻把這些東西送到了公安局，從公安局裏拿到了收條，召開了三次記者招待會，向各位記者不斷地展示收條，同時請政策推行部的人到各個帳棚去，請棚長向每個同學說明這一兩天發生的緊急情況，請大家做好意外時刻的準備。

當時的準備也並不很多，建立的基本原則是五月十九日晚上(當天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作者注)到二十日晚上建立的所謂的原則，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男同學保護女同學，互相並肩和平撤退，同時圍成一個圓圈，這是接受了一個空軍少校的建議，叫中心開花，中心突破，學習了很多軍事術語，最後形成了這一套方案。這套方案在絕食最初的幾天，每天都向大家傳述，同時和醫藥站的人緊急商量弄了幾千個口罩和毛巾，爲防瓦斯。後來這都發下去了，在撤退過程中我發現每個人至少有一條毛巾或者有一個口罩。這是當時做出的一些反應。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名發出了措詞更爲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該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六月三日淩晨，部分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入城，保衛重要目標，由於極少數人造謠煽動，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市內多處路口設置障礙，使部分入城部隊受阻，解放軍戰士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在混亂中，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他們公然毆打、侮辱、綁架解放軍戰士，不僅打傷一些戰士，毀壞一些軍事設施，甚至肆無忌憚地搶奪軍用物資、武器。由於一些路口設障，還造成市內多處交通堵塞。這種公然違反戒嚴令的無法無天行徑，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慨，強烈要求採取強而有力措施，決不能讓他們認爲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決不能手軟。爲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解放軍奉命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爲了制止動亂，維護首都安定，恢復正常秩序，完全是爲了保護人民群眾利益，決不是針對廣大群眾和學生的。廣大市民對此已經越來越理解。請各界人士和群眾積極支持解放軍部隊執行戒嚴任務。

二、在這場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命運前途的嚴重政治鬥爭中，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三、全市人民要顧全大局，堅守崗位，遵守戒嚴要求，不要聽信謠言，不要圍觀，自覺維護首都治安和社會秩序。

四、對於打、砸、搶、燒、破壞治安等一切違法犯罪活動，對於所有暴徒，一定要堅決打擊，嚴加懲處。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這項緊急通告儘管殺氣騰騰，清楚地表明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但並沒有嚇唬住所有的北京民眾，反而將許多原先不知道局勢急劇惡化的北京民眾從家中或工作單位召喚到了天安門廣場，決心與堅守不退的學生們生死相依。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學生，這些北京民眾似乎都忘記了自己此時此刻所

面臨的危險，但只要聽一聽他們相互間的一些談話，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對於自己此時此刻來到天安門廣場將要面臨的危險是很清楚的：

“現在這是幹什麼呀？一口一個不能保證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果國家不能保證我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還要這個國家幹什麼？”

“危險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難道是學生嗎？難道是我們嗎？你問問這位女同志，她覺得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人會威脅到她的生命安全嗎？”

“如果說現在有誰威脅到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當兵的！”

“我真想不通，李鵬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對待我們。現在這樣活著真窩囊，出門時我已經跟我媽說了，如果我明天沒回去，就到這裏收我的屍體！”

我佇立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俯瞰著天安門廣場上數以萬計的人群，心裏默默地祈禱著：人們啊，爲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請願的學生，爲了保衛民主運動的成果，你們今夜千萬不要離開天安門廣場，一定要象往常一樣，與學生共存亡。根據以往的經驗，群眾聚集得越多，中共當局動用武力清場的可能性就越小。身爲教師，我對學生安危的關切之情自然遠勝于常人。放眼望去，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依然人潮洶湧, 人數至少在十萬以上。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鐘

罪惡的槍聲終於打響了，時間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鐘左右。當第一陣隱約的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實際上，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時間比這要早一些，大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地點是在西長安街以西延長線上的五棵松一帶，但因爲距離遠，以及天安門廣場上比較喧鬧等因素，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包括我在內，當時並沒有聽到槍聲。根據我個人的記憶，在天安門廣場上聽到槍聲應該是在晚上十一點鐘左右。

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顯示，第一個死于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口下的六四遇難者是宋曉明，死亡的時間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死亡的地點就在五棵松路口附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女士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中，較爲詳細地記載了宋曉明遇難的情況。

宋曉明是中國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廠的技術工人，遇難時年僅三十二歲。中國航天部當時總共擁有三個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宋曉明行走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正好遇到一長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車從南邊開過來，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進，軍人們在軍用卡車上向路旁呼喊抗議口號的民眾開槍射擊，一顆子彈穿透宋曉明的大腿根部動脈，頓時血流如注。宋曉明儘管被在場的好心民眾及時地送到了附近的解放軍三零一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但是，駐紮在該醫院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持槍嚴厲警告醫生不准搶救，不准輸血，終因流血過多，於六月四日淩晨不治身亡。

解放軍三零一醫院外科主任蔣彥永醫生（參見附錄照片）在 2003 年 4 月 4 日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透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這兩個小時中，解放軍三

零一醫院急診室就接收了八、九位被子彈打傷的民眾，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醫生們發現解放軍戒嚴部隊使用了國際公法禁止的開花彈。

宋曉明遇難後不久，他的母親因腎衰竭而去世。宋曉明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太子峪公墓（位於北京市豐台區長辛店鄉太子峪楊家墳村），編號八十三號，沒有墓碑。

在宋曉明遇難的時間段，途徑五棵松等地，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通信團、集團軍直屬工兵團和陸軍第 63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7 師，首先開槍和大肆開槍的部隊，是作爲第一梯隊開進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

時隔不久，從北京城不同方向陸續響起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站在紀念碑底座上眺望西長安街方向，熊熊火光沖天而起，染紅了那一片夜空。中共當局蓄謀已久的血腥鎮壓行動終於開始了！

密集的槍聲揭開了血腥鎮壓行動的序幕，而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儀式則在密集的槍聲中匆匆落幕。誰也無法料到，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即是它的結業儀式。參與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的知識界人士大多在密集的槍聲中先後匆匆離去。

此後，一些學生和民眾絡繹不絕地來到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向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報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各處使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和坦克，無情屠殺勸阻他們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學生和市民的情況。前來報訊者幾乎全都滿身血跡，或由於自身受傷，或由於救護傷亡者所致，情緒大都激動得有些失控。

直到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和廣大學生們才如夢初醒，無法回避血淋淋的現實：中共當局終於下毒手了，他們不僅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使用催淚彈、電警棍，而且使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和坦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所謂的“人民子弟兵”，開始血腥地屠殺人民！

與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一樣，我感到萬分震驚。雖然在率領特別糾察隊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出發時早已知道局勢極度緊

張，做好了隨時遭到武力鎮壓的心理準備，但萬萬沒有想到，如今遭到的竟然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真槍實彈、坦克和裝甲車的血腥鎮壓。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二十分左右，一名渾身血跡斑斑的女學生從西長安街跑回天安門廣場，頓時引起了一陣騷動，越來越多的人關切地跟著她跑，一直跑到了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救護站，找到一直守候在那裏的志願醫務人員。

這位女學生氣喘吁吁地對迅速圍上來的志願醫務人員說："別……別管我，我……我沒事！我衣服上的血……血都是別人的。"說著說著，女學生的眼眶中湧出了淚水，"他們朝我們開槍，很多同學都倒……倒下去了，有一個同學的太陽穴被打了一個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求求你們，快……快去救救他們吧！……"

志願醫務人員聽了這位女學生的敍述，深受震撼，經過簡短的商量後，迅速聯絡了幾輛救護車沿著長安街西去。

另一名來自于西長安街的女學生在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的廣播中哭著訴說親身經歷，告訴大家，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已經向學生和群眾開槍，她的手上如今沾滿了同學的鮮血。

廣播內容點燃了許多人的怒火，一些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工人操起白天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那裏繳獲的匕首、菜刀等，嘴裏喊著："西邊（指西長安街一帶----作者注）需要支援，大夥兒快去吧，跟他們丫的拼了！"一邊叫喊，一邊快速朝西長安街跑去，越來越多的人跟隨著他們而去。

許多學生也陸續離開天安門廣場，自動自發地前往槍聲激烈的西長安街，有的是去攔阻解放軍戒嚴部隊，有的是去救援受傷者。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以後，許多人通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廣播站發表了情緒激昂的廣播講話。一位老工人在廣播中激動地說："北京在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時候都沒有開槍，如今……"一位中學生在廣播中堅決地表示："大哥哥、大姐姐們，我今天晚上堅決和你們在一起……"

當第一名學生在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前遭解放軍戒嚴

部隊軍人槍殺的噩耗傳入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位於紀念碑底座下東北角的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內）的時候，帳篷內頓時變得死一般的靜寂，大家都在一種驚愕中無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悲傷地哭了。在這個時候，她已經不是什麼總指揮了，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學生，爲她的同學被殺而哭泣。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學生絕食團廣播站播出了這名學生遇難于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前的噩耗。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爆發以來第一次公佈學生死亡的消息，因而引起了在場學生們的強烈反響，許多人情不自禁地哭了，悲憤情緒迅速彌漫。有學生提議播放哀樂悼念死難的同學。然而，事先誰也沒有料想到中共當局竟然會指令解放軍戒嚴部隊使用真槍實彈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因而天安門廣場上的兩個學生廣播站----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和學運之聲廣播站，根本就沒有預備哀樂音帶。

於是，一位男低音放開歌喉，悲涼地唱起了蕭邦的《哀歌》：“沉沉濃霧，慢慢地升起，迷住我雙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響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泣如訴的歌聲在遼闊的天安門廣場上空緩緩回蕩，夜色如晦，風卷起無數面校旗獵獵作響。數以千計的學生肅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淚水順著臉頰無聲地流淌著。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學生領袖梁擎暾（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一九八八級學生）、馬少方在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消息後，當即結束與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赴京代表的會晤，急匆匆地從北京飯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三十三號）趕回天安門廣場，隨即來到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一進門，梁擎暾和馬少方幾乎同時對盤腿而坐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副總指揮李錄發問：“（學生隊伍）到底是撤，還是不撤？”一路上，有許多學生都曾經向他倆提出過這個問題。

梁擎暾和馬少方得到的不是李錄的答案，而是李錄的反問：“你們是什麼意見呢？”他倆發現，李錄的聲音象往常一樣始終帶著一種沉穩的語調。當時也在場的柴玲倚靠在帳篷的

支架上，默然無語，全然從一個叱吒風雲的巾幗英雄的形象回復到一個女學生應有的精神狀態。

“解放軍戒嚴部隊既然開始開槍殺人，我們現在面對的已經不再是可以理喻的人，最好還是撤退吧。”梁擎暾、馬少方提出了撤退的建議。

“一時很難全部撤離天安門廣場。”李錄猶豫著回答說，“但我們希望能夠將天安門廣場上的所有人員都組織到紀念碑周圍靜坐，並且處理好市民與學生送來的軍人故意丟棄的軍用物資，避免給軍隊提供濫殺的口實。”【注釋 8】

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左右，一位來自于西長安街屠殺現場的學生通過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他自我介紹說是“學生堵截團”的成員，剛剛從攔阻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現場回來。在西長安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向民眾開槍了，他們那一組已經死傷了很多成員，他的雙手都沾滿了其他同學的鮮血。說到這兒，廣播中的聲音突然停頓了，因爲他悲傷得無法繼續說下去。

緊接著，廣播中傳出了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早已爲人們所熟悉的聲音。此刻，他正極其悲憤地哭訴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女學生無辜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殺的事情經過，這名女學生當晚隨他一起從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出發，準備趕赴天安門廣場聲援。【注釋 9】由於過度激動和悲傷，吾爾開希的發言時斷時續，終致突然間完全消失。只聽見從廣播中傳來一陣忙亂的聲音，有人焦急地呼叫著救護車，說是吾爾開希暈倒了。

在學生絕食請願期間，幾乎每時每刻都有學生需要送醫急救，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街道，救護車的警笛聲持續不斷，曾經令成千上萬的北京各界民眾撕心裂肺。然而，在吾爾開希暈倒的時刻，卻久久未能聽到救護車的警笛聲。原來，在血腥鎮壓行動開始之前，中共當局已經給北京市各醫療單位下達指令，不准在當晚出動救護車搶救受傷的學生和市民，稍早時尙停在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二十餘輛救護車，此時也已奉命撤走了。

隨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從各個方向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而且越來越逼近，各處學生和市民的傷亡不斷地增加。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知道形勢嚴峻，最後的時刻即將來臨，於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過後做出了一項新的決定，由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副總指揮李錄通過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發出了緊急通告，號召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所有學生有秩序地向紀念碑底座一帶集結，團結一致，準備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最後的抗爭。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群中，李錄顯示

出不同一般的成熟和謀略，只有他，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事件發生後依然保持著應有的鎮定。此刻，通過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他那緩慢而沉著的聲音回蕩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像是一種禱告：

“現在，軍隊正在向天安門廣場逼近，他們已經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同學們，不要害怕，屬於我們的最後的、最光榮的時刻到來了。我們這次民主運動，直至今天，始終是一次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運動。今天晚上，我們仍將堅持這一宗旨。同學們，現在請大家起立，請大家手拉手，緩慢地向紀念碑靠近，在最後時刻，讓我們在這堂堂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聚在一起，讓我們緊緊聚在一起，共同接受歷史的判決。對此，我們將永不言悔。”

於是，許多原先散佈在天安門廣場各處的學生在各自學校旗幟的引導下，緩慢而有秩序地向紀念碑底座一帶集結，依次坐滿了紀念碑底座三層平臺的各級臺階，然後又依次坐到紀念碑底座北側臺階下的空地上。

廣播中，李錄緩慢而沉著的聲音還在繼續著：

“同學們，讓我們以和平來迎接暴力，讓我們以平靜來迎接死亡，讓我們以理性來迎接愚昧，讓我們以犧牲來渴望明天……”

陸續集結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人數大約近萬人。紀念碑底座北側的人數最多，約有五、六千人，南側次之，約有一、二千人，東西兩側人數不多，各有數百人。此外，在天安門廣場各處及四周邊沿地帶，尚分佈著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人數的總和遠遠超過集結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人群，約有七、八萬之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數百座大小帳篷內，也還有數目不詳的學生仍在睡覺休息。

李錄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中唯一的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當時他的身份背景顯得有些神秘，許多人認為，他對柴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就影響力而言，連柴玲的丈夫封從德（時任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都得甘拜下風。李錄的身份曾經引起一些學生的懷疑，多次企圖強行將他趕走，因為他自稱是南京大學的學生，但始終沒有拿出學生證予以證明，堅持說自己沒有攜帶學生證赴京。當時，

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都是以學生證作爲身份證明的。

據一位可靠的朋友告訴我，李錄多年後曾經私下對他透露，他當年赴京聲援的時候其實隨身攜帶著學生證，之所以堅持不拿出來，是因爲在學生證的“政治面貌”一欄中明白地寫著：他具有中共黨員的身份。李錄擔心人們得知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後會對他失去信任。在當年的大學本科生中，中共黨員爲數極其有限。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鎭壓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親身接待了幾位報訊者，傾聽他們敍述發生在各個屠殺現場的情況。

一位來自於河北省農村的小男孩，年僅十一歲，由於長期營養不良, 樣子顯得異常瘦弱。小男孩來自于北京市宣武區的虎坊橋一帶，一邊不斷地抹眼淚，一邊訴說在北京當民工的哥哥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射殺。有人關切地詢問他在北京的住處, 是否有親友。經歷了血腥屠殺的場面，親眼目睹哥哥中彈遇難，這個可憐的小男孩驚恐已極，怎麼也說不清楚在北京的臨時居住處，神情十分令人憐憫。

我看著這個驚恐得全身發抖的農村小男孩，心情說不出有多麼難過，強忍住淚水，急忙安排兩名學生護送他離開危在旦夕的天安門廣場。我再三叮囑負責護送的兩名學生，一定要設法就近尋找一位好心的北京市民暫且收留小男孩，實在不行，就先將他帶回校園好生安置。分手之際，我緊緊地把小男孩摟在懷抱裏，許久許久，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他的顫抖，心疼得無以名狀！

一位北京大學的好友來自于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他憤怒異常，厲聲指控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西單路口一帶肆無忌憚地開槍殺人的罪行，已經完全蛻化爲一群發了瘋的野獸。他所敍述的一段情景，令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熱血沸騰，激憤不已。

在西單路口附近，有一群約百名學生，打著兩面旗幟，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原北京航空學院）的正規校旗，另一面是臨時自製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醫學院的旗幟。這一群學生手挽手、肩並肩，對著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迎面而去，反復齊聲呼喊著一句口號：“爲了可愛的祖國，

我們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勸阻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先是警告性地朝天放射了一排子彈，時隔不到一分鐘，隨即將槍口對準這群不願離去的學生橫掃過去。在一陣密集的槍聲中，這群學生先後紛紛倒下。景狀之慘烈，令道路兩旁的目睹者無不悲憤萬分，不顧自身安危地大聲怒斥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畜生！畜生！”“法西斯！法西斯！”“殺人犯！殺人犯！”聽到怒罵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端槍就向道路兩旁的密集人群一陣掃射。

一位北京市民來自于西長安街以西延長線的五棵松一帶，他敍述說，當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進發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民眾組成人牆，試圖予以阻擋，但領隊的坦克毫不減速，沖向人牆。一名民眾躲閃不及被撞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搶救之時，只見後繼的坦克、裝甲車依然全速地碾壓過去，連續過去了四十餘輛坦克、裝甲車，地面上只留下一片血肉模糊的肉漿，薄薄一層貼在地面上，根本分不出來哪一邊是頭，哪一邊是腳，只是有一邊遺留了幾顆牙齒,料想那邊曾經是頭部……連身上的衣服都被壓成了碎片，慘不忍睹。【注釋 10】

以上是我當時親耳所聽到的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屠殺學生和民眾的訊息，後來我又陸續得到一些相關的屠殺訊息，以及讀到一些屠殺事件目擊者的回憶文字。這些屠殺訊息和回憶文字，有的令人震驚，有的令人感歎。通過這些屠殺訊息和回憶文字，讓我對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情景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瞭解。

一位我所熟悉的年輕女醫生對我敍述了她的親身經歷，其中包括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她所在的鐵道指揮部醫院雖然遠離北京市區，位於西郊的八角村（屬於北京市石景山區）一帶，但在屠殺之夜，也接收了許多被民眾送來的受傷者，一些受傷者因爲傷勢嚴重，在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不治身亡。在眾多的受傷者中，其中有一位受傷者令許多醫務人員感傷不已。這位受傷者是一位少年，年紀不超過十六歲，頭部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刺刀捅穿了，導致腦液外溢，傷勢十分嚴重。醫務人員雖然千方百計地予以救治，但仍然未能將這位少年從死神

的手裏奪回來。

將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且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年，用刺刀硬生生地捅死，心中需要有多大多深的仇恨才能夠做得到啊！如此殘忍的殺人方式，本來只有可能發生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發生在雙方都已經殺紅了眼的敵對的軍人之間，實在無法想像一向號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人，竟然會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採用這種殘忍的方式，將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年活生生地殺死，是可忍孰不可忍！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這位少年不是唯一一位遭受到這種殘忍的殺人方式的遇難者，已知的情況相同的遇難者，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一九八六級學生吳國鋒，他也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殘忍地用刺刀刺殺。

吳國鋒遇難的地點是在西長安街上，他的身上總共中了四槍，肩、肋骨、手臂和後腦勺都有槍傷。根據吳國鋒的親屬敍述，他們事後在整理吳國鋒遺體的時候，發現在他的肚臍右下方有一條七至八公分長的刺刀刀口，在他雙手的手心有被刺刀勒過後的明顯傷痕，這顯然是吳國鋒在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刺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用盡所有力氣抓住刺刀不放時所留下的。

可以斷定，吳國鋒最初雖然連中數彈，身受重傷，但並沒有立即死亡，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接著又殘忍地用刺刀捅進了他的腹部，一刺刀紮進去，然後又用力拉下來，所以這條刀口子有七至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都被攪碎了。最後，當吳國鋒痛極掙紮，本能地用雙手緊緊攥住刺刀不放的時候，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官又用手槍，近距離在他的後腦勺上補射了致命的一槍。

吳國鋒的求生意志和生命力實在是夠頑強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仍未當場喪生，在被民眾送往北京郵電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大木倉胡同四十一號）的途中，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將自己的姓名、所在的學校告訴了一位護送的老年人，然後才咽下最後一口氣。從吳國鋒的遺照上可以看到，他的遺體從上到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吳國鋒死得實在太慘了！他的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引起了

極大的震驚和廣泛的同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當吳國鋒的親屬在北京郵電醫院爲他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時候，與他同一個系的在京同學全都到齊了，本來其他系的學生也要參加，但由於當時北京尚處於戒嚴狀態，其他系的學生則被中國人民大學校方以安全的理由勸阻了。

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多年後曾經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談到當時的情形，他說：“當我們抬著花圈從學校出發的時候，很多同學，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都向我們詢問是不是國鋒的父母，我們回答說是的，他們就上前向我們鞠躬，說：‘爸爸媽媽，別悲傷，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我們一定要爲國鋒報仇！’”可以想見，那時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怎樣一個悲壯的場面啊！

直到十六年以後的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吳定富在四川省成都市新津縣的家中接受四川詩人廖亦武的登門採訪，回憶起當年爲兒子辦理後事的情景，一切的一切還是歷歷在目。

吳定富回憶說：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號上午，我們就在（北京郵電）醫院爲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的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爐子紅通通的，二十四小時沒歇過空。這兒早已接到上面的緊急通知，身份爲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吳國鋒送進去了。

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機器。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抬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麼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緊俏貨，我們剛挑選的時候，還有好幾十個，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有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吳國鋒是四川省成都市新津縣人，不幸遇難時還不滿二十一歲。他是新津縣一九八六年的高考狀元。吳定富回憶當年接到兒子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情景時說：“我傷傷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姓吳的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第一位狀元啊！我當時以爲，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得到改變。”

吳定富在新津縣的縣城開一個小店鋪，做一些小買賣以維持全家的生計。他是一位倔強的漢子，堅持將冤死的兒子的骨灰存放在家中，並設置了靈堂，招引了無數的父老鄉親前來祭拜，從而也引起了中共官方的注意。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裏，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擔心“政治影響不好”，多次勸說吳定富馬上把兒子的骨灰埋了，說是“入土爲安”。但是，遭到吳定富的斷然拒絕，他毫不妥協地對官方來人說：“除非把我槍斃了，同兒子一起埋！”官方來人見一時無法說服吳定富，一定要他明確回答“什麼時候才會埋？”吳定富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不會埋，要一直擺到國鋒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吳國鋒的父母是相當堅強的，但這個家庭的遭遇卻是極其悲慘的。吳國鋒的不幸遇難，給他的家人帶來了一連串深重的災難。

吳國鋒從小聰明，又是長孫，一向被他的爺爺、奶奶當作心肝寶貝。他的爺爺雖然是一個拉板車的工人，卻有些文化，經常把長孫吳國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牆上寫字教他。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幼年時就能看出是個讀書的材料，上小學時就考的第一名。吳國鋒不幸遇難之後，他的爺爺、奶奶因爲想念長孫變成了半瘋狀態，長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他的爺爺、奶奶均于二零零二年去世。他的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爲最鍾愛的孫兒不幸遇難，怎麼也想不通，終于在老伴撒手塵寰之後，兩次企圖自殺。第一次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幸虧被及時發現而獲救。第二次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痛苦地折騰了半個多月，臨死還連聲呼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因爲經不起兒子遇難這麼大的打擊，肢體痲木，幾乎癱瘓，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獨自行走。吳國鋒

的母親宋秀玲在得知兒子不幸遇難的消息時當場暈倒在地，導致頭部嚴重創傷，留下腦部絞痛的後遺症，一想起不幸遇難的兒子就頭痛，一見到兒子的同學就哭，引起視力嚴重下降，從此失去了勞動能力。

俗話說禍不單行，吳家在二零零零年連遭厄運。吳家唯一能寄於希望的二兒子，也就是吳國鋒的弟弟，罹患了尿毒癥，經家人多方奔走，包括六四死難者家屬群體代向海內外呼籲，都無法湊夠換腎所需的高昂費用，結果不到兩年時間，就眼睜睜地看著他離開了這個世界。吳家從此也就絕了後。

緊接著，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罹患了惡性腎腫瘤，再一次讓這個家庭陷入了絕境，最後不得不把那個病腎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注釋 11】

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磨難，吳定富仍然不失硬漢子的本色。就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接待詩人廖亦武來訪的時候，他說了這麼一番感人至深的話："我們眼下是太窮了，每月只有一、兩百元病退的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吳國鋒弟弟遺留的女兒----作者注)，供她讀書——因爲她是吳家最後的一點希望，算是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儘管如此，老威(廖亦武的筆名----作者注)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老師(指丁子霖----作者注)。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以下是部分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有助於人們瞭解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基本情景。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一：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至六月四日淩晨，這位目前不願、也不便透露身份的目擊證人，堅守在天安門城樓東側做現場錄音的工作。他在回憶文字中記錄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殺人的情形，其中特別提到了一位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勇敢少女：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十分，一陣槍打過來，我們迅速從坐姿改臥姿，那動作做得又快又整齊。又是哭聲一片，幾個人被打倒了。我看見兩邊的人在七手八腳地抬受傷者。就在這時，我的右側突然沖出一個姑娘，全速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沖去。由於她身著白色連衣裙，黑暗中竟能看清她的背影。

有五、六個男的也跟在她後面向前沖。全場的人都驚呆了。

（以下根據錄音紀錄）‘姑娘向前跑去了，他們沒有向姑娘開槍，姑娘向前沖過去了。哎呀，姑娘被打倒了。向前沖的姑娘被打倒了。那五、六個男的先被打倒了。他們離得很近，離得很近的時候開的槍。他們在離姑娘只有十米的距離開的槍。有一發子彈打在我身邊……’

六四後我無數遍重複聽自己的這段錄音，以致十六年後的今天仍能一字不拉地背下來。”【注釋 12】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二：目擊證人邢村當時同樣也身處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與東長安街交界）一帶，他在一九九九年所寫的回憶文章中，也提到了上述的那一位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勇敢少女：

“大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最慘烈的一幕出現了。我坐在長安街靠北的馬路上，忽然聽到人們的呼喊，向南望去，只見一個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嚴部隊的警戒線沖去，身後飄起她的長髮。人們立即呼嘯著跟著她一起向戒嚴部隊沖去，我也起身跟著人群向戒嚴部隊沖去。很快，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人們都趴在了地上並後退。在戒嚴部隊與後退的群眾之間的長安街上，留下了大約六、七個中彈者。但是，那個白衣姑娘卻沒有中彈，也沒有停下，繼續一個人向戒嚴部隊沖去。當距離戒嚴部隊的警戒線僅僅幾米的時候，響起了一串罪惡的槍聲，她應聲倒下。

後來，她與其他的中彈者一起被醫務人員救下。由於人很多，我沒有能夠到她的身邊。據周圍的人講，子彈打中了她的大腿。

十年來，我一直在想，她是誰？她活著嗎？如果活著，她現在在哪兒？她生活得好嗎？十年來，這慘烈的一幕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雖然，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由女神被坦克摧毀了，但是，這個身材修長、穿著白色連衣裙、飄著長髮的自由女神卻永遠地矗立在我的心上，矗立在當時在場的數以千計的北京市民的心上，也會矗立在那些戒嚴部隊指戰員的心上。”

邢村當時所處的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一帶，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當第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陸軍第 38 集團軍抵達天安門廣場之後，全北京軍民對抗

時間最久、對抗程度最激烈、民眾傷亡最慘重的地方，傷亡人數僅次於西長安街。在這一帶佈置警戒線，阻止民眾進入天安門廣場援救靜坐請願學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 隸屬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

此處激烈的軍民對抗行動一直持續到六月四日清晨七點鐘以後，其間，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一次次掃射逼近警戒線、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援救靜坐請願學生的民眾，開槍殺人就象近距離射擊活動靶子一樣，一陣槍聲過後，東長安街上就倒下一片死傷的民眾。軍人們殺紅了眼，甚至幾度沖進南池子街追殺逃離現場的民眾。

邢村在回憶文章中，對此處所發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殺人的情景，作了較爲具體的敍述：

“戒嚴部隊從勞動人民文化宮牆根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形成了一條跨長安街的警戒線，只有三排士兵，不時向聚集在東面長安街上的群眾進行一個點射。每次點射之後，群眾都會向東後退幾十米，長安街上就會留下幾位中彈者。這時，中國歷史博物館北側停了好幾輛救護車。馬上就有身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用擔架將受傷者抬走，隨即就會有一、兩輛救護車向東呼嘯而去。人們馬上會自發地爲救護車讓開道路。

我也加入了與（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峙的行列，與群眾一道呼喊口號，一遍遍反復高唱《國際歌》。這時，‘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的歌詞具有了特殊的含義。當第一次打槍時，我隨著周圍的群眾一下子向東後退一大截，至少是十幾米，也可能是幾十米。完全是一種本能的反應，自己當時就回憶不出具體的過程，只知道是連滾帶爬。腿也擦傷了。

槍聲平息後，群眾坐在地上繼續喊口號，唱歌。本來我坐在最前面，但有人坐到了我的前面，又有人坐到更前面。我後來發現，我前面又坐了很多人。這時幾乎所有的人所關心的都是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碑附近的學生，都想沖進天安門廣場將學生們解救出來。當戒嚴部隊感到距離太近時，就會開槍將最前面的人打倒幾個，人群就會往後退一退。就這樣，開槍、後退、搶救受傷者、向前逼進、再開槍……循環往復。

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被當時北京市民的勇氣所感動。面對鮮血，面對死亡，總是有人坐到更危險的位置上。在我的印象

中，當時只有少數學生，沒有有組織的學生，主要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我也發現自己的適應能力很強。雖然第一次開槍時狼狽不堪，很快就適應了。在以後的開槍中，自己並沒有感到很慌亂，並充當了帶領大家喊口號的角色。儘管知道會由於帶領喊口號而成爲狙擊手的靶子，心中感到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當時帶領群眾反復喊的口號是：'天理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在南池子附近的長安街上，到處是斑斑的血跡。我還看到一處比較大的積血中放著幾張十元的人民幣。不知是什麼人放的，放錢時是出於什麼心情。"【注釋 13】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三：這位目擊證人是解放軍駐北京某部隊的現役軍人，出於安全考慮，不便透露具體的身份和姓名。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至六月四日清晨七點鐘，這位目擊證人身穿便服，以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身份，處身于抗議屠殺行爲的人群之中，親身經歷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鎮壓的血腥場面。他在回憶中也提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過後，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一帶軍民對峙的悲壯場面：

"當時，戒嚴部隊已經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在距（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往東約百米的東長安街上，用隔離欄橫街拉起了一條阻擊線，由約一個步兵連的上百名全副武裝的軍人以或蹲或臥的姿勢用步槍瞄著東面，他們的鋼盔泛著幽光。他們不時地放著冷槍，或向兩邊便道的黑暗之處打幾個連發。他們的指揮官從服飾裝備和動作姿態來看，則極不象野戰部隊的人。

與之對峙著的，是一條手無寸鐵的人牆。在這條阻擊線東一百多米的南池子，沿著人行橫道線，從南池子口到公安部大門口，站立著幾百人自發組成的人群，一方面他們攔著那些朝天安門廣場方向走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告訴他們前面真的開槍了，已經有人傷亡，叫大家不要繼續往前冒險；另一方面他們組織起來向戒嚴部隊喊話，如'解放軍不打老百姓！'、'學生無罪！'、'放了學生，不許清場！'等。當有人被狙擊中彈時，口號就變成'戒嚴部隊是殺人兇手'，並唱起悲壯的《國際歌》。這歌聲與從天安門廣場不時傳出的陣陣歌聲和口號聲遙相呼應著。

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裏，就在這南池子，我親眼目睹的就有四十幾個人中彈倒下，他們中有五十幾歲的婦人（腹部中彈），也有一個七、八歲小男孩（左臂中彈）。這幾百人（多時上千人），因大學生都被催著回校去報信去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北京市民，其中有不少婦女兒童，有的還穿著拖鞋拿著扇子，顯然是南池子附近的居民。

整個夜晚，令我震撼的不是戒嚴部隊的奪命槍聲，而是那些自發聚起的人們心系（天安門）廣場，臨危不懼，誓死抗議戒嚴部隊的暴行的那股英雄正氣。他們用血肉之軀在南池子拉出一條'血牆'。"【注釋 14】

根據調查瞭解，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至清晨七點鐘，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民眾至少四次集體衝擊陸軍第 38 集團軍所設置的警戒線，也就是說，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至少曾經四次大規模地開槍射殺民眾。此處中槍傷亡民眾的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北京市太陽能研究所的工程師于地，就是在南池子街南口附近遇難的，也是第一批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擊中的遇難者之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當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在南池子街南口一帶第一次大規模開槍掃射民眾的時候，一顆子彈從于地的左下肋穿入，右上肋穿出，傷及肝、腎、肺等八個臟器，擦傷脊柱。于地被志願救護者及時送入協和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帥府園一號）救治，先後作了四次大手術，摘去一腎，搶救了二十餘天，始終高燒不退，延至六月三十日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四：目擊證人李紀婉本來是一個極膽小怕事的北京小女子，但在周圍成千上萬民眾的英勇行爲激勵下，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她堅持留在屠殺現場，見證了西長安街上木樨地的悲壯一幕。

李紀婉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軍隊已經到達木樨地橋西，長安街上已滿布黑壓壓的裝甲車。坦克、軍車在馬路中央，而軍車兩側是橫向站立、各自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槍的士兵。裝甲車前，則是一個面朝東方的武裝士兵的方陣，這個方陣不同于兩側士兵的是：除了烏黑的鋼盔、瞄向前方的槍刺外，那個方陣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

與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漢界’之間，是一名手握一杆紅旗、頭纏一條紅帶的學子。紅旗之後，便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兩陣相逢，使學生和市民狂退幾步的，便是那殺氣騰騰的軍人手中的大棒。不斷有受傷的學生被市民們準備的平板車拉走。

我不再想到我的家了，我的一腔熱血像長安街上千萬人的熱血一樣沸騰！我聽到響徹夜空的怒吼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我聽到由學生方陣發出呼喊和木樨地兩旁千萬北京人對學生的呼應：‘人民萬歲！人民萬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人民萬歲！人民萬歲！……’

我知道我已不能在那時那刻返回家——木樨地以西已全部被軍隊封鎖，我也知道我也不能在此時此刻離開那些面對坦克、大棒的學生方陣，他們正在手挽手、肩並肩爲著中國爲著北京吶喊著、流著血，他們需要長安街兩側，長安街大槐樹下那千千萬萬‘人民’的支援。雖然市民和學生手無寸鐵，雖然我的支援只能是‘聲’援，只能是那千千萬萬人發出的悲壯高亢的聲聲吶喊——‘人民萬歲！人民萬歲！’

人民憤怒了，北京沸騰了！在進進退退的與大棒進行的拉鋸戰中，人們喊著、喝著，憤慨地甩出手中的飲料瓶，挖出木樨地馬路兩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磚，砸向坦克……爲保衛在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大本營不被侵犯，全北京頑強地阻擋著軍隊開向天安門的路途。

爲了看清楚這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我緊緊跟隨著學生。我被這個幾千年來遭受種種屈辱和悲慘的民族終於發出不屈的‘人民萬歲’的吶喊而心靈震顫，也被直面所見的中國當權者以坦克、機槍、野戰軍逼向自己的學生、子民而震驚心寒，我看著，我想著，接下去到底會發生什麼？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整，忽然我感（到）有什麼不對了！我正在木樨地橋西馬路南側，我周圍突然空空蕩蕩起來，學生大軍不在了，市民不見了，只有‘劈劈啪啪’的類似爆竹聲。在沉沉暗夜的昏黑中，在慘澹昏黃的街燈映照下，我看見向東奔去的大批人流。人流距我已經有了一段距離。我仍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本能地感知到危險，惶竦之中，發現便道南側、北京鐵路局院外，是一片灌木叢，有人

向那兒跑去，我也趕快進入灌木叢，我聽見有壓低的聲音說：‘快趴下，軍隊開槍了！’

我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麼。趴在地上，屏聲斂息，那一刻，我突然感覺北京城變得非常的寂靜，沒有了人聲鼎沸，沒有了口號和歌聲。雖然來自木樨地‘噠噠、噠噠噠’的槍聲響亮而密集，但是從未聽見過這種子彈組成的恐怖交響樂的我，反而出現了神經的錯覺：沒有聲音！北京非常非常的寂靜！”【注釋 15】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和西單路口，是軍民對抗最激烈、民眾傷亡最慘重的地點。從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萬壽路、翠微路、五棵松一帶出發，沿著西長安街強行挺進，一路殺向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第一梯隊，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他們殺紅了眼，不僅射殺街道上試圖攔阻者，射殺躲在路旁呼喊抗議口號者，甚至端槍向道路兩旁的居民住宅樓瘋狂掃射。凡是有人投擲什物或呼喊抗議口號的居民住宅樓，甚至連只要亮著燈的居民住宅樓，幾乎都遭到了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人的開槍掃射。就連居住著大量中共高級幹部和中共元老遺孀、素有“部長樓”之稱的第二十二號樓也未能倖免，目前已知該樓有兩個人被打死，多人被打傷。

第二十二號樓的一個遇難者，是居住在該樓第八層的尹敬，他是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當時，尹敬去廚房喝水，剛剛把燈打開，正背對窗戶倒水，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頭部，當場身亡。關山復作爲中國司法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在確定女婿身亡之後，並沒有立即把屍體送往醫院，而是保護好現場，並通知有關部門，以證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槍彈射殺的無辜者，並非在大街上被射殺的“暴徒”。

後來聽說，關山復曾經在事發後的第一時間首先給當時與他住在同一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家打電話，但其家中始終無人接聽電話。原來，李錫銘身爲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謀劃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事先早已知道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於當晚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並將開槍鎮壓的訊息，全家提前躲到了安全的地方。

尹敬是中國冶金部的工作人員，遇難時年僅三十六歲，他的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的八寶山人民公墓第二區第十七排第十二號。

第二十二號樓的另一個遇難者，是居住在該樓第十三層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離休副部長李初梨家的老保姆。這位老保姆時年六十五歲，已經服侍了李初梨二十多年。當時，八十多歲的李初梨想親眼看一看解放軍戒嚴部隊是怎樣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於是讓老保姆陪同他到陽臺上去，李初梨坐著，老保姆站在他身邊。當解放軍戒嚴部隊挺進過來的時候，頓時槍彈橫飛，根本來不及躲避，轉眼之間，老保姆就被子彈擊中腹部，因流血過多而身亡。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李立三的遺孀李莎也居住在第二十二號樓，其住家也被四處橫飛的子彈所擊中，一顆子彈穿過窗戶射在屋內的牆壁上，彈頭落在李莎面前，嚇了她一跳。

在第二十二號樓的對面、西長安街路北的一排居民住宅樓裏，中彈遇難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婦女是中國國務院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的一個司機的妻子，在家中剛洗完澡從衛生間裏出來，被從窗外射進來的子彈擊中身亡。

事後,中國官方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一直聲稱解放軍戒嚴部隊沒有開槍殺人，更沒有開槍濫射，只是對空鳴槍警告而已。對於這個謊言,不要說別人,就是連居住在第二十二號樓的中共高級官員及其家屬,都不會相信和接受。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五：目擊證人鍾羅白是北京某高校的學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鍾羅白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消息後，與同班同學葉傳結伴同行，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在離開校園之前，鍾羅白爲了表示義無反顧的決心，將一份遺書留在了學生宿舍的書桌上。鐘羅白在途經西長安街的時候，親身經歷了發生在那裏的屠殺。

鍾羅白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當我們來到玉淵潭路與長安街的交匯處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裏湧出悲憤的淚水。當我們停放自行車時，不知是誰高喊一聲：‘沖啊’，數千人竟然旋風潮水般，突然湧向長安街。‘呼呼……’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

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黏黏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周圍的人見我們拍照，連忙指給我們其他血跡，我們又拍了幾張，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爲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在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佈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

這時人群漸漸疏散開來，我和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也有軍用吉普。人群尾隨的那輛，是軍用大卡車，蓋著綠色的帆布，十幾個解放軍端著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著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

（軍用）卡車駛往天安門廣場方向，快到工會大樓（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位於西長安街復興門外大街十號----作者注）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僕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

驚魂甫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汽車每行進十米，需要五分鐘，這五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汽車快要到西單（路口）時，人群被激怒了，他們挽起了手，高唱起《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他們不害怕，不再臥倒，不再停留，緊緊地跟著軍車，軍人繼續向他們腳下射擊，人們不再理會。前面的一個少女，被反彈的子彈射中了一條腿，鮮血淋漓，也沒有停下來，雙手緊挽著旁邊兩個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繼續向前行進。

天空彌漫著燃燒車輛的黑煙，散發著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槍聲依然在響，人群卻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軍車，又一個一個地倒下。

在世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歷史上，你也許難以見到這樣悲慘而壯烈的一幕，手無寸鐵的少女、小夥子、白髮蒼蒼的老人，從容地迎著槍口，迎著子彈，無所畏懼地向前走去，向前走去……

走在這樣的人群中，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神聖莊嚴的感覺，一種類似宗教的情感。生命和死亡，這時似乎已失去了它的意義。在歌聲中，在手挽手所傳遞的力量中，在一步步向前的邁進中，我似乎感到我走到了人生中從未體驗過的一種境界。

槍聲突然停下來，也許這些（解放軍戒嚴部隊）戰士被驚駭住了，他們直楞楞地看著這些不啻於'集體自殺'的人們，看著他們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個軍官喊了聲：'開槍啊！'十幾個戰士，一齊抬高了槍口直接向人群射擊。槍聲、哭聲、人們的尖叫聲，痛苦的嚎叫聲，亂成一團。一個高高胖胖的小夥子，大喊著'操你媽！'，甩出了一塊磚頭，並直接沖向軍車，沒跑幾步，就僕倒在地上。

我臥倒在地，在我和葉傅之間有一個老人，腳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們趕緊把他扶到路邊一輛來救援的平板車上。

待我們轉回來時，槍聲已經停下來，這時，另一個小夥子也許見傷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襯衣，拍著胸膛，帶著哭腔吼道：'你們打死我吧，你們打死我吧！'後面的人群爆發出一陣掌聲，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沉默不語。

也許被這個小夥子所鼓舞，生來怯懦、膽小的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幾步躍向前邊，大聲說道：'告訴你們，這裏不是老山前線，這裏是首都北京；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們是中國人，他們與你們一樣熱愛生命！請你們放下槍，停止屠殺！'人群靜下來，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戰士也似乎在聽。我繼續說道：'我們知道，軍令如山，你們在執行命令。可是，你們難道不能想一想，這是誰的命令？這又是什麼樣的命令？當初你們剛進城時，被困在郊外，許多人不理解你們，學生寧肯自己挨餓，也把食品先給你們；寧肯自己受氣，也要

保護你們，可你們就這樣回報他們嗎？況且，我們在這裏，並沒有真正攔截你們的車，我們手無寸鐵，只不過在這裏表達我們的抗議，告訴你們不要傷害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請你們不要開槍……'

這時，我的腿被猛地一拉，重重地摔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彈打過來。'呀！'在我後邊一個女學生尖叫一聲，倒在地上。葉傳不愧在軍營中長大（他父親曾是解放軍高級軍官），異常機警，他從後面將我拉倒，及時躲過了軍人的射擊，救了我一條命。可子彈卻打在我身後的女學生身上，中彈三處，兩隻手臂和腹部，鮮血染紅了她的衣服。人們將她飛快地送到跟著我們的一輛紅十字會救護車上。

'殺人犯！''殺人犯！'磚頭雨點般砸向汽車，不知是什麼原因，這輛汽車突然脫離行列，向前直駛而去。面對我們的另一輛卡車上，也有十幾個（解放軍戒嚴部隊）戰士，有一個麥克風，他們向人群喊話：'保持距離，不要靠近。'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戰士並沒有端起槍。

人們繼續唱著《國際歌》，跟著軍車，走向天安門廣場。當時大家都覺得，他們要到天安門廣場上屠殺學生。這時，跟隨軍車的只有一百多人了，大家唱著歌，跟著軍車，沒有扔磚頭，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戰士也沒有開槍。沿途，到處可見燃燒的裝甲車、坦克和作爲路障的公共汽車。有幾個市民擔心軍用車輛中的炮彈、子彈會爆炸，正用長長的鐵鉤向外拉炮彈箱。在西單一帶，血跡更多，可見，（解放軍戒嚴部隊）'先頭突擊隊'在突破路障和攔堵的人們時，在這裏犯下了更多的罪惡。

當軍車抵達天安門廣場，人群繼續向天安門廣場走時，早已站在天安門廣場週邊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一陣掃射，人群被迫散開，向後奔去。可不知從哪里來的手持大棒的武裝警察，截住了我們的退路。我們趕緊掉頭向左拐，可我因帶著相機，跑得慢了些，挨了兩大棒，一棒打在相機上，將閃光燈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

我們最後湧進左側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發現胡同因爲臨時施工給封死了。這時，胡同口處一陣槍響和慘叫，當槍聲響過，屠殺者遠去時，在胡同口那裏，已倒下十幾個人，其中至少五個人已經死亡。

我和葉傅手挽手，一起找出路。這時，幾個北京市民從胡同另一端拉過一個梯子。剩下幾十個人，越過牆，來到長安街邊的居民區，是一個個四合院。幾個老太太準備了茶、餅乾、洗臉水，邊招待我們，邊幫助受傷的包紮傷口。

我和葉傅商量了一下，認爲此地雖安全，卻不能久留，因爲我們出來的主要目的是看天安門廣場會怎麼樣，他們如何處理仍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於是，我們倆走出小院，想尋找去天安門廣場的通道。可左顧右盼，就是找不到，最後站在高高的牆頭上，通過相機的長焦鏡頭想看那邊的情況，但人民大會堂擋住了視線，只能看到週邊的坦克。

我們七繞八繞，最後又返回到長安街上，來到離天安門廣場西入口處不遠的地方。這時，街上沒有多少行人，也沒有（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站崗，路燈許多被打壞。於是，我和葉傅在陰暗處找到了一輛平板車，躺在那裏，竟不知不覺睡著了。也許我們太累了，這些日子經常連續二、三天不睡一點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多鐘，我們被一陣爆豆般的槍聲吵醒。‘是天安門廣場那裏’，葉傅說。我們趕緊向入口處跑去。

這時，天漸漸發亮，濃重的煙霧中，浸射出幾道刺眼的陽光。在天安門廣場入口處，有數百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坐在那裏，排成三、四排。

在他們對面二十多米處，對峙坐著四、五百名學生和市民，他們坐在地上，喊著：‘不許屠殺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同時唱著《國際歌》，打著“V”（勝利）的手勢。他們亦坐成三、四排。我和葉傅坐在後排。

這時，有人發現在我們對峙地段內，左側一個平房上，有個人躺在那裏不知是死是活，一個人拿著望遠鏡望了一會說，好像是一個受了重傷的婦女，在那裏還在輕輕地移動。

大家說，一定設法救她。可怎麼救她呢？勇敢者出現了，一對年輕的戀人，那樣子很風流瀟灑，自告奮勇去救她。男的摟著那個女孩的肩頭，一手做出投降姿式，並不時指指平房上的人，試探著向平房移動。走了一半，（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麥克風響了：‘回去！’接著一陣掃射，打到他們腳下，他們只得退了回來。

人們喊道：‘法西斯，劊子手！’

這時，（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們竟然唱起了歌：‘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

人們繼續高喊口號：‘人民要審判你們’、‘人民要絞死你們。’

這時，（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們的歌聲嘎然停止。他們莫名其妙地鼓起了掌，然後突然起身，向西邊散開。

這邊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兩排坦克，有二十多輛，呼嘯著向我們這邊沖來。

這時的人們，顯示出令人驚異的從容與鎮定，他們繼續唱著歌，沒有人站起來，沒有人逃跑。

坦克在逼近，排山倒海般轟鳴著，好像不會停下來，前排的學生中竟有幾個橫躺在馬路上，大聲喊道：‘讓我們的鮮血喚起中國的民主……’《國際歌》聲更加雄壯。

當坦克駛到離學生不足五米遠時，突然停下來，從坦克中鑽出幾個人來，向人群中扔了幾個可口可樂罐狀的東西，大家以爲是炸彈，可沒有人逃避，繼續唱著《國際歌》。一會兒，罐中冒出黃煙，隨風散去，越來越大，是毒瓦斯！那黃煙彌漫開來，坐在或躺在地上的人開始咳嗽。

一個毒瓦斯罐正好扔在我前面，那毒氣吸入肺中，似乎比死亡的滋味更難受，你可以不怕子彈，不怕坦克壓，可你真難以忍受這種毒氣彈，這時，不知誰聲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傻了，趕緊散開！’人們咳嗽著，慢慢散開，走上或爬向兩側便道。

坦克便急速向前駛去。不知爲什麼，沉穩的葉傅突然箭一般地沖上馬路，拿起相機，向著急駛而來的坦克拍照。這太危險了，我大聲喊道：‘葉傅，回來。’這時，又一顆毒瓦斯扔在我腳下，毒氣頓時侵入肺腑，我感到一陣暈眩，胸口一陣劇疼，兩眼模糊，終於跌倒在地，失去知覺。

過了一會兒，我感到臉上一陣發涼，睜開了眼睛，原來是一個戴校徽的女學生，正用沾濕的口罩，向我的臉上滴水。她一見我醒來，馬上對我說：‘去那邊’，我在她的拖曳下，爬到不遠處一個髒水井邊，那裏有幾個同學，正輪流把頭伸入井中，呼吸新鮮空氣，我試著呼吸幾口，頓覺清醒。‘不好受吧？’

那女同學說。‘還好’，我含混地答道。接著站起來，我想，一定得找到葉傅，他可能出事了。

我繼續向前行，坦克飛快地向前開著，邊開、邊向兩邊的人們扔毒氣彈。

走到中南海門口（新華門----作者注）時，站崗的軍人抱起不知什麼時候武裝起來的大木棒，向外驅趕試圖入中南海躲避毒氣彈的人群。

當我們來到六部口時，見馬路左側圍滿了一群人，坦克開始停下，並緩緩後退，我穿越馬路，來到那裏，當即被那個場面驚呆了。

只見路邊自行車道與馬路結合處，方圓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數排自行車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屍體。所有屍身連成一片，呈餅狀，約有十多具，上面還有坦克履帶印。一個小夥子腦袋被壓扁，白色的腦漿迸出數米遠，另一個戴眼鏡的男學生，仰天躺著，下面的自行車車把竟從他的後背穿入，從腹部穿出，還有一個女的，壓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藍色裙子……在屍體旁，是一面紅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鮮血染成了暗紅色。

我從未目睹過這樣殘忍的場面（即便在電影中），這是對人性、對現代文明最無情的踐踏；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一頁！

從我的腳下，發出呻吟聲，啊！竟有人還活著，我連忙從血泊中扶住那個呻吟的人，一個男學生，旁邊的人趕緊推來一輛平板車。當我抱著他血淋淋的身體，輕輕向外拉他時，他微弱地說：‘同學，我的腿……，我腿……’我仔細向下一看，還哪有腿了，整個大腿，從根部被齊刷刷軋掉，正汨汨向外冒血。當我把他抱上平板車時，葉傅來了，他用所有剩下的膠捲，從不同角度，拍下了這個場面。

我們推著平板車，扶著已經奄奄一息的同學，向復興醫院走去。回頭望望那我終生難忘的一幕，在一個死去同學的衣兜中，露出了一個塑膠袋，裏面是一些幹麵包屑。也許，那是這個年輕的生命所享用的最後晚餐 ……。

兩個老太太跪在屍體邊，雙手拍著地，號啕大哭：‘我的學生們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悲慟欲絕的哭泣。

這時，街上高音喇叭在播送中共中央公告：‘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一部分暴徒，破壞戒嚴令，殘害解放軍戰士……’

慘白的太陽冉冉升起，照著充滿血跡、彈殼、坦克履帶印的，曾經十分美麗的長安街，煙霧慢慢散開。在這空蕩的大街上，在這白色的黎明中，我扶著那已經死去的同學。

我們，已流不出眼淚。”【注釋 16】

大學生鍾羅白上述回憶文字中所提到的坦克，隸屬于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他所親眼目睹的坦克碾壓學生情景，就是坦克追軋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出來的學生隊伍的六部口慘案。有關六部口慘案的詳細情況，在本書的下面部分會詳細談到。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六：目擊證人小鹿是北京大學的女學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小鹿和她的同學小雪身處西長安街上，也親眼目睹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對平民百姓大開殺戒的情形。

小鹿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我和小雪準備回校(當時小鹿和她的同學小雪在天安門廣場----作者注)，當時約（晚上）十一點左右，正與洪洋他們告別，互囑保重，一位同學急急奔來，對著帳篷裏的同學大叫：‘他們開槍了！快拿手電筒照我的手！’立時有手電筒從帳篷裏射出，照在他的手上，只見滿手是血跡。大家立刻圍著這位同學詢問。他說木樨地的軍車強行進入市區，上萬的群眾堵著他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始放瓦斯，放槍。木樨地形勢很危急，需要加派一支‘敢死隊’去增援。那些男同學們立即準備出發。我和小雪也急忙離開，去新華門取自行車。

我們取了自行車後往西騎行。人越來越多，不時傳來砰砰啪啪聲，也不知是不是放槍，心裏十分緊張。快要接近民族飯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五十一號----作者注）時，已見人群攢動，騎不過去了。問人哪兒在衝突，人們說，就在眼前了。正說著，忽見一陣煙霧在前邊升騰而起，大家紛紛後退。接著一股刺鼻的氣味湧來，熏的人直要流眼淚。原來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對小雪說：‘快把自行車放到馬路邊上去，看來是過不去了。’

待我放好車後，一轉眼卻不見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著

她，我就戴上眼鏡和口罩隨著人們往前跑，想要看個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後跑。這樣拉鋸了幾次之後，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們的催淚彈用光了！’於是群眾吶喊著又往前沖。沖在頭裏的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一面紅旗。可是沖出二百米遠後，(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又反撲過來，雙方開始用磚頭互擲。

我站在自行車上，聽到磚頭砸得路邊商店玻璃乒乓直響，心裏直害怕。這時路中央的群眾已退到我東邊去了，只有馬路邊上還有許多人。我清楚地看見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齊腰長棍，肩挎衝鋒槍，不斷撿磚頭向前面和左右投擲。一些年輕人為躲避磚頭襲擊，踩著我的自行車跳上了約倆人高的房頂。我嚇得一叫，他們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頂的磚頭扔在地上以作武器。

過了一會兒，不知何故（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又朝後撤，群眾又朝前沖去。我也下了房頂，推起自行車朝西去。走到民族飯店東側，向西沖的群眾已沖得很遠。我思忖著繼續朝西走肯定走不通，可是又不知怎麼才能回校。索性又把自行車停在這兒，自己躲在一個門洞裏，後來又走到聚集了許多人的民族飯店門口。

忽然，前邊的人又一次朝後湧來，只聽得遠處象炒豆子樣響起砰砰乓乓的槍聲。有人從前邊跑來大喊：‘開槍了！開槍了！’人們紛紛問：‘是不是橡皮子彈？’退下來的人憤怒地大叫：‘前邊已打死幾十人，還說是橡皮子彈？’群眾頓時感到十分恐慌。正在這時，前邊抬下兩個被槍打傷的人，大家紛紛擁上去幫忙抬往民族飯店門裏。

防暴警察過後，便是龐大的裝甲車、運兵車和長長的用帆布蒙上的車輛，共分四列向前推進。裝甲車周圍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跟著裝甲車向前，猶如在戰場上一樣。有的人低聲咕噥：‘老山前線挪到長安街上來了！’有兩輛裝甲車上掛著紅布橫幅：‘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致敬！’（用子彈對青年學生表示熱愛、向首都人民致敬，夠諷刺的。----作者注）招來一陣低低的噓聲。這是宣傳車，喇叭裏喊著：‘你們趕快回家去！’群眾中有人喊：‘你們快滾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圍人制止，實在太危險了。

後來，我還跑到馬路邊的欄杆那兒，就近觀看。旁邊還有十幾個人，大家均屏住呼吸，默不作聲。我旁邊有個女孩子年紀看來和我不相上下，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我們在那種危險的時刻彼此有一種患難與共的感覺。我們三人決定一起走以互相壯膽。她邀我住她家去。這時軍車和士兵已過了一個多小時，仍似無窮無盡。我們決定不再呆在這危險的區域，於是走進民族飯店東側的一個小巷子中。

忽然聽得後邊一片叫喊：‘讓開！讓開！’一看，只見一輛平板車疾駛而來，旁邊有人跟著跑，一片忙亂。車上躺著中彈群眾，有人幫其捂著傷口，急急而去。驚魂甫定，又是一片‘讓開！讓開！’的喊聲，又有受傷者通過。那位男朋友是醫學院學生，他說：‘前邊有個郵電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大木倉胡同四十一號----作者注），我們快去！也許能幫點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後，終於來到這所醫院。許多人圍在這裏，自動組成的學生糾察隊攔住眾人不讓進去，並拉出一條通道，供送受傷者的人進入。

那位男朋友先進去了，小曾（即新結識的這位女友）隨後也想辦法進去了。我一個人留在外邊，幫著維持秩序。只見送受傷者的人流不斷，急急忙忙一個，急急忙忙又一個，令人心懸到嗓子眼。受傷者有的用救護車或其他汽車送來，有的用平板車或自行車送來，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則肩背人扶而來，平均每分鐘一個。醫院門前的水泥地上已經汪了一灘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著鮮血。

一個女學生哭著懇求糾察隊員讓她進去，說男朋友背上中了一彈，被送到了這家醫院，被守門的糾察隊員拒絕。因爲搶救受傷者要緊，別人一律不准進。正在這時，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走出來，拉住我說：‘同學你跟我來！’我吃了一驚，急忙跟他走進去了，糾察隊員未及阻擋。進去以後才發現原來他是小曾的男朋友，成了醫生助手，令我一時沒認出來。

在醫院裏，見到小曾，她說她已看了許多受傷者，實在慘不忍睹。我問有沒有被打死的，她說單單是一樓已有九個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彎盡頭。我沒有聽她不讓我去的勸告，走到停放屍體的地方。只見剛剛被打死的人都躺在地上，身上罩著白布。有一個攝影記者、兩位醫生及另外兩、三個人在旁，並悄

悄議論著。記者說，他一定要讓他的攝影機記錄下這幕慘案，今後好讓世人目睹真相。

我請人揭開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屍體身上放著的身份證或記錄姓名等情況的紙片，一一抄錄下來：

劉建國：男，三十五歲，（北京市）西城區橫二條五十號。

富爾克：男，十九歲，中央民族學院（一九）八八級預科生。

吳國鋒：男，中國人民大學工經（一九）八六級，學生證號：**6070115**。

顧麗芬：女，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一九）八六級。

劉忠：男，十九歲，（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隆：男，清華（大學）化工系。

馬鳳友：男，工業企業部工人，一九六二年生，其子馬駿飛同死。

許瑞和：男，復員軍人。

另有一學生系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

還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隨身沒帶身份證）。

…………

每個看到這幕慘景的人莫不憤怒不能語，感到實在慘絕人寰。各個手術室、診療室都擁滿了受傷者，醫生、護士們個個忙得團團轉。一位剛送到的受傷者嘴唇中彈，上唇被撕成兩瓣，上牙全無。

我在三樓看到，因受傷者太多，病房裏和走廊上都躺滿了。一位背部中彈的受傷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兩名醫生就開始給他取彈片、做縫合手術。從他背上取出一顆彈頭，是五四式衝鋒槍子彈。他拿在手裏觀看。應我要求，讓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說要永遠保留著作爲紀念。

回到一樓，見那位在醫院門口痛不欲生的女學生已經獲准進來，並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顆機槍子彈，很長，把他的背脊穿了兩個洞，有拇指粗細，血流如注。醫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針藥打在藥棉上，用手按住藥棉在傷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斷發出撕心裂肺般的慘叫，女學生把臉貼在男孩子頭上安慰著他，早已哭不出淚水。我詢問了女學生，知道他倆都是清華大學學生，心裏更加難過。

槍聲響了一夜。護送受傷者進來的人互相講述著各自的歷險記。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說，與他站的很近的兩個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婦女腸子流了一地，當場斃命。他護送了兩名受傷者入院，渾身是沾上的鮮血。

這家醫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術。許多受傷者需要轉到積水潭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街三十一號----作者注)。他們被安置在長椅上或擔架上，兩人抬起，旁邊再有一人舉著吊水瓶，就這樣匆匆而去。醫生說，他們都免不了截肢。有人開了個黑色幽默玩笑：‘這下，鄧朴方（鄧小平的長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作者注）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馬了！’

已是六月四日淩晨，我們最後詢問了一遍該醫院死亡人數，已是二十八人！這時是五點十五分。”【注釋 17】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七：目擊證人施繩是一位大學生，他不僅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目擊證人，也是受害者。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時分，施繩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附近中槍受傷。

施繩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長安街六部口，路燈昏暗。一輛輛用於戰事的坦克載著荷槍實彈的軍人從西長安街由西向東駛來。每一輛坦克駛過，士兵便將槍口對著路邊的眾人掃射。(後來有傳謠說，槍口是向上的，不是對著路邊的人群。我想，要麼這些人當時不在現場，要麼這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亂真。）子彈的出膛聲，與牆壁和地面的撞擊聲，還有人們中彈後的慘叫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坦克子彈對付赤手空拳’的悲壯場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鐘，總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長安街邊較近的地方因爲子彈太密集，眾人無法就近搶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邊稍遠的地方，便會有人自動圍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彈再次擊中受傷者，並實施緊急搶救。三輪車，擔架隨呼叫而至，將受傷者送往附近的醫院。

感謝北京的市民，他們自動地走出家門，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們，使許多傷號擺脫了死神的誘惑得以複生。要是沒有他們，當時的許多傷號可能

會因爲搶救不及時或流血過多而死亡。也許，我就會在其中之列。

當時我首先中彈的部位是肩部，傷勢比較輕。先是聽到‘嗖’的一聲，隨之肩部感到一種麻麻涼涼的滋味。不過數秒，一記重擊，我中了第二彈，是在背部。這次創口較大，位置非常危險，緊貼脊柱。事後推測爲‘開花彈’所擊中，由於子彈的威力不足，只是將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傷及脊柱。

當時我沒來得及有疼痛的感覺，只在短暫的死神到來之前的清醒中意識到自己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要與家人永別了。這是我瞬間唯有的全部思維。緊接著便是神志昏迷。我想昏迷的時間並不長，因爲當我恢復了些許意識，微微睜開眼睛時，我還躺在離長安街邊不遠的地上。有幾個人圍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聽到有人說：‘他的創口很大，流血太猛，趕快包紮，堵住血流。’我的 T 恤被扯下，而後便有人用力把它從中間撕開（或用剪刀絞開？）並用其包住傷口。

不一會，來了一輛三輪車，我被抬了上去。因爲我是背部受傷，所以只能平臥在車板上。在行進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傷口四周，儘量讓 T 恤貼緊傷口，不讓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漸漸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傷，用手摸摸身體兩側，粘糊糊的，想必是血。當時頭很沉，一個人托著我的臉。我全身麻木，背部有一種似痛非痛的感覺。

我想知道一下周圍的情況，用力抬了抬頭，往旁邊看了一下，發覺車上不止我一個人，還有人躺在我旁邊。那人身上沒有太多的血跡，不知傷在什麼部位，途中一動不動，只是僵硬地躺著。有人將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試試呼吸情況吧。只聽有人說：‘這邊這位（指躺在我身邊的人）比那位（指我）還要嚴重，怎麼連氣息都沒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狀態下，我被送到了一個距現場較近的醫院（郵電醫院？）。有人扶我走進了醫院大門。走廊兩邊站滿了人。最後，我被扶進了一間屋子（診斷室？手術室？）。這裏已人滿爲患，躺著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淚的，低聲呻吟的，大聲痛哭的，高聲怒駡的，比比皆是。我聽到一個女孩在嚎啕大哭，問周圍的人發生了什麼事，說是她朋友剛才在長安街被打中頸動脈而氣絕身亡。

稍後，我周圍騰出了一點空間，一位首鋼（首都鋼鐵公司----作者注）的工人幫我平臥在地上，托起我的頭，讓醫生為我動手術。我看到地上滿是血跡，這與周圍血跡斑斑的傷者一起，構成了一幅比‘戰地醫院’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慘像。

醫生動手包紮。他對扶著我的人說：‘創口太大，傷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需要二次手術。現在受傷者太多，先簡單包紮一下，止住血再說。’包紮後，我被扶到走廊的一角。那裏已有許多人正在接受輸液。看護我的人告訴醫生，我失血太多，需要輸血。那醫生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現在只能保證對垂危的病人輸血。’那人又問：‘血庫的血呢？’答曰：‘血庫已接到命令停止向醫院供給血液。’（這是我聽到的他們的談話，不一定真實。）此後我便感到異常的難受，劇痛快速地向我襲來，不知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難忍，而後神志漸漸模糊。

輸液後，我被安置到臨時病房。病床一個緊挨一個，每行病床之間只留有供醫護人員走動的空間。這時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邊躺著的那位，鼻子嘴裏插滿了管子，大概是在輸氧。右邊的那位元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繃帶包著。我對他道聲多多保重，他看不見我，回應地點了點頭，並用手做了一個‘V’字手勢。

六月四日清晨，（郵電？）醫院的大多數輕傷病號被轉移到離屠殺現場較遠的醫院去了。（因為受傷者太多，屠殺現場附近的醫院已人滿為患。）我被送到了積水潭醫院。在我的病房裏，足有四十多個傷號。這裏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傷號，但多數傷勢不輕，據我觀察，他們多數會留下或多或少的後遺症。

一個外地赴京訪親的農民，整個小腿的肌肉幾乎全被炸光，兩根小腿骨暴露在外，看了直讓人打寒顫。醫生給他動手術時，我不忍心注視他。因為每次醫生給他塗抹藥水，他都會發出撕心裂肺的痛叫。從小在農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深知一個歷經風吹日曬的農民對一般疼痛的承受力。現在看到他如此模樣，可以想像疼痛的程度。如果他的情況落到我的身上，我真懷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一個體育學院的學生，雙腿從大腿根部被鋸掉（據說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斷的）。他的病床，一個可以升降的手術臺，緊挨

著我的病床。由於痲醉劑的作用，他沒有痛苦的呻吟，一直處於昏睡狀態。我看到他那殘存的大腿一直在無助地搖動。難以想像，當他醒來，突然發覺他的雙腿已不復存在，他會何等的悲哀！我懷疑他能否接受這殘酷的現實？！要知道，他是搞體育的。對他來說，腿，不僅是用來完善他的軀體的，而且更是他未來事業的依靠。可是他現在失去了它們。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他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業。（這一位北京體育學院受傷學生的名字叫方正----作者注）

一個青年科技人員，傷勢也著實不輕。通過交談，知道他剛出校門不久。六月四日淩晨，一顆倡狂的子彈沿著他的胸部緊貼表皮從左邊穿到右邊。感謝上帝，子彈沒有傷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彈有毒，且受傷部位奇特，手術難度很大。他活動困難，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離開積水潭醫院爲止，他的傷還沒有得到確診和治療。我很擔心他以後的傷勢。

六月五日上午，在積水潭醫院呆了一天后，我被轉到了另一個醫院。在那裏，在醫務人員的護理下，我接受了近三個月的藥物治療和數次手術。然後，拖著虛弱的身軀，出院了。”

【注釋 18】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八：目擊證人王曉明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淩晨，比較完整地觀察了在整條西長安街上所發生的屠殺情況。

王曉明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六月三日晚，我在距西長安街約三公里處，位於甘家口商場旁的十五層樓上。由於從這座樓到西長安街之間沒有高層建築物，所以我可以一直看到軍事博物館的頂蓋。

六月三日晚九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

六月三日晚十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吶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

約十點過五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

----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

十點十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

我於十一點到達離木樨地約一百米處科學院大樓下。此時長安街上的路燈被全部關掉，其他街道上像平常一樣開著路燈。我看不清長安街。子彈在頭上呼嘯而過，並聽到炸子兒在離我頭上不遠處‘啪啪’地響。但是看不到火光（炸子爆炸時無火光？請有經驗的朋友指教）。一輛救人的公共汽車停在前面，裝了兩人開走了。

六月四日零點，我從胡同中繞到復興門立交橋與南禮士路之間的長安街上。這時軍隊已經過去，其尾部在復興門立交橋。遠遠看到一輛裝甲車停在橋頭。突然，這輛裝甲車向我們這邊移動並開槍掃射，我頭上的樹葉被掃得嘩嘩響。我和其他的人往胡同裏瘋跑。跑了一會兒，身後的槍聲停了，我們又回到長安街上。

大約十二點十分，我看到一個騎摩托車的人帶著一個手捂肚子，肚子上流著血的人從我面前慢慢開過。大概是肚子中彈了。幾分鐘後，一輛平板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胳膊上的肌肉被打得翻開一大塊的人過去。又過了一會，另一輛平板三輪車拉著兩個躺著不動的人過去。

六月四日淩晨一點，我騎車又回到木樨地。在木樨地交叉口中處，我看到八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一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三十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三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路口中央有一輛軍車被燒毀。

我從位於西長安街上的燕京飯店路過時，看不到飯店有人住。在西長安街這一帶，我未看見外國人及記者。

西方電臺報導說開槍是在六月四日，故稱其‘六•四大屠殺’。實際上大屠殺是在六月三日晚十點開始的。”【注釋 19】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九：飛龍（化名）作爲目擊證人和知情者，曾經談到了兩名兒童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無情槍殺的情況，一名兒童被殺是他親眼所見，另一名兒童被殺是聽別人說的，但事後他知道了這名被殺兒童的父母的情況。

一九九四年，也就是在發生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五年之

後，飛龍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六•四’北京死了多少人，確切數字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就有兩個兒童被打死，一個是我親眼所見，另一個是聽別人說，但我知道兒童的父母。

那天死在北京的兩個兒童的形象和故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裏。不知爲什麼，五年後的今天，感到應該寫點什麼來告慰他們過早被終止了的生命的冤魂。

可又的確不知道說什麼好。說什麼呢？說他們仍然是‘反革命暴徒’？說他們的家長獲得兩百元人民幣的‘補貼’外加公安人員三番五次的恫嚇？說他們的父母忍著早年喪獨子的悲哀一遍又一遍地‘交待進京動機’？

這兩個孩子，我見到的一個死在北醫三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花園北路四十九號----作者注），大約十來歲的樣子，除了面色慘白，似乎看不出死相。他在死後曾被學院路上的大學生們推出來在北四環路阻攔軍車。軍車確實被攔下來了。記得當時他的屍體被推到那隊軍車的帶隊人（估計是個師長）的面前，師長一言不發，只是拿右手不停的摸他的鋼盔的下沿，低著頭，也許是不敢正視這慘痛的現實吧。

數千名學院路一帶的學生、學者在六月四日的上午目睹了這一場景。

師長面對瘋狂群眾的譴責與謾罵，一個勁兒的喝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最後的結果是軍車並沒有再朝城裏開進一步，一部分軍車的輪胎先是被大學生們放了氣，到下午被就地燒毀，另一部分軍車轉移到馬甸橋之後，也被那裏攔截的群眾一舉焚毀。

這個兒童也許是死後有靈，以他的屍體說服了數百名荷槍實彈的殺人工具終於沒有釀出更大的殺人事件。直到現在我尚記得那些坐在車篷裏的解放軍大兵們的一張張麻木、冷漠的臉，我從來沒有象那天那樣害怕過解放軍。

另一個被打死的兒童的年齡可能比他更小，死得卻更奇怪、更冤枉。他根本不是北京戶口，他的家在七百多里地之外的山東省，莫明其妙地到北京的姥姥姥爺家走親戚的，六月四日那天莫明其妙地在亂槍之中，死在北京的街頭。由於他的戶口地處偏遠，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死亡的故事。我也是由

於後來出國辦有關證明，才在當地聽到了這個孩子的事。

該小孩的父母的工作單位在：山東省慶雲縣獸醫站（郵編：253700。）【注釋 20】

飛龍上述回憶文字中所提到的第二名死難兒童，是北京市順城根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呂鵬，遇難時年僅九歲，是目前已知的年齡最小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死難者。他的父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去山東省農村下鄉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後來留在了山東工作。呂鵬從小由身居北京的外祖母撫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左右，呂鵬與母親同行，來到復興門立交橋附近，正好遇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掃射，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胸部，當即倒在了母親的腳下。

幼童呂鵬的不幸遇難，讓許多民眾再也無法克制憤怒的情緒，忍耐早已超出了極限。他們決定採取中國傳統的抬屍抗議的方式，用一輛帶兜的一三零小卡車載著呂鵬小小的遺體，到北京西郊的各個大學和單位展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獸行。呂鵬的遺體躺臥在車兜裏，胸部纏滿了白色的繃帶，繃帶上沾滿了血污。他的年輕的母親一路哭喊著守候在他的遺體旁，直到再也哭不出聲音來。

這一幕人世間慘不忍睹的情景，令所有的目睹者無不感到萬分震驚和憤怒，誰也想不到在號稱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竟然會有如此殘忍和野蠻的事情發生，想不到滅絕人性的暴行竟會落到一個幼嫩的小生命身上。遠處北京西北郊紅山口的解放軍國防大學的一位校級軍官曾經親口告訴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他和他的許多同事在解放軍國防大學大門口也看到了呂鵬的遺體，作爲一名解放軍現役軍人，當時的心情十分痛苦而複雜，深深地爲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開槍殺人行爲感到羞恥。

一些民眾拉著呂鵬的遺體四處示威抗議的事件影響很大，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濫殺無辜的真相，因此，中國官方將之定性爲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將參與此事的民眾定性爲“反革命暴徒“，督促公安部門全力緝捕，予以嚴懲。一九九零年七月，我流亡到美國洛杉磯之初，有幸見到了參與該事件的兩位年輕的北京民眾，一個名字叫冷松，一個名字叫孫瑞君，瞭解到了該事件的詳細情況。當年，爲了逃避追捕，冷

松和孫瑞君與我一樣，也是冒險遊過海灣，逃離中國。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十：目擊證人王德邦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王德邦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民眾的訊息後，挺身而出，組織並率領逾千名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從校園出發，緊急增援天安門廣場。一路上，從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到天安門城樓西側，王德邦親眼目睹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鎮壓的情景。

王德邦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多鐘，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西北樓大廳處理著一些事務，有市民騎摩托車從木樨地拉回一個學生。那學生一進西北樓就痛哭著說軍隊開槍殺人了，市民與學生為保衛天安門廣場在冒死阻擋著軍隊前行。我找到當時在校內的陳章寶（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作者注），簡短交換了一下意見後，做出帶師大在校學生去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我們當時考慮軍隊是沖著天安門廣場而去的，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市民越多，屠殺清場的可能性就越小。於是自治會廣播呼籲學生到‘三•一八’紀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門廣場聲援。

去天安門廣場的危險我是能想見的，但我絕不能坐視市民學生的被殺。將近十點，‘三•一八’紀念碑前彙集了一千多學生。我跟陳章寶說我帶學生去天安門廣場，並建議他趕緊離開學校，因為我知道屠殺剛剛開始，而一旦殺人那殺多少就是量的問題，殺十人跟殺一百人沒有質的區別。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難免，一些特別危險的人應該趕緊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認可他們跑到國外（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實在難想到更適當的方法。當然多年後我認為應該堅守在國內，但這不是我們有權要求別人這樣，只能就道義而言）。

我決心去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共生死。陳章寶在（三•一八）紀念碑前發表了簡短演講後將師大一面指揮旗交到我手中，並叫我跟同學們說幾句。記得我當時只說了一句‘我希望每個學生都平安回來’，就再也說不下去了。我本來確有很多感慨，但當時是沒法說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軀是阻擋不了槍炮坦克的，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沉重與痛苦，不知誰能體會。我默默地舉起指揮旗，帶領同學義無反顧地沖出了師大校門，一

種可能永別的悲情襲過我出校門時的心。

隊伍快速向天安門廣場而去，一路上不斷有市民呼喊口號支持鼓勵學生。在我們趕到西單附近時，又有市民學生跑來訴說軍隊開槍屠殺情況，並說軍隊已沖過木樨地，快到文化宮了。我們心急如焚，大家不約而同地奔跑起來，很快我們趕到了西單長安街路口。那裏早聚滿了市民學生，十字路口幾輛公車不知什麼時候已橫斷了長安街，市民與學生群情激昂地聚集在長安街上。

隨我跑到西單路口的師大學生因中途掉隊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讓大家手挽手背東面西橫過長安街的西單路口，並叮囑大家看我的指揮旗行動，如果我的指揮旗放下，大家馬上往東沖進天安門廣場裏面，會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起行動。我告誡大家千萬不要硬阻，那樣不會有甚麼作用。

交代完後，我獨自上前爬上了橫在西單路口的公車。這時有個青年拿著根九節鞭也跟了上去，並聲言要保護我。我勸他趕緊下去，這裏太危險。因爲西邊過來的軍車那雪白刺眼的燈光在午夜的長安街已清晰可見，槍炮聲也透過遠處軍車的轟鳴與近處人群的喧嚷依稀可聞。從車上往軍事博物館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東湧來，並紛紛往兩邊胡同散去。緊跟在人群後的就是坦克。

我上車不到十分鐘，頭上就傳來啪啪的爆裂聲，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雙眼就頓感澀辣難睜。我想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催淚瓦斯了。我趕忙放下指揮旗示意後邊的同學們快撤，同時自己也摸索著往車下爬。剛才上來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艱難地爬下汽車。頓感長安街一片漆黑。當然眼睛睜不開，有燈也沒用。但長安街此時的黑絕不是因爲睜不開眼，而是人爲的熄燈，以便讓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煙霧中摸索著往街南邊的牆根下去，以便倚牆而行。

當我終於摸著牆根往東緩行時，就聽到後面軍車的轟鳴聲很近了，同時感到腳下水泥地上有爆裂聲，我努力睜開眼看到腳下有火星在濺動。這使我認識到是子彈在跑，我緊張地盡力向前走。在路過一個胡同口時，聽到裏邊有人叫快進去，於是就順聲而入。

我發現胡同裏已有不少人，他們一個個在進去不遠的拐彎

處沿胡同牆壁半伏著身子窺視著外面。我進去後，一個市民示意我將指揮旗藏起並彎下身子。幾乎是我剛伏好，軍隊就過來了，坦克的轟鳴聲蓋過了其他。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沿街邊巡查著向天安門廣場而去。

不知什麼時候，有個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邊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將所見情況念叨著：這麼多坦克，還有炮呢，不好，那邊有幾個人被打倒了，還要去追那些跑的。又開槍了，完了，又有兩個倒下了……這些土匪、軍閥、法西斯，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也沒有這樣啊!太殘酷了!他說著說著，聲音在激動中變成嗚咽。

停了一會，就聽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細微響動聲，我側頭看去，就見那人揚手拋出了一片瓦。馬上劈啪的子彈聲就響了起來，並且一隊（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沖到了胡同口向裏就是幾槍。好在這個胡同有個拐彎，沒有擊中裏面什麼人。有（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似乎想往裏沖，聽到有人出面阻止。於是一隊（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就罵罵咧咧地走了。

屋上那人緊緊伏在瓦上，待（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走後又氣憤地罵起來。我心想，你拋幾片瓦，對鋼盔盾牌全副武裝的軍人有什麼用，就是砸一下也豈不形同搔癢？無非是看著過不去泄點憤而已，但我也不好勸說。在親見屠殺的情況下，任何有血性的人豈有不切齒的？

大約半個小時後，軍隊過去了。我與大家趕緊沖出了胡同。我一心記掛著天安門廣場，就匆匆往東趕。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樂廳的前邊路口，我吃驚地看到幾個青年鮮血淋漓地躺在地上。有一個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還汩汩地流著血的學生，向圍觀者痛苦地講述著剛剛發生的事。他說軍隊過來的時候，他們往胡同裏跑，幾個女生因爲跑得慢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攔住了，他們幾個想沖過去救，結果被一陣掃射打倒了。

我看著他痛苦的樣子，猛醒到應該趕緊將他送去醫院搶救，於是大叫一聲‘趕快送醫院啊!’圍觀者也如夢初醒，紛紛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剛才說話的青年，只聽他一個勁地說著謝謝，不過他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爲爲民請願、爲天下盡責，就該落

此下場？我背著他到了音樂廳後的胡同深處，那裏已有不少三輪車裝著一個個還在流血的受傷者。我就近將青年放在一輛車上，並叫推車者趕緊送去醫院。許多人一邊抬受傷者一邊禁不住失聲痛哭，整個胡同沉浸在悲泣聲中。

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樂廳前，那十幾個受傷者已全部被送走了。這時我看到許多人圍在音樂廳前的雕塑邊議論紛紛，於是上前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結果發現那個雕塑的大理石座基被打掉了一個大角。如此硬的石頭被打掉了一個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槍，至少是重機槍或什麼炮吧？!（這個角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回北京時還殘缺著，一九九八年我再去看時發現已經換了。）

我惦記著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不敢停留，就隨著人群往東趕。然而剛走不遠，後邊又來了一批軍隊，路中間是坦克、卡車（車上裝著士兵），車旁還走著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我們一下躲無可躲，於是一大批人就在長安街南牆根下站著。

這時我看到一個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條腿拖拉著，看得出還在流血。他居然跟著軍車一路怒罵著，質問著：‘你們看看，你們槍殺的是些什麼人？這些都是你們的父母兄弟啊!他們所追求的不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嗎？人民解放軍怎麼能屠殺人民？你們的槍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你們還是人嗎？你們有種就再給我一槍！……’

他那堅定無畏的神情與話語深深激勵著路邊的群眾。不知是誰抑制不住大呼了一聲‘打倒法西斯!’於是應者如潮。口號剛喊過去，頓見從人民大會堂那邊沖來一隊（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一路掃射著、喝叫著。街邊的人群頓時蜂擁著往西邊撤。我隨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樂廳前。當我回頭去看那個追隨軍車的青年時，他已不知去向。

看來從長安街南邊往東是進不了天安門廣場了。待又一支軍隊過後，我與一些人從長安街北邊的皇城根下往東去。快到新華門時，我見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趕著往回跑。路邊原本往東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華門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並排橫斷了長安街，並且有一隊（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正鳴著槍驅趕著試圖走近的

群眾。我同時看到在剛跑回的人群中倒下了兩名，很快（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追了過來，將不知是死還是活的傷者抬走了。

顯然從長安街進天安門廣場的路是不通了。（其實早該想到不通的，一條街哪有南邊戒嚴北邊通的？只是心急沒有細想而心存僥倖罷了。）於是我又隨著一批人從六部口往北繞一個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從南池子可以繞開警戒線進入天安門廣場。待我趕到南池子時，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一如新華門邊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已經封死了南池子進天安門廣場的路。在離（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二、三十米處有一條警戒線，好像用什麼攔了一下。市民們就自覺地聚集在警戒線外。大家急切地想瞭解天安門廣場內的情況。

隨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議論著，交換著彼此的資訊，表達著各自的憂慮，同時反復要求前面警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讓大家進去。在一再要求無結果的情況下，大家對天安門廣場情況的擔憂及許多不同方面槍殺情況的彙集，使大家心裏升起了怒火。於是由請求變爲質問，由質問變爲斥罵，最後憤怒地喊起了口號‘打倒法西斯！’‘抗議屠殺學生市民!’‘請願無罪!’……雖然大家在悲痛與憤怒中，但仍沒有超越衝擊警戒線。

然而一會就見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從警戒隊伍後邊忽然出現，舉槍向天鳴了一槍。大家還沒反應過來，就見一些持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向警戒線外的群眾腳下掃射，一批手持警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沖向人群掄棒就打。群眾頓時驚慌四散。我被一棒擊倒在地，等我爬起來時，看見身邊一位婦女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打倒在地並掄棒猛擊，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並一把拉進了旁邊的民房。我進屋後跟那個拉我的人說，快去看看那個婦女。那人轉身出去，一會回來說不見了那女的。

這時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爛，皮膚裂開，鮮血浸濕了衣袖。房東趕忙拿來一些藥噴灑在傷口，並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個多小時，隨後叫兩個中學生騎自行車將我送回師大。

許多同學以爲我已遇難，因爲我帶去的同學早已從天安門廣場撤回。當他們看到我回來時驚喜不已。許多同學建議我離

開學校，但是，我什麼地方也去不了，因爲我當時身無分文，同時，我覺得什麼地方也沒必要去。於是索性蒙頭大睡。我實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來我就沒好好睡過覺，常常一天就睡三、四個小時，並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門廣場，在長安街上都睡過。而今似乎沒什麼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覺。”【注釋 21】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十一：目擊證人麻子（化名）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後，麻子與兩位同學相約離開北京大校校園，趕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在長安街有著一些終身難忘的經歷。

麻子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過了王府井路口（地點有問題，方向不對。王府井路口在東長安街上，而不是在西長安街上。此處的“王府井路口”應該是“西單路口”之誤，西單路口在西長安街上----作者注），看到一個中年人一路走過去，用一件被鮮血浸染的襯衣在每一個臨街的商店櫥窗玻璃上寫下大大的兩個字：‘人血’。

就這樣走走停停，一直到了可以看到人民大會堂的地方就走不動了。我們的前方三、四米的地方赫然出現一排平端著衝鋒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黑洞洞的槍口直對著我們，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人用槍口指著，而且是在那麼近的距離面對著那麼多的槍口，那種陰森的感覺到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覺得毛骨聳然。（我不知爲什麼忽然想起軍訓練習打靶時連長發出的嚴格命令：槍口絕對不許對著人。）

然而，最令我震驚的還是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的臉，那些鋼盔下面年輕的臉。我那年只有二十一歲，可我依然覺得那些臉是多麼年輕啊。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大概都只有十六、七歲的樣子，可是那些年輕的臉上卻充滿了仇恨，因仇恨而顯得兇惡。這些年輕而兇惡的臉已經成了我頭腦中揮之不去的印象。我至今也不理解，是什麼東西使這些年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在自己祖國的首都，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面對著自己的同胞，面對著自己的同齡人，產生了這樣的仇恨呢？

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喝令我們退回去。我掃視了一下，這時我周圍的人大都是學生模樣。我們開始沿著原路慢慢地，很不

甘心地向後退去。我們這時是在西長安街的南側便道上，我們一邊退，那一排（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一邊平端著槍緊緊地壓上來，並且呵斥著讓我們快走。我們的旁邊也出現很多（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象押解犯人一樣押著我們向西走。

我們中間的幾個人似乎還想做（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的工作，結果遭到一頓呵斥，有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還罵了一句粗話。他的粗話一罵出口，我們這些本來就一肚子怒氣的書生一下子炸開了，紛紛叫起來：‘憑什麼罵人？’正叫嚷著，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突然跳出來，用手槍‘砰砰’朝地上開了兩槍，打得火星飛濺，然後他大喝一聲：‘誰不怕死！不怕死的出來！’我們一下子都啞了，低著頭默默地繼續走，但是我想這時候每個人的心裏都已經氣炸了，因爲我自己的心裏就只有一個聲音：‘我需要一枝槍，我需要一枝槍！’

就這樣一直走到新華門。突然，一聲呼喊，在新華門前站崗的幾排武警掄著棍子，嗥叫著，呈扇面橫過馬路向我們沖來。人們開始好象一下子驚呆了，等到明白了怎麼回事，轟的一下開始狂奔起來。我一開始跑就一腳踢在了一輛倒在地上的自行車上，身子一下子撲了出去，但是根本沒有第二個念頭，爬起來接著跑。後來想想，什麼叫做‘逃命’，什麼叫做‘恨爹媽少生兩條腿’，都在那一刻體會到了。當時就只有一個念頭，快跑，千萬不能摔倒。因爲我聽過武警圍毆，亂棍打死人的傳說，心想如果摔倒了，被幾個武警圍住打可就完了。

可在這時看到前面不遠有個高大的民警站在路上，手裏拎著根電警棍，警棍上一點藍幽幽的光在一閃一閃。我也聽過電警棍的厲害，被它點一下，倒在地上動不了還算輕的，關鍵是如果倒在地上，還是要挨武警的亂棍。就這麼一遲疑，我的腰上已經重重地挨了一棍，由於是在向前跑的時候從後面挨的棍子，我的身子一下子撲倒在一棵（人）行道樹的樹坑裏，當時心裏喊了一聲：‘完了！’所幸的是，沒有第二棍、第三棍落在我身上，我能夠爬起來繼續跑。

關於那場逃命的最後一個印象是，在人行道的最裏側有幾個女生很慘，大概是前面有一個人摔倒了，結果導致後面好幾個人摔成了一堆，那種在極度恐懼下發出的聲嘶力竭的哭叫聲

至今回想起來依然令人心驚。

這場逃命到現在為止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恐怖的一刻。在後來的日子，每當我精神狀態不佳，或是學習工作壓力較大時，我經常會做同一類型的夢，就是被人追殺。追殺者和場景會有所不同，但是情節總是類似，就是一開始我拼命地逃，但是結果總是逃不掉，最後在絕望與屈辱中醒來。”【注釋 22】

目擊證人的回憶文字之十二：目擊證人申雪（化名）是北京市民，他所親眼目睹的一幕情景令人髮指，那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擊一群小學生。

申雪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上午九點多鐘，我從市中心王府井去遠在永定路（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部隊醫院看母親。以往我都是騎車走長安街經復興路一直就到了。六月四日戒嚴部隊從南池子開始把長安街封鎖了，我只得騎車繞道，走與長安街平行的前門大街。

我經過正陽門時，看到正陽門兩側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道路都被封鎖了。遠遠望去，看得見天安門廣場上停滿了坦克。封鎖線拉著一條繩，後面是臥倒在地成一線的戴鋼盔的大兵；他們以交通隔離墩為依託，持半自動步槍向前門大街方向瞄準，所有的過往行人、車輛，都在那一排黑洞洞的槍口射程之內，令人不寒而慄。

正陽門門洞下有一支三人的戒嚴部隊巡邏隊，三人分別面向東、南、西三個方向，挪步向東。這三個大兵的鋼盔在陽光下閃得耀眼；三人個個臉色黝黑，臉上的大疙瘩依稀可見，手持半自動步槍槍口微微上傾，緊扣扳機，隨時準備突然射擊。他們不時對過往行人大聲呵斥，由於口音重，誰也聽不清這些傢夥嚎叫的是什麼。這三個大兵的著裝、形像與電影紀錄片裏開進北京城的日本鬼子別無二致，只不過沒有了日本鬼子的泰然傲慢，而是一副驚恐萬狀。

突然，我看到從前門西後河沿的胡同裏沖出一群孩子，都是約摸小學四、五年級的半大小子，穿的褲頭背心還有光膀子的，他們一忽拉跑到馬路邊，隔著馬路沖著正陽門下巡邏的戒嚴大兵高聲喊：‘大兵，操----你----媽！’罵完後一哄轉身鑽進了胡同，逃得無影無蹤。這突如其來的童音稚嫩、響亮，

卻似晴天裏的一聲滾雷，把巡邏的大兵嚇得一激靈，那仨大兵不約而同地把槍轉向傳來聲音的方向，向著半空就是一串點射。當時有許多過往行人，大家都被亮相街頭的‘兒童團’唬得眼前一亮，又被隨後響起的槍聲嚇得四散奔逃。一位大媽腿一軟撲通跪在了地上，大聲罵：‘小兔崽子，你們罵完跑了，子彈不長眼睛，我可怎麼辦？’

目睹了這一幕，我騎車抱頭鼠竄，經宣武門大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鑽胡同想抄近路走。繞來繞去，繞到了鬧市口中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從這裏能清楚看見長安街一線的戒嚴部隊正在清理被燒毀的汽車路障。這時，剛才的一幕又發生了。從胡同裏竄出幾個孩子，沖著幾十米開外的大兵高喊：‘大兵，操----你----媽！’大兵端槍便打，槍聲清脆，好像就從耳邊擦過，可你看不見子彈，不知該往哪里躲，陷入極度恐懼之中，街裏的過往行人都本能地往路邊跑。我扔下自行車就地臥倒，當時每一秒鐘都太漫長，混身毛骨聳然，恨不得能有一個地縫讓我鑽進去。

過了好一會兒，急促的槍聲停止了。我抬頭看見一個孩子倒在了胡同口。別的孩子罵完一句後都象土撥鼠似的返身鑽進了胡同，這個孩子個子大一點，膽也大了點，他一句不解氣罵了兩句，第二句還沒說完便中槍了。

我到跟前看，這男孩頂多小學高年級，穿的大褲頭（就是北京人愛穿的寬大短褲），鮮血像條有生命的小長蟲從他大腿上竄了下來，順著膝蓋關節的轉彎滑過小腿，迅速流向腳面。那孩子臉色煞白，沒哭也沒聲。附近菜站一個大老爺們蹬了輛平板車過來，大夥兒把孩子抱到平板車上，孩子身體綣縮成一團，平板車風風火火地蹬走了。

六四大屠殺後白色恐怖籠罩北京城，緊接著就是二狗子（警察）帶領戒嚴部隊到處搜捕‘反革命暴徒’，戒嚴部隊以它特有的方式----用槍托子狠砸被捕者，不知使多少人受傷致殘。大人們逃散了，噤口了，害怕了，畏縮了。而孩子們，他們雖然還不能理解死亡，也弄不懂什麼是法西斯，但他們童真未滅，誠摯未失，真情猶在；他們明白是非，知曉正義，他們把千言萬語凝聚成了一句話，他們在街頭用傳統的國罵京罵，大聲戳破了‘皇帝的新衣’，他們用嘹亮無畏的童聲，喊出了時代的

最強音，他們的鮮血與六四志士的鮮血流在了一起。

不要說‘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那良知呢？人性呢？甘當暴君工具的根本不是人。戒嚴部隊的傻大兵喪盡天良，它們已沒有親媽，只有黨媽。

小松樹，快長大，綠樹葉，新枝芽，六四的深仇伴隨著我們，快快長大快快長大快快長大……那些當初八、九歲的沖向街頭的勇敢的孩子們，如今你們在哪里？我願在此與你們一道再大喝一聲：‘大兵，操----你----媽！’”【注釋 23】

目擊證人申雪所親眼目睹的這一幕情景，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當年北京市的廣大市民，無論男女老幼，都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平民百姓行爲的痛恨。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在北京，外出的解放軍官兵大都不願或不敢身穿軍裝，不願，是因爲有羞恥感；不敢，是因爲擔心遭到民眾的辱罵。

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事件，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至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主要發生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以及天安門城樓附近和天安門廣場北端，開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主要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其次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虎坊橋（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天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珠市口（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前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一帶，開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主要是空降兵第 15 軍。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民眾事件發生後，血淋淋的消息不斷地從各個屠殺現場傳回天安門廣場，造成一次次強烈的刺激，使得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們終于發生了分化。分歧點在於是繼續堅持和平請願，還是奮起反抗，以暴易暴，沒有人因爲害怕而提出撤退。（害怕的人當然也是有的，但他們已經陸續悄然地離開了天安門廣場。）絕大多數人主張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應該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認爲只有堅持這樣做，這場民主運動才會有更大更深遠的影響。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市民和一些來自各個屠殺現場的學生，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悲傷和憤怒，準備奮起反抗，以暴易暴。他們四處尋找一切可以用作自衛武器的東西，包括石塊、汽水瓶子和從帳篷上拆除下來的棍棒。有人陸續離開天安門廣場，

沖向槍聲最激烈的西長安街一帶。

六月四日淩晨零點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左右，在天安門廣場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廣場上空發射，估計是給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指引方向的。

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自從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以來，持不同看法的學生和市民紛紛來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表達意見，尤其是那些來自于屠殺現場的人們，由於受到血腥場面的強烈刺激，許多人的情緒非常激烈。此時此刻，不管是主張撤離天安門廣場的人，還是主張堅守天安門廣場的人，大都顯得非常情緒化，已經很難理性和冷靜地討論問題。

在《回顧與反思》一書中，記錄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的一段回憶，透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內當時的一些情形：

“這個時候（應該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作者注）張伯笠讓我去演講，我不去，結果柴玲去了。（這裏所謂的“演講”，是指去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儀式發言。----作者注）

柴玲回來的時候，情況已經變得非常危急，那個時候至少圍了有幾十個人，有拿刺刀的，有拿槍的。有人拿著槍對著柴玲說，‘如果你敢在這個時候撤，我先斃了你。這麼多人已經爲你們學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斃了你，宣佈我當總指揮。’柴玲還沒表示任何說法，那邊已經把刀捅到了後腰上，不僅是楊朝輝（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請願活動發起人之一、北京師範大學教工子弟----作者注），楊只是其中之一，說‘這麼多人已經都死在那兒了，你要是還讓人死在這兒，你就要做歷史的罪人。我要爲這些人的生命負責，如果你還不下令撤退，我先宰了你，然後我下令。’

總之，情況就已經變得這麼危急。而且這個時候受傷者多得不得了，每個人都血糊啦喳的。想通知開會，什麼人也找不著，各種表決也不清楚，而且情報部長（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情報部部長，此人化名“辛苦”，是蘭州大學物理系核

子物理專業的學生。----作者注）也找不著了，總之已經不再履行職責。誰也不知道軍隊已經到了什麼地方，什麼消息也沒有了，只知道軍隊在三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進軍，而且在途中遇人就殺，遇人就砍，也不知道還需要多長時間就到了廣場。

對於各種各樣的判斷已經沒有辦法作出，如果撤的話，撤到哪條街道上？哪條街道是生路？因爲當時的感覺就象在電影裏看到的日本鬼子進村以後，把村子包圍了一樣，哪條道路都出不去，出去就殺，反而呆在家裏還有一線希望。所以我當時的基本想法，就是在那時力圖保持一個鎮定的狀態，當時我的基本想法是以靜待動，我先把廣場成爲最和平、最安詳的一塊地方，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要死大家就死在一起，要沒有死的話還有可能保留一個生的機會。”

當學生們集結到紀念碑底座一帶後，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北角一個大帳篷裏的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似乎成爲了遠離陸地的一個孤島。學生領袖梁擎暾、馬少方考慮到工人弟兄們的安危，特意趕到了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找到了一個長著絡腮鬍子的工人糾察隊隊長，通報學生們已經向紀念碑底座一帶集結的情況，希望他們也撤到那裏去，與學生隊伍會合。

“不，我們絕不撤退！”工人糾察隊隊長尚未說話，他身旁一位戴著敢死隊袖標的青年工人哭喊著說：“我們好幾位成員在西單路口附近被戒嚴部隊打死了，他媽的，要死，我也會拼個夠！”

“請你們不要介意”，工人糾察隊隊長一邊對梁擎暾、馬少方說，一邊拍著情緒激動的青年工人的肩膀以示安撫，“我們也同樣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必要的時候，我們會考慮撤到紀念碑底座去的方案。”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仍然有一些工人自告奮勇地來到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要求立即登記加入組織，參加最後的鬥爭。一位汽車司機身上沒帶其他證件，便掏出駕駛證給工作人員看，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工作人員告訴他：“現在辦理不了入會登記手續了，因爲會員證和有關資料都已經轉移走了。”

正說著，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廣播站的廣播響了，傳來

一位剛從西長安街回來的工人的發言："李鵬政府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性，他們現在就像一個瘋狂的賭徒，越輸越賭，越賭越輸！他們現在已經再也輸不起了！……我剛從軍事博物館那邊回來，我可以告訴大家，他們的坦克已經到了六部口了，很快就會把天安門廣場包圍起來。我親愛的同胞們，請你們認真地想一想，你們願意在坦克的統治下生活嗎？……"

聽了上述廣播內容，憤怒的人群立即炸開了鍋，大家紛紛尋找能夠自我防衛的東西，或手裏舉著棍棒，或懷裏抱著石塊，如同撒了韁繩的野馬似的，爭先恐後地朝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一帶沖去。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以暴易暴的行動，是無需否認的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種以暴易暴的行動發生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血腥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之後。就時間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血腥屠殺發生於前，學生和市民的反抗發生於後；就因果關係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血腥屠殺是因，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中共當局在事後的欺騙宣傳中，刻意顛倒了時間先後和因果關係。

此時此刻，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人們的思緒再也無法平靜，是繼續堅持和平請願，還是奮起反抗，以暴易暴，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每一個人。就感情或情緒而言，幾乎沒有人不願意不顧一切地奮起反抗，以暴易暴，爲死難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復仇，但從理智上考慮，又不贊成背棄堅持已久的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尤其是面對擁有包括裝甲車、坦克在內的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民眾手中僅有的石塊、棍棒和汽水瓶子之類的東西根本就算不上"武器"，不要說攻擊，連自衛都談不上，雙方力量對比如此懸殊，以暴易暴無異於無謂的犧牲。

我獨自久久徘徊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上，試圖理順紊亂已極的思維，一顆心始終在感情和理智間痛苦地掙紮。

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南側，絕食請願的青年知識份子劉曉波此刻正背靠著紀念碑而坐，身旁依偎著一位年輕女性，看樣子很像是他的妻子。他倆神態凝重，大多數時間都是相對無語。在這個極其嚴峻、也許是最後的時刻，我很想走過去與他交換

一下對時局的看法，以及商討對策，但又不忍心破壞他倆此刻僅有而且很可能是最後的寧靜。猶豫許久，最終還是沒有走過去與他交談。

記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上，也就是北京各高校的數百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請願的那個晚上，也是在這個地方，我曾與劉曉波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同爲高校青年教師，我強烈反對他動員學生放棄絕食請願行動的主張。我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會在形勢惡化的情況下採用他曾經反對過的絕食請願方式。儘管對於由他所起草的《六•二絕食宣言》有著高深莫測的感覺，不贊同其間對學生和中共當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但是，我始終欽佩他的道德勇氣，他是當時少有的敢說又敢幹的中國知識分子。

劉曉波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第一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人。劉曉波在對中國當代一系列文化界、學術界的名人進行激烈批判後，聲名大噪，被喻爲知識界的“黑馬”。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爆發的時候，劉曉波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聞訊後當即放下一切，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毅然決然趕回北京，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之中。

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十五分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十五分左右，一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開足馬力，由西往東，沿著長安街從天安門城樓前急駛而過。裝甲車的首次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數以萬計的民眾試圖築成人牆加以阻擋，但這輛裝甲車絲毫不減速，沖散了蜂擁而來的人群。

緊接著，又有一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從同一線路快速駛過。

實際上，解放軍戒嚴部隊裝甲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間應該稍早一些，下面會具體談到。這裏所提到的時間，只是我發現裝甲車的時間。

這兩輛編號分別爲“三二二”和“三三九”的裝甲車，隸屬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五十五分，步兵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從北京南郊的東高地出發。東高地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是北京軍區裝甲兵部隊的基地，位置處在隸屬於空軍的南苑機場附近。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挺進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步兵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擔負著爲主力部隊破障開路的任務，並將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在清場過程中發揮裝甲車的威懾作用。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擔任裝甲車隊的最高指揮官（裝甲車隊隊長），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大校作爲上級機關所派遣的“監軍”，跟隨裝甲車隊出發，與佟喜剛乘坐同一輛裝甲指揮車，共同負起指揮的責任。

許多憤怒的民眾紛紛撿起石塊投向裝甲車，並有不少人揮舞著棍棒輪番沖向裝甲車，毫無懼色地抽打著裝甲車。對於裝甲車這類鋼鐵龐然大物來說，這些民眾的舉動近乎唐吉訶德鬥風車，然而，這是一場靈肉與鋼鐵的撞擊，這裏並沒有絲毫的喜劇色彩，只有撼動人心的悲壯。

這兩輛裝甲車在人潮洶湧的長安街上旁若無人，全速前進，速度不低於時速六十公里，連拐彎時都似乎不減速，駕駛員真的很瘋狂。現場有一位自稱十五歲就當兵的解放軍退伍軍人向身旁的民眾介紹說，這是六三式履帶裝甲運兵車，自身重

量十二點八噸，最多可容乘員十三人。

“三二二”號和“三三九”號裝甲車以天安門城樓爲中心，在長安街上不停地來回高速奔馳，炫耀武力，驅散人群，追逐碾壓不願離去的民眾。長安街上騎車或步行的民眾紛紛緊急躲避，慌亂中，許多騎自行車的人摔傷或撞傷。一名女青年躲閃不及，匆忙扔下自行車撒腿便逃。裝甲車毫不猶疑，碾過自行車，繼續追趕。

“三三九”號裝甲車曾經一度調頭沖向天安門廣場，成爲第一輛進入天安門廣場範圍的裝甲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三三九”號裝甲車闖過了中山公園南大門與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垂直線，隨後猛然右拐彎離開了筆直的、東西走向的長安街，徑直朝著南面的天安門廣場撲去。只聽得“咚”的一聲巨響，“三三九”號裝甲車將橫放在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之間的交通隔離墩和鐵護欄撞得飛了起來，一些站在上面搖旗吶喊的民眾猝不及防，紛紛跌落下來。緊接著，“三三九”號裝甲車“突、突、突”一陣咆哮，把交通隔離墩和撞變形了的鐵護欄甩在身後，毫不猶疑地朝著目瞪口呆的人群狂追而去。

很明顯，瘋狂的“三三九”號裝甲車不懷好意。不過，民眾們並沒有被嚇倒，一邊高喊著“設路障，圍住它”，一邊扶起被撞倒了的交通隔離墩和鐵護欄，試圖予以攔截，困住“三三九”號裝甲車。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三三九”號裝甲車逞兇發威。“三三九”號裝甲車加大油門，變本加厲地左沖右撞，一會兒前軋，一會兒後倒，不顧一切地朝四面八方施展蠻勁，對準圍追堵截的民眾胡亂衝撞一氣。

“三三九”號裝甲車上的軍人本意是想借助於高速行駛，以及震耳欲聾的馬達轟鳴聲，顯示裝甲車的威懾力量，製造恐怖氣氛，從而將堅守在天安門廣場邊沿的數千名民眾驅散嚇跑，卻不料反而激怒了民眾，引發了他們奮起反抗的激情。一些民眾不顧自身安危，急忙抓起身旁一切可以當作武器的什物發洩憤怒，磚塊、石頭、飲料瓶子、木棍、鐵杆等雨點般地投向“三三九”號裝甲車。一些民眾開始點起火把往“三三九”號裝甲車投擲，還有人投出了自製的燃燒瓶，撞上“三三九”號裝甲車後火花四濺。終於，“三三九”號裝甲車頂部的機槍

防雨布冒煙了，炮衣起火了。

過了幾分鐘，不知道因爲什麼原因，“三三九”號裝甲車突然間熄火了，趴在原地一動不動，兀立于人群之中。民眾們頓時精神大振，發出一陣陣興奮的歡呼。一群圍觀助威的女學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連聲叫好。一些年輕人興奮地高喊著：“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一名戴眼鏡的年輕男子不知從哪里抱來了一床被絮，準備鋪蓋到“三三九”號裝甲車上點火燃燒，將裝甲車內的軍人逼出來。

“三三九”號裝甲車好不容易重新啓動了。這一回，它沒有張狂地朝著天安門廣場腹地深入，而是加足馬力，發出沉悶粗重的轟鳴聲，匆匆循著原道朝著西長安街奔馳，到了西長安街上，一路往西向西單路口方向退去。與來的時候大不一樣，“三三九”號裝甲車如今飄曳火光，拖帶青煙，顯得有些狼狽。眼看“三三九”號裝甲車離開了天安門廣場，並一路退卻，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也就沒有再追趕，一場驚心動魄的人與裝甲車的大戰暫時告一段落。

根據中國軍方的相關資料記載，當時，“三三九”號裝甲車上共有十一名乘員，包括該裝甲車的指揮員、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的連長韓開印中尉、志願兵(專業軍士)趙留根等人。“三三九”號裝甲車帶著火苗離開天安門廣場後不久，在新華門西側一百余米處燒毀。連長韓開印中尉等官兵被迫下車，遭到一批憤怒民眾的追逐毆打，不同程度地受了傷，最終被防守新華門的解放軍警衛部隊救走。

第一輛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並不是“三三九”號裝甲車，而是編號爲“三二二”號的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時間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指揮官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修理科助理員、助理工程師李勃上尉。

“三二二”號裝甲車作爲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首車，承擔著帶路的任務。李勃不是軍事指揮官，只是一名技術人員，卻被選中作爲裝甲車隊首車的指揮官，看起來有點令人奇怪，其實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主要原因在於他是解放軍將領的子弟，根紅苗正，政治可靠，其父親曾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部的負責人，而且李勃生長於北京，既十分熟悉北京的交通道路情況，

又操一口地道的京腔。

“三二二”號裝甲車單獨進入天安門廣場之後，也曾經遭到民眾的強力攔截，被迫停車後，差一點被憤怒的民眾放火燒毀。危難之際，李勃先是利用一口京腔，以北京鄉親的身份緩和緊張氣氛，後來又聽從一位在場學生的建議，來到位於紀念碑底座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求救，一名學生領袖指派幾名學生前往保護，“三二二”號裝甲車才得以保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主力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後，“三二二”號裝甲車迅速歸隊，並參加了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行動。事後，李勃被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裝甲車的出現，這是當晚最初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範圍、發生在我的視野之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事行動。

不好，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挺進天安門廣場的防線失守了！這是我最初的反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三十分左右，又有兩輛裝甲車一先一後、時間相隔不到五分鐘，從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方向分別進入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的大道，風馳電掣般地前進，一路上橫衝直撞，撞開或碾過任何障礙物。這種氣勢洶洶的陣勢，讓企圖予以阻擋的學生和市民根本無法靠近。

與“三二二”號和“三三九”號裝甲車一樣，這兩輛裝甲車也隸屬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這兩輛裝甲車圍繞著天安門廣場轉了好幾圈，近距離向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炫耀武力。其中一輛編號爲“零零三”的裝甲車車頭卡著一個半圓形的交通安全島開路，顯得有點滑稽，不僅用最高的車速狂野地行駛，而且見人不避、逢物必軋，充滿了挑釁性。

“零零三”號裝甲車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指揮車, 當時車上總共有八名乘員：步兵第 112 師的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北京軍區裝甲兵部的副部長解雙喜大校、步兵第 112 師的通信參謀邱成上尉，步兵第 112 師的一個上尉營長，還有北京軍區裝甲兵部的一個中尉參謀，以及專業軍士（志願兵）駕駛員趙斌和北京軍區直屬通信團的報務員葛明軍。

隨後，這兩輛裝甲車以天安門城樓爲基準，在長安街上來

回穿梭，高速行駛，驅散人群。許多騎車人慌忙跳車而逃，自行車被軋成了鐵片。

其中一輛裝甲車高速行駛抵達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立交橋附近，竟然將奉命正在佔領建國門立交橋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的一輛軍用卡車迎面撞翻在地，不少官兵被拋出車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傷。這輛裝甲車肇事後繼續前進，並沒有停下來。

從軍用卡車車廂被拋到地上的士兵們跳起身來，紛紛沖著遠去的裝甲車破口大罵。有的士兵大聲叫嚷："老子不幹了！他媽的，老子不幹了！"一位基層軍官怒不可遏，從腰間拔出手槍，帶領著一群士兵奮力追趕肇事的裝甲車，喝令裝甲車停下來，但沒有見效。

面對軍中同袍的傷亡，這一群官兵群情激憤，有的人把槍都摔了，有的人說要爲戰友復仇。其他軍車上的士兵見狀也都紛紛大叫"老子不幹了"，先後棄械下車，與圍堵的民眾一起站在路邊，不再理會上級的命令。

在建國門立交橋上下，參與圍堵的民眾有數萬人，乘機向部隊官兵做宣傳工作，鼓動他們棄暗投明，站在人民一邊，部隊軍心開始動搖。步兵第 115 師部隊的指揮官一看苗頭不對，局勢明顯快要失控，急忙召開臨時中共黨委會商議對策，指令部隊政工幹部分頭給各級官兵做安撫工作，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一場即將爆發的兵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在長安街上來回竄動多時的"零零三"號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靠近觀禮台的地方，不知是被交通隔離墩上的鋼筋卡住了車輪，還是被民眾用鐵棍插進了車輪，在原地不斷地前後轉動，依然無法脫困，發出了一陣陣困獸般的嚎叫。大批憤怒的民眾乘機蜂擁而上，在幾名解放軍退伍軍人的指導下，先是用棍棒撬砸，破壞了通訊用的天線和觀察用的潛望鏡，繼而又用棉被鋪蓋上去燒烤，大火騰空而起。

在大火烤炙之下，約十分鐘左右，首先是兩名頭戴鋼盔的中年軍人(事後得知其中一位是副師長佟喜剛大校)耐不住高溫而鑽出了裝甲車逃生，隨後又出來了駕駛員。這三名軍人甫出

車門，立即遭到一群民眾圍毆，有人吆喝著要把其中一名中年軍人拋到天安門城樓前的護城河（金水河）。一個中年人試圖予以阻止，但人潮湧動，怎麼也擠不進去，著急地在人群背後用已經沙啞了的聲音呼喊勸止："不要動武！不要給人製造鎮壓藉口！"多數民眾早已經被西長安街上的屠殺激怒了，根本就不聽勸告。有民眾說，這輛裝甲車在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外撞死撞傷了不少人，應該血債血還。

此時，幸虧有十多個在場學生及時地挺身而出，奮力擠上前去，迅速形成了一個保護圈，將三位軍人團團圍在當中，其中多位學生緊緊抱住一位已經頭破血流的軍人，以自己的身體護住了軍人，同時苦苦勸說在場的民眾冷靜，不要傷害軍人，因爲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時間，許多拳頭和什物誤落到了這些學生的身上。如果不是這十多位學生竭力予以保護，並將這三名軍人一路護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這三名軍人很可能會喪生於憤怒的民眾之手。爲了保護這三名軍人，有一位學生還被民眾誤傷，頭破血流。

在火光的輝映下，可以看到多位學生手拉手形成一個保護圈，將三名軍人圍在當中，護送三名軍人前往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臨時救護站。一些群眾仍不甘心，還在後面追逐著喊打。有民眾憤怒指控"零零三"號裝甲車已經軋死了七、八個人，不能輕易饒恕了這些殺人犯。三名軍人上身都穿便裝，看上去行走無礙，雖然頭上流血，但絕無"重傷"的跡象。

這三位軍人在臨時救護站得到及時的包紮、救治，不久就被救護車送往醫院繼續治療。副師長佟喜剛大校被送到了協和醫院。

與此同時，"零零三"號裝甲車上的另外五名軍人，也一一都先後得到了部分學生的奮力救援。以步兵第 112 師的通信參謀邱成上尉爲例，在他遭到憤怒的民眾毆打時，一些學生奮力將受傷的他救了出來，先是由兩位學生架著他猛跑，後來由一名學生背著他跑，前面另有學生開路，一邊跑一邊喊："快閃開！快閃開！"

邱成事後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背著我的人哭著，喘著粗

氣，速度一點不慢，手一點也不松。來到一輛救護車旁，他一個轉身，把我從後門扔進車裏，迅速關上車門。外面有人喊：‘拉出來，打死這個當兵的！’就聽他哭著求人說：‘別打了，別打了，他已經不行了！’他始終在車門護著。在背我的途中，我頭上的血染紅了他的上衣，他頭部也挨了棍子，額頭也出了血，後來他挨沒挨打我不知道了。跑的途中，恍惚聽他說是吉林長春人。離開（天安門）廣場急救中心到了醫院，以後我又遇到過幾位救我的、關心照顧我的好心人，我生怕忘了他們，都請他們把名字寫在了我的襯衣上。”【注釋 24】

很難想像，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都已經大開殺戒了，這些學生還對“零零三”號裝甲車上的軍人們竭力予以保護，實在是夠理性、夠善良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爲《“共和國衛士”精神永放光彩》的文章，其中對“零零三”號裝甲車的情況有所敍述：

“某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和某部裝甲兵副部長謝雙喜大校，乘坐首長車率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因後面車輛受阻，他們單車英勇前進，先期抵達廣場，對暴亂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轉車頭準備接應後續部隊時，裝甲車突然熄火，暴徒蜂擁而上，有的砸車，有的點火，這兩位領導幹部先後下車，宣傳群眾，揭露暴徒，慘遭毒打，身負重傷。”

《人民日報》該篇文章只談到佟喜剛、謝雙喜等軍人的所謂英勇舉動和所謂“暴徒”們的行爲，卻刻意回避了十幾名學生對佟喜剛等軍人的奮力救護。佟喜剛在相關的回顧文章中，也是大談自己的英勇行爲，以及所謂的暴徒暴行。相較之下，邱成上尉算是不錯的一個軍人，他著重談自己得救的情況，真誠感謝伸出援手的人們。

謝雙喜大校時年四十八歲。奇怪的是，如今查不到有關他的任何資料，按理說，“年富力強”的他不應該離開軍隊，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佟喜剛大校時年四十六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五十五分，佟喜剛奉命率領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從東高地出發，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出發前夕，他曾與裝甲車隊每一輛裝甲車的指揮官一一握手叮囑：“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死也

要到達金水橋！”由於他率先乘坐裝甲指揮車抵達天安門廣場，又挨了民眾的一頓痛打，事後立功受獎，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佟喜剛大校等當事人寫有一篇題爲《浴血金水橋》的文章記錄此事，收錄於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不久，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輯的《戒嚴一日》一書。【注釋 25】在這一篇文章中，記錄了“零零三”號裝甲指揮車的駕駛員、專業軍士（志願兵）趙斌的一段回憶：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處從路旁竄出兩個人，拖起一個隔離墩直朝我車跑來，我先是一怔，怎麼辦？躲，對方也會左右移動，隨車而變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門，方向絲毫不改，徑向前沖。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處路障。我開動腦筋，正確分析，果斷處置，能撞則撞，能軋則軋。說心裏話還是躲得多。因爲每撞一個障礙物，象崗亭、油桶什麼的心裏就一陣難受，爲國家的財產而可惜。”

從駕駛員趙斌的這一段回憶文字中，既可見解放軍軍人的素質之低，也可見中共當局平常都向解放軍官兵灌輸了些什麼可怕的思想觀念，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生命，在他們的眼裏，價值竟然不如崗亭、油桶之類的“國家財產”。活生生的人可以不用躲避，“方向絲毫不改，徑向前沖”，照撞照碾不誤，而“每撞一個障礙物，象崗亭、油桶什麼的心裏就一陣難受，爲國家的財產而可惜”。也只有這樣素質的軍人，才會製造了血腥屠殺平民百姓的事件。

相比之下，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後，許多北京市民和學生雖然極度憤怒和悲傷，但仍然懷著一顆善良的心，千方百計地保護迷路和掉隊的、數以百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並將一些受傷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及時地護送到醫院救治。如果不是這樣，面對北京城數十萬計的被屠殺事件所激怒了的“暴徒”，在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死亡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將絕對不會只有十五個人而已。這十五個死亡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都被中共中央軍委、中國國務院授

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一共有三十七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被中共中央軍委、中國國務院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其中死亡者十五個人，生存者二十二個人。

死亡的十五個“共和國衛士”是：

1)劉國庚：陸軍第 63 集團軍直屬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排長，少尉軍銜。山東省萊陽市城廂街道辦事處蓋家疃村人。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一九八三年十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原先在陸軍第 28 軍步兵第 82 師直屬通信營任通信兵，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六月就讀于解放軍重慶通訊學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三十分，劉國庚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電報大樓對面，距離西單路口東約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死亡。

2)王其富：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營部無線電通信班班長，下士軍銜。安徽省嘉山縣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王其富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位於北京市海澱區）死亡。

3)李強：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1 班士兵，上等兵軍銜。陝西省西安市人。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高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李強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死亡。

4)杜懷慶：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3 班士兵，下士軍銜。河北省清河縣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杜懷慶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死亡。

5)李棟國：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4 班副班長，下士軍銜。安徽省嘉山縣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李棟國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死亡。

6) 王小兵：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4 班士兵，上等兵軍銜。陝西省西安市人。一九六八年四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高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王小兵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死亡。

7) 徐如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有線通信班班長，下士軍銜。安徽省嘉山縣人。一九六七年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徐如軍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路口死亡。

8) 崔國政：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彈炮 2 連第 6 班士兵，下士軍銜。吉林省輝南縣人，滿族人。一九六八年一月出生，一九八七年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四十分左右，崔國政在崇文門過街天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附近死亡。

9) 馬國選：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6 連班長（代理排長），上士軍銜。河南省禹洲市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出生，一九八五年秋天加入解放軍部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馬國選在菜市口（位於北京市宣武區）附近身負重傷，被送往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10) 王錦偉：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某團後勤處戰勤參謀，中尉軍銜。河南省太康縣人，一九六二年出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王錦偉在南新華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死亡。

11) 李國瑞：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2 支隊第 1 大隊第 1 中隊通信班士兵，上等兵警銜。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山東鄉人，一九六九年三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參加武裝警察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鐘左右，李國瑞在阜成門立交橋（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12) 劉艷坡：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1 支隊第 1 大隊

第 1 中隊士兵，列兵警銜。河北省藁城縣（現爲藁城市）南營村人，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生，一九八九年四月參加武裝警察部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劉艷坡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13)于榮祿：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宣傳幹事，少校軍銜。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死亡，死亡地點不詳。

14)臧立傑：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某團第 7 連第 2 班士兵，上等兵軍銜。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生于黑龍江省嫩江農場，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初中文化。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十點鐘左右，爲了護衛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有關人員拍攝“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影片資料，臧立傑隨同部隊官兵乘坐軍車出發，途徑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時，有民眾躲藏在外交公寓裏開槍狙擊，被精確的遠距離射擊擊中面部身亡。

15)王景生：陸軍第 24 集團軍某部第 1 營第 1 連第 3 排排長，少尉軍銜。河南省南陽市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生，一九八四年九月參加解放軍部隊，一九八八年七月畢業于石家莊陸軍學院。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王景生在執行巡邏任務途中突然病發死亡。

如上所述，這十五名死亡的“共和國衛士”，也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所有的死亡者。

其中，王景生因病死亡，死亡時間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無關，也與民眾的抗暴行爲無關，在他的屍體解剖診斷書上明確寫著：“因勞累過度，生活無規律，嚴重營養不良，引發急性非出血性壞死性胰腺炎，併發性心內膜炎、心包炎。心包積液達一百毫升。”

于榮祿的死亡更與所謂的“暴徒”無關，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所作的專題報告“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所說的“誤傷”，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自己人的槍口之下。根據中國軍方的有關資料顯

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在所在部隊開進受阻的情況下，身爲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宣傳幹事的于榮祿立功心切，急於要拍攝天安門廣場清場的照片，不顧勸阻，獨自身穿便裝前往天安門廣場，途中中彈，被民眾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等六名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的軍人，也不是被憤怒的“暴徒”打死的，而是因爲奉命緊急往天安門廣場運送防暴器材, 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的翠微路口，因爲轉彎時軍用卡車速度過快而翻車，油箱爆炸起火，被困在裝滿防暴器材的車廂中無法脫身，最終被活活燒死。

十五名死亡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 減去上述的八個人, 真正死于所謂“暴徒”之手的，也就只剩下了七個人。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陸軍第 38 集團軍是第一主力部隊，也是殺人最多、最兇狠的一支部隊，將西長安街殺成了一條血路。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歷經四個小時，突破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重重堵截，挺進到天安門廣場，除了上述六名因翻車而死亡的“共和國衛士”之外，竟然沒有任何一名官兵被成千上萬憤怒的“暴徒”打死。這也可見這支虎狼之師是如何毫無顧忌地開槍，是如何兇狠毒辣地殺人。就連該集團軍的隨軍醫生們，包括女軍醫王競少校在內，在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過程中，都曾經開槍射擊。

女軍醫王競少校是解放軍將領的子女，生長於北京，事後她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從她的言論來看，痛恨所謂的“動亂”、“暴亂”。

從上述十五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的死亡時間來看，他們都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以後，也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開槍鎮壓之後死亡的，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充分證明了軍隊開槍鎮壓在先、群眾暴力反抗於後的事實。

這些當年被中共當局極力塑造爲“共和國衛士”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死後一度享有殊榮，其骨灰盒經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特批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

墓，但在不久後大都消失不見了。中國官方有關部門的解釋是:“應死者親屬請求,經上級批准,骨灰由死者親屬自行取回家鄉安葬。”這個解釋不符合事實，根本不是死者親屬請求將骨灰自行取回家鄉安葬，而是中共當局不希望繼續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了，擔憂這些骨灰盒會時時引發人們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記憶。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以來，普通中國人的骨灰盒能夠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向被看作是死者最高的榮譽。北京百貨大樓賣糖果的售貨員張秉貴，因爲被中共當局塑造爲著名的全國勞動模範，他的骨灰盒才能夠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而且至今仍然安放在那裏。“共和國衛士”的骨灰盒先是以隆重的儀式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而後又悄悄地陸續撤走，這件事情說明：就連中共當局及其領導人也心知肚明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不得人心。

生存的二十二個“共和國衛士”是：

1)趙勇明：陸軍第 27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少校軍銜。江蘇省南通市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史的有關記載，趙勇明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趙勇明作爲帶隊指揮官，率領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特遣分隊（由三個偵察連和一個步兵連所組成），沖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搗毀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和學生廣播站。

趙勇明因爲“平息反革命暴亂”有功，事後升任北京軍區偵察大隊副大隊長，頒授中校軍銜。【注釋 26】

2)李勃：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修理科助理員、助理工程師，上尉軍銜。北京市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參加解放軍部隊。他的父親原來是北京軍區裝甲兵部的負責人。

根據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的有關記載，李勃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帶領車隊的首車三二二號裝甲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在裝甲車天線被暴徒砸壞、與後續車

輛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他當機立斷，指揮車輛按預訂方案開進。他不顧暴徒們石塊、磚頭、燃燒瓶的襲擊，始終站在車外，指揮車輛排除路障，驅散人群。

在頭部十餘處受傷，臉部也被硫酸燒傷的情況下，仍以頑強的意志，繼續帶領全車八名同志，克服重重困難，第一個到達天安門廣場。而後又主動清除天安門廣場四周通道上的路障四十多處，推開攔在路中央的大小車輛二十多輛，爲大部隊的裝甲車輛順利開進創造了條件。”【注釋 27】

3）王強：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政治處保衛幹事，少尉軍銜。畢業于解放軍長沙炮兵學院。

根據中國官方宣傳資料的有關記載，王強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隨團指揮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爲搶救失散和被暴徒打傷的戰友及武器裝備，不畏艱險，主動請求留下，隻身在街頭戰鬥兩天三夜，組織收攏了因車毀人傷而掉隊的本團三十八名幹部、戰士；在地方保衛幹部的協助下，把兄弟部隊的六十二名受傷者救護出來，並轉送到醫院；幫助八十七名失散的官兵脫險歸隊；機智地從暴徒手中奪回兩支衝鋒槍，還同地方有關部門的同志一起，收繳了八支衝鋒槍、兩支手槍和十箱子彈。”【注釋 28】

王強因爲立功受獎，立即晉升中尉軍銜。

4)廖開喜：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指導員，上尉軍銜。山東省滕州市前洪緒鄉顏樓村人，一九六零年十月出生，一九七八年三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廖開喜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在首都執行戒嚴任務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中，他開展及時有力的思想工作，保證了全連官兵士氣高昂。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途中，他在身上多處被暴徒砸傷，腹部、腿部遭火槍射擊中彈十一處的情況下，忍著傷痛保衛團指揮所的安全，保障後續車隊和軍指揮所順利開進。當部隊到達預定地點後，他因失血過多，昏倒在車上。”【注釋 29】

5)張震：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砲

兵營第 1 連班長（代理排長），上士軍銜。河南省鹿邑縣新集鄉人，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生，一九八二年參加解放軍部隊。高中文化。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張震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部隊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的開進途中，這個入伍七年的上士司機班長驅車前進，多次遭到暴徒襲擊，頭部、肩部、胸部十二處受傷。在傷口流血不止，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他以驚人的毅力，忍著劇烈的疼痛，硬是堅持開車五個半小時，把汽車和車上三十七名同志送到了指定地址。”【注釋 30】

6) 安衛平：陸軍第 39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參謀。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安衛平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安衛平作爲陸軍第 39 集團軍先遣小組的成員，隨同該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提前到達北京城區預定地點開設了集團軍指揮所。當天晚上，陸軍第 39 集團軍屬下各部隊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的開進途中嚴重受阻，並與集團軍指揮所失去聯繫。安衛平遵照軍長傅秉耀的指示，身穿便裝獨自外出尋找部隊，轉達軍長傅秉耀的命令。安衛平曾經獨自六進六出天安門廣場，並且幫助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與上級指揮機關取得了聯繫。【注釋 31】

7) 沈運田：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第 1 營教導員，少校軍銜。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沈運田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當謠言四起，人心浮動的日子裏，沈運田堅定不移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做黨中央決策的宣傳員；（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當解放軍戒嚴部隊奮勇向（北京）城區開進，多次遭到暴徒的襲擊時，他不顧個人安危，宣傳群眾，威懾暴徒。即使在負傷住院期間，他也沒有忘記一名政工幹部應有的責任，恪盡職守，耐心細緻地做好傷患的思想政治工作。”【注釋 32】

8) 余愛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

第 3 營炮兵連班長，上士軍銜。湖北省襄陽縣人，一九六六年出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余愛軍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時間，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地點，共和國的首都北京。

此時此地，這裏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一時間，黑雲壓城，黨難當頭，國難當頭。戒嚴部隊緊急進城平暴。余愛軍，這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共產黨員、某團炮兵班長，就是在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爲了救護戰友，爲捍衛共和國的安寧，被暴徒砸瞎了右眼。

……

六月三日下午，余愛軍所在團接到進城平暴的命令。……他在班務會上對大家說：‘動亂，我是看透了，也恨透了，只要它存在，首都就不會安寧，國家就不會安寧，黨中央決不會置之不理。咱們要誓死保衛共和國。’他帶頭咬破中指，寫下了‘爲捍衛共和國血戰到底’的血書。”【注釋 33】

9) 周家柱：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營長，少校軍銜。湖北省洪湖市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周家柱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周（家柱）營長的果斷指揮和英勇行爲鼓舞下，全營官兵團結一心，勇猛開進，先後衝破兩道火牆、八道障礙，在全營人員全部負傷的情況下，沒丟失一個人、一支槍、一件裝備，於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二十五分到達天安門廣場。”【注釋 34】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時候，周家柱所率領的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是空降兵第 15 軍第二梯隊的先鋒營，後來成爲空降兵第 15 軍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的一支部隊。

10) 遊德高：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4 旅第 2 營第 4 連第 3 排排長，少尉軍銜。四川省內江縣人。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遊德高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遊德高的帶領和英勇行爲的鼓舞下，全排戰士團結互助，勇猛開進，先後衝破了十一道路障，兩道火牆，於（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二十五分隨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參加了清場。

……

遊德高身上十七處受傷，最長的傷口長達五公分，僅頭上和臉上就縫了十四針，造成了嚴重腦振盪後遺症，將留下終身殘疾。”【注釋 35】

11) 王玉文：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1 支隊衛生隊化驗員，下士警銜。河北省大名縣西店鄉店北村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參加武裝警察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王玉文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在執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任務中，面對反革命暴徒的瘋狂襲擊，冒著生命危險奮力救護傷員，慘遭暴徒毒打，身負重傷。”【注釋 36】

12) 王志強：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司令部內衛處副處長，少校警銜。山東省萊州市人，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生，一九七六年二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後來轉入武裝警察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王志強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令發佈後，他在保證指揮、負責聯絡工作的五天中，連續三晝夜沒休息，保證了指示、命令的及時傳達貫徹。之後，他又連續三天三夜沒休息，繪製圖表，擬制方案，爲首長及時提供了資料和依據。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淩晨，在交通被堵的情況下，他帶領一名司機，沖過了暴徒的攔截和圍困，把上級急需的絕密文件按時送到了指定地點。在六月三日晚至四日淩晨平息反革命暴亂戰鬥中，他奉命組織武警防暴隊爲戒嚴部隊主力開進天安門廣場強行開路。帶領防暴隊勇猛衝擊，用催淚彈、電警棍和石塊與暴徒展開了殊死搏鬥。他一面指揮防暴隊戰鬥，一面及時協調與解放軍先頭部隊的配合，根據情況及時調整隊形、戰術及進攻節奏，使突擊頻頻奏效。

戰鬥中，他衝鋒在前，與暴徒展開面對面搏鬥，腿部三處

受傷，鮮血直流，全然不顧。他先後六次被臨街樓上的暴徒用大塊水泥磚擊中頭部，但他咬緊牙關，堅持沒有倒下，率領防暴隊打退了暴徒的一次次反撲，排除了一道道路障、火障，衝破了層層封鎖，經過二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浴血奮戰，同解放軍先頭部隊一起，長驅三十里，終於於（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五分勝利到達天安門廣場，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注釋 37】

王志強所率領的武警防暴隊，由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5 支隊第 8 中隊的部分官兵組成，承擔著爲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開道的任務，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王志強現任廣東省中山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

13) 姜超成：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5 支隊第 8 中隊中隊長，中尉警銜。湖北省麻城縣人，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後來轉入武裝警察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姜超成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接受護送‘前指’(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作者注)任務後，在護送通過玉泉路和永定路口時，分別遭到上千人的攔截，在五棵松路口，受到上萬人的圍追攔截和暴徒瘋狂打砸，於二十二點二十分，護衛‘前指’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

緊接著，接受了爲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實施正面開道任務。戰鬥中，面對異常複雜的情況，他沉著冷靜，指揮靈活。在木樨地路口，有五、六千人在暴徒的煽動下，喪心病狂地用石塊、磚頭向部隊砸過來，不少同志身負重傷。沖過大橋後，又連續遭到成千上萬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群眾的瘋狂襲擊，部隊再次嚴重受阻。在復興門立交橋東西兩側有數十輛燃燒著的車輛擋道，橋上橋下有數千人圍攻。

當部隊行至西單路口時，路面被暴徒鋪上棉被，澆上汽油點燃，一片火障。他冒著雨點般的石塊，站在最醒目的位置——交通安全島上進行指揮，並親自帶領一個突擊組沖向火海，一面撲火開道，一面向暴徒進行反擊。在他和其他幹部的帶領下，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連續拚搏和浴血奮戰，全體防暴隊員人人帶傷，於（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五分引導解放軍戒嚴部隊勝利到達天安門廣場，並順利實施了清場任務。”【注釋 38】

14)劉加林：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下士軍銜。江蘇省大豐縣人，軍人家庭出身，一九八六年十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劉加林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劉加林作爲一名首都警衛戰士，多次跟隨部隊執行任務，表現尤爲突出。尤其是六月三日在六部口奪槍彈的鬥爭中，他捨身忘死，英勇頑強，隻身在裝有武器彈藥的大轎車頂上打下四名暴徒，奪回了一挺輕機槍、一支衝鋒槍、一支步槍，在衛戍區部隊中立下了頭功。”【注釋 39】

一九八九年七月，劉加林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十一月被破格提拔爲排長，授予少尉軍銜。

15)劉閣雲：陸軍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第 2 營營長，少校軍銜。河北省豐南縣宣莊鄉王家盤村人。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劉閣雲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形勢已十分嚴峻，劉閣雲所在部隊，接到秘密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命令。

人員化裝進入大會堂，在暴徒們沒有預料的情況下，可能會較順利，但要把全團近千人的鋼盔、背包、乾糧和其他裝備用車運抵大會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團長曹栓澤、政委王永存，眉頭擰成了疙瘩，讓誰押運保證萬無一失呢？這時傳來‘報告’聲，進來的是劉閣雲，要求把押運武器彈藥的任務交給他。他的請求正合曹團長和王政委的心意，由他押運武器彈藥，正是兩位團領導在考慮的問題。……

劉閣雲清楚地知道，能否把全團的武器彈藥安全順利地運抵人民大會堂，直接關係到下一步任務能否順利完成的大問題，而押運途中可能要遇到險情，冒更大的風險。……先後押運槍支七百余支（挺），及子彈、電臺、被裝等，他們沒丟一槍一彈，沒損一件裝備，沒少一樣物品，爲部隊清場提供了物資保證。

……

在以後二十多次執行不同任務中，劉閣雲總是身先士卒，臨

危不懼,衝鋒在前。

----六月四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清場，他主動要求擔任突擊隊隊長，帶領部隊第一個搜索天安門廣場的地下通道，繳獲兩支被毀壞的衝鋒槍。

----六月十日至七月中旬，他擔任搜捕隊隊長，帶領部隊出擊十二次，每次他都是第一個進屋，第一個上前擒拿暴徒。

----在以後擔任集團軍和師應急分隊隊長中，他帶領部隊結合戒嚴的特殊任務，從一點一滴培養部隊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形象，練隊列、糾軍姿、整軍容、搞自救互救，演練乘車開進，預想各種情況，以合格軍人的姿態出現在首都人民面前。”【注釋 40】

16)楊蓉婭：北京軍區總醫院皮膚科醫生。甘肅省蘭州市人，一九五七年秋天出生，一九八八年六月從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皮膚科取得碩士學位後，分配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一九八九年年初，又被送到協和醫院進修學習。其父楊柏林是解放軍轉業幹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在甘肅省工商管理局工作，其母李改英一九八九年的時候是甘肅省財政廳幹部。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楊蓉婭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正在協和醫院進修學習的楊蓉婭發現醫院裏有三十四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傷患，在協和醫院領導和醫院保衛處人員的配合下，她積極治療和保護這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傷患，並主動聯絡北京軍區總醫院，最終將三十四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傷患分批轉移到北京軍區總醫院，使得他們安全脫險。【注釋 41】

17)李樹存：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裝甲步兵團特務連裝甲車駕駛員，上士軍銜。山東省金鄉縣人，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李樹存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中，李樹存擔任破障開路任務。他在先後三次身負重傷情況下，以頑強的意志衝鋒陷陣，駕車連闖五道堅固路障，爲部隊順利進入天安門廣場開闢了通路。”【注釋 42】

18)葛明軍：北京軍區直屬通信團專業軍士（志願兵）、報務班班長。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河北省黃驊縣羊二莊回族鄉後街村的一個回民家庭，一九八二年十月參加解放軍部隊。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葛明軍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多，威武的裝甲車隊從東高地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了。

葛明軍乘坐的是零零三號指揮車，車上有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和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大校等七名同志。……

車身不斷地顛晃，車內持續高溫，葛明軍直想嘔吐。（六月三日）二十三時四十分，頑強的零零三號，終於到達廣場指定位置。

開進期間，葛明軍共通話二百餘次，收發信號二百多個，及時、準確地將指揮部的命令、指示傳達給車隊指揮員，保證了通信聯絡暢通。

……

六月七日，團領導再次派機關幹部到（解放軍）二六一醫院看望葛明軍，他才眼含熱淚地從枕頭底下取出聯絡檔，交給了團裏來的幹部股長。”【注釋 43】

19)傅勇：陸軍第 40 集團軍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營長，少校軍銜。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傅勇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傅勇奉命帶領全營向北京市區緊急開進。

……

團長在東直門外大街選了個地方，召集各營長開會，研究和部署佔領（東直門）立交橋的方案。命令傅勇帶領炮營首先從橋北側沖上橋頭。

他急喊一聲：‘幹部、黨員到前面來！’便舉槍迅速奔向橋頭。

一塊飛來的石塊擊傷了他的右腿，鮮血染紅了褲管，只見他的身子稍稍晃動一下，又向橋頭沖去。官兵們在他的率領下，

猛虎般佔領了立交橋。他們清理了橋面，死死守住六個交通要道，阻止了人群車輛擁向天安門廣場。”【注釋 44】

20)種振慶：陸軍第 64 集團軍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少校軍銜。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種振慶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全團官兵準備就緒，五十六台軍車組成的車隊，從城郊沙河機場向北京市區進發。

種振慶和兩名通信兵，隨同機關指揮車行進。車隊行至沙河橋，尾隨的一部 150 瓦電臺車線路出現故障。種振慶及時請示團長，要求留下組織搶修。十多分鐘後，車基本修好，他們掉隊了。

……

天漸漸暗下來，寬敞的柏油路上，電臺車在疾駛行進。當車行駛到清水河邊時，公路橋上，擁來了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人流潮水般地擠滿了道路。

……

六月四日淩晨二點四十分，被圍了七小時的車隊，接到上級命令，迅速採取迂回前進的辦法，搶佔控制點。

……

車隊行進到學院路南端時，又被人群堵截包圍。電臺車跟著車隊緩緩地向前移動著。四周飛來的磚石、汽水瓶砸在車身上，‘砰！砰！’的響聲震耳欲聾。

……

突然，前面的軍車遇障停住，小車尾追熄火。這台帶病上陣的電臺車，再也動彈不了了。車隊離去了，電臺車孤零零地停在那裏，種振慶和六名戰士陷在人群之中。

……

此時此刻，種振慶反而冷靜下來。他一邊叮囑戰士，一邊動手拆下電臺主要部件，並把隨身攜帶的十一份機要文件，用毛巾和塑膠袋包裝好，斜掛在身上。一切就緒了，他命令大家：‘準備下車！’

隨著一聲怒喝，種振慶用肩膀撞開了車門。戰士們迅速下

車。暴徒見此情景，蜂擁而上，大打出手。

……

種振慶受傷六十一處，右前額豁開一條五公分長的裂口，深至顱骨。送進醫院時，他雙目瞳孔不等大，生命處於危急狀態。”【注釋 45】

21)樂立成：陸軍第 20 集團軍某團炮兵營營部衛生員，下士軍銜。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樂立成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淩晨，在跟隨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途中，身爲衛生員的樂立成多次奮不顧身地搶救傷患，最後因爲搶救傷患而自己身受重傷。【注釋 46】

22）袁華榮：陸軍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連長，上尉軍銜。

根據中國官方有關宣傳資料的記載，袁華榮立功受獎的主要“英雄模範事蹟”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夜，北京先農壇體育場。在團部經過一番‘唇槍舌戰’爭到防暴突擊隊任務的 5 連連長袁寶華，匆匆返回連隊‘宿營地’……

袁寶華安定住戰士們的激動情緒，傳達了團首長的指示精神，並做了簡短的動員：‘同志們，上級賦予我連擔任團的防暴突擊隊，配合永外派出所開展抓暴徒、端黑窩的鬥爭。這是團黨委對我連的高度信任。同志們，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雖然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斬草除根，堅決把他們消滅乾淨，爲保衛共和國再立新功！’全連官兵聽說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決心大幹一場。

……

在以後的十多個日日夜夜裏，袁寶華帶領二十名防暴隊員，夜行晝宿，機智靈活，配合永外派出所抓獲暴徒八十二名，演出了一幕幕抓暴徒，端黑窩的活報劇……”【注釋 47】

上述三十七名“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先後分爲五批授予。第一批授予的是：劉國庚、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崔國政、馬國選、王錦偉，由中共中央

軍委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授予。

第二批授予的是：李國瑞、劉艷坡，由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國國務院共同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授予。當時，武裝警察部隊接受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國國務院下屬的公安部的雙重領導。

第三批授予的是：于榮祿、臧立傑、趙勇明、李勃、王強、廖開喜、張震、安衛平、沈運田、余愛軍、周家柱、游德高，由中共中央軍委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授予。

第四批授予的是：王玉文、王志強、姜超成，由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國國務院共同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授予。

第五批授予的是：王景生、劉加林、劉閣雲、楊蓉婭、李樹存、葛明軍、傅勇、種振慶、樂立成、袁華榮，由中共中央軍委於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授予。

中國官方對前四批的“共和國衛士”都進行了公開的報導和宣傳，後來出於淡化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負面影響的考慮，第五批“共和國衛士”只在解放軍內部通報，沒有進行公開的報導和宣傳，以至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第五批授予的十名“共和國衛士”不爲人知。

在十五名死亡的“共和國衛士”中，當數被稱之爲“三國”的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最爲出名，在九十年代前期，他們的畫像和雷鋒、賴甯等“英雄模範人物”一起，貼在全國各中小學的教室裏，不過，因爲中國官方刻意淡化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不久後即不再張貼。

在二十二名生存的“共和國衛士”中，仕途發展較好的當屬周家柱和楊蓉婭，前者一路升遷至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3 師師長，授予空軍大校軍銜，後來轉業離開軍隊，現任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後者現任北京軍區總醫院副院長，醫學博士，連續擔任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四十分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四十分左右，在上述陸軍第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幾輛裝甲車出現又消失後，成千上萬被強行驅散的民眾開始在天安門城樓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重新集結，將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廣場邊緣的交通隔離墩、鐵欄柵拉出來，設置成一道道路障。

一隊又一隊的學生和工人、市民打著校旗或上書“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的旗幟，絡繹不絕地從天安門廣場出發，有的朝著西長安街方向西行而去，有的朝著東長安街方向東行而去，有的朝著前門方向南行而去，分頭去堵截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他們有的頭上綁著紅布帶，有的衣服上沾滿血跡，一個個臉上全都充滿了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的神態。

眼看著熊熊火焰迅速吞噬著編號爲“零零三”的裝甲車，我不知道應該爲此感到高興還是惋惜，唯有天安門廣場失守在即的感覺越來越清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五十分左右，無數顆照明彈和曳光彈從四面八方飛向天安門廣場上空，就象節慶日施放焰火一樣，偌大的天安門廣場頓時被照耀得一片通明，如同白晝，儼然成爲決戰在即的戰場。

童年的記憶被喚醒。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性武鬥期間，我的家鄉----浙江省溫州市是全國聞名的武鬥地區之一，與河北省的保定市、四川省的重慶市並稱爲三大武鬥區域。我家所在的機關大院，當時是造反派組織的總部所在地，機關大禮堂於是變成了停放造反派“烈士”遺體的靈堂，經常有死於槍炮的造反派“烈士”遺體停放在那裏。每當召開追悼會，一聲“默哀”令下，數千支包括重機槍、高射機槍在內的各種槍械對天一陣又一陣齊放，槍聲震耳欲聾。

一首當年在造反派“烈士”追悼會上必定演奏的《毛主席語錄》歌“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同時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都非常清晰：“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

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爲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首歌倒是相當符合當時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我的心情。

童年的我已經“習慣”了槍聲和死亡，由於有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武鬥時期的經歷，我對天安門廣場的現狀並未產生過分的驚恐，使我驚訝的是，從未有過類似經歷的青年學生們，此時此刻也表現出異常的鎮靜，沒有人驚慌失措，更沒有人因爲害怕而哭泣。

中共當局對天安門廣場進行血腥清場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看來，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們也將在劫難逃。於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臨空前的考驗和挑戰。隨著四處槍聲的臨近，越來越多的學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進行殊死的抵抗，寧願站著死，也不願跪著生。

尤其是那些來自于各個屠殺現場的學生和市民，情緒極爲激烈，理智已經被極度的悲哀和憤怒所擊毀。他們對著依然秩序井然地靜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破口大罵：“你們難道就這樣坐在這裏等死嗎？你們難道還對那群野獸抱有幻想嗎？那群野獸見人就殺！根本就不分青紅皂白！都到了什麼時候了，還不沖上去拼了！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你們，犧牲了多少人，你們知道嗎？！”甚至有一些人揮舞棍棒威嚇端坐不動的學生。

的確，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北京市民的犧牲已經足夠慘重。這些學生和民眾的斥責話語強烈地刺痛著在場每一個人的心，衝動的情緒像旋風般地傳佈。我和一些特別糾察隊員都當面挨了這部分市民和學生的責罵，甚至被他們揮舞棍棒恐嚇，但我深深地理解他們的言行舉止，再三告誡特別糾察隊員們千萬不能與他們發生任何衝突，即使挨打挨罵也要忍受著，必須耐心地對他們進行說服工作。

一些來自于屠殺現場的民眾顯然是看到了太過於殘酷的屠殺情景，受到了太大的刺激，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像瘋了似地四處奔跑，有人不斷地哭喊著：“他們在殺人！他們在到處殺人！他們不是人！他們是畜生！這幫畜生見人就殺！這幫畜生見人就殺呀！……”

一位年輕的民眾跪倒在地，高舉雙臂悲愴地哭嚎：“老天爺，如果你還有一點公平的話，你就讓我跟這幫殺人不眨眼的畜生一起去死吧！”

一名身穿北京大學白色 T 恤、渾身是血的北京大學學生瘋了似地沖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不斷地揮舞雙手，大聲呼喊著：“給我機槍！快給我機槍！我要去殺盡那群畜生！我要爲死難同學復仇……”他根本無法如願，那些早些時候被學生和市民在各處所搜撿到的槍支，顯然是中共當局指使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故意遺棄的，其中的絕大多數槍支因爲缺少槍栓而無法使用，即使這樣，這些槍支也早已由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有組織地送交給公安部門。這位北京大學的學生唯有失望地抱頭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一名趕來天安門廣場報訊的男青年痛哭流涕，滔滔不絕地敍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血腥屠殺暴行。敍述到悲慘處，他緊闔雙眼，不能言語。只見他反復搖頭，全身不住地痙攣、顫抖。人們以爲他要暈過去了，正想上去扶住他。猛地，他抬起左手對準腦袋，作出槍擊狀，悲憤地呼喊：“他們就是這樣開槍的啊！……就是這樣對我們開槍的啊！法西斯們就是這樣開槍的啊！……就是這樣開槍的啊！……”

這位男青年所描述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使用近距離行刑方式冷酷無情殺人的情景並非虛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用化學專業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生段昌隆，就是被一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官用手槍以行刑方式近距離射殺的，遇難時年僅二十四歲。他的骨灰安葬於北京市西郊的萬安公墓（位於北京市海澱區香山南路萬安里，京西風景區香山南麓）。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段昌隆剛剛從姐姐的工作單位----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回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鼓樓附近北官房的家中，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消息，馬上著急地騎著自行車出了家門，去尋找他的女友和妹妹。六月四日淩晨，段昌隆推著自行車來到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民族宮附近，正好遇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與大批民眾形成對峙局面，手無寸鐵的民眾群情激憤，荷槍實彈的軍人虎視眈眈，情勢極爲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段昌隆目睹這種緊張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心想，軍民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自己是清華大學學生，如果挺身而出向雙方說明道理，加以勸阻，可能會避免一場悲劇的發生。

段昌隆快步跑向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行列，來到站在該部隊行列前排，看起來像是指揮員的一位軍官跟前，沒想到這位軍官二話不說，舉起手槍朝他當胸就是一槍。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當即傷重倒下。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及時上前救助，把受傷的段昌隆背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搶救，終因傷重不治身亡。

當段昌隆被送入郵電醫院的時候，正好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場，他從段昌隆隨身攜帶的學生證中把他的姓名、班級抄寫在自己的褲腿上，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拂曉時分趕回清華大學校園，將情況報告給校方，段昌隆的死訊頓時傳遍清華大學校園。

清華大學校方曾經派人前往郵電醫院聯繫，打算把段昌隆的遺體運回校園處理，但郵電醫院說上級部門有指示，遇難者的遺體將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上午八點鐘由政府統一處理，不能讓其他人插手辦理！

有關段昌隆遇難後的一些情景，他的母親周淑莊作了這樣的陳述：

“那天從電話中得知兒子遇難的消息後，先由親友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早晨趕往郵電醫院，給昌隆做了防腐處理，並剪下他的一縷頭髮留作紀念。親友們看著形勢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才把我們接到郵電醫院的太平間。他們怕我們過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脫下藏了起來，換上新衣服後才讓我們進去與兒子告別。

我進到太平間，那裏還有二十六具屍體躺在那裏。我見昌隆靜靜地躺在一張木板上，像是往常熟睡一樣，只是臉色蒼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氣沒吐出來，雙眼半睜著好象要向親人訴說些什麼。我輕輕將隆兒的眼皮抹下，說：‘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媽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覺得隆兒又回到媽媽的懷抱裏，我親吻著隆兒冰涼冰涼的臉，冰涼冰涼的手，冰涼冰涼的腳，這一切都冰透了媽媽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

固了，渾身上下也都麻木了。

當我被人攙扶起來時，才意識到我要和孩子永別了！心頭的悲憤一下迸發出來，全家嚎啕慟哭，在場的、路過的不相識的人群都陪我們痛哭不已。有些在場的青年攥緊拳頭對我說‘這筆血債早晚要嘗還！’”

後來，周淑莊結識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告訴丁子霖說，段昌隆是段家的獨生子，他父親在四十四歲的時候才得此一子。段昌隆的父親段宏炳出身名門望族，是北京市西城區政協委員。段昌隆來到這個世界才一年多，就遇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段家被抄過家、挨過鬥。段昌隆和他的姐妹是在劫後一貧如洗的境遇中長大的。後來段昌隆考上清華大學，成爲人人稱道的優等生。周淑莊爲段家出了這麼一個有出息的兒子而感到驕傲。她無限感歎地說：“我含辛茹苦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盼得他大學畢業，好回家頂門立戶，報效國家，沒想到就這樣被打死了。”

按照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段家的香火要靠唯一的兒子段昌隆來延續，可現在一切都落空了。每當提起這件事，周淑莊就難以遏制內心的痛苦，她說：“每當我聽到別人談及子女、兒孫的時候，就像是觸及了我的傷疤，痛徹心肺；尤其在夜雨孤燈之際，面對兒子的遺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段昌隆的不幸遇難，清華大學的全校師生無不爲之哀慟，師生們特意爲段昌隆以及其他五名遇難的清華大學學生舉辦了一場隆重而悲壯的葬禮儀式，爲段昌隆的遺體覆蓋了一面印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紅旗，以此來表達對死難者的敬仰與哀思。【注釋 48】

段昌隆既不是中國官方所稱的“暴徒”，沒有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也不是中國官方所聲稱的“誤傷”，死于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亂槍掃射，而是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一名軍官近距離、以行刑式的方式開槍射殺的。段昌隆就倒在開槍者的眼皮底下。不知道那個開槍殺人的軍人，這麼多年來良心上是否受到過譴責，他是否有勇氣面對自己當年所犯下的罪孽。這名近距離開槍殺人的軍人如果還有一點點人性，就應該把全部真相說出來。

段昌隆屬於名人之後，他是一九二零年代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祺瑞是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人物，不僅因爲他是著名的北洋軍閥的首領人物，更因爲他的名字與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慘案”聯繫在一起。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當時，面對在段祺瑞官邸前和平請願的學生隊伍，北洋政府衛隊指揮官驚慌失措，擅自下令開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當場打死四十七人，打傷二百多人。

段祺瑞因爲“三•一八慘案”而備受時人和後人詬罵，真可謂千夫所指。魯迅、朱自清等許多當時的著名文人，都曾經因爲“三•一八慘案”留下激憤的文字。如今輪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而且還動用了裝甲車和坦克。而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作爲青年學生的一員，倒在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槍彈之下，歷史真是善作諷刺！段祺瑞與他的侄孫段昌隆都安葬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假如他九泉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當年，在“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同仇敵愾，對開槍殺人者予以嚴厲譴責。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公開譴責以段祺瑞爲首的北洋政府。就連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休養的梁啓超也加入了譴責的行列。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魯迅更是激憤不已，爲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三•一八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也紛紛譴責屠殺和平請願學生的暴行，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所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新聞報導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十二天內，就連續發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

強烈譴責屠殺和平請願學生的暴行的，還有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大學校長、教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在雲南省

昆明市見到對“三•一八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北洋政府的高級將領鹿鐘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齊聚北京大學的大操場，爲“三•一八慘案”的遇難學生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京大學代校長蔣夢麟在萬人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裏，他竟然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啓動了原已半死不活的國會和司法機構。曾被譏諷爲“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事件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尙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爲，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條之重大嫌疑。”迫使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民心盡失的北洋政府最終也沒有保住政權。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不到一個月，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倒臺。

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的軍閥，其執政時期的政治混亂局面頗受詬病。然而，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開槍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遇難者遺體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發生“三•一八慘案”的一九二六年，中國雖然因爲軍閥混戰而亂象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開槍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比較而言，“三•一八慘案”只是一起偶發的事件，並不是北洋政府有預謀、下令開的槍，而六四血腥鎭壓事件則是由中

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精心策劃，並下達開槍的命令。就屠殺的規模而言，“三•一八慘案”也根本無法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相提並論。至於執政當局在屠殺事件發生後的表現，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與北洋政府和段祺瑞相比，更是有著天壤之別。【注釋 49】

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十分左右，又有一名渾身是血的學生沖進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神情悲憤，情緒激動，這位學生聲言他來自於醫院，至少已經親眼目睹十名學生傷重不治，強烈要求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立即改變播報方針和內容，趕快呼籲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放棄非暴力抗爭的方式，拿起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作殊死的戰鬥。

但是，學生絕食團廣播站沒有接受這名學生的建議，仍然堅持原定的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繼續在廣播中不斷地呼籲學生們放下手中的石塊、汽水瓶子、棍棒等“武器”，以和平方式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堅守到底。

一些特別糾察隊的隊員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也紛紛前來向我請戰，請求我帶隊離開天安門廣場，沖向最前線，爲死難的同學和民眾復仇。我雖然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並且竭盡全力地安撫他們的情緒，而內心裏卻早已憤怒難當，情緒衝動得已臨近爆發點。

我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參與組織中國政法大學的部分師生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以來，始終堅持與學生們站在一起，處身于民主運動的第一線，在絕食請願期間曾經先後四次被送入醫院救治，又曾經在新華門前擔任絕食請願活動的負責人，自視不是一位貪生怕死之輩。在考入北京大學之前，我本是邊防武警部隊的職業軍官，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說實話，當時如果手中有武器，真想與濫殺無辜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拼個高下。

但是，身爲大學教師兼特別糾察隊領隊，很難做出以暴易暴的選擇，眼前這些自願作爲特別糾察隊隊員的學生，大都是我所熟悉和喜愛的，他們那麼年輕，怎麼忍心讓赤手空拳的他們去冒槍林彈雨的風險。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強壓下內心的衝動，痛苦得無以言說。假設我不是特別糾察隊的指揮，沒有將四十名作爲特別糾察隊隊員的學生帶到天安門廣場來，對他們的人身安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或許我早已單槍匹馬地殺向西長安街一帶去了。

突然間，一名特別糾察隊員領著一位報訊的市民前來找我，說是有一名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在西長安街上中彈身亡。震驚之餘，我急忙詢問這位前來報訊的市民是怎麼得知這名死亡學生的身份的，他回答說這名死亡學生的身上有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證，並隨口說出了學生證上的名字“某某”（我現在已經不能確定這個名字）和學生證號碼。【注釋 50】

這時候，帶領這名市民前來報訊的特別糾察隊員插話說，“某某”也是特別糾察隊的隊員，不久前私自離開了天安門廣場，說是要去西長安街一帶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

我本來對此事就極感震驚，一聽說遇難的學生“某某”是由自己親自帶出校門的特別糾察隊隊員，半晌說不出話來，內心裏的自責真的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學生死了，身爲老師兼領隊，怎麼向學生的家長交待？想來想去，唯一能夠安慰自己的就是，好在自己如今也沒打算活著離開天安門廣場。

此時此刻，我算是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舉動和良苦用心有了深切的體會。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八點鐘左右，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與北京市其他高等院校的學生一樣，要上街遊行，抗議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題爲“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該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當時，北京市各個高等院校的校園內盛傳一個訊息：中共當局將對上街遊行的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通往天安門廣場的各個交通要道也早已佈滿軍警。江平校長帶領一批中國政法大學的校、系各級領導和老教授擋在校門口，流淚甚至下跪，苦苦勸說學生們不要出校門遊行，他們反復對學生們說的一句話就是，萬一發生了流血衝突，你們受到了傷害，我們怎麼向你們的父母交待。

在位於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內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裏，以柴玲爲首的學生領袖們經受著更大的壓力和考驗。一批批學生和市民沖進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要求學生領袖們正視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開槍屠殺，以及學生和市民傷亡慘重的現實，立即宣佈放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號召並帶領大家進行暴力抗爭。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裏的人們也是意見分歧，爭論不休。

在鮮血的不斷刺激下，不斷哭泣的柴玲曾經一度衝動得難

以自製，她一把奪過廣播員的話筒，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大聲疾呼："無恥的政府已經大開殺戒，同學們，我的同學們，你們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用來做抵抗的東西，到天安門廣場邊緣去，到天安門廣場邊緣去準備自衛！準備反抗！"

柴玲的衝動舉止當即遭到幾位在場高校青年教師的勸止。此時此刻，這些學生領袖的一舉一動，都將關係到天安門廣場上數以千計的年輕生命的安危，責任之重大，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這般年齡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終于冷靜下來了，在最後關口，她和李錄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領導成員們，這些歷來被人們認定爲激進派的學生代表人物，決定繼續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籲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視爲武器的東西，包括石塊、汽水瓶子、棍棒之類。

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的情緒幾近失控，以暴易暴的反抗行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領袖們和在場的各個高校的青年教師紛紛下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隊伍中間，反復宣講：我們是和平請願，我們的宗旨始終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們曾爲此做出過許多努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繼續堅持這個宗旨，哪怕是流血犧牲，我們不能因爲一時衝動，而使堅持已久的和平請願的宗旨毀於一旦。

只見柴玲走入紀念碑底座下北側的學生隊伍之中，一遍遍、一處處地用她那已經沙啞的聲音宣講："同學們，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同學們，只有我們的犧牲，才能換來這個人民共和國的新生。"言辭之哀婉，態度之懇切，再次激揚起在場學生們的英雄主義情緒，同時也使捨身爲國、悲壯犧牲的氣氛達到了頂點。言者流淚，聞者也流淚。

作爲教師，我無法不爲這些學生而自豪，但更多的則是痛苦，爲這些年輕而可愛的學生將面臨血腥鎮壓而痛苦。

學生絕食團廣播站也在一遍遍地發出呼籲："同學們，爲了避免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請你們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塊，放下一切可能被視作武器的東西！我們是和平請願！請牢牢記住：我們是和平請願！……"

劉曉波、侯德健等人也在廣播中一再呼籲學生們放下手中

一切可能被視作武器的東西，放棄任何暴力抵抗的企圖，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我帶領幾名特別糾察隊隊員在紀念碑底座北面一帶四處檢查，將學生隊伍中一些石塊、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全都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個別人在激憤之余有違和平請願的宗旨，並成爲解放軍戒嚴部隊血腥鎮壓集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以千計的學生的口實。

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聚集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手中已經沒有任何可以稱作武器的東西，哪怕是一塊石頭、一個汽水瓶子或一根棍棒，解放軍戒嚴部隊屆時所面對的將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請願者。

四周的密集槍聲越響越近，英勇犧牲的氣氛籠罩了整個天安門廣場，籠罩了每一個人的心靈。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提議下，全體人員起立，舉起緊握拳頭的右手，跟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莊嚴地宣誓：“我宣誓，爲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爲了祖國的真正的繁榮昌盛，爲了偉大的祖國不爲一小撮陰謀家所顛覆，爲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喪生，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緊接著，一陣悲壯的《國際歌》歌聲響起：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爲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悲壯的歌聲蓋過了天安門廣場四周密集的槍聲，也驅走了人們心中殘存的最後一絲恐懼和猶豫。

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時此刻，人們無不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洋溢著爲真理而獻身的神聖情感。我激動得難以自製，“四•二七”大遊行的時候我曾經激動過，“五•一三”大絕食的時候我也曾經激動過，但從未像此時此刻如此之激動。學生們紛紛前來與我緊緊握手、擁抱，表達最後的情感。

在生與死的臨界點，許多學生絲毫不考慮自身的安危，卻一再懇切地勸我離開天安門廣場。他們說：“吳老師，您是我們尊敬的老師，我們不願意讓您冒任何生命風險。您快離開這裏，快離開這裏吧！”我感動得連“謝謝”兩字都無法表達，只是緊緊地擁抱著每一位熟悉的學生，一行熱淚湧出眼眶。

面對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年輕學生，我除了激動，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這些屬於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年輕一代，卻將直面冷對血腥鎮壓的危險。羞愧的是，此時此刻，除了極少數與學生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高校青年教師之外，幾乎已見不到其他的知識界人士。

多年來，許多中國知識界精英分子一直對學生們鼓吹民主理念，激勵學生們追求民主。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他們也曾信誓旦旦，宣稱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用鮮血和生命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爲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而如今，當學生們因爲追求民主而面臨流血犧牲的危險時，當真正需要爲真理而進行最後的鬥爭時，他們又身在何處？他們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經過在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復興門、軍事博物館、西單路口、六部口等處的血腥屠殺行動，終於殺出一條血路，沿著西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廣場北面的天安門城樓前，集結在金水橋一帶。

這支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隸屬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所謂“紅軍團”。這個“紅軍團”應當就是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陸軍第 38 集團軍一共擁有兩個“紅軍團”，另一個是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

時任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團長的是李少軍上校，時任步兵第 334 團副團長的是黃光雄中校，時任步兵第 334 團政治處主任的是王建偉中校。

這支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一路上已經殺紅了眼，異常兇狠，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殺集結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附近、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廣場北端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天安門城樓一帶仍然聚集著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他們曾經組成一道道人牆，試圖阻擋軍隊向前挺進。陸軍第 38 集團軍先頭部隊的軍人不由分說，立即開槍掃射人群。數分鐘內，即將金水橋一帶的人群驅散。

此時，在天安門城樓附近的長安街上，不止一輛公共汽車被火點著了，一團團火焰騰空而起。整條長安街上槍聲密集，煙火濃烈，不時有子彈射中路旁的鐵欄杆或燈柱，閃爍著耀眼的火花。一群又一群的學生和市民浴血奮戰，但終究抵擋不住槍林彈雨，先後潰散退入天安門廣場。

其間，不斷有中彈受傷的學生和市民被用三輪平板車、自行車運載著，或被幾個人抬著、背著撤離現場。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為了躲避槍彈，慌不擇路地躲進了天安門城樓前橫跨長安街的地下人行通道。

然而，仍有大批勇敢的市民和學生聞訊趕來，在天安門廣場北端邊沿組成人牆，企圖阻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進入天安門廣場。

一名青年男子從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由南往北，朝著天安門城樓方向狂奔，轉眼之間已經來到了長安街南邊的交通護欄前。只見他昂首挺胸，勇銳無畏，“唰”地一下，毅然決然地撩起了白色T恤衫，用力拍打著結實的胸膛，沖著不遠處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吼叫：“法西斯，你們開槍吧！法西斯，你們來吧！法西斯，你們動手吧！法西斯，你們沖著老子開槍吧！……”

山東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學生潘強，原來待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抵達天安門城樓前，情況緊急，也拿著小話筒急匆匆趕到了天安門廣場北面的長安街南側。當時，潘強與其他的很多學生一樣，習慣於在有衝突發生的時候主動站出來調停或維持秩序，而當時的北京市民非常服從學生的組織和指揮。

潘強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當時看到長安街上有一輛坦克和一輛裝甲車(當時還沒有坦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應該都是裝甲車，編號分別爲“零零三”和“三三九”，而三三九號裝甲車被焚燒的地點是在新華門附近。潘強作爲一名沒有軍事常識的學生，分辨不清坦克和裝甲車。---- 作者注)已經被憤怒的群眾所點燃，天安門城樓前早已是熊熊大火，在天安門廣場北端的國旗杆附近有人拿著火把點燃帳蓬。不斷有市民和學生把奄奄一息、混身是血的受傷者抬來，送到位於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的臨時救護站。

這時候，有幾個從西長安街撤回來的工人模樣的北京市民變得無比憤怒，到處尋找石頭和棍棒，要衝上去與不遠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拼命，潘強上去勸說他們放下手中的石頭和棍棒，放棄暴力抵抗。他們對著潘強一通狂吼：“他們殺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害怕就滾開！”其中一個工人還要上前來揍潘強，被其他市民拖住了。

潘強絲毫沒有退讓，拿起小喇叭，也沖著他們大吼大叫：“我們現在要儘量避免沖突和流血。你們現在請趕緊回家，我們現在沒有任何可以抗衡戒嚴部隊的武器，我們要儘量保存實力，總有一天會血債血還的！”有些市民覺得潘強說得有道理，便開始撤離。混亂之中，潘強手中的小話筒也不知何時被誰搶走拿去喊話了。

隨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從西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城樓前，並不斷開槍掃射，大部分民眾在槍林彈雨中被迫退入天安門廣場，另有一部分民眾則被迫向東長安街節節後退。

就在這個時候，從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內湧出一批又一批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防暴警察，他們或持槍，或揮舞棍棒，列隊通過金水橋，直逼長安街。先前遭到潘強勸阻的那幾個憤怒的年輕工人勇敢地沖上前去，向黑壓壓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防暴警察的隊伍投擲石頭，但漸漸地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防暴警察的隊伍逼退，一步步往西長安街退去。

潘強和幾名北京大學特別糾察隊的學生，以及一名北京經貿大學的學生，退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北角（即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出入口），繼續設立糾察線，勸說現場的市民和學生撤離，並警告出天安門廣場的人：前面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注意人身安全。

隨著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到來，天安門城樓一帶頓時槍彈橫飛，造成了不少學生和市民中彈傷亡，許多學生和市民冒著生命危險，自動自發地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受傷者。一位學生和他的一位同學臨時找來了一輛三輪平板車，齊心協力把受傷者拉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的臨時救護站。據他介紹，他與他的同學至少拉了十二趟受傷者，從傷勢看，其中最多只有二、三位受傷者可能存活。在救人的過程中，他看到一位相當勇敢的北京市民，這位市民騎著三輪平板車，獨自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火網中至少拉了二十一趟受傷者，將他們一一送往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的臨時救護站。

在槍林彈雨中，一部分市民和學生來不及撤入天安門廣場，匆忙間帶著部分受傷者撤退到了天安門城樓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西北門前（正對著南池子街南口）的長安街上。正當醫務人員和自願救護者在此地緊急爲一些受傷的學生和市民處理傷口的時候，從東面沿著東長安街開來了一輛大通道式的公共汽車，這是一輛插有紅十字旗幟、臨時用來運送受傷者的車輛。於是，一些受傷者迅速被抬上車去。

大概是司機或自願救護者想再搭載上更多的受傷者，所以

這輛公共汽車繼續向西行駛，也就是向著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挺進過來的方向開去。車子沒走多遠，尚未接近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就被一陣密集的槍彈所包圍，車子前後的窗玻璃全都被打碎了。

檜聲暫停之際，車子內的一個小夥子爬到車廂前面，奮不顧身地取下插在車頭、印有紅十字標記的白旗，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使勁搖晃著，說明救護受傷者的目的。志願救護者史鑒因為白上衣上繡有紅十字的標記，所以，他也勇敢地從車窗探出身子，向不遠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大聲呼喊："請你們不要開槍，我們是救護受傷者的！"並且向他們指示紅十字的標記。

當時，車子內大約有十幾名志願救護者，這些人沒有任何組織，原先互不相識，絕大多數與死傷者毫無瓜葛，也不是醫務人員，但是，在屠殺事件發生後，在受傷者需要救助的時候，他們毫不猶豫地伸出了援助的手。

史鑒雖然也不是醫務人員，但因為種種淵源，對醫學多少有所認識。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鎮壓、許多人中彈傷亡的危難關頭，他覺得自己不能不勉力為之，決定冒險上街，到屠殺現場搶救受傷者，盡自己的一份責任。離家之前，在許多熱心人的幫助下，他匆匆搜集了一些急救藥品。他的母親知道他的決心後，雖然十分擔心他的安危，但沒有予以阻攔，只是在他離家之際，默默地將紅十字標記分別繡在他的上衣的胸前和左臂部位。

在史鑒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喊話，表明志願救護者的身份和搶救受傷者的目的之後，車上的志願救護者們開始繼續安置受傷者，汽車也重新啓動。突然間，猛烈的槍聲再次籠罩了車子，車廂的前部分有人中彈倒下了。車子內的志願救護者震驚了！誰也沒有想到，在表明志願救護者的身份後，竟然會再次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開槍射擊，他們是搶救受傷者的志願救護者，而且還打著紅十字標記的旗幟啊！

槍聲在激烈地持續著。趴在滿地都是碎玻璃的車廂裏，史鑒第一次感覺到死亡距離自己如此之近，但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多想什麼，因為車廂前部分的一個受傷者正在掙紮著向他爬過來求救。這位受傷者的肚子上有一個彈孔，鮮血正不斷地湧出，

史鑒的手頭已經沒有任何醫用物品，只好將自己的手絹遞給這位受傷者，沖著這位受傷者高聲叫喊："用手絹堵住傷口！緊緊壓住！"環顧四周，史鑒意識到眼前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勵大家不要失去求生的意志和信心。因爲在這一刻，精神上的絲毫絕望都可能將受傷者引向死亡。在密集的槍聲中，史鑒一邊爲一個瀕臨死亡的受傷者壓迫止血，一邊不停地大聲呼喊著，鼓勵著大家。

不知過了多久，槍聲一下子停止了。還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們並沒有沖上前來。史鑒大聲對車子內的人們喊叫："誰會開車？請趕快倒車後退！去協和醫院！"此時，有志願救護者再次向不遠處虎視眈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搖旗請求。之後，車子放棄了原先繼續前往西長安街搶救受傷者的目標，回頭向協和醫院開去。【注釋 51】

轉眼之間，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一輛輛坦克和裝甲車迅速地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布好了陣式，數以千計的後續部隊官兵或搭乘軍用卡車，或步行，陸續抵達。隨即，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部隊官兵就分頭在天安門城樓東面的南池子街南口、天安門城樓西面的南長街南口布好了警戒線，嚴密封鎖了從東、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通道。同時，也在天安門城樓北面的故宮博物院（紫禁城）闕門設置了警戒線，嚴密封鎖了由北往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通道。

緊接著，在天安門城樓東邊，再次響起一陣又一陣密集的槍聲，沿著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部隊的一部分官兵隨之掩殺而至，與從西路率先抵達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部隊，在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一帶實現了會師。

擔任陸軍第39集團軍先頭部隊指揮官的是該集團軍的參謀長王榮贊少將，他按照上級機關"靠前指揮"的要求，隨同步兵第 116 師的先頭部隊一起乘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但由於車隊在開進途中受阻而脫隊，並沒有跟隨先頭部隊一起抵達天安門廣場。

隸屬於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部隊的一部分官兵陸續抵達之後，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門前，面對著天安門廣場，一排排地坐在臺階上。

與此同時，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的西北門，湧出數千名陸軍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穿過中國歷史博物館，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門前集結待命。陸軍第 24 集團軍部隊的另一部分官兵，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的南門沖出來，經由正義路，也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門前集結待命。

陸軍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大都頭戴鋼盔，手持槍支，但也有許多官兵手中沒有槍支，只是拿著長短不一的棍子。這些手握棍子的官兵隸屬于陸軍第 24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2 師，由於該師的槍支彈藥沒有及時送到，當時全師只有二十五衝鋒槍，包括師政委張鼎文大校、師參謀長賴豫福上校在內，都是人手一根棍子。

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清場計畫部署，陸軍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在軍長周玉書少將、軍政委尹文聲少將等人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提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以便裝、徒手、分批開進的方式，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此時，集聚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除了陸軍第 39 集團軍一部分官兵和陸軍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還有來自於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部隊的兩千名官兵。炮兵第 14 師部隊的兩千名官兵是在師長陳明義少將、師政委徐福安大校等人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火車站的臨時駐地營房出發，經由崇文門、前門等地，抵達天安門廣場。

如上所述，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官兵在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殺人不眨眼，越殺越兇狠，將西長安街殺成了一條血路。他們在抵達天安門城樓金水橋的時候，早已經殺紅了眼，面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他們依然毫不留情，繼續開槍殺戮，造成市民和學生很大的傷亡。

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二年級第二班學生王楠（參見附錄照片）是眾多遇難者中的一個，他的遇難情景具有典型性，足以證明許多屠殺事件目擊者所說的，這些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官兵已經不是人，而是一群見人就殺的野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對面、南長街南口，王楠被到達天安門廣場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即所謂“紅軍團”的軍人開槍擊中，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從左耳後穿出，傷重倒地不起。

當時，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一路開槍挺進，陰森森的槍口在夜幕中不時地噴射出子彈，閃爍著耀眼的火花，王楠站起身子，正面對著持槍挺進的軍人舉起照相機，準備將這個鏡頭拍攝下來，留作歷史的見證。就在此時，一陣密集的槍彈對著他掃射過去，他隨即被子彈擊中倒地。

王楠真是一個令人敬佩的好小夥子，在傷重倒地之時，他仍然用盡全身力氣做出了一個 v 字形的手勢。

在王楠傷重倒地之時，在場的一些市民和學生曾經試圖沖上去想將他送到醫院搶救，但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端槍威脅民眾不准接近他，不准抬走他，並粗野地將受了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不許任何民眾接近他。

據兩位目擊者，一位光大計程車公司的劉姓司機和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吳姓學生敍述，當時曾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哭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允許民眾將王楠送到醫院搶救，“那是個孩子，求求你們讓大家去救他吧！”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但毫不理會老太太的苦苦哀求，反而蠻橫地將槍口指著老太太威脅說：“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你再廢話，我也斃了你！”

後來，先後有兩輛救護車沿著南長街從北往南開過來，想到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這兩輛救護車在抵達南長街南面路口，準備拐上長安街的時候，均被在那裏設置了警戒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截堵了。其中一輛救護車上的一位男性醫生經在場民眾請求，曾經下車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交涉，要求將王楠和倒在地上的其他受傷者抬走，送往醫院搶救，卻同樣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斷然拒絕，只好作罷。

這兩輛救護車最終都未能進入長安街搶救傷員，也沒能帶走王楠和倒在地上的其他受傷者，無奈地經由原路向北返回。據目擊者反映，這兩輛救護車中的一輛屬於北京醫學院，另一輛可能屬於協和醫院。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端槍阻止民眾和醫務人員搶救受傷者的所作所爲，這真是令人髮指的罪惡啊。即使在兩軍交戰的你死我活的戰場上，也沒有不准救護受傷者的道理，甚至有時還會對敵方的受傷者予以救護。而在號稱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僅動用真槍實彈、裝甲

車、坦克殺戮平民百姓，而且還不准救護受傷者，天理何在？人性焉存？

此後不久，一支由幾名北京醫學院（現爲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和幾名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位於西單大街）的職工自發組成的臨時醫療救護隊，冒著槍林彈雨，不顧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嚴厲警告，沿著被殺成一條血路的西長安街，從西單路口一路救死扶傷到達南長街的南面路口。他們到達南長街南面路口的時候，已經是六月四日淩晨兩點多鐘，發現王楠就倒在南長街南面路口的路邊，而在馬路對面，也有兩個民眾已經中彈受傷倒下。他們立即給王楠和其他兩位中彈受傷的民眾包紮了傷口。

當時，王楠已經陷入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體溫和心跳，眼鏡還是完好的，至於照相機等物品都已經不見了，身邊只留有一個空書包。醫學院學生們看過王楠的學生證之後，立即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提出要求：他是一位中學生，傷重流血過多，必須馬上送到醫院搶救。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找來一位軍官，該軍官年紀較大，上校軍銜。（據一位臨時醫療救護隊的醫學院學生事後透露，該部隊的代號爲“51010”。）【注釋 52】這位上校軍官看了王楠的學生證之後，看樣子很同情，可是，一聽到醫學院學生們將王楠送往醫院搶救的要求，馬上面現難色，說：“那不可能，你們就地儘量搶救吧！”或許上級機關有統一規定，這位上校軍官真的是做不了主。

醫學院學生們隨身攜帶的醫療用品都已經用完，只有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的職工手中尙剩餘最後一點繃帶，他們給王楠包紮了傷口，做人工呼吸。除了包紮傷口、做人工呼吸之外，沒有別的搶救手段和條件，但王楠畢竟受傷時間已久，血流得太多了，這樣簡單的治療是無濟於事的，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三十分不治身亡。這時候，馬路對面受傷倒下的那兩個民眾同樣因爲沒有得到足夠的救治，也已經陸續不治身亡。

於是，醫學院學生們收起了王楠的學生證，寫好了死亡證明書，清楚地記錄了王楠的身份、年齡、中彈部位以及死亡時間，同時也爲馬路對面的那兩位遇難者寫好了死亡證明書，每份死亡證明書上都有三位醫學院學生的親筆簽名。

然後，他們再一次找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交涉，希望能夠允許他們將王楠等遇難者的遺體送到醫院保存，以便其家人尋找。這次來的軍官是一位年紀較輕的軍官，少校軍銜，態度非常蠻橫，斬釘截鐵地回答說："誰都不准抬出去，你們也趕快走，否則都抓起來。"醫學院學生們沒有理會少校軍官的威脅，繼續留在原地不走。

那個時候，天已拂曉，醫學院學生們經過商量後覺得，既然不能將王楠的遺體送往醫院保存，讓他的家人認領，那就應該想辦法將他遇難的訊息及時地告知他的家人。於是，一位姓吳的醫學院學生冒險步行到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郵局，按照王楠學生證上所寫的地址，給他生前曾經借讀過的學校——北京花園村中學（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增光路五十號）打了一通報告王楠死訊的電話。

這些自願組成臨時醫療救護隊的醫學院學生們令人尊敬，從他們的上述表現可以清楚看到，他們不僅勇敢無畏，而且充滿愛心，具有人道關懷精神，不愧是承擔救死扶傷重任的醫療工作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多鐘，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終於強行趕走了仍然堅持守護在王楠遺體旁邊的醫學院學生們，同時將那裏的警戒線向南長街口內推進了二十米。在推進警戒線的時候，當著醫學院學生們的面，端槍射殺了一名呼喊抗議口號的青年。【注釋 53】

香港《百姓》半月刊雜誌的女記者張結鳳，也是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紅軍團"到達天安門城樓前的時候中彈受傷的，受傷的地點就在金水橋上。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專程赴京採訪學生運動，投宿在北京飯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三十三號）的張結鳳，發現北京形勢越來越險峻，在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接近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後，感到自己作為一名記者，有責任到現場去實地觀察採訪，讓世人知道真相。於是，她與兩名同伴組成"採訪敢死隊"，帶著防範催淚彈的濕毛巾，輕裝簡履，沿著東長安街一路西行。

不久，張結鳳一行人來到天安門城樓的西側觀禮台前，被前面的一道厚厚的人牆擋住了去路和視線，看不清前面究竟發

生了什麼情況，於是，張結鳳奮力攀上路旁的燈柱石墩，放眼望去，一團團熾熱的火光，映照出眼前一幅冷森森的景象：在人民大會堂北側的長安街上，數百名殺氣騰騰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手持槍械，或坐或立地排成陣勢，與市民和學生所組成的人牆對峙著。軍人們持槍對準人牆、從他們隨時準備開槍的姿勢看，眼前緊繃的情勢無疑是一觸即發。

一看之下，張結鳳驚呆了。在陰森森的密集槍口面前，記者的投入感和責任感隨即消失於無形之中，一瞬間萌生了強烈的逃跑意念。張結鳳環顧四周，找尋逃生之路，沒有警覺前面那一道厚厚的人牆已經迅速散去，人們開始奔逃。當她發現情況不對的時候，已經有一大群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端槍快速地沖了過來，她趕緊從燈柱石墩上跳下來，與兩名同伴一起撒腿逃跑。

張結鳳先是接受兩名同伴的建議，準備躲入天安門城樓下的門洞，當她跑上金水橋的時候，才發現幾乎所有的民眾都往天安門廣場方向逃跑，自己幾個人顯得很孤單，不禁越發感到害怕，於是決定也改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逃跑。

張結鳳剛剛調頭跑到金水橋的南面橋頭，忽然眼前一黑，右邊腦袋開始劇烈疼痛，一股濡濕的粘液滑下臉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事先沒有發出任何警告，即開始對著四處奔逃的民眾開槍掃射。“不好，中彈了！”張結鳳心裏頓時湧現對死亡的恐懼，不過理智支配她馬上臥倒，剛一趴到地上，背上又是一陣劇痛，又中了一槍！

張結鳳連忙拉起衣服外套用雙手緊緊抱著頭，臥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大滴的鮮血不斷地滴在金水橋上，滴得如此之急，她甚至感覺聽得到那“滴答、滴答”的聲音。張結鳳已經看不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沖到了哪里，也不知道此刻長安街上的局面是如何混亂。她猶豫不決，是應該起身繼續逃跑，還是繼續臥地躲避？起身逃跑，有可能再次遭到亂槍掃射；臥地躲避，傷口在不斷地流血……

最後，幸虧有幾位勇敢的學生冒險跑回來救助張結鳳，迅速地將她送進了醫院，得到了及時的醫療救治，脫離了生命危險。【注釋 54】

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英

國《泰晤士報》的東亞編輯梅兆贊（Jonathan Mirsky）正站在金水橋上觀望情況，突然間，一個站在他身旁的年輕人突然彎身倒向金水橋欄杆。梅兆贊連忙拉他起來，見到他的白襯衣上有迅速擴散的深紅色血跡，胸膛上中了一槍。

這個年輕人並不是梅兆贊所親眼目睹的第一個遇難者，半小時之前，他曾經親眼目睹了一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快速輾過一個人，死難者的鮮血在路燈的映照下非常顯目。

當迎面而來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臉孔逐漸清晰之際，梅兆贊突然想起一位具有實戰經驗的軍人曾經告訴過他："在越南戰爭的戰場上，當你能夠見到敵人的眼睛時，對方也可以見到你雙眼，這時候便會開槍射擊你。"梅兆贊開始感覺到死亡的危險，覺得現在該是自己離開此地的時候了。

梅兆贊當天是騎著自行車出門的，事先將自行車留在了漆黑一團的紫禁城(故宮博物院)裏。於是，他打算通過天安門城樓的門洞去紫禁城，然後騎自行車返回住處，發稿件給位於倫敦的報社，報導他所親眼目睹的一些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事情。就在他準備動身離開之際，十多名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從紫禁城的闕門沖了出來，不消數分鐘便到了他跟前，開始毆打在他附近金水橋上的民眾。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兇狠地把民眾打倒在地上，然後便用手槍近距離射擊他們。

梅兆贊開始加快步伐，試圖繞過這些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快速逃離現場。但是，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已經發現了他，其中一位快步向他走過來。梅兆贊一看情況不妙，連忙高高舉起雙手，用普通話(中文)表明身份說："我是外國記者。"這位武裝警察破口大罵："外國記者？去你媽的！"然後就用長長的警棍使勁毆打他。梅兆贊以爲武裝警察會把他打倒在地，然後再近距離開槍射殺，就象對待其他的在場民眾一樣。還好，梅兆贊畢竟是高鼻樑、藍眼睛、金頭髮的外國人，武裝警察在打掉了他的一顆牙齒和打斷了他的左臂後，隨即揚長而去，並沒有對他開槍射擊。

當時，還有另一家外國報社的一位記者和一位義大利駐中國大使館的副領事在場，他倆都曾經挺身而出，喝止武裝警察毆打梅兆贊。在這個危險時刻，他倆沒有只顧自己逃走，反而

見義勇爲，前來救援梅兆贊，將負傷的梅兆贊帶離現場。分手之際，義大利駐中國大使館的副領事把在屠殺現場撿到的一些子彈殼放入梅兆贊的口袋，特意告訴他說："你是記者，不要丟失這些子彈殼，這是證據，明天他們一定會否認曾經開槍殺人。"【注釋 55】

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糾察隊總隊長張健，被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一位中校軍官用五四式手槍近距離連開三槍，右膝蓋負傷，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顆子彈頭至今遺留在體內。

張健當年只有十八歲，正在北京體育運動學校求學，主要練習中國武術和田徑項目。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張健前往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崇文門一帶，觀察和瞭解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情況。午夜時分，張健剛剛返回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就有一個糾察隊員匆匆前來向他報告說："我們在西線（指西長安街一帶----作者注）由學生糾察隊和市民所組成的防線，目前已經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強行突破，而且學生和市民死傷慘重。"

對於糾察隊員所報告的情況，張健當時並不完全相信，但覺得有必要親自去觀察一下，於是帶領二、三百名糾察隊員向西長安街趕過去。

來到西長安街之後，張健才確定那名糾察隊員所言不虛。在新華門附近，張健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一邊走，一邊端著衝鋒槍肆意地四處掃射，不少躲避不及的民眾中彈倒下。張健清楚地看到，在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臉上表露出隨隨便便就開槍殺人的表情，不能不被激怒了。子彈"啪啪啪"的打在地上，發出沈悶的聲音。之後，有些子彈朝著張健這邊的人群平射過來，在張健附近就有兩名糾察隊員剎那間中彈，僕倒在地上。

張健和其他的民眾都被激怒了，情緒極其激動，紛紛對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也有民眾忍不住破口大罵："殺人犯！法西斯！畜生！"這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稍微停止了一下射擊，然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射擊。

看到眼前的情形非常危急，張健就讓大家向後撤退。這時

從前面撤退下來的市民和學生大概有逾千人。大家擡著許多中彈的受傷者走一步、停一步地向後撤退，一直撤到天安門城樓東側的觀禮台再往東一點的位置。

撤退到此處的學生和市民有逾千人，他們停住了腳步，仍然與逼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僵持著，再也不願繼續後撤。解放軍戒嚴部隊形成一個進攻的隊形，其前列是端著衝鋒槍的士兵，他們做直立射擊狀。在這些士兵的後面，是一部帶支架的攝影機，由一名隨軍記者操縱著，帶領這支部隊的是一名中校軍官。市民和學生再次對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齊聲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話音未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再次開火。不過，這一次槍彈好象是朝著地上射擊，並沒有人中彈傷亡。

這時候，一輛大型的公共汽車越過人群，直接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們的前面。密集的槍聲隨即響起，頓時把這輛公共汽車打的象篩子眼一樣，渾身上下都是槍眼。隨後，一群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端槍沖到車上，揪著那些渾身是血的人的頭髮，把他們一一拽下車來。在一瞬間，張健看到被捕者中有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常務委員、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秘書長郭海峰（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

此時，張健與幾位糾察隊隊員站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面對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的地方，他們與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你們放了他！放了他！"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開始舉槍射擊，又有幾個人中彈倒下。

再次親眼目睹民眾中彈倒下，張健的情緒非常激動。他當時穿著一件白色的 T 恤衫、白色的長褲，白色的 T 恤衫上印著一隻黑手的圖案。他撩起 T 恤衫直至胸前，對著解放軍戒嚴部隊那位領隊的中校軍官高喊："我們都是學生，我們沒有武器，人民軍隊愛人民。如果你們想殺死我們的話，我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糾察隊員的頭。要殺你就先殺死我！"

那位中校軍官距離張健只有十米遠，他清楚地聽到了張健的叫喊，隨即舉起一把五四式手槍瞄準張健，毫不留情地一連開了三槍。其中一槍打在地上，一槍打中張健的右膝蓋，一槍擊碎了張健的大腿肱骨。（參見附錄照片）

張健中彈後硬撐著沒有倒下，拖著血淋淋的傷腿，死死地盯著開槍的中校軍官看了將近三十秒鐘，然後又向中校軍官大喊了一番：“你再開一槍，你再來！你沒有將我打倒，你再來！”喊完這幾句話，張健實在支撐不住了，“撲通”一下翻倒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地上。這時候，一批糾察隊隊員勇敢地沖上前來，企圖搶救受傷倒地的張健。槍聲再次響成一片，又有幾個人中彈倒下。

張健記得這時候大約是六月四日凌晨兩點鐘左右。張健雖然身負重傷，但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對企圖再次沖上來搶救的幾名糾察隊隊員喊道：“危險！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但他還是聽到一陣急速靠近的腳步聲，其間伴隨著女孩子的哭聲，原來是有許多女學生沖過來救他。這一次，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沒有再開槍。女學生哭著抬走張健，糾察隊隊員接著將他擡到了紀念碑底座附近。張健囑咐一名糾察隊隊員趕快去轉告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和同學們在一起堅持下去。”

當時，天安門廣場上已經連一輛急救車都沒有了，只有一輛被打壞了的一二一型號的汽車。張健看到有三位受傷者躺在他的身邊，其中的一位受傷者胸口中了三槍，剩下的另外兩位受傷者，一位被子彈穿進了鼻子，另外那一位不記得傷在什麼部位了。由於流血過多，張健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糾察隊隊員們馬上把他和其他的受傷者擡上一二一型號的汽車。一路上，近百人交相接替著推車，一直推到同仁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崇文門內大街二號）。

張健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開槍，第一個打倒的就是他，之後還有其他學生陸續中彈。與他同一輛車送到同仁醫院的一共有四位受傷者，傷勢都很嚴重，其中三位受傷者死於送醫途中，另外一位受傷者死在手術過程中。【注釋 56】

開槍將北京中學生王楠打死，將香港女記者張結鳳、北京體育運動學校學生張健打傷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都來自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

陸軍第 38 集團軍隸屬于解放軍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一九六六年二月，陸軍第 38 軍從吉林省的通化市調

到河北省的保定市，接替了陸軍第 69 軍的防務。此後，陸軍第 38 軍就長期擔任著拱衛首都北京的重要任務，擁有“禦林軍”的稱號。

陸軍第 38 集團軍是解放軍中的頭號王牌軍，也是解放軍中第一個機械化裝備的集團軍，屬於甲類整編集團軍。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抗美援朝（西方國家稱之爲“韓戰”）戰場上，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的彭德懷曾經在一份嘉獎電報中極爲罕見地使用了“38 軍萬歲！”的字眼，因此，陸軍第 38 集團軍又擁有“萬歲軍”的稱號。

調動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使用包括裝甲車、坦克在內的現代化武器，對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進行血腥屠殺，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揚尙昆等人真的是發瘋了！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從公主墳路口到天安門城樓約七公里路程的西長安街一帶，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殺人最多、境況最慘烈的地方，而從這一路線率先殺到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正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令人奇怪的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卻紛紛傳說陸軍第 27 集團軍是屠殺民眾的主要部隊，而陸軍第 38 集團軍則成了反對屠殺民眾的部隊，甚至要站到人民的一邊，對陸軍第 27 集團軍動武。

上述的這個誤傳事出有因，因爲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長徐勤先在接到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後託病住院，拒絕帶兵進京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徐勤先軍長抗命之事在當時的北京城廣爲流傳，只是將徐勤先軍長誤傳爲已故解放軍大將徐海東之子。北京學生和市民對抗拒鎮壓命令的徐勤先軍長深爲敬佩，出於愛屋及烏的心理，進而不相信、也不願意相信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會對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民眾大開殺戒。

徐勤先軍長的抗命之舉，不僅爲他的個人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而且也成了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起重要事件。

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的劉亞洲中將，在擔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的時候，曾經在雲南省某空軍基地對營級以上軍官做了一次題爲“信念與道

德”的內部報告。劉亞洲在報告中透露了以下有關徐勤先軍長抗命事件的情況：

在得知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消息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中將親自趕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傳達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要他帶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徐勤先問：這份中央軍委的命令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嗎？周衣冰回答說有。徐勤先又問：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簽字嗎？周衣冰回答說有。徐勤先最後問道：有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嗎？(應當是明知故問)周衣冰回答說沒有。徐勤先隨即表示說，這個命令我無法執行，因爲它不符合中央軍委調兵的規定。

據說，中共中央軍委有關調兵的規定是，凡是調動一個班以上的、武裝的解放軍野戰部隊進入北京，必須有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命令上必須同時具有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和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缺一不可。

雖然周衣冰再三予以解釋勸說，徐勤先仍然拒絕率領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最後，周衣冰勃然大怒，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的老婆是法官(言外之意是死摳法律條文)，你的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

徐勤先軍長的抗命之舉當然是事實，但到了具有報告文學作家身份的劉亞洲的口中，卻憑空增添了許多文學色彩和故事情節。

由於抗命，徐勤先馬上被撤銷軍長職務，並遭到逮捕，後來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有消息人士透露說，徐勤先在軍事法庭上拒不認罪，但也沒有推卸自己的責任，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說徐勤先的這句話在解放軍中反響很大，對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等人也產生了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意充當“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

徐勤先身爲解放軍第一王牌軍的軍長，在解放軍中廣受尊敬，就連劉亞洲在那次“不懷好意”的內部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徐勤先是解放軍中少有的懂得現代化軍事理論和善於使用

現代化武器的少壯派將領，本來有著遠大的前程。

《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也提到了徐勤先軍長抗命一事，有如下一段記載：

“(一九八九年五月) 二十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洪學智(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作者注)、劉華清(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作者注)、秦基偉(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作者注)、楊白冰(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作者注)、遲浩田(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作者注)、趙南起(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作者注)以及戒嚴部隊指揮部成員參加，聽取關於戒嚴情況的彙報。

會上，周衣冰首先報告了對徐勤先事件的處理經過。周衣冰說：‘原 38 軍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事件發生後，根據楊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作者注)的命令，我們進行了及時處理。現在，徐勤先的軍長職務已經被解除，徐勤先住院養病去了。38 軍軍黨委成員一致表示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堅決擁護對徐勤先的處理決定，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軍黨委提出從今天起，軍、師、旅各級黨委要認真清理各種思想認識，聯繫徐勤先的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在幹部戰士中狠抓堅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劉華清問：‘38 軍的開進情況怎樣？’

周衣冰彙報說：‘昨天晚上，38 軍指揮部、112 師、炮兵旅、高炮團（應該是工兵團----作者注）和通信團等將近七千人已進入復興路至公主墳一帶。餘下的 113 師和坦克 6 師等部隊將於今天下午進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橋一帶。雖然他們也像別的部隊一樣遇到了不明真相群眾的圍困阻截，但執行命令的情況是好的。’

楊尚昆說：‘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爲戒，保證不再發生。軍人一定要以服從軍令爲天職，決不能違抗。’”

關于徐勤先軍長抗命事件，另有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個與《中國“六四”真相》一書有關記載大同小異的版本，相比之

下，應該比劉亞洲所透露的版本更爲可靠。這位知情者所敍述的情況如下：

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某一天，徐勤先軍長和新兵們一起進行投擲手榴彈的軍事訓練，不慎將腿摔成骨折。於是住進了坐落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北京軍區陸軍總醫院。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初至五月中旬的四十多天的住院治療期間，徐勤先軍長有幸耳聞目睹了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每當他從報紙上、電視裏看到了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便熱淚盈眶，他被學生們的愛國獻身精神深深打動了。徐勤先軍長總是喜歡從醫務人員和病友那裏打聽有關學生運動的各種消息和他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據當時在北京接近徐勤先軍長的人說："徐軍長那些天變得沉默寡言了。"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的某一天，徐勤先突然被緊急召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中將和政治委員劉振華上將向他傳達了由鄧小平所簽署的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命令陸軍第 38 集團軍火速開進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制止動亂。

徐勤先當場並沒有表露任何違抗命令的言行，立即架著拐杖，奉命趕回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部佈置任務。

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部，徐勤先召集各級指揮官，宣佈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進行戰前緊急動員，並親自做好了各項兵力部署、進京日程及路線安排。當一切就緒後，徐勤先才給北京軍區司令部打電話，說他因病不能帶兵進京。周衣冰說他這是違抗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徐勤先回答說，不管上面給他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掛帥出征。

徐勤先在掛完電話之後，便以請病假爲由，(的確，他的腿傷還沒有痊癒，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逕自離開部隊，又回到北京軍區陸軍總醫院。

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尙昆得知徐勤先抗命之事後驚恐不安，大發脾氣，連續幾夜睡不好覺。爲了殺雞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舉在軍中引發連鎖反應，楊尙昆親自簽發了一道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軍長職務，並將他押送軍事法庭審判。

北京軍區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拿著這道由楊尙昆親自簽發

的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帶著一隊北京軍區政治部的保安人員，來到北京軍區陸軍總醫院，先把楊尚昆親自簽署的中共中央軍委命令拿給徐勤先看，等他看完後，詢問徐勤先："你還有什麼意見嗎？"徐勤先平靜地回答說："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準備。我是軍人，沒有服從命令，理該如此處理。你們執行命令吧。至於學生運動，我有我的看法，現在還不能下定論。"

在軍事法庭審訊期間，徐勤先用平和婉轉的語氣告訴主持審問的人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沾汙這個歷史。"【注釋 57】

在徐勤先因抗命而被撤銷軍長職務並遭逮捕之後，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遂由副軍長張美遠少將以代軍長的身份率領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也許是代軍長張美遠、軍政治委員王福義少將以及其他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各級軍官害怕遭致與徐勤先同樣的命運，急於用實際行動洗脫和表現自己，於是在後來的血腥鎮壓行動中十分賣力，大批官兵因此立功受獎。

《鋼鐵的部隊：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注釋 58】一書的第七章"赴北京維護首都秩序、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對此有詳細的記載：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相互策應下，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相繼掀起了旨在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我集團軍奉中央軍委和北京軍區的命令，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先後三次赴北京擔負維護首都秩序、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和防衛亞運會場館任務。

在黨和國家處於危難之際，全體指戰員發揚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經受住了'政治關'、'生死關'、'苦樂觀'的嚴峻考驗，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各項使命，向黨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總參謀長遲浩田和北京軍區首長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極大的鼓勵。

集團軍有一個師榮立集體一等功，一個師榮立集體二等功；有三個團榮立集體二等功，二個團榮立集體三等功，一個團受嘉獎；有一個營被授予'衛國英雄營'，十三個營榮立集

體三等功；有一個連被授予‘衛國英雄連’，二個連被授予‘衛國先鋒連’，二個連榮立集體一等功，十七個連榮立集體二等功，六十四個連榮立集體三等功；有三十八個排榮立集體二等功，一百四十七個排榮立集體三等功；有四十七個班榮立集體二等功，四百七十二個班榮立集體三等功。有八名同志被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四名同志被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二十七名同志榮立一等功，一百三十一名同志榮立二等功，一千三百一十一名同志榮立三等功。”

此外，上述的軍史中還記載了陸軍第 **38**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一些具體情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趁機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尋釁鬧事，利用學潮發展成爲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四月二十二日，集團軍奉命率第 **112** 師（欠第 **336** 團）、坦克第 **6** 師（欠炮兵團）、工兵團、通信團，共八千九百八十六人、四百零九台汽車首次赴京，協助公安、武警完成了維護首都秩序，保護胡耀邦總書記的靈車安全進入八寶山公墓的任務。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揭露了動亂的實質和危害。動亂製造者不甘心失敗，組織和策劃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集團軍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 **6** 師、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五千一百人、二百三十四台汽車，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赴京擔負了警衛人民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任務。

五月十五日後，首都局勢急劇惡化。爲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和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我集團軍第三次奉命率第 **112**、**113** 師、坦克第 **6** 師、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一萬五千零九十九人、八百五十一台汽車、二百一十三輛裝甲車和三十三輛坦克及坦克搶救牽引車，於五月十九日進京執行戒嚴任務，至六月十八日的一個月裏，共經歷四個階段，出色地完成了戒嚴、平息反革命暴亂任務。

第一階段，克服困難，主力按照命令準時開進北京市區，

爲向動亂要害地區——天安門廣場進發做好準備。

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後，集團軍迅速收攏部隊，進行了思想動員。在向北京開進中，各部隊在遭到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圍困堵截的情況下，採取佯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

集團軍指揮所、第 **112** 師、第 **113** 師第 **339** 團、高炮團、炮兵旅大部和通信團一部，共六千七百多人於五月十九日夜進至五棵松至軍事博物館地域。坦克第 **6** 師於五月二十日下午進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橋，爲爾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月二十一日部隊轉入休整。集團軍本著由遠而近、由外向裏、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於街頭、郊外的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第 **113** 師第 **337**、第 **338** 團、坦克團和炮兵團在大井村遭到圍堵三天四夜，幹部戰士冒著磚頭、瓦塊、汽水瓶的襲擊，衝破重重包圍，進入集結點。坦克第 **6** 師、炮兵團在六里橋同時遭到圍堵，經過宣傳和說服群眾，揭露動亂份子的兇殘面目等艱苦工作，進入到了指定位置。

在休整中，部隊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積極進行了指揮方法研究和適應性訓練，成立了一千多人組成的二十四個防暴隊，籌集了各類裝備和物資，爲下一步的行動做好了準備。

第二階段，率先開進天安門廣場，擔負清除動亂要害地區的歷史重任。

六月三日，我集團軍奉命作爲先頭部隊，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第 **112** 師由師偵察營開路，首先佔領軍事博物館以東出發地域，掩護了全集團軍的編隊。第 **113** 師駐城區的兩個團先期到達出發地域，駐豐台的四個團，在開進中由師偵察連掩護，連續突破暴徒在四個路口的圍堵，到達編隊位置。炮兵旅排除種種困難，主動前出到集團軍先頭地點。工兵團從良鄉營房出發，快速疾進，二十七分鐘行駛二十四公里，提前抵達預定位置。通信團排除幹擾，全力保障，隨集團軍機關到達指定位置。

六月三日晚九時三十分，集團軍開始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第 **112**、**113** 師和炮兵旅並肩前進，防暴隊擔負開路任務，其他部隊緊緊跟進。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

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十二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七道火障，克服了七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四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六月四日一點三十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爲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

擬擔負清場和巡邏任務的第 **112** 師裝甲車隊，於六月三日二十一時五十五分，從東高地出發，經過艱難開進，三台車在六月三日二十三時三十分到達天安門廣場。後面受阻的車隊按照預案，果斷指揮，在復興門路口與集團軍大部隊匯合，加快了開進速度。坦克第 **6** 師在距離較遠、駐地分散的情況下，積極行動，師前指（前進指揮部----作者注）帶坦克 **21** 團和高炮團於六月四日一時四十五分到達天安門廣場，師基指（基本指揮部----作者注）和直屬分隊及坦克 **24** 團分別於六月四日四時三十分、七時二十分趕到天安門廣場，該師其餘的部隊進到軍事博物館一帶。

全集團軍一萬零八百名官兵、四十五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份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爲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集團軍抵達金水橋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週邊的暴徒紛紛向東西長安街集結，企圖組織反撲。集團軍按照（北京）軍區的統一部署，派第 **112** 師、第 **113** 師分別堵住東、西長安街的路口，牢牢地控制住警戒線。同時，派坦克第 **6** 師兩個團對金水橋至午門地段進行了清理，並堵住東、西闕門，阻止暴徒從故宮方向進入廣場。從而切斷了廣場北部的內外聯繫，使廣場上的頑固份子陷於孤立的境地，確保了清場的順利進行。”

六月四日凌晨一點三十分過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點三十分過後，解放軍戒嚴部隊完全佔領了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一帶，並且設置了警戒線，但是，在天安門城樓附近仍然有一些學生和市民冒著生命危險，儘量靠近警戒線，靠近在那裏集結待命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官兵，耐心地與部隊官兵們對話，希望說服部隊官兵們別對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情願的數千名學生動武。

有一位民眾含淚質問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你們來這裏幹什麼呢？你們如果是上前線殺敵，我們老百姓一定會全力予以支持，但不能來這裏鎮壓學生！人民的軍隊，應該站在人民的一邊，決不能向人民開槍！”

一位解放軍退伍軍人對一位士兵說：“你看我們這些人像暴徒嗎？我也是當過兵的，對你們並沒有任何成見。但是，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爲，實在太令人傷心了！北京根本不存在什麼暴亂，我們北京的市民和學生自己能解決問題。”

那名士兵用手指了指不遠處尚在燃燒的“零零三”號裝甲車說：“你說北京沒有暴亂，那爲什麼要燒我們部隊的裝甲車呢？”

解放軍退伍軍人回答說：“那是因爲你們首先開槍，打死了很多老百姓，人們忍無可忍，才燒了你們的裝甲車！”

那名士兵實在無法反駁解放軍退伍軍人的這一番話，支支吾吾地按照中共當局的宣傳口徑說：“那……那你們把天安門廣場弄得這麼髒，也不打掃……”

旁邊的一位市民忍不住插話說：“你們難道是來天安門廣場打掃衛生的嗎？你們帶清掃工具了嗎？你們拿什麼清掃呢？恐怕是準備用學生的血來洗吧？！”

那名士兵一下被噎住了，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他旁邊的另一名士兵見狀急了，大聲吼叫著：“別跟我們說這些，我們的耳朵都磨出繭子來了，什麼都聽不進去！你們再說，我就打你個龜兒子的！”說著，便端槍做出要掃射的樣子。

儘管如此，悲憤的民眾仍然堅持不離去，繼續向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喊話，希望他們不要辜負了老百姓的殷切期望，千萬別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開槍動武。

爲了壓制住民眾的勸說，避免軍心動搖，一位軍隊指揮官站了出來，帶領一些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唱起了殺氣騰騰的軍歌，諸如“當兵上戰場”、“打靶歸來”之類。其間，有一位校級軍官手拿著半導體喇叭，以陰陽怪氣的聲調慢悠悠地對民眾們說：“你們不要不到黃河不死心！你們是嫌血流得還不夠嗎？！”他的這一番話引起了公憤，所有在場的民眾停止了勸說，開始齊聲高唱起《國際歌》，將陸軍第 38 集團軍官兵的軍歌聲壓了下去。

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抵達天安門城樓前，並開槍驅散民眾之際，我久久眺望著天安門城樓上高高懸掛的巨幅毛澤東畫像，思緒萬千，心情痛苦而複雜。四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那兒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如今，就在毛澤東的眼皮底下，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卻一個個倒在所謂的人民子弟兵的槍口下……

幾乎是在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一帶的同一時間，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有近千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途經永定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宣武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珠市口（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從前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方向抵達人民大會堂東南側。伴隨著一陣陣密集的槍聲，大批學生和市民紛紛退入天安門廣場，向紀念碑底座一帶靠近。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少人先後中彈倒下，或死或傷，均被志願救護者及時送往北京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救護站。

這支從天安門廣場南面殺到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直屬于中共中央軍委指揮的空軍特種傘兵部隊----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15 軍是當時解放軍唯一的空降軍，【注釋 59】屬于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該部隊的官兵受過特殊訓練，戰鬥力強，武器裝備精良。

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一直以班爲戰鬥單位，形成一個個方陣，幾乎人手一支衝鋒槍，個個像兇神惡煞，不斷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一路開槍挺進，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橋（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天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珠市

口、前門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打死打傷不少民眾。從珠市口到前門，在這個民居密集、道路複雜的區域，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雖然遭遇到成千上萬民眾的頑強阻攔，但由於他們毫不留情地以密集的槍彈開路，僅僅花了十五分鐘就走完了這一段路程。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西長安街的挺進行動，總共花了四個小時。

在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進軍線路上遇難的平民百姓人數，僅次於西長安街。由此可見，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的兇悍程度決不下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

記載于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中的許多死難者，就是死于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的進軍路線上的，這些死難者是：

1)張向紅：女性，遇難時年僅二十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一九八七級學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張向紅與兄嫂等多人從位於珠市口的親戚住處出來，回家途中，在前門遇到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而受阻。後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射擊，同行的幾個人被沖散，張向紅與嫂子一起躲在前門西側的樹叢後面，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左胸主動脈，穿透後背。民眾將張向紅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搶救，但因爲傷勢過重，於六月四日淩晨不治身亡。

張向紅的骨灰安葬于北京的太子峪公墓。

2)劉弘：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四歲，生前是清華大學一九八八級環保專業碩士研究生，一九八八屆清華大學本科生畢業。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劉弘在前門附近遇到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子彈擊中劉弘的腹部，傷口很大，腸子流出。與劉弘同行的同學替他將流出的腸子塞進肚子，扣上一隻小盆，緊急送往醫院搶救，傷重不治，死於同學懷中。

3)杜燕英：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九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市勞改局下屬某公司職工。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現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杜燕英在前門大北照相館附近遇到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杜燕英的肝部中了一顆“炸子”(開花彈)，被民眾送往友誼醫院（位於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九十五號）搶救，於六月五日凌晨不治身亡。

4)劉春永：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四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天橋南通服務樓浴室工作人員。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劉春永在天橋十五路公共汽車總站附近，遭遇從南邊過來的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空降兵第 15 軍的軍人開槍掃射，劉春永的頭部中了一彈，被民眾送往友誼醫院搶救，於六月四日凌晨不治身亡。友誼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上寫著：“頭部槍傷引起心衰、呼衰。”

劉春永的骨灰安葬於北京市通縣（現爲北京市通州區）某地。

5)劉俊河：男性，遇難時五十六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職業是個體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爲了謀生，劉俊河堅持在前門大街箭樓下擺西瓜攤營業，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途徑前門的時候，向道路兩邊開槍掃射，劉俊河被一顆子彈擊中面頰主動脈，大量出血，被民眾送往友誼醫院，因傷重不治身亡。

6)梁寶興：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五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市華豐縫紉機廠汽車司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梁寶興在天橋十五路公共汽車總站附近，遭遇從南邊過來的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空降兵第 15 軍的軍人開槍掃射，梁寶興的臉頰被子彈打穿，被民眾送往友誼醫院搶救，於六月四日凌晨不治身亡。

7)王志英：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五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市第三通用機械廠重型汽車鑄造廠傳動橋廠車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鐘，王志英與妻子一起離開位於宣武門的岳母住處，準備返回自己位於東珠市口的住家。約午夜十二點多鐘，行至珠市口十字路口，遇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由南向北行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一路開槍掃射，

王志英夫婦躲在珠市口十字路口的一輛面包車後面，一顆子彈射中王志英的頸動脈，血流如注。王志英先被送往前門醫院（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前門大街一七六號），又被轉送到同仁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崇內大街二號），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死亡。

王志英是同仁醫院裏的第一個遇難者，骨灰安葬於北京市昌平縣（現爲北京市昌平區）的佛山公墓。

8) 王慶增：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四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天壇糧食管理所汽車司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鐘，王慶增離開位於珠市口附近的住家，騎車去工作單位(永定門方向)檢查車輛是否安全，行至北京橡膠八廠對面馬路的時候，遇到從南邊開過來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王慶增被一顆子彈擊中左胃部，民眾將他送到天壇醫院（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六號）搶救，傷重不治死亡。

王慶增的骨灰安葬於北京市門頭溝。

9) 王文明：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五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前進鞋廠模具鉗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王文明聽到外面有槍聲，與一位鄰居一起前往珠市口觀察動向。約午夜十二點鐘，解放軍戒嚴部隊自南向北行進，經過珠市口，不斷開槍掃射，王文明左肋中彈，子彈從右肋穿出，被民眾送往友誼醫院搶救，因腸子多處打爛，只接上兩米多長，其餘部分無法接上，手術後發高燒，於六月四日晚上九點多鐘不治身亡。

王文明遇難後，其工作單位按正常死亡處理，他的骨灰安葬在河北省廊坊市文安縣老家。

10)張建：男性，遇難時年僅十七歲，家庭所在地北京市。生前是北京市宣武區第九十五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張建離家去位於前門的三叔住處看望叔叔、嬸嬸，中途遭遇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子彈擊中他的心臟。張建被民眾送到協和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帥府園一號）搶救，但送醫途中已經死亡。

張建遇難後，他的家人尋找多時，最終在協和醫院通過查閱遇難者的遺照，才找到了他的遺體。其家人當時在協和醫院

總共查閱了三本遇難者的相冊，每本相冊約有十七至十八名遇難者。

張建的骨灰被運往老家河北省泊頭市張莊村，與其父母合葬。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空降兵第 15 軍是一支非常重要的部隊，執行鎮壓命令堅決，殺人也非常兇狠。在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揚尚昆等人的武力鎮壓行動佈局中，空降兵第 15 軍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幾乎可以與陸軍第 38 集團軍等量齊觀。但不知爲何，長期以來，這支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的所作所爲，卻一直不太引人注目，往往被研究者和評論者所忽略，很少見到相關的文字記錄。人們談論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津津樂道的總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和陸軍第 27 集團軍。

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在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東南部之後，陸續從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進入人民大會堂，但由於人民大會堂裏預先部署了太多的軍隊（包括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和陸軍第 63 集團軍的一個師），已經無法全部容納這些新抵達的部隊，因此，有相當多的空降兵第 15 軍的官兵只好停留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臺階上，佈好警戒線，不讓學生和市民靠近，並不時地沖下來鳴槍嚇唬上前說理的學生和市民。這的確是一支虎狼之師，市民與學生幾乎無法靠前與他們說理，只能遠遠地組成人牆，試圖防止他們突入天安門廣場。

據《戒嚴一日》一書中的相關文章透露，空降兵第 15 軍的先頭部隊----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到達天安門廣場東南部的時間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二十五分，比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紅軍團”（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抵達天安門城樓前的時間還要早五分鐘。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的營長周家柱少校，事後被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但是，在我的記憶中，陸軍第 38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這兩支部隊幾乎是同時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是從北面抵達，一個是從南面抵達。可能是由於西長安街一帶和天安門城樓附近的軍民衝突更爲激烈，更引人注目，讓我印象深刻，也可能是由於我所處的位置是面對北面的天安門城樓，對天安門廣場北面所發生的事情印象較深刻，感覺上還是陸軍第 38 集團

軍的部隊先一步到達。

另外一個可能是，按照中共中央軍委或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必須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抵達天安門廣場，而空降兵第 15 軍爲了搶奪功勞，弄虛作假，將先頭部隊實際抵達的時間提早了五分鐘。

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史中有相關的記載，其中聲稱，在整個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該集團軍是第一個成建制地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部隊。這一點應該是無可置疑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是沿著同一條路線----西長安街，齊頭並進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集團軍直屬通信團和集團軍直屬工兵團緊隨其後而至。

而空降兵第 15 軍則將屬下的空降兵第 43 旅、空降兵第 44 旅分爲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依次開進。空降兵第 43 旅和空降兵第 44 旅又將屬下的部隊分爲多個梯隊，依次開進。開進途中，各梯隊部隊又遭遇到民眾的強力阻攔，不得不改變原定的路線，各自迂回前進。因此，空降兵第 15 軍並不是整個部隊成建制地沿著同一條路線，於同一時間抵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二十五分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南部的，可能僅僅是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的官兵而已。

除了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另有一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陸續抵達天安門廣場南面，集結在紀念碑底座南側的“毛主席紀念堂”和前門箭樓之間的空地上，人數約有三、四千之眾。他們到達後先是端槍命令民眾離開，隨後逐漸演變成開槍驅離不願離開的民眾。

這些部隊官兵應該隸屬于陸軍第 20 集團軍。陸軍第 20 集團軍與空降兵第 15 軍一樣，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都是從位於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開進途中多次受阻，其中有三個團在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路的涼水橋南側受阻，與同樣受阻于此地的空降兵第 15 軍第二梯隊會合，接受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大校的統一指揮，跟隨空降兵第 15 軍第二梯隊抵達天安門廣場。

此外，陸軍第 54 集團軍部隊也陸續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27 師在軍長朱超少將、軍副

政治委員張堃少將、師長钟聲琴大校的率領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五十分從北京市豐台區出發，沿著六里橋、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等地，向天安門廣場南面的正陽門西側開進。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62 師在師長黃棟甲大校、師政治委員胡永柱大校的率領下，沿著木樨園、馬家堡、太平街、天橋等地，從西南方向朝天安門廣場開進。

陸軍第 54 集團軍隸屬于濟南軍區，素有“鐵軍”之稱，所屬部隊中有解放軍中歷史最悠久的“葉挺獨立團”，但由於沒有駐防京畿地帶，知名度遠不如陸軍第 38 集團軍，甚至連陸軍第 27 集團軍都不如。而實際上，陸軍第 54 集團軍是解放軍中一支實力強大的部隊，武器裝備及戰鬥力僅次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與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同屬於中共中央軍委三支戰略總預備部隊。

陸軍第 54 集團軍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先頭部隊，是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該集團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後，佈防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承擔著對正陽門西側進行警戒的任務，一直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

步兵第 379 團號稱“紅軍團”，其前身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孫中山大元帥府的鐵甲衛隊，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改編爲葉挺獨立團，是解放軍中唯一一支本身的軍史比解放軍軍史還要早的部隊。由於步兵第 379 團率先抵達天安門廣場，表現突出，該團團長徐乃飛上校和政治委員張文品上校雙雙獲破格提拔，徐乃飛升任陸軍第 1 集團軍副參謀長，張文品升任河南省軍區鶴壁軍分區政治委員。

不過，從現有資料來看，步兵第 379 團並不是虎狼之師，在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由於沒有接到開槍命令，因此沒有開槍濫殺民眾。正因爲如此，該團官兵傷亡較重。據該團自己的統計數字顯示，有一人死亡(第 2 營第 6 連代理排長馬國選)，一百四十九人重傷。該團官兵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對民眾的態度也比較友善，沒有隨意開槍殺人。

伴隨著步兵第 379 團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是同屬於一個步兵師的步兵第 380 團，中國官方的有關資料記載如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十八時十分，380 團隨師從集

結地域出發，十九時五十分進至豐台區戒嚴位置。二十一時四十八分，接到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開進的命令。經過各部快速收攏，二十二時二十分，由 127 師政治部主任曹東新帶隊，作爲師第二梯隊從六里橋出發，徒步沿廣安門外大街→廣安門內大街→騾馬市大街→南新華街→前門西大街之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一路上遭受暴徒猛烈襲擊和大量不明情況的群眾阻攔，部隊損傷嚴重，許多官兵被毒打、掉隊，但 380 團，這支英勇的紅軍團和葉挺獨立團 379 團一起，高唱軍歌，百折不撓，冒著磚林瓶雨，頑強挺進。

（六月）四日零時三十分，該團突破重重阻擋，付出重大代價進至正陽門西側。（淩晨）二時三十分，又進至人民大會堂南門待命，（淩晨）四時，推進至毛主席紀念堂，與兄弟部隊達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合圍。（淩晨）五時三十分，配合兄弟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

從（六月）四日六時至六日零時，隨師擔負正陽門西側的戒嚴任務。後奉命進至天壇公園部署，配合地方公安部門廣泛開展‘抓暴徒、端黑窩’行動，狠狠打擊隱蔽起來的暴徒和反動組織成員，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380 團 1 營黨委被總政(解放軍總政治部----作者注)通報表彰爲全軍先進基層黨組織。同時，該營黨委和集團軍張副政委(張堃----作者注)受到中組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作者注)的表彰。濟南軍區也於一九九零年三月五日發佈命令，授予 380 團 3 營‘衛國英雄營’榮譽稱號，給 380 團 8 連指導員彭同軍記一等功。”【注釋 60】

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後曾經開槍殺人，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一九八六級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被槍殺在天安門廣場南部的“毛主席紀念堂”附近，遇難時年僅二十七歲。

戴金平是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鎮人，一位農家子弟。戴金平一九八零年畢業於湖北農業大學，因爲家境不好，需要掙錢養家，大學畢業後工作多年，才於一九八六年報考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

戴金平是一九八九年應屆碩士研究生畢業生，他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終於趕完了碩士畢業論文，並在當天下午將畢業論文交給了自己的導師。吃完晚飯後，他便騎上自行車，帶著照相機到天安門廣場去了。但是誰也沒能想到，戴金平此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一個年輕的生命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一顆罪惡子彈奪走了。

事後，戴金平的同學猜測，可能是戴金平當時正在照相，照相機的閃光燈引來了槍彈，因爲解放軍戒嚴部隊最怕的就是有人將他們開槍殺人的行爲拍照下來。

戴家地處湖北省的貧困地區，世代務農。戴金平是戴家的大兒子。在漫長的艱難歲月裏，他的父母咬緊牙關供他上學，本指望兒子在研究生畢業後能頂起戴家的大樑，哪知一場屠殺事件導致兒子身遭不幸，喪命於首都北京。

戴金平的父親是一個忠厚本分、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他得知兒子戴金平遇難的消息後，日夜兼程從湖北老家趕到北京。當他來到北京農業大學校園，剛一邁進同學們爲戴金平佈置的靈堂，便嗚咽著癱倒在地。

據戴金平的同學們介紹當時的情景說，戴金平的父親雖然悲痛欲絕，但這位從未見過世面的老農，自始至終都不敢在眾人面前大聲地哭一聲，因爲他的兒子是頂著“暴徒”的名聲死的呀！每當戴金平的同學們回想起當年令人心酸的這一幕，總是唏噓不已。

戴金平不幸遇難後，其母親因悲傷過度，常年疾病纏身而無錢醫治，幾乎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然而，更爲不幸的是，戴家在大兒子戴金平遇難後不到半年，僅剩的年僅十六歲的二兒子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十年。戴家不僅又失去了一個勞動力，而且還要負擔沉重的醫療費用。

禍不單行，硬是把一個本來就是朝不保夕的貧苦家庭推入了絕境。爲了全家人的生計，也爲了支付二兒子的醫療費，戴父不得不農忙時務農，農閑時遠走他鄉到武漢等地賣苦力打工掙錢。但想不到厄運再一次降臨到了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一九九八年秋天，戴父在武漢市漢正街一家信託貿易公司打工期間，老實巴交、與世無爭的他突然被一群歹徒無緣無故地活活打死，末了還落個狀告無門的結局。

一個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貧困農民家庭，轉眼間只剩下一個無依無靠、被疾病折磨得幾乎難以支撐的老婦人，還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呢？而這一切，皆緣起於一場滅絕人性的六四血腥屠殺！【注釋 61】

戴金平的遇難，再一次以鐵一般的事實戳穿了中共當局和中共官員們多年來一口咬定"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謊言。戴金平不是唯一一位死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更不是唯一一個死在天安門廣場的平民百姓。

有資料稱中共當權者曾經嚴令解放軍戒嚴部隊，絕對不允許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殺人，例如《中國"六四"真相》一書就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四時，楊尙昆、李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國國務院總理----作者注）、喬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作者注）、姚依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作者注）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作者注）、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等開會，就突然出現的嚴峻局勢緊急磋商。

……

楊尙昆特別強調：'戒嚴部隊指揮部一定要向各部隊交代清楚，要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開槍。我在這裏特別重申，決不能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不走，我們戒嚴部隊架也要把他們架走。決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見，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們大家的意見。'"

事實證明，上述這一段記載並不可信，很可能是有心人事後特意編造的。試想，如果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具體負責調動和指揮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楊尙昆，真的有"決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的意見，而且不只是代表他一個人的意見，"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見"，哪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膽敢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殺人？

已知與戴金平在同一地點、幾乎同時遇害的還有一位大學生，他就是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八八級乙班學生、共青團支部書記李浩成，遇難時年僅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期間，李浩成曾隨同本校的五千餘名師生前往北京聲援。六月一日，李浩成再次入京聲援，此後就一直沒有回家。

當時與李浩成在一起的同學提供了如下情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從前門方向進入天安門廣場南端，當時，李浩成正好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拍攝現場照片，當閃光燈亮起來的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向他開槍射擊。李浩成連中兩彈，致命的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肝部。民眾隨即將李浩成送往同仁醫院搶救，終因傷勢過重而身亡。

大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或六月七日，同仁醫院根據李浩成身上的學生證，將他遇難的消息通知了天津師範大學校方。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天津師範大學校方及李浩成親屬趕到同仁醫院認領了他的遺體，他們當時看到該醫院的太平間裏還有十多具遇難者遺體沒有被領走。

李浩成的遺體就地於北京八寶山火葬場火化，然後由其大哥把骨灰帶回，安置在天津市武清縣的南骨灰堂。

據說，後來天津師範大學校方曾給了李浩成的親屬一些金錢的補償。

李浩成也是一位農家子弟，家在天津市武清區（原天津市武清縣）農村。其母親是一個苦命的農家婦女，生育有三男三女，李浩成是她的第二個兒子。以前農村講"階級鬥爭"，李家的成分是上中農（富裕中農），雖然不屬於"剝削階級"，但也算是階級成分偏高的農戶，遇事常常遭受歧視。因此，李家前面的幾個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或高中就回家務農了。李浩成是李家最聰明的孩子，學習成績很好，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已經被當時河北省的重點中學——楊村中學挑走了。但是，李浩成剛上高中，父親就突然病故，家庭經濟狀況急遽下降。

李浩成是一個有志向而又懂事的孩子，在父親突然病故後，他不忍心再讓老母親爲家庭經濟問題爲難，一看高中畢業在即，便主動對母親表示說："憑我的成績，我是能夠考上北

京大學的，但家裏經濟困難，我還是由學校保送，去天津師範大學讀師範吧。”(當時的中國師範院校學生統一由國家提供生活費----作者注)他的母親雖然爲兒子抱屈，但考慮到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也就只能隨了兒子的心願。可這樣一個難得的既懂事、學習成績又好的孩子，卻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無情地剝奪了生存的權利。

李浩成的母親多年後談起這件事情，心裏還是隱隱作痛。她曾經對登門拜訪的“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張先玲傾述：“現在兒女都長大成家了，生活也比以前強了，但可憐的浩成，當年家裏實在太困難，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李浩成的家人擔憂李浩成的母親承受不了，將李浩成遇難的消息隱瞞了一年多時間，是李浩成的大哥前往北京處理後事。李浩成的母親是個堅韌的母親。其實，在見不到李浩成的一年多時間裏，她已經意識到李浩成出事了，否則怎麼會這麼長時間不回家呢？但她並不把心裏的疑問寫在臉上，只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暗暗地流淚。後來，有一次村裏人不慎說走了嘴，她回家追問她的子女才知道真相。即使是這樣，她也從不在人前流淚，更不願讓子女們看見。她因爲流的淚太多，落下了嚴重的眼疾，看東西已很模糊。【注釋 62】

與戴金平、李浩成差不多時間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學生，現在已知的還有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周德平、中國科學院一九八八級碩士研究生黃新華、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雙學士班學生程仁興。由於至今沒有人願意站出來作見證，周德平和黃新華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詳情都還不是很清楚。

周德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獨自一人離開清華大學校園，朝北京市區而去，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學校。一顆子彈擊中了周德平的頭部，他被民眾送到距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同仁醫院搶救，因傷重而不治身亡。由於當時沒有同學同行，好久都不知道周德平的下落，一直到七月六日才從同仁醫院找到他的遺體。

周德平也是一位農家子弟，家在湖北省天門市郊區一個貧困的小村莊，他的父母年逾古稀，仍然生活在這個貧困的地方。

自兒子周德平遇難後，那年年月月伴隨著兩位老人的，只是無盡的淒苦和絕望。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是在一九九六年才尋找到周德平的親屬的。因爲長年遭到中共當局的嚴密監控，丁子霖本人無法去看望周德平的父母，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冬天，才委託一位朋友順道去看望了兩位老人。

那位朋友回來後告訴丁子霖：周家所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因年久失修，門窗都掉落了，寒風直往屋子裏灌。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什，連僅有的幾張板凳都已破爛不堪。別人家看上彩色電視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連一台黑白電視機都還沒有。周母患神經性面癱，臉部扭曲，僅剩下幾顆殘齒的牙床整個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軀蜷曲，也已失去勞動能力。

這些年來六四死難者家屬團體給周家兩位老人轉去的海外人道救助捐款，僅夠兩位老人艱難度日而已。一九九八年長江鬧大水，農田被淹，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一九九九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門板抬到了醫院搶救。如果不是六四死難者家屬團體及時給他們追加了海外人道救助捐款，景況可想而知。

丁子霖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他們的兒子----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周德平不死，他們會活得這樣淒慘嗎？

但是，就是對這樣兩位勉強維持著殘生的老人，共產黨的地方基層官員也還不肯輕易放過他們。一九九八年丁子霖給周家寄去的海外人道救助捐款，居然就被村上的一位前任共產黨的村支部書記冒領了去，迫於無奈，丁子霖專門給這位前任村支部書記寫了一封信。

丁子霖在信中寫道：

“我已得知今年七月間我從北京郵局匯給周治剛的八百元人民幣由你從當地郵局擅自領去，至今不還給收款人周治剛。

你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前任村黨支部書記，應該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郵政法規的規定。你這樣做是知法犯法。你也不會不知道，周治剛是‘六四’難屬，他年老體弱，現在又遇到水災，朋友們給他寄去這份匯款，完全是出於人道

主義的同情。周治剛作爲一名公民，有權接受這筆匯款。在法律面前，他和你是平等的，你沒有任何理由扣壓這筆匯款。

我今天給你去信，是把道理講清楚，請你接信後立即把匯款八百元還給周治剛，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將通過法律管道狀告你和所在郵局的局長，一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

也許是丁子霖的這封信起了作用，最後這位前任中共村支部書記不得不把錢退回給了周家兩位老人。

但是，住在城裏的人是很難想像偏遠農村的中共基層官吏是怎樣橫行鄉里的。二零零一年秋天，丁子霖又接到了周德平父親的來信，信中一開頭就說：“那個沒良心的政府，我們這些受害者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而信的最後一句話說：“真把我氣死了！”

原來周家再次遭到了侵擾。這回是村幹部帶領鎮上公安派出所的警察一行五、六人開著吉普車到了周家，他們脅迫兩位老人“老實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說是再要發現有北京來的匯款，他們就立即扣下。他們厲聲惡語地威脅兩位老人：今後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向他們“請假”，回家還要向他們“彙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這種強加的侮辱性規定，同毛澤東時代對待所謂“五類分子”的做法有什麼兩樣？【注釋 63】

遇難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黃新華也是農家子弟，家在湖南省邵東縣農村。黃新華從小到大都是一名好學生，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他於一九八三年考入清華大學高等物理系，一九八八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班。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黃新華在天安門廣場被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打死，年僅二十五歲。他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火葬場火化，骨灰由其兄黃林強帶回湖南省邵東縣老家安葬。

據說中國官方有關部門事後給了黃新華家一千二百元人民幣，說是黃新華遭誤傷至死的補償費。【注釋 64】

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一帶。這些軍人分別隸屬于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的步兵第 116 師和北京軍區的炮兵第 14 師。這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在抵達之初並未開槍，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試圖接近他們，對他們進行宣傳、勸導，希

望他們不要對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數千名學生使用暴力。但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端槍阻嚇，未能奏效。

於是，數百名學生和市民一排排就地坐下，以血肉之軀組成一道人牆，擋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面前，企圖阻止他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負責這道人牆的一位中年工人，不斷來回高聲呼籲、告誡組成人牆的民眾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絕對不能使用暴力。另有幾位老工人也在人牆中來回叮囑民眾："大家都要聽學生的，一定要堅持採用和平方式，千萬不要使用暴力。"

與此同時，也有幾個手持水管、木棍的年輕市民走過來，憤怒地對組成人牆的民眾大聲叫嚷："你們還坐在這裏等死？那些畜生見人就殺！根本就不分青紅皂白！哪會管你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

在這道人牆中，有來自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的女學生李蘭菊，只見她勇敢地走上前去，拉住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的手，嗚咽著對他說："我是香港的學生，天安門廣場裏的人都是大學生，是國家的精英和棟樑，他們是和平請願，決不是暴亂，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把希望放在他們的身上。你們不能開槍，求求你們，不要朝他們開槍！"李蘭菊說著說著就痛哭失聲，跪倒在地，她看見那位軍官的眼中也有淚水。

李蘭菊回到人牆中原來所處位置的時候，發現身旁有一名學生正拿著一根木棍加入進來，於是憤怒地對他說："放下木棍，否則就先將我打死！"那位學生盯住李蘭菊看了好一會，見她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只好委屈地將木棍放到了身後。一位十二、三歲的小男孩見狀，主動地從身後拿出一根十幾寸長的鐵條交給了李蘭菊。

一位年僅十五、六歲的少年在人群中放聲大哭，斷斷續續地向眾人訴說他的哥哥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打死了，大家都跟著掉眼淚。那少年說著說著，就要衝上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拼命。李蘭菊急忙上前攔住他，百般加以勸慰，那少年伏在李蘭菊的肩上不停地淒厲哭叫："哥哥！哥哥！"隨後追趕著一輛救護車而去。

當李蘭菊在天安門廣場上再次發現這位少年時，他已經全

身鮮血地躺在一位工人的懷抱裏，於是李蘭菊當場悲憤得暈倒過去，被人們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

在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的臨時急救站裏，李蘭菊蘇醒過來，醫生和護士們得知她是來自香港的學生，雖然明知她身體並無大礙，仍堅持要送她去醫院。當時臨時急救站帳篷內的地上躺滿了二十多名受傷者，門外還坐著四、五十名受傷者，其中不少是學生。李蘭菊身旁躺著一個滿身鮮血的學生，脊背血肉模糊，傷得很重，已經不能動彈，但仍不停地自言自語："要堅持到底！要堅持到底！......"

當時，有兩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受傷軍人也被民眾送進了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的臨時急救站，有人不讓醫生予以救治，說他們是殺人兇手，死了活該，但遭到其他人的勸阻。一個醫生說："不要爭吵了，軍人也是人，也應該得到醫治。"

第一輛救護車到來的時候，李蘭菊堅持不肯上車。第二輛救護車又來了，李蘭菊依然掙紮著不肯上車。一位女醫生緊緊握著她的手，哭泣著用英語對她說："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讓全世界都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事情，你知道嗎？"聽了女醫生的這一番話之後，李蘭菊才同意上救護車去醫院。伴隨李蘭菊一起去醫院的，是她的同學、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的學生陳清華。陳清華也受了傷，他稍早前在天安門城樓附近攝影的時候，被防暴警察用棍棒打傷了。

李蘭菊到了同仁醫院，看見整座醫院到處血跡斑斑，地板、牆壁、擔架，以及醫務人員的衣服，統統都沾滿了鮮血。李蘭菊雖然沒有受傷，一位上了年紀的資深醫生還是堅持給她仔細檢查了身體狀況。當時，同仁醫院裏躺滿了鮮血淋淋的受傷者，其中絕大多數人都傷得很重。李蘭菊懇求眼前的資深醫生不要管她，快去搶救其他的受傷者。資深醫生含著眼淚對她說："孩子，你身體很虛弱，但休息一下就會好的。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們需要你平安回到香港，向世人宣佈我們的政府究竟幹了些什麼。"

正當李蘭菊打算離開同仁醫院之際，傳來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將要進入醫院搜捕"反革命暴徒"的消息，一時間人

心慌慌，醫務人員勸導一些傷勢較輕的受傷者儘快離開醫院躲避。陳清華遂將身上剩餘的三千元人民幣分發給一些受傷者們當作逃亡路費，每人一百元。一位十六歲的受傷學生小陶流著淚拒絕了，他說："我是不行了，胸口中了兩槍，一條腿也斷了，你還是把錢分給別的同學吧。"

小陶看到李蘭菊的腰包上扣著一枚"天下爲公"的徽章，嗚咽著對她說："請你告訴同學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還告訴李蘭菊，他是獨生子，父母一定會爲他的死訊傷痛不已。

當天下午三點鐘左右，李蘭菊和陳清華在離開同仁醫院之前，特意來向小陶道別的時候，發現年紀輕輕的小陶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注釋 65】

在天安門廣場西面，就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部隊從北面、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從南面抵達天安門廣場後不久，一向緊閉的人民大會堂東大門突然敞開，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潮水般地湧出，源源不斷。在解放軍軍方特意安排的攝影燈光的映照下，我站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遠遠望去，只見人民大會堂的數十級臺階上一片密密麻麻、閃閃發光的鋼盔在晃動，猶如無邊無際的海洋。這批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陸續集結在人民大會堂東側一帶，面對著天安門廣場。

據《戒嚴一日》一書透露，當時集結在人民大會堂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來自於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其中包括陸軍第 27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集團軍直屬工兵團、集團軍直屬通信團，陸軍第 63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8 師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3 師、守備第 3 師、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陸軍第 27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在東單受阻，臨時撤退到東單體育學校集結待命，沒能按原定計劃進入人民大會堂。

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將偌大的人民大會堂擠得水泄不通，不僅是過道走廊，就連廁所裏都擠滿了軍人。陸軍第 65 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任留計)的通訊連裏有許多女兵，因爲長時間上不了廁所，被尿憋得直哭，十幾個女兵圍著旅長、旅政治委員又哭又叫，有的還直跺腳。旅政治部主任在一旁裝睡躲避女兵們的哭鬧。【注釋 66】

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史中所記載的相關資料，透露了該集團軍部隊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以及提前集結在人民大會堂裏的具體情況：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下午，軍長錢國梁奉命乘直升機到北京軍區受領任務。軍區命令，集團軍應立即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當日十八時前後，集團軍向步兵第 79 師、第 80 師等部發出預先號令。二十一時，集團軍黨委召開緊急常委擴大會，錢國梁軍長、黃信生副軍長、楊學林副軍長、陳學政副政委、陳春耕副政委、王良均參謀長、朱增泉主任（軍政治部主任---作者注）、湯昌和部長（軍後勤部部長----作者注）以及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高炮旅旅長車成德、工兵團團長高水德、通信團團長程德舟參加了會議。

會上，錢國梁傳達了軍區首長的命令和有關指示，部署了執行戒嚴任務的行動方案。成立了以錢國梁、黃信生、陳學政、王良均、朱增泉、湯昌和爲成員的赴京執行戒嚴任務指揮組，並確定由楊學林、陳春耕等組成留守領導小組；……

五月十九日七時三十分起，27 軍參加戒嚴的部隊分三路向北京地區梯次開進。錢國梁軍長、黃信生副軍長、陳學政副政委先于部隊出發，基本指揮所由王良均參謀長、朱增泉主任率領，沿京石公路（北京市至河北省石家莊市公路----作者注）開進。

第 79 師參加戒嚴部隊編爲兩個合成團，含六個合成營二十八個連，共三九一六人，二二九臺車，按預定方案沿元氏（河北省元氏縣----作者注）、趙縣（河北省趙縣----作者注）、安國（河北省安國市----作者注）、保定（河北省保定市----作者注）、良鄉（屬於北京市房山縣，現爲北京市房山區----作者注）路線向北京待機地域開進；第 80 師編爲兩個合成團，含六個合成營三十一個連，共三五八一人，二五一臺車，按第 239 團、師指（師指揮部----作者注）、第 240 團序列，沿靈壽（河北省靈壽縣----作者注）、曲陽（河北省曲陽縣----作者注）、徐水（河北省徐水縣----作者注）、朗縣（河北省朗縣----作者注）路線向北京大興（北京市大興縣，現爲北京市大興區----作者注）地區開進。

（五月）十九日午後，集團軍先頭部隊行抵保定，遭到學生和群眾的攔截，集團軍基指(基本指揮所----作者注)和直屬隊，第 79 師、第 80 師戒嚴部隊各一部先後受阻。在疏導勸說無效的情況下，爲避免與人群發生沖突，第 79 師當即指揮先頭部隊改變行軍路線，繞道安新（河北省保定市安新縣----作者注)、容城(河北省容城縣)、涿州(河北省涿州市----作者注)，于(五月)二十日晨進入北京市郊。但後續部隊被截堵於保定，前進後退均受阻。

該師復組成以王小京參謀長爲組長的輕便指揮組返回保定控制和指揮部隊。設法排除阻力，迂回進京。集團軍高炮旅、工兵團、通信團於（五月）十九日十二時後先後出發，當日行至保定受阻，連同第 80 師部分車輛在保定市郊被阻七個小時。面對群眾的圍堵，部隊通過談判和宣傳，終於通過保定市區。

部隊進入北京市郊，在良鄉、豐臺(屬於北京市豐臺區----作者注)路口、大興（北京市大興縣，現爲北京市大興區。----作者注)、蘆溝橋（屬於北京市豐臺區蘆溝橋鄉----作者注）等地再次被阻隔，通信聯絡中斷。27 軍各級指揮員相機處置情況，採取分段躍進、繞道前靠、逐次收攏的辦法沖破了北京市民的阻截，進入集結地域。第 79 師部隊在良鄉等地嚴重受阻。該師首長率領機關人員往來於各點指揮，並先後派出十三個小組五百多人次外出接應部隊，指揮部隊選準時機，採取化大爲小、逐點跳越、外引內接等辦法迅速收攏，在較短時間進駐集結地域。

高炮旅、工兵團在豐臺等地遭到人群的攔截圍困，其中工兵團 1 營、2 營和機關在豐臺路口被圍堵十一個小時，3 營和部分機關人員被圍四天四夜。北京市民出於對戒嚴的擔心，在向 27 軍幹部戰士進行勸阻的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部隊進行謾罵、圍攻，使幹部戰士連日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睡不上覺，處境十分艱難。在這種情況下，27 軍指戰員始終保持高度克制，克服種種困難，向圍觀的學生和群眾做宣傳解釋工作，避免了同學生群眾發生沖突。

五月二十日淩晨二時至二十二日，27 軍戒嚴部隊先後進入集結地域。集團軍機關、工兵團、通信團進入北京軍區後勤第

六分部，第 79 師和高炮旅按時進入集結地域豐臺總後(解放軍總後勤部----作者注)一零一綜合倉庫，第 80 師師直及所屬各團到達大興縣城北的小營地區(北京衛戍區教導隊駐地----作者注)。五月二十日零時三十分,第 239 團一臺車誤入永定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作者注)，第 80 師師直汽車連一臺車前往解救，均被市民破壞後做了路障。第 79 師先頭部隊進入集結地域後，即奉命調部分兵力配合豐臺區公安分局救援集團軍高炮旅彈藥車，並接應友鄰部隊進入集結點。集團軍機關、高炮旅、通信團、工兵團及第 79 師等部被阻於豐臺路口和長辛店（北京市豐台區長辛店鎮----作者注）等地的官兵于（五月）二十三日前全部進駐集結點。

五月二十日九時許，集團軍戒嚴部隊奉命立即向天安門廣場推進。(五月）二十日十時，第 80 師沿蘆城（北京市大興縣蘆城鄉----作者注)、蘆溝橋路線開進，於十一時三十分到達衙門口（位於北京市石景山區----作者注)；集團軍機關和直屬隊奉命緊急前往玉泉路（位於北京市海澱區----作者注)，被人群圍堵分割數段，阻於衙門口以西及以南地區。

集團軍指揮所和第 80 師迅速改變前進方式，改摩托化行軍爲徒步沖擊，旋又被阻截。第 80 師四十三臺生活保障車被圍困在裝甲兵技術學院（應該是裝甲兵工程學院，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盧溝橋畔。裝甲兵技術學院在吉林省長春市。----作者注)，第 240 團機關及 1 營被阻截在蘆溝橋以南地區，第 79 師一七零零多名幹部戰士、一四九臺車被阻於途中，集團軍其他戒嚴部隊也先後遭到人群圍堵，前進受阻。

根據北京軍區命令，爲避免流血事件發生和事態擴大，部隊暫緩進城，撤回原集結地域待命。五月二十三日晨，集團軍受阻部隊全部返回集結地域。

……

休整待機期間，27 軍把‘準備好’放在第一位，積極主動地勘察地形，擬制方案，在休息好、生活好的同時抓緊做好入城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同時，各級理順隸屬和指揮關系，實行科學的領導分工負責制。團以上單位建立了精幹的指揮機構，各師建立了基本指揮所、前進指揮所和流動指揮所。

集團軍指揮所先後數次組織各師、旅、團領導和機關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地域勘察地形道路，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然情況，並制定了執勤、制止暴亂和指揮所緊急行動的三項預案。各部以預定方案爲指導紮紮實實進行了應急訓練。第 79 師在訓練中重視預測情況，研究制定了執勤中處置情況的五十個辦法。第 80 師、高炮旅還爲部隊配發了北京市區交通路線圖，使部隊做到任務熟、地形熟、情況熟。集團軍偵察分隊進行了應付多種突發事件的專業基礎訓練，突出散打和捕俘技術訓練，以及樓房攀登、單兵技術、化裝偵察、調查詢問和城市識圖用圖訓練，使偵察兵的技術水準和快速反應能力均達到了規定要求，爲完成清場任務奠定了基礎。

根據上級指示，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集團軍派出得力幹部協助地方清除路障。各師、旅、團分別組織機關和營連幹部分期分批到天安門廣場勘察地形，研究清場方案。六月一日，錢國梁軍長率領各師、旅軍事主官和集團軍機關部分幹部到天安門廣場勘察現場，做好了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前的各種準備。

……

五月二十二日，總參謀長遲浩田在朱增泉主任陪同下看望第 235 團全體官兵。同日，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也來看望部隊，聽取情況匯報，提出要求。五月二十三日，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徐效武在黃信生副軍長陪同下，到豐臺第 79 師駐地看望部隊。六月二日上午，中央軍委副祕書長劉華清、洪學智在北京軍區齊連運副司令員陪同下來集團軍視察工作，並看望了集團軍部分官兵。

六月二日，錢國梁軍長在軍區（北京軍區----作者注）受領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任務。上午，集團軍召開常委擴大會，各師、旅長和直屬團團長參加。錢軍長在會上傳達了軍區命令，並研究部署了行動方案。

同日上午，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和高炮旅旅長車成德赴人民大會堂受領任務。

二日下午，各師旅召開緊急會議，下達任務，分析情況，研究制定進城方案。同時，集團軍王良均參謀長率集團軍前指（前進指揮部----作者注）先期到達人民大會堂三樓河南廳；第

79 師、第 80 師前指也先後搭乘地方大交通車繞道到達人民大會堂。

二日晚二十一時起，第 79 師、第 80 師、高炮旅、通信團、工兵團等部先後由駐地出發，分別沿豐臺、蓮花池（位於北京市豐台區----作者注）、廣安門外大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作者注）、宣武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作者注）、和平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作者注）、虎坊橋（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南新華街----作者注）、珠市口（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作者注）等路線向天安門方向前進。爲避免與人群發生沖突，保證順利進點，指戰員奉命改著便裝採用多批次、小批量、大間隔方式徒步行進。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主動派出多輛交通車協助部隊運送人員物資。

第 79 師開進前，對人員進行了妥善調配編組，五百多個波次中每一波都配有一名幹部或黨員，並採取定點指揮與跟進指揮相結合，以先期入城的師參謀長王小京率機關人員和偵察兵在交通要道設立了八個調整點，接應引導部隊開進。同時，師團各級領導和機關幹部大部下到部隊中實施跟進指揮，保證部隊在復雜環境下不潰散。開進中，全師有近二千人被沖散在近百個點上，不少人被打傷。第 79 師的武器彈藥由總後（解放軍總後勤部----作者注）西倉庫提供的四輛大交通車運送。六月三日淩晨，第 235 團 8 連押運的一輛大交通車在西單路口遭民眾攔截，車上載有一百余支沖鋒槍、五挺輕機槍、二部電臺和上萬發彈藥。後經過師偵察分隊、西單公安分局、總後一零一倉庫的努力，以及學生和市民的配合，當晚十二點，這輛車上的武器彈藥完好無損的轉移到了海軍醫院。

第 80 師從六月二日二十一時起，按照第 238 團、第 239 團、炮兵團、第 240 團、坦克團、高炮團序列，化整爲零，便裝徒步沿虎坊路、珠市口等路線向人民大會堂方向開進。六月三日零時前後，近二千名官兵在宣武區的虎坊橋、珠市口、陶然亭等地被北京市民圍堵，數十人受傷被送進醫院，大部被沖散，兩臺指揮車被燒。不少官兵繞道二、三十公里才進入大會堂。

六月三日上午，副軍長黃信生、第 80 師政委許德亮來到宣武區，親臨被圍堵現場組織指揮，及時處理各種復雜情況；教

育官兵，嚴守紀律，臨時編組排、連、營，指定負責人，收攏失散人員，先後七次接回受阻官兵一千三百餘人。

到六月三日下午，第 79、第 80 兩師部隊除少數被困於虎坊橋、陶然亭一帶外，其餘已進入上級指定集結點人民大會堂。

六月三日十七時許，尚在豐臺地區集結待命的集團軍高炮旅，奉命將部隊經鐵路輸送到北京站。該旅接令後立即行動，傍晚全旅八百餘人全部運抵北京火車站，爾後向指定地點公安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七號----作者注）方向徒步行進。當晚二十時在東單（位於北京市東城區----作者注）一帶前進受阻，（六月）四日淩晨復奉命在東單體校臨時集結待機，準備配合兄弟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六月四日淩晨，集團軍到達人民大會堂的人數已近七千，其中軍直屬工兵團、通信團已全部到位。但兩師一旅仍有七百餘人被阻於一八二中學（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壽長街一號----作者注）、友誼醫院（位於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九十五號----作者注）、天橋辦事處（位於北京市宣武區虎坊路十四號樓----作者注）、宣武區園林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白紙坊東街甲二十九號，在萬壽公園內----作者注）、武警七支隊（位於北京市宣武區----作者注）、東單體校（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大華路----作者注）等地，數日後陸續歸隊。全集團軍有四十餘名指戰員負傷，但無人走失或死亡。”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有三則關於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誤傳先是在北京民間流傳，隨後又廣泛地在海內外流傳。這三則誤傳是：

一、誤傳陸軍第 27 集團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淩晨沿著西長安街強行開進，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一路殺到天安門廣場，並血洗了天安門廣場。

而事實上，陸軍第 27 集團軍事先已奉命集結在人民大會堂中，並沒有參與西長安街及其它地方的屠殺行動，只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派遣了一個由二百零五名主要由偵察兵組成的特遣分隊直接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主要任務是搗毀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二、誤傳支持開槍屠殺民眾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與反對開槍

屠殺民眾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在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交火開戰，並發生了激烈的炮戰。

而事實上，當時這兩支部隊都部署在天安門廣場，根本不可能在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交火開戰。

三、誤傳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主要領導是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親屬，號稱“楊家軍”，因此執行血腥鎮壓任務格外賣力。

而事實上，時任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長的錢國梁少將是江蘇省吳江縣人，時任陸軍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朱增泉少將是江蘇省無錫市人，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均與祖籍四川的楊家兄弟沒有任何親戚關係。陸軍第 27 集團軍政治委員徐永清少將當時正在國防大學進修，他是浙江省建德縣人，也與楊家兄弟沒有親戚關係。

爲什麼會誤傳陸軍第 27 集團軍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首惡？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爲陸軍第 27 集團軍前不久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對越作戰，當時有不少人認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之所以在北京殺人如此兇狠，視人命爲草芥，是因爲這些部隊官兵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對越作戰中早已經殺紅了眼。而陸軍第 38 集團軍除了由八百三十八名偵察兵所組成的偵察大隊外，沒有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界老山戰區的對越作戰。

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共當局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之後，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抗命事件廣泛流傳，深受北京民眾和學生的讚賞和敬佩，當時人們普遍對陸軍第 38 集團軍抱有好感。

此外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北京大學的學生那些年都是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接受軍訓，相互間存在著一定的友誼，他們不相信熟悉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會對自己大開殺戒。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到六月三日晚上屠殺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的學生一旦發現被阻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屬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總是熱情地上前傾訴軍訓期間所結下的友誼，並能完整地唱出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歌：

“鋼鐵的部隊鋼鐵的英雄，鋼鐵的意志鋼鐵的心。平江起義上井崗，鐵流向北方。嘿！大戰平型關，敵寇心膽寒，南征

北戰，艱苦奮鬥，英勇又頑強，跨過鴨綠江，碧血灑鄰邦，血染戰旗紅，盛名天下揚。我們越打越硬越戰越強，跟著偉大的共產黨，嘿！勇猛地向前進！

鋼鐵的部隊鋼鐵的英雄，鋼鐵的意志鋼鐵的心。團結奮發爲四化，軍史添榮光。嘿！不怕流血汗，傳統大發揚，軍民共建，向著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枕戈燕山下，練兵在太行，緊握手中槍，準備上戰場。我們越打越硬越戰越強，跟著偉大的共產黨，嘿！勇猛地向前進！”

陸軍第 27 集團軍同樣隸屬於北京軍區，也是解放軍的王牌部隊，與陸軍第 38 集團軍一樣，承擔著拱衛首都北京的重要任務。陸軍第 27 集團軍也是解放軍部隊中的一個重點集團軍。

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部的駐地在河北省的省會石家莊市。由於上述的三個誤傳，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的幾天時間裏，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軍部遭到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民眾的圍攻，學生和民眾呼喊著“27 軍是劊子手！”“27 軍鎮壓人民！”“27 軍殺死老人、孩子和學生！”等口號。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陸軍第 27 集團軍在地方上工作的家屬受到同事們的激烈責罵，在地方學校上學的子女也遭到同學們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得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全體官兵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集團軍領導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

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陸軍第 27 集團軍不得不破例以集團軍黨委的名義給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陸軍第 27 集團軍這次奉命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和學生開一槍。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衆的工作，才使得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處境有所改變。

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鎮壓民眾不光是在首都北京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的。

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這種做法，把同樣駐守在河北省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將了一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若不公開表態澄清，等於承認自己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時確實向首都人民和學生開了槍。陸軍第 38 集團軍一怒之下一狀告到中共中央軍委，指責陸軍第 27 集團軍既然是奉命到首都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爲什麼

視開槍爲大逆不道，而要去公開澄清什麼事實。這種不請示中共中央軍委，擅自給地方黨政機關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

陸軍第 38 集團軍告這一狀，實際上是借機要求中共中央軍委對開槍的問題明確表態，予以支持，從而爲自己曾經開槍鎮壓北京學生和民眾的行爲推卸責任。但沒想到中共中央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有人說這是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的原話)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顯然表明中共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那麼，開槍打死無辜群衆最多，並且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是否敢於承認自己開了槍，而且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代軍長名義率領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進京鎮壓民眾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雖然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升任軍長，但情緒十分不好，曾經對來訪的朋友談到陸軍第 38 集團軍內部對中央屢次調動他們進京對付群衆很不滿，他本人因而也産生了提前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

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們，儘管在一九八九年曾經風光一時，但不久以後這些“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功績卻成了他們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零年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共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事件一周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偉大歷史意義，以教育人民群眾，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

當該份報告送到當時中共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那裏的時候，被否定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上將十分不滿，曾經質問李瑞環爲什麼不予批准，李瑞環回答說是鄧小平的意見。

從此以後，這個曾被高度評價爲“挽救了中國共産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光輝業績，就從中國共産黨的宣傳舞臺上消失了，而在每年的“八一”解放軍建軍節、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應該去慰問那些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曾被授予“共和

國衛士”榮譽稱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及其家屬。

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解放軍官兵在復員或轉業前，紛紛要求從個人的檔案裏拿掉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立功受獎的資料，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時會受到歧視，更不願自己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負這個歷史的黑鍋。

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曾被大肆歌頌的“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光輝業績，竟然成爲中共當局不敢碰觸的禁忌，也成爲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唯恐沾邊的穢跡。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不但使人民群衆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爲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所有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精神負擔。近些年，在中國的諸多軍事網站上，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參加過一九七九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和一九八零年代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對越作戰的解放軍退伍軍人或轉業軍人，談論自己的光輝業績或驚險經歷，而幾乎難以見到解放軍退伍軍人或轉業軍人談論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參加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經歷，一旦有網民提到某某部隊曾經參加過一九八九年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馬上就會有該部隊的退伍軍人或轉業軍人出來阻止說，此事太沉重了，別再提了。

一位陸軍第 40 集團軍步兵第 118 師的退伍軍人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也就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十周年前夕，向香港《星島日報》記者敍述了十年前的往事。儘管退伍之前上級已命令他們要注意言論，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要採取“四不”態度：不議論、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但退伍多年並經歷過當工人下崗的這位退伍軍人說，時至今日心裡仍然覺得難受，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會終身銘記。他說，這樣的事情，派警察去就完事了，出動軍隊，覺得很過分。希望“六四”能夠平反，但現在沒辦法，只能讓歷史平平淡淡地過去。

被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共中央高層，也無人願意承擔開槍的責任。解放軍內部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楊尚昆爲什麼解放軍戒嚴部隊會開槍時，楊尚昆的答復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

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解放軍上將張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

後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曾經質問過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白冰回答說，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爲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控楊尚昆、揚白冰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小平。據說，這也是鄧小平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中共高幹子弟圈子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向前、聶榮臻這兩位解放軍的老元帥和中共元老陳雲在去世之前，都曾經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解放軍戒嚴部隊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爲鄧小平等人分擔開槍的責任，沾“平息反革命暴亂”這個“歷史功績”的光。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還有一個隸屬於北京軍區的陸軍集團軍值得一提，那就是陸軍第 28 集團軍。

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軍部駐地在山西省大同市。在中共當局有關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軍事部署中，陸軍第 28 集團軍被安排作爲第二梯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陸軍第 28 集團軍奉命從位於北京市延慶縣的臨時駐地出發，向北京城內挺進，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陸軍第 28 集團軍在開進途中遇到民眾的攔阻，指揮官沒有採取包括開槍在內的強力措施積極突進，遲至六月四日清晨才抵達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

據劉亞洲在題爲“信念與道德”的內部報告中透露，當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部隊乘坐包括裝甲車在內的軍用車輛，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點鐘左右開進到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時，遭到大批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攔阻，在指揮車裏帶隊的該集團軍軍長何燕然和該集團軍政治委員不但沒有率隊強行開進，反而順勢停滯不前，而且兩個人神態輕鬆，有說有笑的。軍長手搭涼棚往前一看，說了一句“遍地青紗帳”，軍政委隨即接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劉亞洲稱這兩個人真可惡，都把自己比喻成日本鬼子了。軍長何燕然還對軍政委說：事後不知道是該我還是該你上軍事法庭。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點鐘左右，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的車隊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是事實。成千上萬的民眾圍住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的車隊，紛紛向部隊官兵們敍說從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期間所發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情況。一開始，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官兵們都不相信民衆所描述的屠殺情況，他們強調“人民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衆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復興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十四號），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 軍官兵不相信軍隊會向群衆開槍。”

這些年輕人很快從復興醫院拿到血衣，給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官兵們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導致軍心渙散，許多士兵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士兵甚至把槍支扔到了護城河裏。靠近木樨地立交橋的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

約上午十點鐘左右，有憤怒的民眾開始焚燒軍車，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軍人不但不制止，甚至還有軍人主動告訴燒車的民眾如何才能快速將裝甲車點燃。一時間，西長安街從木樨地到軍事博物館的路段上火光熊熊，濃煙沖天，總共燒毀了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通訊車。在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中，陸軍第 28 集團軍被燒毀的裝甲車和軍車的數量是最多的。

到了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總指揮劉華清上將(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特地指令空軍司令員王海上將派了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陸軍第 28 集團軍受阻部隊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傳達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地區的氣氛再度緊張起來。

但是，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始終沒有執行中共中央軍委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命令，相反，有一個士兵（一說是退伍軍人）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傳達命令的軍用直升機掃射，將軍用直升機打跑了。一直到了下午五點鐘，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不但沒有往前推進一步，反而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軍事博物館（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路九號）。

在奉命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中，陸軍第 28 集團軍是唯一一個成建制地沒有抵達上級領導機關所指定位置的部隊，其他的部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上

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官兵到達了上級領導機關所指定的位置。在中共當局的眼中，陸軍第 28 集團軍是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表現最差的一支部隊，在中共中央軍委事後所頒授的立功授獎名單中見不到陸軍第 28 集團軍所屬的部隊和官兵，連中國官方有關“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宣傳資料中，也幾乎見不到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蹤影。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象陸軍第 28 集團軍這樣消極抗命的部隊和軍人其實不少，許多被認爲是因爲迷路而未能按時到達預定戒嚴執勤地點的部隊，實際上是故意裝作迷路，許多被列入失蹤名單的軍人，實際上是臨陣棄械脫逃，當時在北京各處的護城河裏都可以找得到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所丟棄的槍支。

在消極抗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中，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大校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後的第二天，駐紮在遼寧省沈陽市附近海城市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軍委的緊急命令，火速前往沈陽市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兩點鐘左右，陸軍第 39 集團軍所屬的步兵第 116 師部隊乘坐軍車向沈陽市摩托化開進。當隊伍車隊行進到沈陽市附近的時候，上級命令改去位於河北省秦皇島市的北戴河。到了位於河北省秦皇島市的山海關附近，上級又命令改去北京。經過兩天一夜的急行軍，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早晨六點鐘到達北京市通縣的三間房軍用機場，奉命駐紮下來，集結待命。

陸軍第 39 集團軍部隊在三間房軍用機場住下後，實行全封閉式管理，與外界隔絕，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崗把守，不許部隊官兵隨意進出。部隊官兵當時獲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解放軍報》。部隊對官兵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時候說，是要到北京城內的外國使館區維持治安，強調不能向人民開槍，誰開第一槍就要向歷史負責等等。

陸軍第 39 集團軍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時期隸屬于林彪麾下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解放軍中是戰功顯著、赫赫有名的一支部隊，而作爲第 39 集團軍主力師的步兵第 116

師更是聲名顯赫，在解放軍所謂的“四大王牌師”中名列第二。【注釋 67】該師進駐北京郊區的三間房軍用機場之後，就連解放軍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的負責人，都紛紛親自前往視察慰問。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步兵第 116 師指揮部接到立即率領部隊向北京城內進發的上級命令，命令中明確要求，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準時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這時候，上級的命令中沒有再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決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因此，步兵第 116 師部隊官兵們都感到氣氛緊張，事態嚴重。

步兵第 116 師部隊奉命向北京城內進軍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北京學生和市民的頑強堵截，整個部隊的行進速度非常緩慢，爲了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不得不按照預定方案改走另一條路線。

當天晚上，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大校親自帶領一些參謀人員身穿便裝，先頭進入北京市區，到預定的部隊開進路線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消息悄悄在步兵第 116 師部隊的官兵中傳開，說是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開槍殺人。師長許峰也許聽到、看到的情況更多，從北京市區回來後神態凝重，告訴大家說，現在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也不用找我了。說完這一番話，就一頭鑽進了師部的通訊車裏待著，再也不露面。

隨後，師長許峰帶領部隊車隊一直在北京城外轉悠，說是一直收不到上級指示。實際上，如果他願意，步兵第 116 師與上級是應該可以聯系得上的，就連步兵第 116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營部的電台都一再收到中共中央軍委的直接呼叫：“116 師，你們在哪里，請回答！請回答！”

師長許峰始終不回應中共中央軍委的焦急呼叫。不明底細、頭腦簡單的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營長還私下對人嘀咕：“奇怪，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級的呼叫嗎？師長爲什麼一直說聯繫不上呢？”聽的人忍不住暗自發笑，但不願點破其中的奧秘。

時任步兵第 116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2 連雷達站站長的

李曉明中尉，親身經歷了上述的一幕，他於二零零一年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

“這時候，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隊開槍殺人的事情，都躲了起來，沒有人敢在街上攔阻軍隊和堵路，我們部隊完全可以順利進城，但車隊就是不直接進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繞行。這期間每人都發了子彈，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殺氣騰騰地向城裏開進。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我正睡著，忽然聽到馬達響，睜眼看見一輛裝甲車向天上放著槍，將擋路的公車推開，全速向城裏開去。這時，我們部隊也完全可以隨裝甲車進城，但卻仍然未進城，仍在效區繞圍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傍晚，我們車隊還是停在郊區的一片稻田邊休息。大家各自想著心事，久久不能入睡，也無人有心情閒談。遠處鋼廠的火光將天邊染得通紅，使我突然想到第二次大戰時法西斯的焚屍爐，更不敢想像幾十年來一直都在號稱人民子弟兵的友軍竟然已經開始屠城。同時，我也爲我們部隊有一位善良的師長，迂回、婉拒上級指示而暗暗慶幸。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清晨六時許，第 38 集團軍作戰處處長前來我團，他站在一輛軍車上，兩名士兵將機關槍架在駕駛室上。由他在前面開路，我們車隊仿佛被押解進城。一路上，我們看見許多燒毀的軍車、民用車、公車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幾乎不見，但不時從街旁樓內傳出喊聲：‘法西斯、劊子手！’我們的戰士有的便向樓內開槍掃射。

到天安門廣場後，我們部隊被安排到軍事博物館的前廳駐下。我同 6 連一名排長一起去天安門廣場想看個究竟。只見紀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紀念碑北側的大理石臺階和柱子已被坦克車撞壞，履帶印在天安門廣場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見。我們在垃圾堆裏隨意翻了一下，發現一條褲子和一件棉襖上面，都有彈洞和斑斑血跡。也不知這些衣服的主人是傷是死。我們的戰士去打掃天安門廣場，回來後也告訴我說，他們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灘血。”

李曉明在回憶當年情景的時候，也談到了當年部隊官兵對開槍鎮壓的看法，他說：

“當時，部隊官兵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同情學生的。對政府

開槍殺人、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也是持否定態度的。我們團六連一名排長，他和我一樣也是軍校裏來的‘學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當時，他就公開在部隊中講了一些批評政府的話，並在六月中旬開小差回了海城（遼寧省海城市----作者注），後被處理回家。

我們師長許峰也是因對政府的做法有不同意見，才婉拒戒嚴令而被迫轉業。我們軍長傅秉耀因執行戒嚴令不得力而被貶新疆軍區，名爲平調，實爲暗降。據說，38 軍軍長因拒不執行戒嚴令而被軍事法庭判刑。

對中共爲維護其專制統治而不惜血腥殺人的野蠻、殘暴行徑，我也十分憤怒。雖然我未開一槍，但看到天安門廣場的灘灘血跡，想到那些爲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與幸福而英勇犧牲的青年學生和無辜平民，內疚、慚愧、負罪之感常常縈繞我的心頭。

記得當年的六月八日，我和營部車輛管理員一同坐公共汽車到郵局想往家發封平安電報。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懼的眼光看著我們。到了郵局，當我們向工作人員說明想發電報時，他們又同樣以冷冷的眼光瞄了我們一眼，說機器壞了，不能拍，拒絕了我們。我是那樣悔恨、羞愧。我那時就認識到，我們已經成了廣大人民痛恨的殺人犯、劊子手，我爲我仍在作爲一名軍人而害羞。

十二年了，我心中的這種傷痛一直都沒有痊癒，時時隱隱作痛。來到澳洲這塊自由的土地，我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有了更深的瞭解，特別是我成爲一名基督徒後，更感到中共當局槍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法西斯無異。

良心使我不再沉默，我覺得我有責任、有義務將我當年參加‘六四’鎮壓時的所見所聞告訴中國人，告訴全世界，使全世界人民進一步認識‘六四’，使我們國家早日成爲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願上帝看顧、保護中國人民早日脫離流血、死亡、悲慘、危險的境地，永遠不再受苦、受難。”

在師長許峰帶頭消極抗命的情況下，步兵第 116 師除了步兵第 347 團在團長艾虎生上校、團政治委員劉建星上校的帶領下，全體官兵上了刺刀、排著方隊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其他各

團的許多部隊一直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才在其他部隊的變相押解下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任務。

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大校因爲表現“不好”，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立即被迫轉業，離開了軍隊。而該師屬下的步兵第 347 團的團長艾虎生上校、團政治委員劉建星上校則獲得破格提拔。艾虎生先是取代了許峰的步兵第 116 師師長的職務，後來又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 39 集團軍軍長，獲授少將軍銜。劉建星升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獲授少將軍銜。【注釋 68】

二零零二年，李曉明專程從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市飛抵美國的紐約市，公開參加於六月二日舉行的六四事件十三周年紀念活動，在記者會上講述自己當年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的所見所聞。在接受記者採訪之前，他出示了軍官證、“首都衛士”紀念獎章、軍官轉業證書、軍校畢業證書，以及與他的戰友們以軍車和天安門爲背景的照片。

在記者會上，已經成爲基督徒的李曉明說，他準備每年捐贈一百澳元給“天安門母親”群體，一直到六四事件獲得平反爲止。時年三十二歲的李曉明表示，他不是一個英雄。他是在妻子和八歲的兒子於今年到達澳大利亞同他團聚之後，才下決心公開他內心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看法的。

“天安門母親”群體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在北京聽說這一消息，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她說：“六四事件的真相就需要各方面來挖掘，包括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李曉明能夠站出來，把這些真相向世界講述，是一個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開始。希望能起一個好的帶頭，有更多的軍人、更多瞭解真相的人站出來，把六四事件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像。”

參加絕食請願的青年知識分子高新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了他所經歷的兩起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願向民眾開槍的事情。

其一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和程真、沙濤(赴京聲援的香港學生----作者注)從天安門廣場出來後，先是在前門箭樓南面遇到了一支荷槍實彈但全都席地而坐，沒有任何武力行動的部隊（不是那支兇狠的空降兵部隊）。許多群眾圍著他們講道理，當然肯定也有出口傷人的。但士兵和軍官沒有一個人

哪怕是說一句惡語相向的話。

我和程真擠上前去與他們的指揮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指揮官眼含著淚對我們說：你們快走吧，我什麼也不能說。但是我希望你們相信我們，並不是所有的軍人都向你們開槍了。’軍官的話音剛落，幾個士兵把頭上的鋼盔捂在臉上，放聲痛哭，在場的大學生和市民群眾無不為之動情。”

其二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下午在北京師範大學，一位連長帶領兩車士兵開進校園，連長對圍觀的大學生和教職工們說：‘我是一個連長。部隊一進城，我手下的四車弟兄就有兩車被沖散了。現在，我們連就剩了這兩車弟兄了。但是，進城後看到的情景讓我們明白了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你們放心，我們是人民子弟兵，决不會向愛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開一槍。我們現在就向人民繳槍。’說完，兩車士兵跟著他紛紛把手裏的槍械朝車下扔。

被此番情景嚇壞了的在場大學生和教職工趕緊勸他們不要這樣，因為這可能會給學校帶來災難。後來，上千名大學生和教職工相送連長帶著士兵開出了北師大校園。這時，車上車下，許多人都哭了。這兩車士兵和他們的連長的命運不難想像。”【注釋 69】

凡是消極抗命或棄械逃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事後無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處罰。有消息說，陸軍第 28 集團軍部隊的團級以上軍官全部被拘捕，受審查，關押在軍隊監獄裏，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上了腳鐐。但是，至今尚未找到這方面的確鑿證明。

不過，有資料證明，中共當局和解放軍軍方對陸軍第 28 集團軍進行了歷時將近半年之久的調查和整頓，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陸軍第 28 集團軍軍一級的指揮官，從軍長何燕然少將、軍政治委員張明春少將、副軍長杜東海少將、軍副政治委員楊惠川大校，到軍參謀長邱金凱大校、軍政治部主任蘇雲大校，均被調離該集團軍，調離野戰軍部隊，並受到降職使用的處分。整個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軍部算是被一鍋子端掉了。軍長何燕然少將降職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軍政治委員張明春少將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治委員，軍參謀長邱金凱大校調任貴州省軍區參謀長。

相較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何燕然軍長等人所受到的處分顯然算是輕微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軍長是以“抗拒執行命令”的罪名予以處罰的，而何燕然軍長等人則是以“執行命令不力”的理由予以處分的；其二，徐勤先軍長是獨自承擔責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沒有任何人與他分擔責任，而何燕然軍長等人則是集體承擔責任，也就是整個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領導層集體扛起責任。事發之時，雖然軍長何燕然曾經對軍政治委員張明春開玩笑似地說過：事後不知道是該我還是該你上軍事法庭。事實上，事發之後，不僅軍長何燕然和軍政治委員張明春沒有推卸責任，就連其他的集團軍負責人也沒有推卸責任。

與徐勤先軍長一樣，陸軍第 28 集團軍軍長何燕然、軍政治委員張明春本來在解放軍中都屬於充滿前途的少壯派將領，兩個人都剛剛在一九八八年九月被授予少將軍銜，仕途正處於上升時期。何燕然少將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從天津警備區副司令員的位置上升任陸軍第 28 集團軍軍長，張明春少將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從陸軍第 2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升任陸軍第 28 集團軍政治委員，兩個人都升遷新職不久。

令人歎息的是，張明春少將被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治委員一年之後，在鬱悶之中不幸病逝。張明春少將思路清晰，口才出眾，瀟灑倜儻，至今還可讀到原陸軍第 28 集團軍軍人對他的稱讚文字。（參見附錄照片）

劉亞洲在那次內部報告中沒有提到陸軍第28集團軍的軍長何燕然少將和軍政治委員張明春少將的結局，但他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說，北京軍區所屬的部隊長期駐防京畿地帶，消息靈通，對北京的學生運動情況非常瞭解，普遍同情學生，執行戒嚴令當然不力。幸虧鄧小平英明，除了調動北京軍區所屬的部隊進京之外，還調動了大量其他軍區所屬的部隊進京，要不非出大問題不可。

據《鋼鐵的部隊：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中的相關內容記載透露，一九八九年奉命進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包括：北京軍區所屬的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28 集團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沈陽軍區所屬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40 集

團軍，濟南軍區所屬的陸軍第 20 集團軍、陸軍第 26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陸軍第 67 集團軍，以及直屬于中共中央軍委指揮的空降兵第 15 軍（當時該軍也作爲廣州軍區的戰略預備隊），總共調動了十八萬野戰軍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另據《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史》中的相關內容記載，則提到沈陽軍區所屬的陸軍第64集團軍也曾經奉命進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其中一段記載稱："(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陸軍第 27 集團軍)79 師接替了 39 軍、40 軍、64 軍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七個值勤點和十一個駐勤點。"

此外，另有資料顯示，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還有南京軍區所屬的陸軍第 12 集團軍、天津警備區所屬的坦克第 1 師、北京軍區所屬的炮兵第 14 師。中共當局還調動了北京衛戍區所屬的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3 師【注釋 70】和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

上述解放軍戒嚴部隊進京的路線如下：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的陸軍第 12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步兵第 110 團、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江蘇省的徐州市、南京市空運進京。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南省開封市的陸軍第 20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28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許昌市、登封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的陸軍第 2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守備第 7 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灤平縣、灤縣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山東省萊陽市的陸軍第 26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38 師（師部駐地在山東省濰坊市），從山東省的膠縣空運進京。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工兵團，集團軍直屬通信團，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邢臺市、獲鹿縣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陸軍第 28 集團軍，該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山西省的洪洞縣、內蒙古自治區的集甯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坦克第 6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通信團、集團軍直屬工兵團，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保定市、新城縣、滿城縣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遼寧省營口市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116 師、集團軍直屬通信團，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遼寧省的蓋縣、新城縣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遼寧省錦州市的陸軍第 40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8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遼寧省的義縣、錦州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南省新鄉市的陸軍第 5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162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洛陽市、安陽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山西省太原市的陸軍第 63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188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山西省的榆次市、忻州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遼寧省大連市的陸軍第 6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0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遼寧省的大連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的陸軍第 65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河北省的宣化市向北京市開進。

集團軍司令部駐地在山東省淄博市的陸軍第 6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9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山東省的鄒平縣向北京市開進。

軍部駐地在湖北省孝感市的空降兵第 15 軍，該軍屬下的空降兵第 43 旅、空降兵第 44 旅，以及部分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開封市、廣水縣空運進京。

師部駐地在天津市薊縣、隸屬于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 1 師，

該師屬下的三個坦克團和一個裝甲步兵團，以及部分保障分隊，從天津市的薊縣向北京市開進。

師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炮兵第 14 師，該師屬下的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炮兵第 37 團和炮兵第 208 團，從河北省懷來縣的沙城火車站乘坐火車向北京市開進。(該師屬下的炮兵第 6 團的駐地在北京市延慶縣，已經在北京市境內。）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向天安門廣場等地點強行挺進的時候，上述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如下：

空降兵第 15 軍：由南向北。該軍屬下的空降兵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大校、旅政治委員趙金奎大校、旅參謀長樊光銀上校、旅政治部主任趙宗慶上校）、空降兵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大校、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上校）在副軍長左印生大校、軍副政治委員田瑞昌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點鐘從位於北京市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沿著南苑路（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經由木樨園（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永定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珠市口（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前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等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26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38 師，在軍長佟寶存少將、軍政治委員劉書田少將的指揮率領下，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從位於北京市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沿著南苑路，經由木樨園、永定門、珠市口、前門等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3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師參謀長馮兆舉大校）、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大校、師政治委員陳錦彪大校）所屬的一萬零八百名官兵，在代軍長張美遠少將、軍政治委員王福義少將的指揮率領下，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鐘，從位於北京市西郊的石景山區萬壽路一帶的解放軍各兵種總部機關大院和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西倉庫（解放軍總後勤部一零一綜合倉庫）出發，經由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六部口等地，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加

上所屬的坦克第 6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工兵團、集團軍直屬通信團，總共有一萬五千零九十九名官兵。

陸軍第 39 集團軍：由東向西。該集團軍在軍長傅秉耀少將、軍政治委員馬盛林少將、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桓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兵分兩路，步兵第 115 師由師長張作禮大校指揮率領，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鐘沿著八王墳（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向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立交橋挺進；步兵第 116 師由師長許峰大校指揮率領，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鐘沿著八王墳、北京火車站（北京火車站南站，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40 集團軍：由東北向西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大校、師政治委員郭景全大校）、集團軍直屬炮兵旅，在軍長吳家民少將、軍副政治委員高雲江少將、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的指揮下，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從北京市東郊的首都機場（位於北京市東北郊順義縣境內，距離北京市中心 25 公里）出發，沿著京順路（北京市----北京市順義縣）、機場路、太陽宮（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鄉）、三元橋立交橋（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向東直門立交橋（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開進。

陸軍第 64 集團軍：由北向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0 師在副軍長劉書明大校、軍副政治委員張傳苗大校的指揮率領下，從沙河機場（位於北京市昌平縣沙河鎮）出發，沿著馬甸橋、清河鎮（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和平街北口（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向德勝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開進。

陸軍第 2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和守備第 7 旅，在軍長周玉書少將、軍政治委員尹文聲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提前分批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所屬的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團長賈炳正上校，團政治委員常躍上校。所屬的守備第 7 旅，旅長李守成大校，旅政治委員安明大校。

陸軍第 54 集團軍：由西南向東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27 師在軍長朱超少將、軍副政治委員張堃少將、師長鍾聲琴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點五十分從

北京市豐台區出發，沿著六里橋（位於北京市豐台區）、廣安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菜市口（位於北京市宣武區）、虎坊橋（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南新華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和平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向天安門廣場南端的正陽門西側開進。步兵第 162 師在師長黃棟甲大校、師政治委員胡永柱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沿著木樨園（位於北京市豐台區）、馬家堡（位於北京市豐台區）、太平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天橋（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陸軍第 2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在軍長何燕然少將、軍政治委員張明春少將的指揮率領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從北京市延慶縣出發，於六月四日清晨，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被北京學生和市民堵截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

陸軍第 63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大校、師政治委員邵鬆高大校、師參謀長李海清、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在軍長刁從洲少將、軍政治委員曲繼甯少將、軍參謀長劉蔭超少將、軍政治部主任張秋祥少將的指揮率領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沿著陸軍第 38 集團軍所開闢的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7 師，在師長高宗武大校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六月三日提前進駐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步兵第 188 師所屬的步兵第 562 團團長丁克忠、團政治委員李德順，步兵第 563 團團長馬新芝、團政治委員張志傑，步兵第 564 團團長譚永生、團政治委員李文瑞，坦克團團長劉世清、團政治委員錢秋根，炮兵團團長張雲山、團政治委員宋曉茹，高射炮兵團團長呂湘泉、團政治委員李宗獻(或閻增雨)。

陸軍第 20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60 師，在軍長梁光烈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市大興縣出發，沿著大紅門（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涼水河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永定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向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開進。

陸軍第 12 集團軍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緊急空運進京，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作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預備隊，

在南苑機場集結待命。該集團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接到中共中央軍委的緊急命令，屬下的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步兵第 110 團、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集團軍直屬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近萬名官兵, 在軍長郭錫章少將、軍政治委員溫宗仁少將的指揮率領下空運進京，抵達北京市南郊的南苑機場。

陸軍第 2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大校、師政治委員刁九建大校）、步兵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大校）、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大校）、集團軍直屬工兵團（團長高永德上校）、集團軍直屬通信團（團長程德舟上校），在軍長錢國梁少將、副軍長黃信生少將、軍副政治委員陳學政少將、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提前分批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

陸軍第 65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3 師（師長王勤大校、師政治委員張常青大校）、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在軍長臧文清少將、軍政治委員曹和慶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通過地下通道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

陸軍第 67 集團軍：由南往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9 師（師長李鳳龍少將、師政委楊玉文大校）在軍長吳玉謙少將、軍政治委員杜鐵環少將等人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市通縣出發，經由通縣定福莊、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呼家樓、日壇路、東城區建國門立交橋、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上述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等地開進的路線、開進的方式，以及各個部隊指揮官的姓名，只要仔細研讀《戒嚴一日》一書，幾乎都可以在該書所收錄的署名回憶文章中得到驗證。

據《中國“六四”真相》一書透露，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經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在鄧小平的家中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問題。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見分歧，最後只好動用表決的方式，表決的結果是：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趙紫陽反對戒嚴；喬石棄權，表示服從組織決定；胡啓立棄權，表示保留個人看法。關

於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決議遂以二比一通過。第二天下午，楊尚昆秉承鄧小平的旨意，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軍委會議，針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共中央軍委的組成人員除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之外，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以及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全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以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主要任務；設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組成，劉華清擔任總指揮，遲浩田和周衣冰擔任副總指揮；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直接對中共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共中央軍委統一安排和指揮。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各級指揮官，凡是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期間表現積極者，均在事後的“論功行賞”時得到了應有的犒賞，用平民百姓的鮮血染紅了自己頭頂上的官帽子。在此，特將收集到的與此相關的一份升官晉級的名單列出，留作歷史的記錄和見證：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固輝中將（遼寧省蓋縣人），解放軍戒嚴部隊副司令員，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史玉孝中將（陝西省寶雞市人），解放軍戒嚴部隊副政治委員，升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中共第十三屆和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頒授上將軍銜。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二日廣州病逝，終年七十二歲。

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少將（山西省原平市人），解放軍戒嚴部隊發言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成都軍區政治委員、中國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中共第十四屆和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安徽省太和縣人），後來歷任赤峰守備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山西省五台縣人），先

後升任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政治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朱敦法中將（江蘇省沛縣人），先後升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瀋陽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蘆光祖少將（河南省商丘市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基地指揮部司令員、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政治委員、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校長。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病逝，終年六十六歲。

陸軍第 12 集團軍軍長郭錫章少將（湖北省廣濟縣花橋鎮劉常村西湖口垸人，廣濟縣現爲武穴市），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12 集團軍政治委員溫宗仁少將（安徽省巢湖市人），先後升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中國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五屆和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淩晨病逝，終年六十八歲。

陸軍第 12 集團軍副軍長徐文義少將 (山東省濟南市曆城區人)，升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

陸軍第 12 集團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書記史水洲少將（江蘇省溧陽縣上興鎮劉莊人，溧陽縣現爲溧陽市），先後升任陸軍第 12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南京軍區後勤部政治委員、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陸軍第 12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胡道仁大校（安徽霍邱縣人），先後升任安徽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安徽省軍區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12 集團軍參謀長季崇武大校（江蘇省響水縣人），升任江西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12 集團軍步兵第 36 師師長徐承雲大校（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12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12 集團軍坦克第 2 師政治委員陸鳳彬少將（江蘇省南通市通州東社鄉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12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

江蘇省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福建省軍區政治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大校（河北省藁城縣人），先後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副政治委員田瑞昌大校（河北秦皇島市人），先後升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大校（湖北省漢川市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參謀長、副軍長、廣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3 旅政治委員趙金奎大校（河南省鎮平縣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大校（河南省洛陽市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4 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上校（湖南省澧縣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45 旅政治委員、空降兵第 15 軍副政治委員、成都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0 集團軍軍長梁光烈少將（四川省三台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54 集團軍軍長(該集團軍是中共中央軍委戰略總預備隊之一)、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 20 集團軍政治委員楊興隆少將（河北省遷安市人），升任濟南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委員，一九九一年七月因病提前離休，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一歲。

陸軍第 20 集團軍參謀長張祥林大校（山東省高密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20 集團軍副軍長、陸軍第 54 集團軍軍長、濟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4 集團軍軍長周玉書少將（湖南省攸縣人），先後

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頒授武警中將軍銜、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十三屆和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24 集團軍政治委員尹文聲少將（河北省蔚縣人），升任北京軍區後勤部政治委員。

陸軍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2 師政治委員任之通大校（江蘇省灌雲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2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委員、天津警備區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政治委員常躍上校（重慶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5 集團軍裝甲師政治委員、內蒙古軍區政治部主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6 集團軍政治委員劉書田少將（山東省滕州市人），先後升任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廣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兼廣州軍區黨委書記、成都軍區政治委員兼成都軍區黨委書記，中共第十五屆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少將（江蘇省吳江縣人），先後升任濟南軍區參謀長、司令員、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將（江蘇省無錫市人），先後升任國防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解放軍總裝備部副政治委員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第十五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副軍長黃信生少將（河北省新城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長、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陳學政大校（江蘇省揚州市人），升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大校（江蘇省鹽城市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聯勤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大校，先後升

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副軍長、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趙勇明少校（江蘇省南通市觀音山鎮人），升任北京軍區偵察大隊副大隊長，頒授中校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政治部副主任周衍智上校（安徽省舒城縣張母橋鎮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後勤工程學院副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團長彭新國上校（湖南省攸縣人），先後升任步兵第 80 師副師長、師長、南疆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副軍長、代軍長張美遠少將（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下八廟鎮人），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一九九二年預定提升爲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但他被視爲“楊家將”主要成員，隨著楊尙昆、楊白冰兄弟被鄧小平清洗出軍隊，卻被貶任青海省軍區司令員，繼而任蘭州軍區副參謀長，後來轉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直至退休。

陸軍第 38 集團軍政治委員王福義少將（遼寧省丹東市人），升任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十四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劉丕訓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副軍長、陸軍第 24 集團軍軍長、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副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吉林省吉林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馮兆舉大校（山東省莒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陸軍

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 65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團長李少軍上校（江蘇省睢寧縣人），先後升任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陸軍第 38 集團軍副參謀長、參謀長、副軍長、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大校（江蘇省濱海縣人），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政治委員陳錦彪大校（江蘇省通州市金餘鄉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委員、天津警備區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副參謀長王喜斌上校（黑龍江省甯安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副主任鄶萬增上校（遼寧省瓦房店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委員、山西省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團長岳中強中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旅長、陸軍第 38 集團軍裝備部部長，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政委馬炳泰中校（河北省盧龍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4 師政治委員、河南省軍區開封軍分區政治委員、武裝警察部隊河南省總隊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9 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黑龍江省巴彥縣人），先後升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委員馬盛林少將，升任遼寧省軍區政治委員。

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桓少將（河南南陽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政治委員、武裝警察部隊政治部主

任，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師長張作禮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副軍長、沈陽軍區聯勤部副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團長艾虎生上校（河南省禹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陸軍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軍長、成都軍區參謀長，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政治委員劉建星上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40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遼寧省人），升任沈陽軍區參謀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軍長朱超少將，升任河南省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副參謀長黃漢標大校（廣東省揭東縣玉湖鎮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54 集團軍後勤部部長、副軍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黃漢標是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張萬年上將的女婿。

陸軍第 54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岳宣義大校（四川省南江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5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駐中國司法部紀律檢查組組長、中國司法部中共黨組成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師長鍾聲琴大校（四川省蓬安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26 集團軍軍長、濟南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政治委員王玉發大校（河南省南召縣人），先後升任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大校，升任河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政治委員胡永柱大校（四川

省渠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54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西藏軍區政治委員、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第十五屆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團長徐乃飛上校（河南省鄆城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12 集團軍步兵第 36 師副師長、師長、陸軍第 1 集團軍副參謀長、陸軍第 31 集團軍參謀長、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政治委員張文品上校，升任河南省軍區鶴壁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軍長刁從洲少將（河北省深澤縣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委員曲繼甯少將（山東省龍口市人），升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參謀長劉蔭超大校（河北省玉田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山西省軍區參謀長、陸軍第 65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日病逝，終年六十二歲。

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張秋祥少將，先後升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政治委員、陸軍第 65 集團軍政治委員、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參謀長劉逢君少將（遼寧省遼陽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大校，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政治委員邵松高少將，升任陸軍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九六年一月，邵松高因爲貪污受賄被免職，並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

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李海清大校（河南省正陽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7 師師長、武

裝警察部隊寧夏自治區總隊總隊長，頒授武警少將軍銜。

陸軍第 63 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李世明上校（四川省三台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9 師師長、陸軍第 24 集團軍參謀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4 集團軍副軍長劉書明大校（吉林省洮南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副軍長、遼寧省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聯勤部部長，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4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張傳苗大校（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張家坡鄉西五莊村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第二炮兵部隊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4 集團軍參謀長葛振峰大校（河北省清苑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 64 集團軍軍長、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校長、中國軍事科學院院長、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中共第十六屆和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 6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于景常大校（山東省黃縣人），先後升任黑龍江省軍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64 集團軍步兵第 190 師參謀長王國生上校（吉林省大安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4 集團軍步兵第 190 師師長、陸軍第 64 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 40 集團軍參謀長、副軍長、軍長、蘭州軍區參謀長、司令員、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5 集團軍軍長臧文清少將（河北省承德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5 集團軍政治委員曹和慶少將（河北省甯晉縣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第二炮兵部隊副政治委員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第十五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在北京病逝，終年六十一歲。

陸軍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政治委員李文華大校（內蒙古

自治區武川縣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65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北京衛戍區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第十六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5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指揮部主任方文平上校（北京市人），先後升任陸軍第 27 集團軍副參謀長、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師長、陸軍第 27 集團軍後勤部部長、河北省軍區參謀長、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團長張鴻兵上校，先後升任守備第 3 旅旅長、陸軍第 65 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山西省軍區臨汾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政治委員金秉章上校，先後升任步兵第 207 師政治委員、石家莊陸軍學院副院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 67 集團軍軍長吳玉謙少將（山東省甯陽縣人），先後升任沈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中共第十四屆、第十五屆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 67 集團軍政治委員杜鐵環少將（遼寧省鞍山市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副主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師長秦濤大校（(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區秦羅莊人，黃安縣現爲紅安縣)），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秦濤是原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秦基偉上將之子，一九九四年因爲“田明建事件”【注釋 71】被免職，隨即退役。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參謀長李勝堂上校，升任陸軍第 24 集團軍副參謀長，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副大隊長程志強中校（山西省永濟縣方池村人），先後升任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大隊長、北京衛戍區副參謀長，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高射炮兵團團長李旦生上校，先後升任警衛第 3 師副師長、師長、內蒙古軍區阿拉善軍分區司令

員，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副團長鄧健康上校（安徽省宿縣人），先後升任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團長、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9 師參謀長、北京軍區聯勤部司令部後勤工作研究室副師職研究員、山西省軍區臨汾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政治委員吳忠明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 24 集團軍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團長羅剛上校（北京市人），先後升任坦克第 1 師副師長、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第 1 支隊支隊長楊德安上校（河南省臨穎縣人），先後升任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副總隊長、武警部隊司令部直屬政治部主任、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副總隊長、總隊長、武警部隊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北京市總隊總隊長。晉升少將警銜。

此外，還有一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師、旅、團級建制單位立功受獎的名單，這些部隊分別被中共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集體二等功和集體三等功。具體名單如下：

集體一等功：

1）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師參謀長馮兆舉）

2）陸軍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團長賈炳正、團政治委員常躍）

3）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團長幸中原、團政治委員萬金華）

4）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團長艾虎生、團政治委員劉建星）

5）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團長徐乃飛、團政治委員張文品）

集體二等功：

1）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師政治委員陳錦彪）

2）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師政治

委員邵松高）

3）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師長陳明義、師政治委員徐福安）

4）陸軍第 40 集團軍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師政治委員郭景全）

5）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師長鍾聲琴、代師長、集團軍副參謀長黃漢標、師政治委員王玉發）

6）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旅政治委員趙金奎）

集體三等功：

1）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師政治委員刁九建）

2）陸軍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師長王勤、師政治委員張常青）

3）陸軍第 24 集團軍守備第 7 旅（旅長李守成、旅政治委員安明）

4）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師政治委員胡永柱）

因爲各種條件所限，上述的這一份升官晉級名單顯然是很不完整的，立功受獎的部隊也僅限於被中共中央軍委所記功的師、旅、團級建制單位，但從中仍然可以大概看出哪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比較賣力，手上所沾的鮮血比較多。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在武力挺進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陸軍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是四大主力部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至清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加入了陸軍第 24 集團軍（六月二日預先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陸軍第 27 集團軍（六月二日預先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陸軍第 63 集團軍（六月二日預先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陸軍第 65 集團軍（六月二日預先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在整個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最爲賣力、殺人最多的部隊，當屬陸軍第 38 集團軍，其次是空降兵第 15 軍。

從上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調度安排中，可以發現劉亞洲所說的鄧小平的“英明”之處，即調動多個軍區的解放軍部隊入京，以起到相互監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個進京部隊之間互存戒心，難以串連，避免發生兵變事件。

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長期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即所謂的“党指揮槍”，但是，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當時對這一支“黨的軍隊”仍然不放心，尤其是在出現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之後。因此，在部署和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的時候，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調度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慮，做了一種“雙備份”、“雙保險”的周密安排。例如：安排擔任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部隊，是四個解放軍中最尖銳的主力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時候，又加入了陸軍第 24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陸軍第 27 集團軍等部隊，由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一個“特緝分隊”負責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任務。

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待命的部隊也是多個集團軍，包括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的步兵第 188 師。

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西線東線南線三條主要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部隊，同樣也是各爲兩支或兩支以上的部隊，西線的部隊包括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7 師、陸軍第 28 集團軍，南線的部隊包括空降兵第 15 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陸軍第 20 集團軍、陸軍第 26 集團軍，東線的部隊包括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40 集團軍、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 1 師。

此外，在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時候，中共中央軍委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明確要求各個部隊實施所謂的“靠前指揮”措施，軍級指揮官下到師（旅）級部隊指揮，師（旅）級指揮官下到團級部隊指揮，依此類推。同時，向各個部隊派遣了指揮組或工作組，隨同各個部隊的指揮部一起行動，一方面

起到監督作用，另一方面變相地剝奪了部隊的指揮權。

據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顯示，派往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指揮組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陳培民中將、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北京軍區訓練部王姓部長等人組成。派往空降兵第 15 軍的是一個工作組，級別比較低，組長是來自于北京軍區的趙曉強中校。從中也可看出，在出現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之後，陸軍第 38 集團軍顯然不受信任。

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等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前，事先安排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早已經對天安門廣場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而在這個包圍圈的週邊，還部署了空軍部隊和炮兵部隊。

在整個鎮壓行動中作爲第一主力部隊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在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時候，如同被“請君入甕”，甚至連後路都已經被封死，因爲陸軍第 63 集團軍的步兵第 187 師緊隨其後，實際上起著“督戰隊”的作用。

這種周密的軍事部署，使得整個圍繞天安門廣場所進行的進軍過程，以及隨後實施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看上去更像是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尙昆等人一場小心謹慎的對解放軍各個部隊忠誠度的測試。如果當時作爲第一主力部隊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真的接受一些學生和民眾的呼籲，陣前倒戈，站在人民的一邊，在天安門廣場與靜坐請願的學生“勝利會師”的話，他們也將立即在鄧小平、楊尙昆等人預先設置的包圍圈內遭到被血腥鎮壓的結局。

同樣的，其他任何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如果輕舉妄動，陣前倒戈，站在學生和民眾的一邊，也必將遭到被圍剿殲滅的結局。除非有足夠數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事先達成共識，同時行動，但這對於一向遭到嚴密控制的“黨的軍隊”來講，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集聚北京的數十萬解放軍戒嚴部隊來自於不同的軍區，屬於解放軍內不同的“山頭”。因此，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也好，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也罷，這些良知未泯的解放軍指揮官，只能盡自己個人的

努力，以各種消極的方式進行抵制，很難有進一步的積極行動。

曾經有研究者指出，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當時所憂慮的，一個是中共黨內出現“政變”，另一個是軍隊發生“兵變”。動用如此龐大的兵力，進行如此周密的軍事部署，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的確不僅僅是爲了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如果僅僅是爲了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動用北京衛戍區所屬的兩個警衛師和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的兵力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調動各大軍區的野戰軍部隊進京。

爲了鎮壓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到底動用了多少軍隊？中共當局始終沒有公佈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部隊番號和官兵人數，至今仍然是一個秘密。因此，關心者和研究者無法獲得可靠而準確的資料，只能依靠零散的資料進行研究和推測，得出各自不同的結論。關於奉命進京執行鎮壓任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總人數，迄今爲止，有說是十八萬的，有說是二十三萬的，也有說是二十五萬的，報數最多的是三十五萬，見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號所刊載的一篇題爲《黨指揮槍？槍指揮黨？——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的文章。該篇文章指出：“這次奉戒嚴令進京的，有來自全國七大軍區的軍隊，達三十五萬人之眾。他們大多出自作爲軍隊‘精銳’的野戰部隊；軍兵種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空降部隊、導彈部隊。其中 27 軍、38 軍、39 軍、24 軍均爲經過合成改造的現代化集團軍。參加人數最多的 27 軍和 38 軍爲中央軍委戰略預備隊。”

另外，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報導稱，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下午三點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中南海的懷仁堂接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發表重要的講話，出席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人數是“百餘人”。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軍以上幹部”人數竟然達到“百餘人”，可見動用的軍隊之多。

從目前已知的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情況分析，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動用了十八萬到二十五萬的解放軍野戰部隊進京應該是可信的。筆者根據多年來對有關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解放軍戒嚴

部隊和武裝警察部隊的總人數不會少於二十萬。

在解放軍的各個兵種中，唯一沒有參加北京戒嚴行動的就是海軍。海軍並不是無兵可調，除了水面艦艇部隊和航空兵部隊之外，當時還擁有兩個海軍陸戰旅。海軍陸戰旅與空軍的空降兵第 15 軍一樣，屬于解放軍最精銳的特種部隊，平常輕易不會動用。問題是，既然連空降兵第 15 軍都已經調動進京，爲什麼仍然不動用海軍陸戰旅？

有人說，當時之所以沒有調動海軍陸戰旅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是因爲海軍不被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所信任。曉沖在題爲《“五•一九”戒嚴的幾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一九八九年十月號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軍高級幹部對他親口所講的一段話：“當時海軍上層軍官一致反對戒嚴。而且海軍官兵文化層次高，見多識廣，不會盲從。當時楊尚昆他們認爲海軍非常不穩，海軍總部被派去的陸軍看守，故有陸軍接管了海軍之說。”

筆者認爲，上述有關海軍的說法，僅僅只是一種揣測而已，尚無確鑿的證據。

另一個有關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重大秘密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接獲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命令，又是在什麼時候獲准可以向民眾開槍的。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中，收錄了兩位解放軍戒嚴部隊高級將領的署名回憶文章，雖然不可能直接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但從中可以推測得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時左右，中共當局通過中共中央軍委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下令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當天晚上十一點鐘之前，則決定解放軍戒嚴部隊可以採取“果斷處置”，即“開槍”，並已經將“開槍”的命令傳達下去。

署名回憶文章之一的作者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政治委員王福義少將，他在題爲《鐵流東進天安門》的署名文章中寫道：

“也許與心情有關，（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點，北京西郊的空氣格外滯悶。作戰室裏，我們集團軍幾位領導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張副軍長（張美遠----作者注）歸來。一小時前，他應召匆匆去軍區（北京軍區----作者注）開會，受領任

務。

……

電話鈴急促響起。爲了爭取時間，張副軍長在軍區受領任務後，當即要通電話向我轉達。軍區命令以 x 個集團軍(兩個集團軍,即陸軍第 38 集團軍和陸軍第 63 集團軍----作者注)的建制，並由我集團軍爲前導，由西往東向天安門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拆除，務必按時到達。同時命我集團軍於當晚十時前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成四路縱隊乘車東進。”【注釋 72】

署名回憶文章之二的作者是陸軍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他在題爲《再度京華》的署名文章中寫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二十三時十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應該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的副部長----作者注)，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

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即沈陽軍區前進指揮部----作者注)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即陸軍第 38 集團軍----作者注)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這使我意識到事態已相當嚴重，顯然不對空鳴槍部隊很難突圍開進。於是我們決定：第一，堅決執行上級首長命令，採取對空鳴槍驅散圍阻人群的堅決措施，組織部隊突圍，保證在（六月）四日四時前全部到位。”【注釋 73】

提到陸軍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有必要順帶說一下，他雖然沒有象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那樣積極或消極抗命，但應該還算得上是一位良知未泯的解放軍將領。據陸軍第 40 集團軍步兵第 118 師一名軍人事後回憶,吳家民少將在接到“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的變相開槍命令之後，馬上召集部隊下達向北京城內挺進的命令，在行動前的動員大會上，他親自訓話，特意對全體官兵講了一段簡短的話：“我活了五十多歲，第一次指揮這樣的軍事行動。軍令如山，不過，弟兄們，我求求你們，進城的時候，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請把你們的槍口抬高一寸。”【注

釋 74】

事實上，筆者在閱讀了大量的相關資料之後，也的確是至今尚未找到陸軍第 40 集團軍的部隊官兵開槍殺人的具體事例。當時，陸軍第 40 集團軍的主要任務是佔領和控制東直門立交橋、東四十條立交橋。

陸軍第 40 集團軍指揮部在接到開槍命令後，曾經指令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組成防暴隊（又稱“接應分隊”），由集團軍直屬炮兵旅參謀長王建平上校指揮率領，一路鳴槍示警接應該集團軍的各路受阻部隊。具體給防暴隊指揮官王建平上校下達命令的是陸軍第 39 集團軍的參謀長楊福臣大校。

楊福臣大校在題爲《奇速用兵太陽宮》的署名文章中寫道：

“當時，我想，上級鳴槍示警的命令是下達了，但這是一場特殊的任務，不同以往我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戰鬥，那時沒有這麼多說道，敵人來了就打，使勁往死裏打，那是對付敵人。可這次情況就複雜了，一旦開槍誤傷了群眾怎麼辦？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是兒戲。要是對空鳴槍群眾不散，部隊又到不了位，又怎麼辦？必須想一個既不誤傷群眾，又能使部隊按時到位的良策才行。爲此，我進一步分析了圍堵人群的情況，認爲不明真相的群眾是多數，暴徒是少數。只有大力宣傳，採取猛烈突然的行動，造成巨大的威懾力，才能避免或減少傷亡。

於是，我就給接應分隊提出了‘一定要先廣播，大造聲勢，不行就集火對空鳴槍，要突然猛烈，造成一股銳不可當的威懾力’的要求。

這時帶領接應分隊的旅參謀長王建平同志又問：‘鳴槍後群眾不散怎麼辦？’

這真叫哪壺不開提哪壺，其實這也是我最擔心的問題。但我想今晚部隊必須到位，這是命令。

‘那就朝地下打。’我咬咬牙，說，‘但無論如何不能對人群開槍。’

‘是，堅決執行命令。’王參謀長腳跟一磕，大聲說。”

【注釋 75】

有關開槍命令，筆者在《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中用專門章節作了說明。

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分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分左右，突然從人民大會堂裏冒出逾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令人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終於徹底醒悟過來，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血腥鎮壓行動的計劃蓄謀已久，他們早已利用各種方式調兵遣將，包括通過北京城地底下四通八達的國防戰備通道，將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送到了緊鄰天安門廣場的幾個地方，包括位於西側的人民大會堂、位於北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位於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做好了武力強行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所有準備。

至於連日來在大街上所進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赤手空拳地向天安門廣場徒步進發的行動，無非是爲了轉移人們的視線，故意吸引北京市民和學生予以阻攔，製造軍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樣一來，既顯示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仁慈克制的虛僞假像，又有利於尋找血腥鎮壓的口實。同時，在軍民衝突中，讓這些赤手空拳、徒步進發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感覺到受辱，從而激發他們以及其他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對北京市民和學生產生仇恨心理，相信中共當局有關北京發生了“動亂”、“暴亂”的欺騙宣傳，隨後在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時自然就會毫不手軟。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的虛僞和狡詐，是常人所很難體察的。

《戒嚴一日》一書很有價值，不僅透露了大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開始前已奉命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等地方，同時還透露了解放軍戒嚴部隊事先早已經對整個北京市區每日的人流數量和活動規律進行了探測，而且還針對可能出現的集會、圍堵、槍殺、爆炸、縱火、放毒及自然災害等情況，制定了周密的警戒防衛方案，組織了三十二次較大規模的演練，擬制了十二套處置突發事件的方案。各軍、師、旅、團的指揮官對各自部隊的開進路線、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底座進行了實地偵察，緊扣各自部隊所執行任務的特點，組織演練，擬制了處置突發事件的方案。

以陸軍第 27 集團軍爲例，該集團軍指揮部根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指示，團以上單位建立了精幹的指揮機構，各師建立了基本指揮所、前進指揮所和流動指揮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三十一日，陸軍第 27 集團軍指揮所先後數次組織各師、旅、團負責人和機關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地域勘察地形道路，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然情況，並制定了戒嚴執勤、制止“暴亂”和指揮所緊急行動的三項預案。各師、旅、團分別組織機關人員和營、連幹部分期分批到天安門廣場勘察地形，研究清場方案。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少將親自率領各師、旅的軍事指揮官和集團軍機關的部分幹部到天安門廣場勘察現場，做好了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前的各種準備。

陸軍第 27 集團軍屬下各部隊以預定方案爲指導，紮紮實實進行了應急訓練。步兵第 79 師在訓練中重視預測情況，研究制定了戒嚴執勤中處置情況的五十個辦法。步兵第 80 師、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還爲部隊配發了北京市區交通路線圖，使部隊做到任務熟、地形熟、情況熟。集團軍偵察分隊進行了應付多種突發事件的專業基礎訓練，突出散打和捕俘技術訓練，以及樓房攀登、單兵技術、化裝偵察、調查詢問和城市識圖用圖訓練，使偵察兵的技術水準和快速反應能力均達到了規定要求，爲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奠定了基礎。

至此，天安門廣場已經完全處於至少四、五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嚴密封鎖包圍之中，血腥鎮壓行動的陣式布好了。以武力佔領並清理天安門廣場作爲勝利目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始將槍口直接瞄準仍然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和平請願的學生。

需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確切地講，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事件發生的最初時間不是中共當局所強調的、外界通常所認爲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而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北兩側之初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因爲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抵達之初，即有許多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的範圍內傷亡，陸續被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人數有數十人，其中一

些受傷者由於傷勢沉重，在送醫途中已經不治身亡。另有一些遇難者的遺體或是遺棄在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廣場北端邊沿地帶，或是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用車輛拉走。

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一九八七級雙學士（相當于碩士研究生學歷）班的學生程仁興，就是於此時在天安門廣場北端升國旗的地方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槍殺身亡的，遇難時年僅二十五歲。

程仁興是第一個爲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有名有姓的學生。關於程仁興遇難的時間、地點及過程，有當時一位與他同行的同鄉好友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大學校方事後也曾經指派專人對程仁興遇難的情況作了詳細調查，留下了一份內部調查報告。不過，這一份內部調查報告從來沒有公佈過，中國官方的有關部門並告誡知情者不得對外透露。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國官方爲了維護“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謊言，將有關程仁興的檔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開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遇難情況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一九八三級碩士研究生，與我是同年級、住隔壁宿舍的朋友，一九八六年夏天取得碩士學位後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作爲程仁興的班主任，范琦勇曾經到北京多家醫院尋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程仁興的遺體。

范琦勇在題爲《程仁興：“六•四”淩晨死在天安門廣場》的署名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第二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上，學生們陸續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回校後，各單位緊急清點教員學生人數。我趕到學生宿舍，大部份人都有下落，只有兩個人，程仁興和另一個研究生，沒有消息。到晚上那個研究生也回來了，但程仁興仍不見蹤影。他宿舍的人說他六月三日下午開完會就帶著濕毛巾(防催淚瓦斯）和北方工業大學的一個老鄉一起騎車到天安門廣場去了。我一聽覺得兇多吉少。

我把情況向（研究）所裏匯報後，曾姓總支書記要我繼續尋找他的下落。六月六日我帶著另一個學生到各個醫院尋找程仁興的下落。當時北京城仍一片混亂，木樨地一帶被燒毀的幾十輛坦克、裝甲車仍在熊熊燃燒，復興門立交橋被坦克封鎖，

不得通行。在復興醫院和兒童醫院，我看到幾十張無人認領的死者的照片，有打中胸部的，有打中頭部的，有的死者臉上血肉膜糊，但仔細辨認都不像是程仁興。

隨後幾天北京形勢更爲緊張，紛紛傳說軍隊要進駐海澱區，要在各大學展開搜捕行動。很多學生老師都離開北京去外地。爲避禍，我也到外地躲了幾天，六月十一日夜返回北京。六月十二日早上曾姓總支書記告訴我，程仁興的女朋友在北京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大華路一號----作者注）發現了疑似程仁興的死後照片，但不敢肯定，要我再去北京醫院核實。

於是我和程仁興的室友張某騎著自行車趕到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北京醫院。管太平間的老頭給我們看了二張仍無人認領的死者的照片。我一眼就認出了其中一人正是程仁興。爲進一步確認，我要求看他的屍體。太平間的老頭打開了冰櫃，抽出一個藏屍盒，裏頭躺著的赫然就是程仁興。身體已幹縮了許多，倦曲著，臉色慘白。我簽字認領了這具屍體，醫院開的死亡報告一律寫爲‘非正常死亡’。

我問當時親手處理程仁興的醫生（他的名字我已記不清了）。他告訴我程仁興被槍彈擊中腹部大動脈，血一下子都流光了。他翻動著程仁興的屍體，我看見程的下腹部有一個小手指大的槍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醫生告訴我，程仁興中的是開花子彈，彈頭進入身體後再爆炸。

醫生敘述當時的情形說，當時抬進來的人太多，我們醫院人手有限，不可能每個人都搶救。我們派兩個人在門口驗傷，覺得有救的就送上手術臺，沒救的就先放在一邊。醫生告訴我程仁興被抬到北京醫院時大約是六月四日淩晨二、三點鐘，抬到時就因流血過多而斷了氣。

回校後我向所裏領導作了匯報，然後開始辦理他的後事，但程仁興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被打死的，他的血衣在那裏，當時有誰和他在一起，這些問題，當時都不清楚。所裏也沒有讓我去調查，只告訴我會通過組織管道瞭解。

大概一周後，某負責人告訴我，程仁興的血衣找到了，是從他在北京工業大學的老鄉那裏得到的，當時程仁興和他在一起。我問，程仁興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被打死的？他告訴我，據程仁興的老鄉向組織交代，程仁興是在天安門廣場上被打死

的。是程仁興的老鄉把他送到北京醫院的。他最後告誡我別對別人說他是在天安門廣場上死的。”【注釋 76】

程仁興的老家在湖北省通山縣農村，他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民家庭裏出一個大學生很不容易，程仁興的遇難，給他的父母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在一九九五年冬天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裏，程仁興的父親終于因爲貧病交加、不堪承受喪子之痛而離開了人世。臨終之际，他用盡僅存的一點力氣呼喊著兒子的名字：“仁興仔啊！阿爸來陪你了……！”

程仁興的父親去世後，程仁興的母親經受不住接連而來的打擊，幾次想跟隨丈夫去另一個世界尋找自己的兒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備，懷裏揣著兒子程仁興的遺像，把一條繩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樑上，決定上吊自殺，跟隨自己的丈夫和兒子而去，幸而被年僅十歲的孫兒及時發現。孫兒一邊苦苦哀求，一邊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撐著奶奶的身軀，足足有一個多小時，才被大人趕來救下。

什麼叫做“生不如死”？我想無須我再多說什麼了。一個貧困地區的農民家庭，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位大學生，希望依靠他來改變全家的命運；然而，又有誰能想到，這個家庭竟然在一夜之間墜入了苦難的深淵。【注釋 77】

緊隨著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對天安門廣場包圍圈的形成，安置於人民大會堂制高點的中共官方高音喇叭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名發佈的最後通牒式的緊急通告。

這項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瘋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想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全由自己負責。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這項最後通牒式的緊急通告後來反復被播放，每播一次約三分鐘時間左右，播放時間長達三個多小時。血腥鎮壓的訊號終於被明白無誤地發出來了。

當聽到這項緊急通告中的“反革命暴亂”一詞的時候，我已經消除一切曾有過的美好幻想，確認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我的記憶中，中共當局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年，這是第一次在公開的通告中使用“反革命暴亂”一詞，措辭之嚴厲，定性之嚴重，不能不令人震驚，完全暴露了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的意圖。

在震驚之餘，我又感到無以名狀的憤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自四月中旬爆發至今，已經持續了將近五十天。在此期間，雖然曾經連續出現幾次逾百萬人參與的大遊行，但北京城內始終未出現任何由民主運動所引發的打砸搶案件，就連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有關報導都不得不承認，在學生運動期間，北京市的交通事故和各類刑事案件的發案率下降。民間更是有傳言說，在學生運動期間，連小偷都紛紛表示罷偷，免得中國官方給學生運動抹黑。

在學生運動期間，反而是在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領導下的北京市政府曾經故意製造混亂，停止公共交通，撤走交通警察，又是學生們主動地組織起糾察隊，日夜維護交通和治安，並對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等重要場所加以保護。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是一場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運動，北京城內根本不曾有過動亂，更談不上反革命暴亂。

至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遭到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阻攔，有一部分裝甲車、坦克和軍車被燒毀，則更進一步證明責任在於中共當局及其主導者鄧小平、楊尙昆等人。人民節衣縮食所供奉的軍隊是爲了保家衛國、對付外來的侵略勢力的，而不是用來對付本國的平民百姓的，這無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數十萬全副武裝的軍隊和數十噸重的坦克，怎麼可以出現在和平時期的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大街上呢？怎麼可以將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作爲開戰的對象呢？

即使是在嚴酷的戰爭時期，軍人屠殺外國平民百姓的行爲

都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何況是在和平時期屠殺本國的平民百姓！而當解放軍戒嚴部隊血腥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北京學生和市民之時，卻不允許北京學生和市民進行應有的自衛和反抗，則純屬“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強盜邏輯，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兵臨城下，天安門廣場上出現傷亡，更大的血腥鎮壓行動在即，柴玲、李錄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個時候，有人建議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們宣佈撤退，主動帶領學生隊伍離開天安門廣場。他們提醒說：“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

與此同時，又有人強烈反對撤退，宣稱我們必須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作代價，捍衛民主運動的成果，並以此喚起更多人的奮起，推翻李鵬僞政權。甚至有人拿著刀子和手槍威嚇柴玲，聲稱如果柴玲宣佈撤退，首先就要幹掉她。

在這種情況下，柴玲除了不停地流淚悲傷之外，已經無力承擔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的重任。學生領袖們在激烈地爭論不休，無論是主張堅守還是主張撤退，都已經失去了常態，無不處於情緒化狀態之中。

突然間，從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團的廣播中傳來了柴玲的最新呼籲：“同學們，請鎮靜！同學們，請鎮靜！願意撤離的同學現在可以撤離天安門廣場，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和我一起留下來，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柴玲並且在最新呼籲中幾次強調指出：“這是最後的時刻！這是最後的時刻！”每一個字都像重錘一樣，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在人們的心上。

此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正在我身後的絕食棚裏討論局勢和對策。當他們聽到柴玲在廣播中所發出的最新呼籲後，立即意識到這一段話的危險性。他們認爲，柴玲的這一段話只會動搖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原本害怕但團結的心，萬一有許多人離開紀念碑底座一帶，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隊伍必將發生紛爭，紛爭勢必導致混亂，而混亂勢必引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殺機，其結果不僅是堅持留下的學生必死無疑，即使是願意離去的學生也未必能活著離去。

臨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前集結待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始對著紀念碑底座上空開槍，一排排子彈呼嘯著從我們頭頂不遠處飛過，在夜空中劃出一道道耀眼的火光。起初，我和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上的學生或多或少還是有些害怕被流彈擊中，行走之時總是下意識地儘量放低身子，後來就習以爲常了，不再把流彈當一回事，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氣氛越來越緊張。我看到，一些記者開始撤離紀念碑底座最高層。

與此同時，處於人民大會堂制高點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也曾經對準天安門廣場開槍掃射。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北角，有兩名學生中彈受傷，一位傷在手部，一位傷在眼眉處。這兩名受傷的學生被及時地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焦急地跑來告訴我，有一部分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怎麼也不願離開帳篷，聲稱寧願死在那裏也絕不離去。於是，我急匆匆地趕到位於紀念碑底座下面東北側的中國政法大學帳篷，裏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學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覺休息。情急之下，我已顧不得禮節方式，利用教師的權威，喝斥他們迅速撤離帳篷，集結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隊伍中去。

這些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實在是太疲倦了，其中有的學生自從五月十三日參加絕食請願以來，就一直沒有離開天安門廣場。長期以來，他們始終處於極度的精神和體力的雙重疲憊狀態之中，實在太需要休息了。其中也有個別學生是因爲不願意在最後關頭離開堅守已久的、自己學校的帳篷營地，下定決心要與營地共存亡。

帶著學生離去之前，我看到帳篷門前寫有“中國政法大學”字樣的橫幅，情不自禁地凝視了一會兒。說實話，如果不是因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我對中國政法大學這所素有“中共第三神學院”之稱的學校，沒有好的觀感，更談不上有感情。

來回奔走之際，我發現附近的每一座帳篷裏幾乎都或多或少地有學生在睡覺休息，看模樣，大多是外地赴京聲援的學生。外地赴京聲援的學生是最辛苦的一群人，他們到達北京後主要

擔負宣傳和糾察任務，白天終日頂著烈日活躍於各主要路口和交通要道，只有夜晚才能回到天安門廣場稍歇，帳篷是他們唯一可供休息之處。

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方向，槍聲更爲密集，那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軍人在開槍驅散人群。中槍的學生和市民不斷地被送往附近的協和醫院，或被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救護站，天安門廣場北端的水泥磚地面上到處可見斑斑血跡。（參見附錄照片）

此時，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清理、封鎖東、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通道的行動已經完成。在東、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入口處，成千上萬名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軍人嚴密佈防，設置了警戒線。被阻隔在警戒線之外的學生和市民只剩下大約不到一萬人，分佈在東長安街上，但他們仍然堅持不走，與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軍人遙遙對峙，並不時地向前逼近警戒線，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集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堅守的數千名學生。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軍人時不時地向逼近警戒線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射擊，將學生和市民擊退驅散，造成一輪又一輪學生和市民的傷亡。

對於這些在天安門廣場週邊地帶堅持不退的市民和學生，我始終心存敬意，他們直接面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不時發射的槍彈，在相當程度上，他們比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更爲勇敢，當然也更具危險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秘書長郭海峰（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帶領十幾名學生和市民，乘坐一輛公共汽車從東長安街返回天安門廣場，在金水橋東側的長安街上，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猛烈槍擊，司機首當其衝，當場中彈死亡，車上另有多人受傷。

在司機中彈遇難之後，這輛公共汽車依靠慣性又掙紮前行了一、兩米，然後才熄火，一動不動地趴在距離開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們只有兩三米遠的地方。學生領袖郭海峰等多人當場被拘捕，有人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暴打。郭海峰遂成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爆發以來第一個被捕的學生領袖。這些開槍掃射公共汽車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隸屬于陸軍第 38 集

團軍。

在拘捕學生領袖郭海峰等人的過程中，現場亮起了一束強烈的燈光，原來是有幾名忠於職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隨軍記者正在拍攝，準備將之作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輝煌“戰績”之一，記錄于軍史。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共當局誣告郭海峰等人企圖駕車燒毀天安門城樓。一時間，中國官方的各種宣傳機器大肆渲染所謂的“郭海峰等人企圖駕車燒毀天安門城樓”事件，以此作爲北京曾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的主要證據之一。

當時的中國官方媒體在有關的報導中聲稱：“高自聯頭頭郭海峰帶領一小撮暴徒，駕著一輛裝滿汽油的汽車，沖向天安門，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

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少將軍銜）對該事件做了任意的想像和發揮，宣稱“一夥人手提汽油瓶，往天安門城樓沖”等等。

在後來召開的中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也特意提到了這一事件，聲稱：“特別惡毒的是，一夥人駕駛一輛裝滿汽油的公共汽車駛向天安門城樓，企圖放火燒毀天安門城樓，在金水橋南被戒嚴部隊及時截獲。”

令人奇怪的是，這麼一起曾經喧鬧於一時的、被稱作“反革命暴動”的惡性事件，不久後即被中共當局和中國官方媒體所遺忘，再也沒有被提及，就連對郭海峰這一夥“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的暴徒”的處理結果也從未公佈。

這個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經過仔細研讀有關郭海峰等人案件的法律檔案，包括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終審裁定書，同時依據該事件一些當事人的相關敘述，特將該事件的詳細經過、有關人員的遭遇，以及最後處理的結果回顧如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二點鐘左右，郭海峰在天安門廣場找到了北京教育學院的學生陳萊和北京體育學院(現爲北京體育大學)的學生姚軍嶺，對他倆說想要去弄點汽油回來。於是，郭海峰、陳萊、姚軍嶺等三個人就在天安門廣場搜集了十

幾個汽水瓶和塑膠瓶，另有兩個塑膠桶，然後一起登上停在天安門廣場的一輛大型公共汽車。當時，李成煥（某外資企業職員）、齊輝（個體戶）、于 X（該公共汽車售票員）和其他一些人已經在車上。

隨後，這輛大型公共汽車從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出去，沿著東長安街行駛到王府井大街南面路口附近，遇到另一輛被民眾當作路障的大型公共汽車，於是停下車來。郭海峰等人下了車，由郭海峰撬開被民眾當作路障的那一輛大型公共汽車的油箱，姚軍嶺找來一根塑膠管，從油箱中抽出汽油，灌入預先準備好的汽水瓶子、塑膠瓶子和塑膠桶中，陳萊則把汽水瓶子、塑膠瓶子和塑膠桶的蓋子一一蓋上。當時，還有其他一些人參與了這個灌取汽油的過程，但因爲事後沒有被抓住，所以沒有被追究責任。就在這時候，朱世生（某批發部經理）也上了這輛大型公共汽車。

裝完汽油之後，郭海峰等人就讓大型公共汽車調頭沿著東長安街向西行駛，準備返回天安門廣場。當大型公共汽車行駛到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附近的時候，正好遇上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抵達金水橋前。按照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起訴書的說法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命令停車，大型公共汽車不但不停車，反而加速向前沖去。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於是就向大型公共汽車開槍掃射，大型公共汽車因熄火而停了下來。（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有意回避了大型公共汽車的駕駛員當場被亂槍打死的事實）車中的乘員一看情形不對，紛紛急忙跳車逃跑。姚軍嶺身爲跨欄運動員，動作非常敏捷靈活，從車窗跳出逃走。而郭海峰、陳萊、朱世生、齊輝、李成煥、于 X 等六個人來不及逃走，則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當場抓獲。

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停止射擊之後，迅速端槍沖上前去，命令大型公共汽車上殘餘的乘員舉起雙手下來，每下來一個人，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都要詢問一聲："幹什麼的？"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學生。"凡是學生都沒有當場挨打，只是先把雙手緊緊捆綁起來，然後再捆綁到金水橋的欄杆上。只有朱世生一個人回答是"商人"，則立即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棒子狠打了一頓。

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四、五點鐘，郭海峰等六個人被轉移到位於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在那裏被關押了三天。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至六月七日的幾天時間裏，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位於天安門城樓西側的中山公園裏關押了數以千計被捕的市民和學生，他們都是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公安警察抓來的。這些關押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裏的市民和學生，整整三天時間幾乎沒有吃到任何東西。當時臨時駐紮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隸屬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血腥清場行動結束之後的天安門廣場，幾乎已經變成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毒打被抓獲的市民和學生的“大刑場”。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一些散兵游勇手持大棒子，看見被抓獲的學生和市民就是一通毒打，有人被活活打死，打成終身殘廢的人更多。因此，當時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裏，負責看守任務的公安警察爲了便於管理，經常威脅被抓來的學生和市民說：“如果你們不老實，就把你們送到天安門廣場去，交給解放軍戒嚴部隊處理。”這種威脅在當時非常有效，因爲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暴行實在令人害怕，用槍托沒頭沒臉地亂砸一氣，是當時常見的打人方式。（參見附錄照片）

相比之下，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對待被捕學生和市民的態度較爲友善，因爲他們親眼目睹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整個過程，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普遍懷有同情和好感，也理解北京各界民眾普遍支持學生的行動，因此，在最初的幾天時間內，他們基本上沒有參與毒打被捕者的行動。

此外，慘痛的歷史教訓也讓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心有餘悸，大多數人覺得必須爲自己預留一條後路，別把事情給做絕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曾經導致一大批中共的高級官員及其家人被捕入獄，許多人在受審或囚禁期間遭受到殘酷的虐待和迫害，他們在平反之後強烈要求嚴懲有關的公安警察，結果是有一批中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安警察，以及秦城監獄的看守人員被追究責任，其中包括多名各級公安部門的主管人員。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史稱“四五運動”）平反之後，北京市的公安系統經歷了一次內部大清洗，當年積極執行鎮壓命令、立功受獎的公安警察都沒有好結果，就連中共北京市委常務委員、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都在劫難逃，自知無法善終，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開槍自殺。

內部大清洗工作由原中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等人主持，從北京市公檢法系統中抓出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整人、打人最兇的十七個典型人物，都是手上沾有“革命老幹部或老幹部家人”血跡的看守人員或審訊人員，對他們進行內部審訊後秘密槍決，力主清算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親自到場監刑。

對這些公檢法人員的處理沒有經過公開的法律程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沒有進行任何公開的宣傳，因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樣的冤情實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責任，那麼將可能動搖中共政權的國家機器的根基，所以鄧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則，一筆帶過。

據說北京市公安系統事後只是對遭到秘密槍決的公安人員的家屬宣佈：“因公殉職。”但是，北京市公安系統的人員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受到相當大的震動，此後他們在審訊和看管政治犯的時候都會仔細考慮一番，這倒是對減少公安系統內的肉刑和體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國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事管制委員會時期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七百九十三名解放軍幹部全部撤離。這次清理是在派駐北京市公安系統的軍代表都已經回到軍隊以後才進行的。其中，那些手上沾有“革命老幹部或老幹部家人”鮮血的軍人，也沒有因此逃出生天。據說軍隊系統也按照與北京市公安系統相同的模式進行內部清理，把一批這種軍人押解到雲南省秘密槍決，而對他們的家屬同樣只說是“因公殉職”。對這些軍人的處理也都沒有經過公開的法律程式。【注釋 78】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開始，關押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裏的被捕學生和市民開始被分批向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稱“K 字樓”）轉移。郭海峰等人也被轉移到“K 字樓”，

因爲是涉及“企圖駕車燒毀天安門城樓”大案的要犯，在“K字樓”關押了兩天或三天后，就被轉移到了秦城監獄，關押在二零區。郭海峰等人由於被中共當局指控爲“企圖焚燒天安門城樓的暴徒”，都被戴上了手銬、腳鐐，負責看守的武警部隊士兵對他們很兇狠，有的人挨了毒打。

一九八九年十月份以後，關押在秦城監獄中的一些被捕者在接受嚴格審查之後，開始被分批釋放。朱世生由於自始至終一口咬定他只是搭便車去天安門廣場看熱鬧，沒有參與任何活動，於是在關押了半年之後獲釋。齊輝和于 X 在一九九零年分別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和兩年。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姚軍嶺雖然在事發之時幸運地跳窗逃脫，但事後被查出曾經參與了灌取汽油的行動，則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份被抓到秦城監獄。郭海峰、姚軍嶺、陳萊、李成煥等四個人，於一九九零年三月份前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以“持械聚眾叛亂”的罪名批准正式逮捕。

當時，繼續關押在秦城監獄中的學生、教師、知識界人士，以及少量的市民、工人，都是屬于重犯、要犯，人數最多的時候估計有兩百多人，其中包括知名人物王丹、王軍濤、陳子明、包遵信、劉曉波、劉剛、陳小平、劉蘇里、吳稼祥、熊焱、任畹町、周舵等人。對這些人的處理大約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審查清楚後釋放；第二類是轉移到北京市各區、縣的公安局或法院處理；第三類是批准正式逮捕。

到了一九九零年的十月份，秦城監獄中餘下了大約二、三十人。大部分人在被批准正式逮捕之前，一般都以“收容審查”的名義被關押了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起訴和審判這些重犯、要犯的時間一再延後，這是因爲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於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九零年十月七日在北京舉行，中共當局不想因爲起訴和審判這些人而影響國際形象。

在北京亞運會結束之後，中共當局判斷國際壓力相對減輕了，起訴和審判的時機成熟了，於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開始對關押在秦城監獄的這些重犯、要犯進行起訴，然後交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郭海峰、姚軍嶺、陳萊、李成煥等四個人的第一份起訴書，

大約是在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底收到的，是以“持械聚眾叛亂”的罪名予以起訴。其中認定的所謂“犯罪事實”有如下幾條：郭海峰“撬開了油箱”，姚軍嶺“灌了汽油”，陳萊“爲汽油瓶蓋上蓋子”，李成煥則是在大客車的行駛過程中“用木棒敲打車廂，爲車子開道”。

在第一份起訴書中，檢察官有意將汽油瓶稱之爲“燃燒瓶”，指控郭海峰等人製造“燃燒瓶”的目的是“企圖燒毀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並具體指控說：“在大客車駛近天安門廣場的時候，郭海峰、陳萊拿起燃燒瓶，企圖燒毀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

按照中國《刑法》的規定，凡是觸犯“持械聚眾叛亂”的罪名者，“要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首要分子要判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這一份起訴書中有一個明顯的漏洞：郭海峰等人當時所搭乘的大型公共汽車在長安街上從東往西靠路北行駛，與天安門廣場隔著七、八十米寬的長安街，他們怎麼可能在車中把所謂的“燃燒瓶”投擲向“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

在郭海峰等人收到第一份起訴書後大約一個星期，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的預審員又來到秦城監獄，告訴郭海峰等人說：“上面有新的政策，對學生要從寬處理，因此收回第一份起訴書。”第二天，郭海峰等人又收到一份新的起訴書。

這份新的起訴書對郭海峰等人改以“反革命破壞”的罪名起訴，這個罪名比第一份起訴書所指控的“持械聚眾叛亂罪”要輕一些。按照中國《刑法》的規定，“反革命破壞罪”的量刑沒有下限。量刑沒有下限，也就意味著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上級的旨意或政治需要隨意從輕判處。

第二份起訴書中所認定的“犯罪事實”與第一份起訴書基本相同，但刪去了原先所提到的一個具體情節：“郭海峰、陳萊拿起燃燒瓶，企圖燒毀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

審理郭海峰等人案件的法庭，大約是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底開庭的。開庭之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曾經特地關照郭海峰等人在審判期間要“態度好一點”，爭取從寬處

理。郭海峰沒有理會這個“關照”，不僅在法庭上爲自己作了長達四個小時的無罪辯護發言，而且與擔任公訴人的檢察官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姚軍嶺同樣也爲自己做了長時間的無罪辯護發言。休庭之後，審判人員很不滿地對郭海峰、姚軍嶺說：“就你們的這種態度，還能從寬處理？！”郭海峰、姚軍嶺對此則一笑置之。

實際上，根據中共當局“對學生要從寬處理”的旨意，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郭海峰等人的判決結果早在開庭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審判人員只是配合劇本演出的木偶而已，根本無權決定什麼。最後的判決結果是：郭海峰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姚軍嶺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陳萊、李成煥被判處免於刑事處分。

對關押在秦城監獄中涉及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學生、教師和知識界人士的宣判，先後分爲三批進行。在最後一批宣判結束之後，秦城監獄中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政治犯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進行了一次集體絕食行動，以抗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審判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政治犯一事進行歪曲報導，爲首進行集體絕食行動的劉剛（北京大學物理系一九八五級研究生、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兼職人員、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創始人）、郭海峰、戴熾義（北京經濟學院畢業生）等人，被從條件較好的政治犯監室轉到普通刑事犯監室，以示懲戒。

隨後不久，劉剛等人被轉送到遼寧省遼源市的勞改工廠服刑，郭海峰被轉送到河北省開封市服刑，姚軍嶺在秦城監獄服完最後大半年的刑期，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獲釋，陳萊、李成煥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宣判之日獲釋。

綜上所述可見，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終審裁定書，都是將郭海峰等人所涉及的這一事件認定爲“企圖燒毀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而與天安門城樓毫無關係。事實證明，所謂的郭海峰等人“企圖駕車焚燒天安門城樓”事件純屬子虛烏有，是中共當局爲了證明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而編造的又一個謊言。【注釋 79】

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行動前後，許多北京市民和學生象

郭海峰等人一樣，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公安警察的拘捕。這些被捕者非常不幸，幾乎沒有人逃得過毒打，其中有人被活活打死，不少人被打成終身殘廢。

由於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將反抗血腥鎮壓行動的學生和市民定性為“反革命暴徒”，將和平請願的民主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因此對學生和市民充滿仇恨，虐待被捕者的手段多樣化，也很殘酷，例如用點燃的煙頭在被捕者的前胸後背燙上大大的“暴徒”字樣。

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高新回憶在公安看守所中的親身經歷時說，有一個年輕的“暴徒”實在忍受不了殘酷的折磨，竟然跪下來苦苦哀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大爺呀，你就把我當個屁給放了吧！”

山西大學電腦系的學生高旭，就是眾多被捕者中的一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五點三十分過後，高旭本來已經隨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有一個同學遺留了照相機，他於是自告奮勇返回去取，結果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拘捕。

高旭連同其他被拘捕的八個人，全都被緊緊地捆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他們，用點燃的煙頭燙他們，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的時候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再打。

殘酷的摧殘，使得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振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藥度日。【注釋 80】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集結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奉命派出一支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北端，對天安門廣場邊沿地區進行掃蕩，為最後的清場行動，為驅除數千名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做好預先的準備工作。

這支特種部隊小分隊在進入天安門廣場之後，時斷時續地開槍射擊，射殺和驅趕在天安門廣場北端邊沿地帶堅守不走的學生和市民。

此外，陸軍第 65 集團軍指揮部也奉命派出一支突擊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北端，承擔爲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掃清週邊的任務，擔任突擊隊指揮官的是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第 2 營營長劉閣雲少校。事後，劉閣雲被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中國官方有關的宣傳資料在談到劉閣雲立功受獎的“英雄模範事蹟”時，有這麼一段記載：“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清場，他主動要求擔任突擊隊隊長，帶領部隊第一個搜索天安門廣場的地下通道，繳獲兩支被毀壞的衝鋒槍。”【注釋 81】

當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突擊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北端的時候，還有一些學生和市民仍然躲避在天安門城樓與天安門廣場之間橫穿長安街的地下人行通道裏，此時無處可逃，全部都被抓走，關押在勞動人民文化宮。

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的帳篷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北角，首當其衝。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及其廣播站，原先駐紮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處，當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事件發生之後，工人弟兄們出於保護集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學生隊伍的考慮，特意將總部及其廣播站遷移到天安門廣場西北角，這裏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從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必經之地。

此時，在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的所在地，工人弟兄們遭到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的血腥掃蕩。只見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的帳篷起火，逐漸蔓延爲沖天火焰。據一位倖免于難的工人弟兄回來報告說，大約有三十余名工人弟兄在那一帶遇難。

一位倖免於難的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的工人弟兄手提一隻黑色小箱子，匆匆地來到紀念碑底座下。這位工人弟兄想登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聯絡，但因爲身分不明而遭到學生糾察隊的攔阻。他著急地大聲呼喊：“我是北京工自聯的，我帶著重要的東西，快讓我上去見學生領袖！”

我聞聲連忙下去，經過詢問，得知黑色小箱子內裝著一部

軍用發報機和一冊密碼本，不知是誰先前從解放軍戒嚴部隊那裏繳獲的。在攔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民眾中，有爲數不少的解放軍退伍軍人和轉業軍人，甚至還有身穿便裝的解放軍駐北京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知道通訊聯絡在部隊開進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往往帶領或指點民眾重點攔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通信車和身背電臺的通信兵。

這位工人弟兄想將黑色小箱子交由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代爲保管。我告訴他，就目前情形來看，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也岌岌可危，並非安全之地，最後的結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你還是帶著小箱子離開天安門廣場，好自爲之吧。聽了我的這一番話，他沉默許久，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與我緊而有力地握了握手，所有的理解和情感全已融入這短暫的一握之中了。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汽水瓶子和棍棒而已，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手中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

那一晚，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有一支爲數三十來人的工人糾察隊與我們協同執行維護秩序的任務。當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打響血腥鎮壓的槍聲之後，這些工人糾察隊員們隨即一批批地奔赴最危險、最前線的西長安街一帶。

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泣不成聲地說，他是工人糾察隊中唯一的生存者，與他同行的工人弟兄們都英勇地犧牲了……。此時，這支工人糾察隊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僅存的兩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舊軍大衣，情緒極爲衝動地就要跟著這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衝向西長安街一帶。

她倆那麼年輕，又是女性，由她倆去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讓人覺得太過殘忍，實在令人無法接受。我和在場的幾位特別糾察隊隊員流著淚苦苦地勸阻她倆，堅決不放她倆前行："求求你們倆，別去了！千萬別去了！我們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倆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同行的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呀……"最終，她倆還是隨著那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

我終身不會忘記這兩位女青年，不會忘記那些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爲了爭取民主與自由而英勇獻身的工人弟兄們。在面臨生死考驗的時候，他們的勇敢程度遠遠超過了知識分子，充分表現了人性的高貴。我一直認爲，北京各界民眾的同情心、正義感和捨生取義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之一。

在天安門廣場北端正中央升國旗的地方，一些學生和市民堅持不撤，最終遭到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的軍人開槍射殺。一名姓劉的北京工人作爲見證人，敘述了當時的親身經歷：

"我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旗桿（位於天安門廣場北端正中央的國旗桿----作者注）下面，當時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還有幾千人吧，不少人呢。六四淩晨兩點來鐘，軍人端著槍趕過來了，來了就朝我們這裡'噠噠噠'的一陣掃射，當時有很多學生倒下了。我聽到槍聲當時就趴在地上，我的前面正好有一個垃圾桶，我就躲在垃圾桶後面，沒敢站起來。我看到有的學生還站起來喊口號，好象他們不相信解放軍會開槍，結果一梭子子彈就打來，喊口號的學生倒地不起。

我一看共產黨動真格的了，死人了，就連滾帶爬的往歷史博物館方向逃，爬出天安門廣場，爬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躺在地下，然後我從歷史博物館邊上的一個小胡同逃回家，褲子上、身上都是鮮血！"【注釋 82】

在天安門廣場北端中央地帶的"民主女神"塑像周圍，當時仍然聚集著一批學生，大約有數十人。"民主女神"塑像自從豎立之日始，就儼然成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重要象徵

物。這批以外地赴京學生爲主幹的學生隊伍，發誓要與“民主女神”塑像同生死、共存亡，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殺到之後，他們依然堅持不撤，在對峙一陣之後，終於遭到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軍人的血腥殺戮。時間大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二十分。

這支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種部隊（偵察兵）小分隊的軍人，異常兇狠，因爲他們都是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對越作戰的偵察兵，曾經在戰場上玩過命，殺過人。一九八六年九月，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偵察部隊奉命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戰地番號是第十二偵察大隊。第十二偵察大隊由陸軍第 38 集團軍直屬偵察營、步兵第 112 師直屬偵察連、步兵第 113 師直屬偵察連和步兵第 114 師直屬偵察連所組成，在老山戰區參戰十五個月，是當時解放軍部隊中參戰時間最長的一支偵察大隊。

我在接觸過很多相關的資料後得知，凡是曾經奉命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戰的解放軍部隊軍人，都早已經在對越作戰中殺紅了眼，視人命爲草芥。尤其是在戰場上立了戰功或負了傷的解放軍軍人，在雲南省各地，包括省會昆明市，橫行霸道，就連執法的公安武警都不敢招惹他們，因爲他們誰都敢打，什麼機構都敢砸。許多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過戰的解放軍軍人連自己都不得不承認，剛從對越戰場下來的時候，個個都像土匪，一切都沒有規矩。

當年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還發生了陸軍第 67 集團軍的一名士兵用衝鋒槍掃射集團軍領導人的惡性事件，造成多人死傷。集團軍軍長張志堅少將在該事件中中彈受傷，集團軍參謀長粟戎生少將(解放軍大將粟裕的兒子)幸虧及時地鑽到桌子底下，才躲過了一劫。

經過陸軍第 38 集團軍特別（偵察兵）小分隊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突擊隊的持續掃蕩，除了紀念碑底座一帶之外，在天安門廣場北部邊沿地帶，再也難以見到學生和市民的身影。紀念碑底座已經成爲狂風巨浪中的一座孤島，失去了所有的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槍口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不得不放棄了原先的所在地——位於紀念碑底座下東北側的學生絕食團廣播站，

撤至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南角的學運之聲廣播站。

據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事後介紹說，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撤離學生絕食團廣播站之前，他已經前往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西南角，在那裏秘密籌建新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在我身後距離不及兩米的絕食棚內，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尚未宣佈放棄絕食請願行動。爲了表示對他們的敬意，特別糾察隊員們聯名寫了一張短箋遞進去，表示只要還有一名特別糾察隊員活著，就絕不放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或公安武警進入絕食棚。對此，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深受感動，隨即由劉曉波以四個人的名義寫了一張答復的條子，表示要與特別糾察隊員們共存亡，只要還有一位學生未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就會堅持不走。

劉曉波等人的這張條子經過宣讀後，贏得一片熱烈的掌聲。我還趁機把綁在頭上的紅布條遞進去，讓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簽名，留作歷史性的紀念物。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開始，天安門廣場上血腥鎮壓的氣氛越來越濃，四周不遠處，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端槍蠢蠢欲動，不時地發出一陣陣吼叫聲，時而有子彈從空中呼嘯而過。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靜靜地端坐著，等待著最後時刻的來臨，除了犧牲就義的感覺之外，幾乎不可能再有別的思維。

柴玲等學生領袖們還在做最後的努力，通過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廣播，不斷地向四周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發出呼籲："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爲了祖國的民主和自由，爲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請你們不要將槍口對準人民，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行動……""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與人民爲敵，不要向人民開槍！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爲人民請願……"。

學生們在做和平抗爭到底的準備，一些學生，看樣子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指派的人員，開始忙碌起來，爲了應付催淚瓦斯彈，他們不知從哪里弄來大批口罩，兩人一組抬著大袋子在學生隊伍中挨個分發。另有一位學生送來一桶水，讓

大家將手中的口罩、毛巾放進水桶中浸透，以備防護催淚瓦斯彈。直到此時，大家似乎仍然抱有一絲幻想：在最後的清場行動中，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或許只動用棍棒和催淚瓦斯彈，而不是動用真槍實彈。因爲靜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幾乎已是清一色的學生，他們是和平請願者，手無寸鐵。

我沒有動手去拿口罩，因爲心裏很明白，在目前的局面下口罩根本派不上用場。印象中，身旁的劉蘇里也沒有動手去拿口罩。儒家經典《論語》一書中有一句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是死是活隨它去了，聽天由命吧。

另有一些學生在四處搜集棉被、棉大衣，說是用來鋪在紀念碑底座週邊的空地上，以阻止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裝甲車和坦克前進。據這些學生說，裝甲車和坦克的履帶一旦遇上軟綿綿的棉被、棉大衣，就會原地打轉，無法前進。不知道這是誰的發明創造，也不知道這種方法是否靈驗。

六月四日淩晨兩點十分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十分左右，陸續又有大批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沿著東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側，伴隨著大批的裝甲車、軍用卡車。與此同時，又有不絕於耳的槍聲響起。

槍聲經久不息，滯留此地的民眾本能地逃散，又有一些人中彈受傷，倒地不起。槍聲稍歇，馬上有民眾勇敢地沖上前去搶救，迅速將受傷者運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二十二分，香港《星島日報》女記者蔡淑芳親眼目睹了一個血流滿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這位中彈受傷的同學血流如注，醫護人員經過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後，馬上就把他抬上救護車，送離天安門廣場。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九屆應屆畢業生、女學生程真，也在天安門廣場北端親眼目睹了一個學生中彈倒下。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程真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的時候敍述了當年她所見到的情景：

“在我前面差不多有十幾米遠的地方，就有一小夥子，我估計他是糾察隊的成員，係著紅布條的都是糾察隊的成員。他就在地下拿了一個瓶子，就想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扔過去；他是特別憤怒，因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端著槍就在開槍了。他就剛要扔，我就在他後面，就看著他一下子就倒下來，就滾在地下。

當時還有點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但是知道對他不利，就趕緊跑過去，大家有幾個人就跑過去了，跑到那邊兒一看，他眼睛都在發白。

那麼一看，他是前面中彈的，後面有一個大洞，一直在流血。一開始還不知道是後面在流血，但知道他前面中彈了，就把他抬起來。我抬著他頭，另外幾個男生抬著他的手和腳，想把他送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中心去救護。

我一邊走一邊腳上都是血，你想我走的時候腳步邁得快嘛，就剛好流到自己褲子上了。我一看就說，哎喲！這不行，他根本不是前面在流血，是下面在流血，所以再趕緊把他翻過

來。很多人拿一大堆紗布，就這樣其實是把傷口塞住了。

我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樣救護，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受過這種訓練，就硬是用布條把傷口勒住了，綁住了，希望他不再那麼快地流血。

然後就把他的身子再翻過來了，再看那孩子眼睛都白了，臉整個都白了。然後我當時的感覺就是手腳都木在那兒了，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看到他那個樣子，甚至我都不敢看，都不會哭。我就站在那兒了。

然後當時有幾個小夥子，手腳比較快的，就把他拉走了，趕緊送到急救中心。但是他後來怎麼樣，我真的不知道。

後來我就木了，站在那兒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這個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還在往我們這邊開槍，就在我們一邊抬人的時候，還向我們開槍。所以後來有人拉我一把，看我好像沒有反應了，就又拉我一把，把我拉到（天安門）廣場中心去了。”

（以上是根據錄音採訪的文字記錄）

沿著東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和軍用卡車越來越多，給人以源源不斷的感覺。

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三十分左右，又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一隊一隊地往中國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槍械，跑到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匯合，然後一排一排地坐下來待命。集中在此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分別隸屬于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和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三十分左右，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發表廣播講話：“同學們，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勇氣和策略堅持到最後！此時，如果我們搞一些武力抵抗，勢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鎮壓的口實，那麼，他們就可以欺騙世界，而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堅持和平請願，也許也要犧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會徹底看穿這個政府的真實面目！”

緊接著，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也先後發表廣播講話，輪番呼籲學生們要堅持非暴力原則，千萬不要以暴易暴。

周舵極力呼籲學生們在最後時刻一定要堅持採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塊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不要做無謂的暴力抵抗。

侯德健在痛斥中共當局是“無人性、無理性、瘋狗似的反動政府”的同時，也呼籲學生們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能被指稱爲武器的東西，千萬要克制。

劉曉波強調指出，現在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人，是中華民族最有才華、最有希望的一代，決不能再做無謂的犧牲，一定要堅持非暴力的抵抗方式。

突然間，一名特別糾察隊隊員急匆匆跑來告訴我：“吳老師，不好了，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南側出現了一挺機槍，是由幾位工人弟兄架設的。”我聞訊大吃一驚，急忙帶領幾名特別糾察隊隊員趕過去。侯德健、劉曉波、周舵等人也已經聞訊趕到。

只見一挺機槍架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的漢白玉護欄上，槍身上覆蓋著一床棉被，槍口朝西，對準人民大會堂方向。幾位年輕的工人弟兄在旁邊嚴密監視著，他們手持鋼管，不時地用鋼管敲打槍身，警告誰都不許靠近，否則他們將以鋼管自衛。

見我們一群人走過去，那幾位工人弟兄即刻戒備起來，虎視眈眈的。他們都來自于屠殺現場，親眼目睹了父老鄉親、兄弟姐妹被殺的情景。此時，他們兩眼通紅，滿面怒容，除了一心一意要報仇，什麼也不顧了。

正當我們猶豫不決之時，侯德健已經搶先一步，上前緊緊抱住了其中一位年約二十歲的小青年，自我介紹說：“我是侯德健。”也許是由於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幫工人弟兄並未動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剛剛張口喊了一聲“侯哥”，便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他哭泣著訴說，他們是一群最早、也最堅決支持學生運動的人，爲了阻擋軍車，保護學生，他們的許多夥伴都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槍殺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體鱗傷。

大家聞言都忍不住落淚。侯德健一邊安慰一邊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

其他的工人弟兄也紛紛開始痛哭，一邊憤怒控訴解放軍戒

嚴部隊的軍人如何兇殘，“他們全都是野獸，根本不是人！”一邊講述他們如何看著身邊的夥伴一個個平白無故地給槍彈打得滿身窟窿，“夥伴們死的死，傷的傷，回去怎麼向他們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跟那幫畜生拼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我和留在原地的劉曉波、周舵等人繼續說服其他的工人弟兄交出機槍。大家一再向工人弟兄們宣講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強調面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暴力反抗不僅保護不了數以千計的靜坐請願學生，反而會遭到更血腥的殺戮。暴力反抗不僅是無謂的犧牲，而且也有損于整個民主運動的聲譽，使這場持續已久的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爲宗旨的民主運動毀於一旦。

劉曉波本來口才就不怎麼好，說話還有些結巴，此時乾脆連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勸說過程中，劉曉波無意間提到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都是寶貴財富，說我們大家都應該替這些大學生的生命安全負責。這些工人弟兄一聽這話就火了，忍不住又大聲吼叫起來：“難道只有你們這些大學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我們爲了誰？還不是爲了保護你們這些人？我們本來在家呆著好好的，爲什麼要往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槍口上撞？你們呆在這裏倒是沒事，可我們的人死了那麼多，難道就白死了不成？”

工人弟兄的這段話不無道理，說的也是事實，因此頗具震撼力，在場的人們久久無法回應，陷於沉默之中。

我流著淚對一位工人弟兄說：“我是大學教師，我真誠地感激你們，你們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付出了極大的流血犧牲的代價。在感情上，我完全理解你們的舉動，如果現在是人手一槍，我也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帶領我的學生們沖上前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拼命，爲死難的父老兄弟復仇。可是，我們僅有這麼幾支槍呀！……”

我說的完全是真心話。天安門廣場無險可守，手頭又沒有足夠的武器彈藥，在這種情況下，武力反抗無疑是以卵擊石，必死無疑，死後還得被抹黑爲“暴徒”。與其這樣，倒不如靜坐等死，以弱者的姿態被殺戮。同樣是死，後者的死法，至少

可以在道義上贏得廣泛的同情，屠殺者將付出相應的代價。

我很痛悔學生組織當初主動交回去那麼多槍支彈藥，而今善良的人們全成了惡狼爪牙下哀哀待斃的羔羊，只能坐以待斃，沒有任何別的選擇。

周舵走到一個年紀看上去還不到二十歲的小夥子面前，此時兩個人都已經淚流滿面。周舵再三規勸小夥子要冷靜，千萬要保重自己。那小夥子哽噎著告訴周舵，他今年十九歲，是個體戶。他還說，他家裏有父母親，另有一個姐姐。周舵順勢勸說他，死了的人沒法再活過來，你就是去死也救不活他們了。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親還有姐姐將會多麼難過？我們又怎麼向你的父母親交代？千萬千萬別衝動，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吧。

經過再三勸說，我們終於得到了這幫工人弟兄們的諒解和合作，拿到了這一挺機槍。這是一挺從裝甲車上拆卸下來的機槍，也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動交來了一支步槍，沒有子彈，原先被藏在附近的一頂帳篷裏。

我們重新回到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北面，召集了尚留在紀念碑底座上的幾位中外記者，當著他們的面，由劉曉波將槍支在紀念碑底座的漢白玉護欄上砸毀了。一位外國記者用攝像機錄下了毀槍行動的整個過程。【注釋 83】

毀槍行動，再次重申了我們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莊嚴而有力地宣告，我們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即使面對殘酷的血腥鎮壓，面對死亡的威脅，我們仍然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仍然堅持和平請願的方式，既無抵抗之心，也無抵抗之力。我們寧願以自己的流血犧牲作爲代價，也要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根據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有關資料記載，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過程中，陸軍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擔任突擊隊的官兵，在天安門城樓與天安門廣場之間橫跨長安街的地下人行通道中找到了兩支已經被毀壞的槍支。陸軍第 65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擔任“尖刀營”的官兵，也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找到兩支已經被毀壞的槍支。

所有的槍支，不管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有意或無意遺失的，還是被民眾所繳獲的，全都遭到了學生和民眾的毀壞，

充分證明了學生和民眾和平抗爭的意願。

在此之前，曾經有幾名自稱是北京市民敢死隊成員的年青人，攜帶著幾支衝鋒槍來到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西北角，說是要在這裏堅守到底，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作最後的殊死抗爭。他們不聽學生們應當堅持和平抗爭的勸說，說是反正已經不打算活了，與那些見人就殺的畜生拼了，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面對學生們的反復勸說，他們怒吼著回應："你們不使用暴力，當兵的可不管你這一套！你不殺他們，他們照樣要殺你！"

後來，劉曉波、周舵、高新等三位絕食請願的知識份子聞訊趕來，和學生們一起耐心勸說，幾乎把好話說盡，總算是把他們請走了。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就是不肯交出手中的槍支，最後罵罵咧咧地帶著槍支離開了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臨走之前，其中有人還擱下了一句話："你們不抵抗，坐在這裏等死，到時候死了，都沒有地方可以後悔！"又有人一邊怒視著尚未宣佈停止絕食請願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一邊大聲吼道："好吧，你們這些軟骨頭！我們走！我們爲了誰？還不是爲了你們？有你們後悔的時候。"

說心裏話，我十分敬佩這些決心以死抗爭的年輕人，也不認爲他們的想法和行動有什麼不對。軍人血腥鎮壓在先，民眾反抗於後，軍人血腥鎮壓是因，民眾反抗是果。包括這些決心以死抗爭的年輕人在內，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他們是真正的勇士，就勇氣而言，讀書人無法與他們相比，真正不怕死的讀書人有幾個？我是讀書人，當然也無法與他們相比，雖然我做好了思想準備，要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們一起面對最後的結局。

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但只要一想到這些決心以死抗爭的年輕人，一想到當年在復興門立交橋、木樨地、西單路口、南池子、珠市口、前門等地方浴血奮戰的男女老少們，我還是感到自愧不如。

接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的時候，赴京聲援的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生林耀強，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黎洪等幾位香港學生，結伴來到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帳篷，與學生領袖柴玲、

李錄、封從德、馬少方、梁擎暾等人會面，頗有最後告別的意味。他們與柴玲等學生領袖們一一緊緊地握手、擁抱，現場彌漫著生離死別的氣氛。

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再三懇請林耀強趕快帶領香港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爭取安全地回到香港，好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屠殺北京市民和學生的真相告訴全天下的人。

林耀強卻堅決地表示，他雖然是香港學生，但也是中國人，跟你們一樣，在這個時候決不能離開天安門廣場。就這樣，林耀強與黎洪等香港學生最終留了下來，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數千名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一刻。

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左右，在絕食棚內，劉曉波等四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就當前的局勢繼續著緊張的討論，尋求對策。在座的還有劉蘇里等幾位北京高校青年教師。自從西長安街上發生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學生和市民的事件以來，他們就一直在關注著局勢的最新發展，並進行有針對性的討論。在座者始終爲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數以千計的年輕學生的生命安危而擔憂。隨著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對天安門廣場包圍圈的縮小，以及學生和市民傷亡人數的急劇增加，大家逐漸達成一個共識，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屠殺行動，不能再對結局抱任何美好的幻想了，血已流得夠多的了，應當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更多的流血。

於是，周舵在獲得高新的全力支持後提出了一個建議：應該動員柴玲、李錄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以此避開解放軍戒嚴部隊血腥鎮壓行動的鋒芒。

在周舵向侯德健和劉曉波徵求意見的時候，劉曉波當即明確表示反對，認爲局勢發展至此，該犧牲的已經犧牲，現在別無選擇和退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槍口下不能退縮，退縮就意味著背叛，對不起那些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而已經流血犧牲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

我當時非常讚賞劉曉波的看法。從道義上講，我們不能在北京市民已經付出慘重代價的情況下自己卻全身而退，他們之所以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難道不就是爲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我們嗎？此外，兩軍相逢勇者勝，面對暴政，我們可以喪失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但是，我們決不能喪失抗爭的勇氣。中共當局之所以能在中國大陸獨裁統治達四十年之久，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在面對暴政的時候普遍缺乏一種抗爭的勇氣。我們應該以自身的流血犧牲去喚醒更多人的勇氣和覺醒，雖然因爲抗爭我們可能會喪失生命，但是，我們英勇抗爭的浩氣將與世長存，激勵著後來者，當年慨然赴義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不是至今仍然激勵著

許多後來者嗎？！【注釋 84】生命自然應該尊重，但不能因此否定或放棄反抗，否則還談什麼反抗暴政？

然而，侯德健很快就表示同意高新和周舵所提的建議，劉曉波孤掌難鳴，在周舵、高新、侯德健三個人的反復勸說下，劉曉波放棄了原先死守到底的意見，同意一起去說服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緊接著，周舵提出了有關撤退的具體方案：第一，首先說服學生領袖，由柴玲和李祿負責指揮學生撤退。第二，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天安門廣場上的全體人員放下手裏的一切“武器”，準備撤離。第三，從絕食請願的四個知識分子中派出兩個代表去尋找解放軍戒嚴部隊談判。要求解放軍戒嚴部隊予以配合，給學生隊伍留出撤退通道。

但是，周舵等人一時之間還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方法。就在這個時候，北京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帶來了一個建議，說是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們的陪同下，搭乘救護車出天安門廣場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以爭取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許諾，留出安全的通道和一定的時間，讓數千名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

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這兩名醫生不像是尋常人。受當時危急形勢的影響，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無不處於情緒化的狀態中，幾乎無法正常而冷靜地思維。可是，這兩名醫生卻神態自如，出奇地鎮定和冷靜。在以後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接觸過程中，這兩位醫生的表現依然如故，與眾人的緊張慌亂形成鮮明的對比。

周舵後來在回憶中談到了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接觸談判這件事情，他透露說，他之所以提出由學生領袖柴玲、李錄等人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建議，是因爲受到學生領袖邵江的影響，是邵江建議他出面動員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周舵在一次與解放軍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交談中談到了當時的具體情形，羅點點作了如下的記錄：

“北大學生邵江再一次闖進絕食者的帳篷，他蹲在周舵的床前，用緊張得發抖的聲音，把軍隊開槍殺人的恐怖情景描述

了一番，他說他出去轉了一圈，親眼看見了那些血淋淋的場面。然後他帶著哭聲，懇求這四個人（指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作者注）想想辦法，勸同學們能及時撤退。

‘現在只有你們幾位老師能夠救大家了。柴玲他們說話沒人聽，別的人就更不行了。無論如何，也請你們把同學們帶出去吧！總得試試呀！我倒沒什麼，可這麼多人就這樣坐著等死嗎？當兵的殺人已經殺紅了眼，見人就開槍，根本不管你抵抗不抵抗。快想想辦法吧，周老師……’

周舵看看表，已經快（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半了，事不宜遲，要撤就得馬上！然而，這做得到嗎？赤手空拳去和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肉搏，大家都死在這裏顯然是愚蠢和毫無意義的，這一點用不著爭論。可是，學生們能夠聽從勸告嗎？已經說了那麼多豪言壯語，現在怎樣轉彎子？軍隊和政府的態度又如何？再說怎麼撤法？如何組織？如何佈置和實施？太難了，幾乎不可能做到。

周舵先徵求高新的意見，高新同意撤。這時旁邊馬上有人反對：北京市民爲了保護學生，堵軍車，流血犧牲，死了那麼多的人，我們就這樣撤了，怎麼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麼喚起民眾？侯德健也同意撤，周舵又找到劉曉波，劉曉波一開始不同意，侯德健、高新、周舵一起力陳撤退理由，終於說服了劉曉波。”【注釋 85】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邵江向筆者證實了當年的確是他向周舵提出請求，懇請他和侯德健等人出面說服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他並證實以上周舵所敍述的情況大致屬實，只是細節上有些許差異。

邵江向筆者介紹了當年的情況：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鎭壓之後，他曾經兩次離開天安門廣場，趕赴軍民對峙最嚴重、民眾傷亡最慘烈的西長安街屠殺現場觀察情況，親眼目睹了許多市民和學生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殺的慘狀，感到非常震驚。他與許多自告奮勇的民眾一樣，投入了救護受傷者的工作，身穿的寫有“北京大學”字樣的 T 恤沾上了遇難者的鮮血和腦漿（邵江請人保留著這件 T

恤）。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和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左右，邵江曾經兩次返回天安門廣場向周舵彙報在西長安街上所看到的屠殺情況。

邵江當時的感覺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殺人都已經殺得瘋狂了，已經毫無理性可言，學生們再怎麼和平理性也沒有什麼作用了。爲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犧牲，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說服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是，他知道憑一己之力已經無法說服柴玲等學生領袖，只能寄希望于周舵等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

邵江透露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左右，他第二次從西長安街屠殺現場回到天安門廣場，首先是來到位於紀念碑底座下東北部的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帳篷（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設在這裏），找到柴玲，建議柴玲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更大的流血犧牲。但是，柴玲不接受他的建議，表示不能撤離。

當時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都不在場（封從德已經到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籌建新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以防不測。----作者注），在場的只有幾位年輕的市民，都是從各個屠殺現場回來的，情緒十分激動，柴玲由於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情緒也已經失控。

邵江感覺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說服柴玲，於是轉而去尋找周舵等青年知識份子的支持和幫助。

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鎮靜，方寸已亂。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密集的槍口下，平常喜歡給學生獻計獻策的各界知名人士早已不見蹤影，學生領袖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柴玲再次通過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的廣播發出呼籲，聲稱：最後關頭已到，願意走的同學，現在可以離開天安門廣場，不願意走的，和我一起留下來，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

如前所述，柴玲的這種講話頗具危險性，一旦引發學生隊伍的分裂，就會導致混亂，而混亂很可能導致更多人的死亡。在此之前，也曾有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前來徵求我的意見，是否可以考慮將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隊伍撤走，被我斷然否決。

我之所以予以斷然否決，除了道義考慮之外，理由就是怕在緊張已極的形勢下帶領部分學生撤離，將導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隊伍的分裂和混亂。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鐘過後，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進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帳篷，準備與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商議主動帶領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事宜。因爲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靜坐請願的主體是學生，天安門廣場的控制權也掌握在學生手裏，沒有學生領袖們的參與，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就沒有代表性，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劉曉波、侯德健等人迫不及待地向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全盤托出了他們有關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建議，及其理由和具體設想，希望得到學生領袖們的認同並參與。

然而，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們並不採納劉曉波、侯德健等人所提出的主動帶領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建議，拒絕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輕易地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有違學生運動的初衷，等於將先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的吶喊，以及三千名學生絕食請願的成果，在轉眼之間全部都付諸流水了，這樣做，對不起已經流血犧牲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尤其是對不起那些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學生，而流血犧牲的北京市民；二是即使現在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也還存在著秋後算帳的問題。歷史經驗已經多次證明中共當權者並不是寬容大量之輩，與其以後束手待斃遭受秋後算帳，倒不如現在堅持到底，放手一搏。

甚至有學生插話說，趙紫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已經遭到軟禁）、閻明複（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他們已托人轉告，只要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堅持到天亮，事情就會有轉機。這種說法當即遭到劉曉波等人的反駁，認爲決不能因爲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言，而拿數以千計的學生的生命開玩笑。

劉曉波等人同時強調指出，不管是否存在著秋後算帳的問題，我們現在都應該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不能再做無謂的流血犧牲了。侯德健說，如果說存在著秋後算帳的問題，那我們這些長鬍子的人首當其衝，就憑我這張人人都熟悉的臉，怎麼

也跑不了。

侯德健有關秋後算帳的說法似是而非。他的“這張人人都熟悉的臉”，事後想躲過中共當局的追捕的確不容易；但他的“這張人人都熟悉的臉”在面臨秋後算帳的時候，卻倒是一個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的大審判行動中，知識界人士和學生領袖們所受的刑罰相對而言都比較輕，至少比預先所估計的要輕很多，這顯然與知名度、與強大的國際壓力有關。

知識界人士中判刑最重的是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負責人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兩個人被作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都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在中國公安部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中，判刑最重的是名列第三的劉剛，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周舵、高新等三位參與絕食請願的知識份子在關押一年半多的時間後獲釋，三個人都是免於刑事處分，沒有被判刑。

侯德健的情況於眾不同，由於他是來自於臺灣的著名作詞作曲家，而且是違背臺灣當時的法律規定偷跑到中國大陸，並定居北京，從而成爲中共當局大肆宣傳的高級統戰對象，受到各種優待，背景特殊，知名度很高，因此，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經歷頗具戲劇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侯德健躺在擔架上，蒙著頭，被好心的志願醫務人員抬離天安門廣場，先是住進一個外國記者的公寓，六月六日躲進了澳大利亞駐中國大使館避難，後來在中國官方不斷動員和予以某種承諾的情況下出來自首，被軟禁在家。

後來公安人員欺騙侯德健說，已經爲他安排妥合法返回臺灣的途徑。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六日，四位公安人員押送侯德健搭乘解放軍軍方的聯航飛機到達福建省的省會福州市。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早上六點鐘，侯德健搭乘公安邊防武警部隊的巡邏艇出海，在海上他被扔到了一艘臺灣漁船上，被迫以偷渡的方式返回臺灣。

事到臨頭，侯德健才發現自己被公安人員欺騙了，原來臺灣方面對他這個返回臺灣的安排完全不知情，他不是合法返

台，而是偷渡回台。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日早上八點鐘左右，侯德健從臺灣宜蘭縣蘇澳鎮的南方澳漁港（臺灣的三大漁港之一）上岸，中午十一點三十分左右回到位於臺北市木柵的家中，傍晚七點鐘左右向司法機關自首，午夜時分到調查局接受調查。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點三十分，臺北市地方檢察官向侯德健宣佈了“責付”（類似於中國大陸的“取保候審”）的處理決定，然後由其母親領回家，隨傳隨到。

侯德健先前違反臺灣的有關法律規定跑到中國大陸，並定居北京，被中共當局以高級統戰對象的身份捧爲貴賓，臺灣官方因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記了他一筆帳。

本來侯德健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已經在臺灣挽回“政治影響”，受到臺灣各界的普遍讚揚，但由於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與劉曉波、周舵、高新分別接受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中國官方媒體的採訪，說“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沒有死一個人”，遂將以前的努力付之流水。

針對侯德健“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沒有死一個人”的說法，臺灣輿論大嘩，一片討伐聲浪，連侯德健的許多老朋友都無法諒解他，紛紛公開予以譴責，其中包括與他同爲臺灣校園民歌時期代表性人物的羅大佑。

侯德健雖然後來並沒有被臺灣司法機關以“偷渡”的罪名判刑，但他在臺灣的生活遭遇很不好。爲了謀生，侯德健重操作曲作詞舊業，包括爲電影和電視劇譜曲，但卻不能以真實姓名署名。

與他在北京同居四年的“親密愛人”程琳（東方歌舞團演員），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也離他而去。程琳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搭乘飛機從北京飛往香港，先後旅居澳大利亞、法國，盛傳一度曾與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關係親密。程琳後來投奔閨中密友、武打明星李連傑的前妻黃秋燕，定居美國洛杉磯，進修音樂。

至此，侯德健心灰意冷，自我放逐到偏僻的新西蘭多年，一直到遇上了一位相知相愛的北京姑娘，心情才逐漸有所好轉，重返臺灣，然後潛心研究《易經》命理，以給人卜卦算命、看風水謀生。

相比之下，不具知名度、沒有一張“人人都熟悉的臉”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普通大學生在內，數以百計的社會各界人士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被判處十年以上的重刑，其中包括死刑、死緩（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無期徒刑。僅北京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一九八八級碩士研究生李海所搜集提供的一份有名有姓、有關押地點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政治犯名單，北京市判處十年以上重刑的社會各界人士就有五百多人。

李海因爲收集並向海外的人權組織提供這份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政治犯名單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並被北京大學開除了學籍。

李海在爲期九年的牢獄生涯中，從肉體到精神均備受折磨，大部份時間處於嚴管或單獨禁閉，生病得不到醫治，也不能享受普通囚犯的待遇。李海本身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務委員兼對外聯絡部部長，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經被關押審查了十八個月。

據海外有關的新聞報導透露，二零零六年二月，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被判處重刑的北京市民孫傳恒從北京市第二監獄獲釋。二零零六年九月，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被判處重刑的北京市民張茂勝、董盛坤從北京市第二監獄獲釋。但是，至今仍有許多因爲參加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而被判處重刑的北京市民在獄中服刑。

二零零四年五月，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屆滿十五周年之際，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公佈了一份通過特殊管道從中國所獲得的北京地區“六四暴徒”的資料。根據這一份資料顯示，當時仍有許多“六四暴徒”在漫漫刑期中煎熬。

原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現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的共有九個人，包括朱更生、董盛坤、張茂勝、李玉君、朱文義、苗德順、王連禧、郗浩梁、孫宏。

原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現在北京市延慶監獄服刑的有薑亞群。

原判無期徒刑，現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的共有十一個人，包括趙鎖然、張國棟、常景強、武春啓、常永傑、孫傳、高鴻衛、王連會、孫彥財、石學之、李志欣。

原判無期徒刑，現在茶澱監獄服刑的有馮立生。

原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現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的有李紅旗。

原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現在北京監獄服刑的有劉建文。

“中國人權”組織在公佈上述這一份資料的同時指出，這些被判處重刑的所謂“六四暴徒”，都是參與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市普通市民，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的所謂“罪行”，有的僅僅是在別人借火焚燒軍車的時侯，順手提供了自己隨身攜帶的火柴或打火機，或者是在親眼目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殺人的時侯，出於義憤，投擲了石塊、磚頭、汽水瓶等等。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氣氛中，他們成了中共當局渲染“反革命暴亂”和“反革命暴徒暴行”的犧牲品，已知至少有二十二人在經歷不公正的、秘密的審判後被槍斃。由於這些普通的北京市民都是以個人形式參與，又沒有知名度，所以外界很少瞭解他們的實際情況，使得他們大多被輿論所遺忘，默默地在漫長的刑期中獨自煎熬。

當年十九歲的孫傳恒，是北京市地質儀器廠的工人。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他一開始就積極地參與由大學生所發起的各項活動。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孫傳恒被捕，原因是“焚燒軍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孫傳恒親眼目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屠殺民眾，憤怒之餘，帶領一些大學生在距離新華門東側兩百米的地方燒毀了兩輛軍用卡車。

一九九零年八月十四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持械聚眾叛亂”的罪名判處孫傳恒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改判為十六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二零零一年，孫傳恒曾經獲得減刑。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孫傳恒刑滿出獄，目前尚未服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

在十七年漫長的監禁生涯中，孫傳恒由於不認罪及反改造，多次遭到單獨關禁閉的處罰，受盡了折磨，患有腎炎、貧血、腸結核及腰尖盤突出等多種疾病，至今尚未痊癒。

孫傳恒是一位自強不息的有志之士，即使在環境極其惡劣的監獄裏，也始終沒有放棄求知求學的努力。自二零零零年至

二零零五年的五年時間裏，他通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獲得了法律專業的大專文憑及心理學專業的本科文憑，先後總共獲得了四十八份單科合格證書。他的刻苦學習精神在監獄裏是十分罕見的。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孫傳恒好不容易熬到出獄，苦難卻沒有就此結束。自二零零六年二月份出獄後的半年多時間裏，孫傳恒一直忙於尋找工作，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養活自己，但一無所獲。孫傳恒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有兩個：第一，他服刑長達十七年，脫離社會太久，沒有工作經驗；第二，他曾經是“反革命暴徒”，沒有人敢於錄用，哪個私營老闆也不願意給自己找痲煩。

孫傳恒比常人付出不知多多少倍的努力而獲得的法學和心理學的雙學歷，在找工作的時候根本就派不上用場，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

孫傳恒的父母都是北京電子管廠的退休工人，其父親孫克寬患有十二指腸穿孔及敗血症(由於穿孔引起腹腔感染)，其母親劉桂珍患有心臟病及腦出血，由於北京電子管廠早已倒閉，醫藥費根本無法報銷。

孫傳恒出獄半年多以來，一直在依靠老爹老媽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作爲家中獨生子的他，深深感到對不起年愈古稀的父母，畢竟父母已經在他入獄十七年的漫長時間裏爲他付出了太多太多，但他出獄後不僅沒能孝敬父母，反而繼續在給父母增添負擔。

當年二十一歲的張茂勝，是北京市機械公司第三處的工人。當北京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就一直站在學生的一邊，積極地予以支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當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並開槍鎮壓民眾的時候，張茂勝出於義憤，在北京市朝陽區馬店橋焚燒了一輛軍車。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張茂勝被捕，由於被視爲“反革命暴徒”，先後遭到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公安警察的嚴刑拷打，以至於遍體鱗傷。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縱火罪”的罪名將張茂勝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張茂勝憑著堅強的意志，在獄中憑藉出賣體力而多次獲得減刑的“獎

勵”。在服刑十七年之後，張茂勝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出獄，但仍有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尚未服完。

張茂勝因爲長期坐牢，獄中環境又極其惡劣，染上多種疾病，例如腎結石、膀胱結石、前列腺炎、高血壓等。二零零六年四月，張茂勝曾經因爲腎結石和膀胱結石入住北京市監獄系統所管轄的濱河醫院就醫，迄今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療。

張茂勝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沒有錢看病，只能依靠年邁父母的退休金度日。他的父親張貴春高齡七十九歲，患有肺結核、前列腺炎、腦血栓等多種疾病；他的母親張玉芬患有高血壓、白內障、面部癱瘓等疾病。

由於長期的囚禁生涯，張茂勝與現實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脫節，他不會使用電腦，連手機也不會使用，三十八歲的他在出獄後陷入迷茫和極度貧困之中。

當年二十九歲的董盛坤，是北京市某印刷廠工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董盛坤爲了抗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屠殺行爲，參與焚燒軍車的行動。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董盛坤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縱火罪”的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董盛坤在服刑十七年後，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五日獲釋，回到其北京父母的家中。

董盛坤仍有剝奪政治權利八年的附加刑在身，因此，當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試圖採訪他的時候，他不得不表示：“我現在是被剝奪政治權利八年。剝權期間是不允許接受媒體採訪的，如果我接受媒體採訪就等於是違法了，所以對於你的採訪我非常感謝，對我的關心我也很高興，從內心裏面也很感動，但是我確實不能接受採訪。”

毫無疑問，孫傳恒、張茂勝、董盛坤等人都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受難者，他們作爲反對解放軍戒嚴部隊屠殺行爲的普通北京市民，爲當年一時的義憤之舉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在熬過漫長的刑期出獄之後，他們依舊在受苦受難，而且很可能是另一個無期徒刑的開始。這個監獄外的無期徒刑，很可能比監獄中的有期徒刑更難熬、更可怕。

孫傳恒、張茂勝、董盛坤等人應當算是非常不幸的，但還有比他們更不幸的人，那就是已經在獄中喪生或仍在苦牢中煎

熬的“六四暴徒”。

目前已知有兩名“六四暴徒”死于獄中。一個是王稼祥，他是年齡最大的一位“六四暴徒”。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王稼祥出於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行爲的義憤，這位當年已經七十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焚燒軍車的行動，後來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的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一九九七年，已經八十多歲的王稼祥，因病逝世於北京市第二監獄。另一個是路洪澤，他被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路洪澤因突發腦血栓病而逝世於監舍。

政治犯孫立勇曾經與路洪澤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三中隊一起服刑。孫立勇當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區公安分局警察，因爲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不久創辦地下刊物《鐘聲》和《民主中國》，抗議和譴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屠殺行爲，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煽動”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孫立勇在回憶錄中具體談到了路洪澤的情況，讓我們有機會具體瞭解到“六四暴徒”在獄中的悲慘遭遇：

“隨我一起調到三隊的一百多名犯人中，有五個是‘六•四’時進來的良心犯，一個是路洪澤，另外四個是劉育生（判刑十四年）、閻建新（判刑十一年）、霍建剛（判刑十一年）和孫博光（判刑十三年）。

老路大我三歲，是四季青鄉(屬於北京市海澱區----作者注)的農民，被捕前在城裏做零工。妻子熱情賢慧，兒子虎頭虎腦，完美幸福的家庭是老路最大的財富。然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屠殺打碎了成千上萬人的家庭，也打碎了老路的幸福家庭。

六月三日晚，剛下班的老路像往常一樣同朋友一起準備去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當他們走到距天安門廣場還有一公里左右的六部口時，發現十字路口處停著許多已被點燃的裝甲車。看到正在燃燒的裝甲車，老路的火氣一下子上來了，於是與同伴一起掏出隨身帶著的汽水瓶砍了過去，結果被架在紅綠燈上的攝像機給攝了下來。‘六•四’之後各個電視臺反復播放當時的錄影，不知是被人舉報還是公安部門自行偵查的，總之老路

和同伴一道被抓獲歸案了。

經過近四個月的審訊，（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對老路及其同案進行了秘密審判。對老路罪行的認定，判決書上是這麼寫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零時許，被告人李延華、路洪澤竄至本市西城區六部口十字路口處，適遇已被點燃車頂頂部的戒嚴部隊某部三三九號裝甲車（價值人民幣三十三萬元）由東向西行駛。被告二人分別向該裝甲車上投擲燃燒瓶，致使該車火勢增大被迫熄火停車，後被焚毀。

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戒嚴部隊某部證明材料爲證，足以認定。被告二人均亦供認。

本院認爲：被告人李延華、路洪澤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期間，向戒嚴部隊裝甲車投擲燃燒瓶致使該車被焚毀的行爲，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危害了公共安全，擾亂了社會治安，均已構成放火罪。爲嚴肅國家法律，保障公共安全不受危害，對被告二人均應予懲處。’

最後判決如下：

‘被告人李延華犯放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本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被告人路洪澤犯放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刑期自本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從我到十一隊的第一天起，老路就對我說他的案子是冤案，他承認自己和同伴的確用瓶子砍裝甲車了，但絕不是燃燒瓶，而是汽水瓶子，是喝完汽水的空瓶子。他反復強調他到六部口時所有的裝甲車都在燃燒著，據先來的人講，裝甲車是戒嚴部隊自己澆上汽油後點燃的，目的是擴大事態、製造暴亂的假像以爲暴力鎮壓找藉口……

‘那你爲什麼不上訴？’我不解地問道。

‘誰敢上訴呀？！當時的形勢多恐怖呀！法院說了，不槍斃我們就算便宜我們了。另外，在看守所裏每天都得挨打，一開始是戒嚴部隊打，後來是警察打，最後是刑事犯打，大家都

盼著早點判完早點下圈兒，看守所那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離開看守所後的老路先到了一監（北京市第一監獄----作者注），由於他會電氣焊，不久他就轉到了二監（北京市第二監獄----作者注），分到二監的建築隊做電焊工。

爲了早日與家人團聚，老路拼命地幹活以爭取減刑，爲此還將家裏的兩台電焊機和一個氧氣瓶拿給隊裏無償使用。工夫不負有心人，一九九三年底老路終於獲得減刑兩年的獎勵。

由於過度勞累，一九九五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他昏厥了，而且當時嘴就歪了。經醫生診斷，他得的是高血壓，高壓一八零，低壓一一零，這次昏厥是因中風引起的。爲此醫生建議針灸治療，但家裏要拿一千六百元的治療費。老路把情況跟妻子說明後，妻子二話沒說就去四處借錢，湊齊後送到了監獄。

經過幾天的治療，病情稍有好轉的老路就又投入到勞動的隊伍，因爲他害怕休息時間長了會影響自己年終的評獎，那樣自己一年的辛苦豈不是白費了？但老路總說自己的左半邊身子有麻木感，於是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半身麻’。一些比他年齡小的乾脆就叫他‘麻哥’。

一九九六年初，二監決定在監區的西南角蓋一個花棚，由於花棚的架子要用鐵管做支架，因此幹部找到老路，問他能不能爲監獄做點貢獻？老路答應了。接見時，老路把幹部的意思告訴了妻子。爲了讓丈夫早減刑、早回家，不到一個星期妻子就給監獄拉來一卡車的鐵管……

老路的妻子叫于建玉，是四季青鄉一個鄉辦企業的工人，每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這點錢不僅要供老路在監獄裏的各種花銷，還要供兒子念書、吃飯，最後輪到自己也就所剩無幾了。然而于建玉是個豁達開朗的女性，她始終堅信自己的丈夫是個好人、堅信困難是暫時的、堅信早晚有一天丈夫能夠重獲自由、堅信……因此無論遇到什麼難事兒，她都是打脫了牙和血吞。

一九九八年春節前，由於勞動表現突出，老路獲得了減刑一年零兩個月的獎勵，這時的老路離自由的日子只差一年多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上午，老路突感不適，隊長急忙帶他去醫院就診，經醫生診斷爲高血壓，打了一針降壓針後

就回來了。之後我曾去他的監舍看他，問他‘感覺怎麼樣？’老路說‘沒大事，還是老毛病——高血壓。’我問他‘血壓是多少？’老路講‘高壓二二零，低壓一一零。’我問他‘爲什麼不要求住院？’老路說‘這幫孫子才捨不得花錢呢！**XXX**比我血壓還高呢，不也在號裏呆著嗎？沒事兒，過兩天就好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上午，老路突然昏迷了，在隊長的帶領下，班裏的幾個人迅速將老路抬到了醫院，經醫生診斷，還是高血壓，打了一針降壓針後就又回來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老路口吐白沫，並再一次昏迷，隊長急忙讓號裏的犯人用褥子當擔架把老路抬到了醫院，然而這一次他卻再也沒能回來……

據送老路去醫院回來的犯人講：老路是腦溢血，到醫院就死了。

從十九日犯病到二十一日死亡，老路沒出過監獄一步！隊裏的一百多名犯人都是證人！

據我後來瞭解，直到四月二十四日法院才將老路死亡的事情通知了老路的家屬，謊稱‘曾送老路先後去了天壇醫院、宣武醫院等四家醫院，但人家都不收，因此最後才死在濱河醫院了’。之後，同老路的家屬簽定了一份協議書。

協議書

罪犯路洪澤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因‘腦梗塞’轉濱河醫院住院治療。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晨六點五十五分突發‘上消化道出血，應急性潰瘍’，經搶救無效，於七點二十五分死亡。現與家屬協議如下：

1）對死因無異議。

2）屍體定於四月二十五日在通州區殯儀館火化。

3）遺物及骨灰由家屬領回。

4）運屍費、停屍費、火化費由監獄承擔。

家屬(簽字）

北京市第二監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當我看到這份‘協議書’時，我終於明白了爲什麼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建玉去隊裏領取老路遺物時，中隊

將各個號門都插上了，並且嚴禁扒窗戶向外張望；同時我也明白了爲什麼當時主管中隊管教工作的魏中一再囑咐我‘出獄後別瞎說’，‘否則對你沒什麼好處！’

據老路的家屬講：除協議書上規定的費用由監獄承擔外，整容費、喪服、骨灰盒等兩千多元的費用都是自己家裏湊的；老路在監獄服刑的九年裏，家裏至少給他花了五萬元，其中大部分是用在請幹部吃飯、送禮及給老路買藥上了……

前不久我專程去路家探望，得知十九歲的路園（老路的兒子）因沒錢繼續讀書現在已經輟學，眼下在一家超市打工，以減輕母親沉重的經濟負擔。另外，于建玉也已再婚，現在的丈夫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對大人、孩子都不錯……”【注釋 86】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過後，解放軍戒嚴部隊數以萬計的軍人已經將天安門廣場圍得水泄不通，而且包圍圈已經縮得非常小，槍口幾乎已抵住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學生們的胸口，數以千計的學生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這對於柴玲等年輕的學生領袖們是一個極大的心理壓力，責任之重大，遠遠超出了他們這般年紀所能承受的負荷。實際上，他們都是些二十歲出頭、從未出過校門、缺乏社會閱歷的學生而已。

因此，從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們當時的言行舉止和神態來看，對於是否接受侯德健、周舵等人所提出的建議，派代表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率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的態度顯得猶豫不決，雖然表示不能採納，但並非嚴詞拒絕，給人的感覺是存有默許之意。或者可以這麼說，對於侯德健等人所提出的這項建議，學生領袖們既沒有表示接受，也沒有提出反對。

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柴玲等學生領袖們不願意由自己直接出面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封從德當時即對侯德健等人明確表示：你們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談判，只能是作爲第三方，不能代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封從德強調指出，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也沒有做出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的權力，只有天安門廣場上的全體學生才有做出撤離天安門廣場決定的權力。

而柴玲拒絕參與談判的一個理由（或託辭）是，她身爲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總指揮，在這個時刻不能離開指揮

部。

時間已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三點三十分過後，再也沒有什麼商議迴旋的餘地。紀念碑底座四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蠢蠢欲動，越來越多的彈道從紀念碑底座上空呼嘯而過，劃出一道道火光，從人民大會堂東側大門前扔過來的催淚瓦斯彈不斷地落到紀念碑底座西側附近，騰起一團團煙霧。種種跡象顯示，解放軍戒嚴部隊武力攻佔天安門廣場、強行驅逐學生隊伍的行動隨時都會發生。

在時不我待的情形下，劉曉波等人只好放棄爭取柴玲等學生領袖們共同參與同解放軍戒嚴部隊談判、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努力，決定先由他們自己出面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在取得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定的承諾後，再回過頭來繼續爭取柴玲等學生領袖們的認可，說服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就是六四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中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起因及商議過程，提議者及執行者都是侯德健、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與柴玲等學生領袖們無關，既沒有得到柴玲等學生領袖們的認同，也沒有爭取到柴玲等學生領袖們的介入參與，更沒有徵求並取得天安門廣場上廣大學生們的意見和認可（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廣大的學生們根本不知道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這件事，知情者只有為數極少的高校青年教師和糾察隊員。

然而，在六四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發生之後，面對海內外，尤其是國際社會強烈的抗議聲浪，中共當局為了掩蓋血腥鎮壓的真相，推卸血腥鎮壓的責任，於是就抓住侯德健等人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這件事大做文章，聲稱學生主動提出撤離天安門廣場的要求，解放軍戒嚴部隊立即予以應允，於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就打著旗幟，有組織、有秩序、和平地撤離了天安門廣場。因此，在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死亡。中共當局企圖以此來掩蓋解放軍戒嚴部隊用武力強行驅趕和平請願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血腥清場行動的真相。

例如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電

訊”中聲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時半，天安門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自五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

例如中央電視臺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上七點鐘開始播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聲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於五時半，整個過程結束。”

例如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主動撤離、和平撤離，學生自己提出來是和平撤離，後來雙方達成了協議。”

與袁木同時出席記者會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聲稱：“學生代表向我們戒嚴部隊提出一個要求，能不能讓他們和平撤離或是自動撤離。戒嚴部隊立即表示同意。”【注釋 87】

對於侯德健等人主動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舉動，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就頗有爭議，時至今日，海內外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是非曲直，很難評定，完全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在這裏不予評論，只是肯定一點，中共當局利用侯德健等人的這種舉動，藉以掩蓋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歷史真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三十分左右，侯德健和周舵兩個人作爲絕食請願知識分子的代表，在兩位北京市紅十字會醫生的陪同下，從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西側出口下去，尋找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讓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隨同他們而去的還有幾位誓死保護侯德健人身安全的糾察隊員，但他們後來並沒有隨同侯德健等人一起前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接觸談判。

選擇侯德健擔任談判代表，主要是借重於他的知名度，他那張人人都熟悉的臉蛋，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就是一份最有效的通行證，也許可以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面前增加安全係數；而選擇周舵擔任談判代表，則是因爲他具有一副文質彬彬的書生相，加上他說話慢條斯理且有邏輯性，不象劉曉波容易情緒衝動。

在當時的情形下，去找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前景不

明，吉凶難測，具有相當的風險。因此，在商議究竟由誰擔任談判代表的時候，周舵搶先提議由他和侯德健兩個人作爲代表去談判，理由是這個談判撤退的建議是由他首先提出來的，所以他應該去；而侯德健的知名度大，當兵的恐怕也都知道他，可能會手下留情。劉曉波馬上表示反對，說應當由他和侯德健兩個人作爲代表去談判。但是周舵堅持己見，強調應該由他和侯德健作爲代表去談判。

這時候，周舵說了應該讓他作爲代表去談判的另外一個理由：劉曉波在學生中名氣大，有影響力，萬一自己和侯德健在去談判的過程中出了問題，不管是死是傷，或是讓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抓起來，劉曉波可以和高新繼續做學生領袖的勸說工作，帶領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

侯德健表示同意周舵的意見，半玩笑半認真地說，周舵看上去比較溫文爾雅，不像個“暴徒”。於是，劉曉波也就不再堅持己見。

儘管我不贊同侯德健等人主動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舉動，但我心中卻始終維繫著他們的安危，我們特別糾察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保護他們的安全。當侯德健他們一行人離開紀念碑底座之時，我佇立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側出口處，目送著他們一行人漸漸遠去，不停地在心中爲他們的安危而祈禱。

侯德健、周舵一行人下了紀念碑底座，先是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側大門對過的馬路邊沿，在那裏逗留了十多分鐘，隨後攔住一輛路過的白色救護車，登車後沿著人民大會堂東側大道往北開往天安門城樓方向，行駛到天安門廣場西北端，然後東拐，停車于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位置，與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方陣隔著長安街遙遙相對。

此後發生的事情自然很重要，但已不是我的耳力和眼力所能及，只好借助于侯德健本人事後的一段自述：

“才到（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我們就看見了，整條長安街都已擺好了衝鋒陣形的數以萬計的部隊，急救車立刻停住了，我們急忙下車往部隊跑去，當時我們停車的周圍已無人影，不知道部隊已在這兒待了多久了，一見我們跑來，立刻引起了一陣嘰嘰喳喳的子彈上膛聲，中間夾著叫罵喊住的聲音，我們

立即停住了腳步，醫生急忙表明身分，並介紹我是侯德健，希望能與指揮官說話，激動的士兵稍稍緩和，也聽得見議論我的名字的聲音，聽不清楚，但感覺並無惡意。

指揮官離我們不很遠，聽清我們的來意後，與四、五個軍人一齊走上來，他看起來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見的那種四十多歲，曾經很結實而今略顯發福的三顆星的高級軍官，他與我們握手的時候，顯得很平靜，一點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軟、也很熱，我覺得他認真地聽了我們的請求，剛開始時，他有點嚴肅（不能稱凶）地要求我們先停止絕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們已經停止了。之後，他的態度一直很溫和，他表示需要請示總部。

就在他走回部隊中沒五分鐘，（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突然熄了，我沒看表，不知是部隊清場的信號，抑或是日常慣例的清晨五點熄燈，因爲當時我們驚恐極了，幾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來，扳動槍械，又開始叫吼，還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揀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無人的廣場邊緣。我們四個人站在空曠的廣場東北角上，極爲突出，前後左右都不敢動，還是醫生比較鎮定，勸大家站著別動，一方面把雙手舉起來高聲喊叫，請他們快一點。

三分鐘不到，指揮官又來了，告訴我們總部已同意我們的請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東南口。在我們的詢問下，他告訴我們是部隊的政委，姓紀，番號我記不得了，因爲我們需要這些材料去說服同學。在談判中我記得紀政委還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服大家撤離廣場，我們將立下了一個大功。我個人認爲他這句話是真誠的，沒有什麼其他含義。

有了保證，我們飛也似地跑回紀念碑上……”【注釋 88】

侯德健上述回憶中談到與他接觸談判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政治委員姓紀，“紀”應該是同音字“季”之誤。周舵在相關的回憶中說，這位上校軍官自稱“季新國”，某團政委，所屬部隊的代號是“51048”。【注釋 89】

侯德健、周舵等人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季姓團政治委員接觸談判的時間，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四十分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記錄說：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一輛

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在天安門廣場歷史博物館的東北端被勒令停住。車上一共下來四個中年人，他們舉著雙手，請求談判，他們高喊，他們是侯德健。”

我查閱相關的資料得知，與侯德健、周舵等人接觸談判的季新國上校，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的政治委員，當時在場的還有該團的團長赫飛上校和團政治處主任王劍中校。當他們得知侯德健、周舵等人的來意後，緊急請示了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劉興貴知道自己無權做主，馬上帶著季新國等人趕到金水橋一帶面見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然後又請示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最後由季新國上校出面告訴侯德健、周舵等人：學生可以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撤離，那裏是唯一的通道。【注釋 90】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五十分左右，當侯德健等人尚在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之時，一輛裝甲車經過“毛主席紀念堂”西側快速開到紀念碑底座西側附近。一群學生迅速地圍了上去，準備強行予以阻攔，裝甲車卻又突然加速北去，開往天安門城樓一帶。

一群學生拿著墨水瓶和大型毛筆，神情凝重悲憤，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護欄上寫下了許多類似於“絕筆”的大幅標語，諸如“六月四日淩晨三時，軍人向老百姓開槍！”“六月四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國人民爲民主與自由而流血犧牲”等等。

凝視著一條條墨蹟未乾的標語，我一陣暈眩，熱淚盈眶，透過一個個墨寫的大字，浮現的卻是一幕幕屠殺的情景，那一個個墨水欲滴的大字，分明是一灘灘鮮紅的血液。在我這個飽讀史書的中國古典文獻學者眼中，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中國的歷史上分明不是一個墨寫的日子，而是一個血寫的日子。

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整，天安門廣場上的全部燈光突然一齊熄滅，黑暗瞬間籠罩了整個天安門廣場，頓時造成極其強烈的恐怖氣氛。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人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後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於是，黑暗中，悲壯的《國際歌》歌聲再次響起：

……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
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就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在整個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我唱《國際歌》唱了很多次，也曾經多次帶頭領唱過，但從來沒有唱得像這一次如此地投入，似乎將包括生死在內的一切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也許是感覺到死神的來臨，這將是一生中最後一次唱《國際歌》的緣故。

坐在高高的紀念碑底座上，俯瞰一片漆黑而遼闊的天安門廣場，四周佈滿了排列成行的裝甲車、坦克，以及數以萬計虎視眈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我第一次對《國際歌》雄渾而悲壯的旋律和睿知而激揚的歌詞，理解感受得如此之深，尤其是對“這是最後的鬥爭”這一句歌詞有了切身的體會。

我與在場的數千人一樣，亮開了喉嚨，忘乎所以地放聲高唱，歌聲中帶有一點嘶啞，還帶有一點嗚咽。數千人在生死之際一起放聲高唱《國際歌》的那種悲壯，那種震撼，真的無法用筆墨來形容，這個難以磨滅的記憶，必將一直伴隨到我離開人世爲止。

在我的記憶中，總覺得是我自己帶頭領唱《國際歌》的，但似乎又不能或無法確定，當時我坐在紀念碑底座北側的最高一級臺階上。帶頭領唱的《國際歌》也許是不止一個人，因爲在黑暗突然間籠罩了整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所有在場的人都感覺到這是最後的時刻到了，生死之際，熟悉的《國際歌》的旋律自然而然地會在許多人的腦海裏響起，於是就不約而同地唱了起來。

放聲高歌的人們依舊安然端坐著，手挽手，肩並肩，沒有一絲騷動不安，異常平靜地等待著最後時刻的來臨。就在這個時候，坐在身旁的劉蘇里鎮定而自豪地對我說："老吳啊，幾十年來，第一次這麼轟轟烈烈地與共產黨幹了一場，咱們哥倆今天就是死也值了。"劉蘇里說出了我的心裏話，心有靈犀一點通，我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

劉蘇里雖然年紀比我小五歲，當年才二十八歲，但性格沉穩，老成持重，又長著一臉絡腮大鬍子，在我以及許多人的心目中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漢。劉蘇里是最早投入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知識份子之一，有關他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幾件事情，讓我印象極爲深刻。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我和青年教師陳小平、熊繼甯(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統工程研究室主任)等人率領數百名中國政法大學師生以給胡耀邦敬獻花圈的名義，一路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搶了個先。翌日下午，劉蘇里聞訊趕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一見面，就興奮無比地沖著我叫喊："老吳，幹得好！真沒想到政法大學這一次搶了先，我還在北大瞎忙呼著呢！"

劉蘇里於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一九八三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攻讀碩士學位，一九八六年夏天取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在北京所發生的歷次學生運動中，幾乎都是由北京大學帶領風潮，遂有"北大動，不動也動；北大不動，動也不動"的說法。因此，包括劉蘇里在內的一些北大校友都對北京大學寄予厚望，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之日始，他們即頻繁出入北京大學校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午夜，北京大學學生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第一次走

出校園遊行，作爲遊行隊伍前導的寫著“中國魂”三個大字的白色綢布大條幅，就是劉蘇里、楊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一九八三級碩士研究生、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的秘書）等北大校友的傑作。

中國政法大學曾經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兩塊大型看板，也與劉蘇里有關，是他將準備用以打傢俱的木頭捐獻出來製作而成的。一塊大型看板是胡耀邦的巨幅遺像，由國際經濟法系青年女教師張麗英所畫，另一塊大型看板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集會、結社、遊行等公民權利的條文，是我請同單位的青年教師劉斌書寫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曾經派專人來商議，要將後一塊大型看板收爲館藏物品，被沒有遠見的我們所拒絕，結果不知所終。（參見附錄照片）

當年，劉蘇里家中有嬌妻和年僅兩歲的幼兒小喬西，不象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但是他卻能豁得出去。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的晚上，當我們結伴去調查詩人駱一禾去世情況的時候，劉蘇里還特意抽空帶著我一起回家看望妻兒，途中他對我說，他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年幼的兒子。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時分，他的妻子特意來到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探望他，當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開槍殺人，形勢變得非常危急，他的妻子自然很擔心他的安危，但她知道決不可能在此時此刻勸說他離開天安門廣場，離開學生，只好背著他悄悄地囑咐我，代她儘量看顧好劉蘇里，千萬別出事。說著說著，她的臉頰上掛滿了淚水。

在此時此刻的天安門廣場上，還有一個人讓我特別掛念，那就是我的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一九八六級碩士研究生浦志強，我給他講授過中國文獻學的課程。浦志強是一位熱血青年，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參加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第一次遊行示威活動以來，他就一直站在學生運動的第一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國政法大學校門口，浦志強第一個站出來報名參加絕食請願行動，做了簡短而慷慨激昂的發言，隨後帶領同學前往北京師範大學集合，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步行去天安門廣場。（參見附錄照片）

在這期間，我一直站在不遠處默默注視著，印象中只記得

浦志強說過一句話："難道法大（政法大學）的男子漢都死絕了嗎？"爲了給浦志強和其他參加絕食請願的學生送行，我和同單位的青年教師劉斌匆匆跑到校園內的小賣部買了一瓶白酒和一大批巧克力。

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送別，竟將自己送到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請願圈，送到了新華門前的絕食請願區，其間又四次被送進了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所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郭海峰（北京大學學生）、周勇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張智勇（北京大學學生）等三名學生代表高舉著請願書長跪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的臺階下，卻得不到中國官方的任何回應，浦志強悲憤難當，用手提電喇叭將自己砸得頭破血流。

在天安門廣場陷入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重重包圍之後，我擔心浦志強的安危，特地將他從中國政法大學的帳篷裏叫到了紀念碑底座的學生隊伍中。按照我的本意，當然是想勸說他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根本無法說服他這麼做，只能儘量予以關照。他不能出事，因爲他沒有兄弟姐妹，河北鄉村的老家只有年老的養父母。在他參加絕食請願期間，他的養父曾風塵僕僕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探視，讓我感慨不已。

此時此刻，浦志強也已經做好了最後的準備，他告訴身邊的同學說："紀念碑將會見證我們的死亡，但是假如能活著出去，此後每年的今天，我都會再回來，來這裏憑弔所有無辜的死難者。"

當年的這一番話，竟然成了浦志強許下的一個心願，一個可能需要終身來償還的心願。從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五年，每年的六月三日夜晚，無論是身爲北京市北太平莊農貿市場的苦力，還是身爲忙碌的知名律師，他都在這個時刻風雨無阻地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憑弔還願，按時撥通"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的電話，以便這位失去唯一親生兒子蔣捷連的白髮蒼蒼的母親，能夠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如期收到另一個兒子的問候。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晚上九點鐘，浦志強寫了一封電子短信打算發送到上千個朋友、熟人的手機上，內容如下：

“六月三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個年頭，我們將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憑弔。只想告訴自己，這件事並未走入歷史，而是植根於內心深處。浦志強與君共勉：勿忘六四，說出真相；立足維權，宣導和解！”

沒想到這一封電子短信招來了公安警察，導致浦志強被傳喚到公安派出所，隨後又被軟禁在家，短暫地失去了人身自由，致使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第一次未能在六月三日的夜晚去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憑弔還願。

我與浦志強名義上是師生，但心目中卻視他爲兄弟，很欣賞這位來自河北鄉村的大男孩。他的養父母是村中唯一的富農，屬於“黑五類”。可想而知，浦志強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經歷了許許多多不爲人道的歧視與屈辱，但他一直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真誠仗義。

浦志強作爲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學生骨幹，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自然成爲重點清查對象，但他是爲數極少的“拒不認罪”的學生，並公然譴責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爲此，他未能取得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只好到北京北太平莊農貿市場當苦力掙錢養家。在經歷千辛萬苦終于成爲知名的律師後，仍然對社會、對弱勢群體十分關切，經常主動出錢出力。他曾經不取分文，主動找上門去擔任《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陳桂棣、春桃夫婦的義務辯護律師，爲了悲苦的農民，這位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的男子漢，竟然在法庭上淚流滿面。

黑暗中，留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上採訪的最後幾名中外記者也開始撤離了，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上再也見不到身份公開的新聞從業者。不過，仍有一些沒有表明身份的中國年輕記者躋身於學生隊伍之中，默默地承擔著見證和記錄歷史的責任。在後來學生隊伍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有一位《中國青年報》的年輕記者非常痛苦，不願撤離，跪倒悲慟，最後被同伴強行架走。

此外，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以後，有一些中外記者冒險逗留在天安門廣場四周的邊沿地帶，繼續記錄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情況。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公司（CBS）雇用的三名美國籍新聞從業者理查羅斯、羅伯蘭、德特里昂和一名新西蘭籍新聞從業者，就是其中的幾位。他們一直在做現場報導，及

時地將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最新情況告知海外的民眾。後來，理查羅斯和攝影記者羅伯特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痛毆，不但攝影機被砸毀，人也被拖進了人民大會堂，失去了人身自由。【注釋 91】

法新社發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一則電訊，對上述事件作了相應的報導：

“兩名在天安門廣場作現場報導的美國電視記者，被中國士兵抓走並拘留十九小時後，于周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作者注）獲釋。

理查羅斯和攝影記者羅伯特週六（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作者注）午夜正在天安門廣場現場報導軍隊暴力鎮壓示威者的情況，結果他們被士兵包圍。理查羅斯敍述士兵走近並抓住羅伯特的情況時報導。‘我們必須趕快離開，他們正在追趕德特里昂，奪走他的照相機，他們正朝我們趕來，我們正設法離開。’這時槍聲響了，只聽見理查羅斯說，‘哎喲，不要，哎喲，不要’，又說，‘我就走，我就走。’

理查羅斯稱，他和羅伯特被士兵從天安門廣場邊緣一直拖到人民大會堂，一路上慘遭拳打腳踢。”

天安門廣場熄燈之際，殘餘的市民基本上都離開了紀念碑底座一帶，少部分學生也零零散散地離開了，他們從南面的前門方向撤離了天安門廣場。最後堅持留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人們，除了爲數不多的北京各高校的青年教師之外，幾乎是清一色的學生，人數約有五、六千人，絕大部分集中在紀念碑底座的北側，因爲北側面對著天安門城樓和長安街，是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地帶。

我充分理解在此時離開天安門廣場的人們，死亡的恐怖不是輕易可以戰勝得了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熄燈的那一刻，在心理感受上，無疑是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過程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時刻。多日來一直人聲鼎沸的天安門廣場突然間變得死一般的寂靜，恐懼和壓抑就像那漆黑的夜色一樣迅速吞噬著每一個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間肯定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誰要是說自己當時一點也不害怕，那肯定是騙人的謊言。如果不是身爲教師，如果不是數十名特別糾察隊隊員的領隊，或許我也會在此刻離

開天安門廣場了。恐懼本來就是人的天性之一。

北京農業大學的隊伍中也有不少學生離開了，最後只剩下一百多人。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林青堅持留了下來，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我們這群‘亡命徒’們仍然互相鼓勵著。此時此刻，我們已不抱任何幻想，想到的只是需要留下什麼給父母。同學們紛紛尋找紙筆準備寫遺書。宋文清遞來本子，讓大家記下姓名、班級。空氣頓時凝固了，手中的筆也越加沉重，年輕的臉上也寫滿了莊嚴的神情。

就在這一刻，我體會到了‘捨生取義’的莊嚴，想到了‘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豪爽。其個中滋味只有真正經歷的人才能有深刻的體會。”【注釋 92】

不過，也就是在這個最恐怖的時刻，仍然有北京市民不顧一切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決心要與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生死相依。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二十五分左右，一群北京市民從天安門廣場的東南角進入，向紀念碑底座走來，一邊走，一邊齊聲呼喊著：“中國人，站起來！中國人，站起來！”悲壯的呼喊聲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蕩，象驚雷般炸響，如浪潮般卷過，撼動人心，那一副慷慨赴難的景象，不能不令人動容。

站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層，望著發生在眼前的這一幕感人景象，我整個心靈都爲之震動，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多麼令人敬佩的北京市民啊，他們爲了維護做人的尊嚴和良知，選擇了與和平請願的學生生死相依，選擇了面對死亡，而且選擇得從容不迫。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身邊坐了一位姑娘，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便隨口問她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她回答說不是學生。我隨即追問她是幹什麼的。她回答說是搞攝影的。我接著對她說，記者們不都已經離開這裏了嗎？你怎麼還不走？這裏太危險了，你一個姑娘家，趕快離開吧。她回答說，我不是記者，我是攝影個體戶，我要將這百年難遇的歷史事件用鏡頭記錄下來。

她的回答讓我既驚訝又敬佩，這真是一位奇女子。聽她的口音應當是江浙一帶的人，我於是問她老家是什麼地方。她回

答說是浙江溫州。乍聽之下，我更驚訝了，萬萬沒有想到會在此時此地遇到小同鄉。都說溫州人會做生意掙錢，還沒有聽說溫州人肯爲理念玩命的，何況還是一位姑娘。我當即興奮地改用溫州話告訴她，我也是溫州人。這下子輪到她驚訝了。在詳細詢問了我的身份和情況之後，她主動提議爲我在紀念碑前照一張相。我想也好，這也許是自己這一生最後的留影了。平常我並不重視照相，有時還刻意躲避鏡頭，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所參與過的許多重要事件或場面，大都沒有留下任何個人影像。

拍照前，我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紀念碑上書寫的那一行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心情頗爲複雜。站在高高聳立的紀念碑前，耳邊響著持續不斷的槍聲，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忽明忽暗的幾堆篝火在閃爍著，在這種現場氣氛下照相，不能不讓人充滿了英雄就義時的感覺。

拍完照，她向我索取了溫州老家的地址，說一定會將這張照片寄到我溫州的家中。說實話，我並不在意能否收到這張照片，因爲當時連自己能不能活著離開天安門廣場都無法確定。可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一直沒有收到這一張照片，反而讓我十分擔憂，擔憂的當然不是照片，而是她----一個有見解、有膽量的攝影個體戶姑娘，不知她是否最終躲過了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劫難。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待在屠殺現場攝影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爲了留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平民百姓的罪證，爲了將歷史事件真實地記錄下來，許多人因此付出了流血犧牲的慘重代價。中共當局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都十分忌諱留下殺人的記錄，凡是發現有人在屠殺現場攝影，總是立即毫不留情地開槍掃射。但是，還是有許多人勇敢地冒著生命危險，以攝影或錄音等各種方式，千方百計地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真相記錄下來。

北京大學數學系一九八七級學生閻文，北京市人，平常是同學們口中的"小倒爺"，屬於腦子靈活，早期在校園裏靠倒賣東西發了點小財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閻文在得知了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訊息後，不聽同學好友們的再三勸阻，扛著那

時還不多見的私人攝像機離開北京大學校園，趕到了屠殺情景最慘烈的西長安街。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閻文在木樨地拍攝屠殺現場情景的時候，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右腿主動脈中彈，鮮血噴湧而出。民眾將他被送到海軍總醫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阜成路六號）搶救，終因流血過多，不治身亡，年僅二十二歲。閻文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的太子峪公墓福南區第十一排。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培攝影班”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生陳來順，北京市人，也是在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屠殺民眾的消息後，帶著照相機匆匆趕到天安門廣場，自覺承擔起記錄歷史的責任。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從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陳來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平房屋頂上照相，可能是由於閃光燈引起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注意，沖著他開槍掃射，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頭部，當場不幸遇難，年僅二十三歲。

陳來順遇難後，他的同班學員集資在位於北京香山的金山陵園購置墓地安置其骨灰，並立有墓碑。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的一位青年教師（恕我目前尚不能提及他的名字），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五點多鐘，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用小型錄音機完整地記錄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並進行血腥清場的整個過程。事後，這位青年教師堅定地對我表示，無論將付出什麼代價，他都要將錄音帶保存下來。

在此，不能不提到許多中國官方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他們雖然受到中共當局嚴密的控制，嚴令不許報導與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行動相關的新聞，也知道相關的新聞根本無法刊出或播出，但仍然出於職業道德和良知的選擇，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民眾的事件發生後，不顧禁令，冒著生命危險，“私自”在槍林彈雨中記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的真相，爲歷史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記錄。

目前已知有三位姓名及身份確定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遇難。

第一位是《中國冶金報》的記者里慧泉，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五歲。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里慧泉在西長安街的六部口路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擊中，不幸遇難。他的遺體遲至六月十一日才在北京郵電醫院被發現，頭部已消失不見，是一具無頭屍。

第二位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俄語部副主任張汝甯，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二歲。他的遺骨葬於北京西郊石景山區的福田公墓。

張汝寧畢業於北京大學俄語系。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是星期六，是他的休息日，張汝寧本來也想借機好好恢復一下多天來連續採訪學生運動所積累的勞累。但是，六月三日晚上，北京城風雲突變，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並開槍殺人了。身爲新聞工作者的張汝寧再也不能在家裏待下去，他要趕到電臺與他的同事們在一起，向全世界報導這一重要歷史時刻所發生的一切。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多鐘，當張汝寧走出家門穿越馬路的那一刻，正好遇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掃射，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腹部，倒下的地方就在離家不遠的西長安街木樨地橋頭附近。

張汝寧隨即被民眾送到復興醫院，但當時往這家醫院運送的傷員實在太多，醫生無法一一及時搶救。復興醫院臨近木樨地，這個地點民眾的傷亡特別慘重。復興醫院庫存的血漿很快就用完了，而緊急運送血漿的車輛又在途中被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打壞了。

據張汝寧的親人介紹說，張汝寧中的是一顆“炸子”（開花彈），傷勢十分嚴重，整個腹腔都被打爛了。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垂危的生命也漸漸失去了復蘇的希望。親人和同事們一直守候著他，急得一籌莫展。張汝寧與死神一直抗爭到六月四日淩晨，他的親人和同事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在痛苦的呻吟中停止了呼吸。

第三位是北京亞運村《住宅建築》報社的記者蘇生機，男性，遇難時年僅四十三歲。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蘇生機在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

松樹街的一個朋友家中商談工作。晚上六點鐘，看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緊急通告，得知北京局勢惡化，隨即離開朋友家。晚上十一點鐘，有人在天安門城樓旁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前見到過蘇生機，以後再也沒有人見到他。蘇生機的家人至今沒有找到他的遺體。

《中國青年報》作爲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應當算是中國官方的一家大報社，規模可能僅次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當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後，該報社即有大批記者自動奔赴各個屠殺現場採訪，人數可能僅次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過後，天安門廣場已經遭到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四面包圍，不時有流彈或曳光彈在上空呼嘯而過，一位志願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東側被流彈所傷。就在這種情況下，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幾家中國官方報社的記者還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四處採訪。

據清華大學的青年教師海明回憶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過後，他和他的幾位同伴就在天安門廣場北端的中心地帶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採訪。記者向他們詢問了很多問題，諸如“你們覺得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你們準備怎麼辦？”就在採訪之際，一顆子彈擊中了距離他們僅二、三米遠的一座帳篷。

一位《中國青年報》的年輕記者，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抵達天安門城樓前的時候，仍然冒著四處橫飛的流彈，堅持留守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觀察並記錄現場情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五十分左右，又有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及裝甲車抵達天安門廣場西側，軍人胡亂開槍，槍聲不絕于耳，市民和學生紛紛往後逃跑，有人中彈倒地，有人趕忙上前救援。這位《中國青年報》的年輕記者仍然堅持留守在原地，利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崗亭躲避槍林彈雨。就在崗亭後面，他結識了香港《星島日報》赴京採訪的女記者蔡淑芳，槍聲停歇之際，他拉著蔡淑芳的手一起脫離險地。

《人民日報》雖然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但是，該報社的許多記者和編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屠殺事件發生後的

表現，也是可歌可泣。據一位《人民日報》的編輯透露，起碼有十幾個《人民日報》的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歷史鏡頭。《人民日報》的記者與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不一樣，他們始終同學生和市民戰鬥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在屠殺現場直接獲得，屬於第一手的資料。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沒有一個《人民日報》記者交出手中的照片和錄音帶。可以肯定，他們將不惜代價保護這些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責任者和殺人兇手的可靠證據。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當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開始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消息後，許多《人民日報》記者即自動自發地奔赴各個屠殺現場。一名常駐紀念碑底座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於當晚八點鐘即離開了天安門廣場，趕到了後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殺人最多、景況最慘烈的西長安街。這位記者一直到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過後，才從西長安街回到《人民日報》報社彙報情況。

這位記者對報社的同事說，他一直在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現場情況，數以千計的民眾奮力攔阻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但沒能成功。當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驅散民眾繼續向前挺進的時候，他馬上躲到馬路旁邊的樹叢裏，蹲在一堵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一動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裝警察仍然沖上前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導致他受了傷。

另有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西郊的五棵松一帶就開始一直跟隨著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的龐大車隊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只要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一開槍，他就立即臥倒在地，每一次當他爬起來重新前進的時候，總會發現身旁有人已經中彈，不能再站起來而永遠躺下了。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一帶，他看見武裝警察部隊的防暴隊官兵揮舞警棍、發射催淚瓦斯彈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緊接著跟進的是大批全副武裝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軍人。

這一支為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開道的武裝警察部隊的防暴隊，是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5 支隊第 8 中隊（該中隊又

稱“防暴中隊”或“機動中隊”)，由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司令部內衛處副處長王志強少校、第 5 支隊副政治委員李林中校、第 5 支隊第 8 中隊中隊長姜超成指揮率領。事後，王志強、姜超成被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國國務院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

在西長安街各個主要的屠殺現場，幾乎都有《人民日報》記者的存在，在當時沒有手機，通訊不發達的情況下，他們冒著極大的風險，千方百計地將屠殺現場的消息儘快發回報社。將近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一個《人民日報》記者第一個打電話回報社報告屠殺現場的消息，說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端槍對準道路兩旁的民眾平射了。這位記者帶著哭泣聲說，木樨地一帶民眾傷亡嚴重。

這時候，報社的另一部電話緊接著響起鈴聲，《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個記者打電話來彙報西長安街屠殺現場的情況。他說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有一個女記者，在西長安街的電報大樓附近被沖散，下落不明。《人民日報》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聞訊馬上讓接電話者轉告大家：凡是能遇見的本報記者，請通知立即撤離屠殺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人身意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過後，開始有記者陸續從屠殺現場回到《人民日報》報社，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一九四零年代國共內戰時期的《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在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流血事件中，高集曾經被國民黨政權的憲兵警察毆打致傷，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還親自表示慰問。高集不可能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

在《人民日報》報社的總編室裏，張寶林向報社同仁敍述了他在木樨地一帶如何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大批市民和學生中彈倒地，血灑西長安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經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候，聚集在《人民日報》報社總編室裏的人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憤，起先是低聲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從屠殺現場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的總編室。

在屠殺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報社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都是北京市和外地的讀者詢問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情況的，他們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消息。《人民日報》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

將近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人民日報》報社的電話鈴聲繼續響個不停，其中一個是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屠殺情況，接電話的人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個時候起，凡是有人來電話詢問北京發生的屠殺情況，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做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的第一次。

《人民日報》領導層當時的表現也不能不令人欽佩。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主持報社夜班工作的是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六月二日下午，學生運動爆發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人民日報》報社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的最高權力機構），拿出一份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佈自己即時開始休病假。此時，《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已經在休病假，他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李仁交代說，報社一切工作暫時交由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大家，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事先對此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錢李仁其實是託病抗命，與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如出一轍，在這個非常時刻，這些軍人和文人表現了相同的道德良知。

錢李仁是從胡耀邦的共青團中央系統升上來的，當時身爲中共中央委員，作爲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社長，經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熟悉中共高層內幕。他突然以"休病假"的名義離開工作崗位回避，引起報社眾人敏感。因此，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四點鐘，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佈"錢李仁休病假"的消息時，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事件發生後，許多報社同仁湧進了《人民日報》總編室。時間已接近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

十一點鐘，平日此刻，《人民日報》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經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爲《孫亘同志的一封信》。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轉來的，信中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嚴厲批判。

據悉，孫亘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這封信的全文不僅上綱上線，而且充滿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共中央宣傳部明令《人民日報》要適當修改文字後才予以刊登。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最後成爲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

除了孫亘的這封信，還有一篇稿件準備發排，那就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所發表的電視講話稿，其他再也沒有準備什麼稿件，大家都在等待著有關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最新消息。

大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三十分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經拼好版，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觀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使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位置的兩條新聞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體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新聞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大樣，隨手簽字付印。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上述“國際新聞”的內容和標題，尤其是標題，都是針對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平民百姓的。這顯然是《人民日報》有良知的編輯和記者在新聞封鎖的情況下，使用“小動作”對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平民百姓的暴行表示抗議。

在中國的新聞界，《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算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中共當局對上述這類被他們稱之爲“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解放軍戒嚴部

隊的軍人大開殺戒以後，《人民日報》有良知的編輯和記者不再滿足於這些“小動作”了，他們自從《人民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命發表題爲《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四•二六社論）以後一直背著黑鍋，遭受到北京學生和社會各界的普遍責罵。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當《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第一次上街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時候，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終於獲得了北京學生和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事後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個時候，有一位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俗稱“部長樓”的第二十二號樓上，有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裏被子彈擊中身亡。北京的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來電話報告民眾的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紛紛把目光轉向主持工作的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事實上，陸超琪願意接替錢李仁主持這段時間的工作，本身就說明他已經做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爲個人患得患失。但是，《人民日報》畢竟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通常負責向各報社發通稿的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也就是說，新華社保持沉默，不願承擔責任。

一些記者哭著對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一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吩咐說，記者可以把有關的稿子先寫出來，至於稿子如何安排處理，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陸超琪出生于廣西容縣，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一九四九年開始在《人民日報》工作，一九八六年擔任副總編輯，可謂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裏脫胎換骨出來的英雄。此時，陸超琪召集了另一位值班副總編輯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

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的《人民日報》應該使用通

欄黑框，對屠殺事件的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表示贊同，但有人發問，郵局不發行怎麼辦？（當時中國的報刊都統一由郵局發行）大家商量決定，分頭準備，報紙印出來之後，編輯、記者親自到北京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要報導北京屠殺事件，關鍵是核對民眾的傷亡數字。當兩位最先從西長安街屠殺現場回來的記者動筆撰寫稿子的時候，其他人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北京各醫院和北京市紅十字會，瞭解民眾的傷亡情況。

前後不到半小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題目是《北京這一夜》。另外，除了記者們主動打電話查詢外，友誼醫院、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醫院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傷亡者的情況。有些電話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達醫院的民眾打來的。在電話中，有的人破口大罵，有的人泣不成聲，大多數的人是邊哭邊說。記者們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候，早已過了平常《人民日報》報社所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面添加文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裏，反復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二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講話稿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講話稿的下面是《孫亘同志的一封信》。

然後，陸超琪自己動手修改題爲《北京這一夜》的稿件，最後壓縮成一則電訊新聞，言簡意賅。陸超琪告訴版面編輯，預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此刻都明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不可能出加上通欄黑框的悼念死難者的版面了。但是，作爲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關於北京屠殺事件的新聞，仍然不失爲中共黨報的一個突破。

《北京這一夜》的稿子修改完畢後，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

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

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左右，陸超琪辦公桌上的那部紅色電話機響起了鈴聲。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電話。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以直通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最高領導層。那位總編室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叫陸超琪接電話。這個電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王唯純打來的，他負責與《人民日報》保持聯繫。這是北京發生屠殺事件當夜《人民日報》所聽到的唯一的“中央聲音”。

王唯純在電話中告訴陸超琪，《解放軍報》報社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送過去，一定要刊登。陸超琪表示疑問說：新華社早已經關機了。王唯純根本不加解釋，只是蠻不講理地說：“這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說：有關今天解放軍戒嚴部隊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准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超琪反問道：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唯純沉思了一會，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開了鍋似的。編輯、記者，包括編輯主任、副總編輯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陸超琪與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商量了一下，決定《北京這一夜》的稿子照上不誤。不過，陸超琪又慎重地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

這時候，《解放軍報》的社論傳真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廣場還只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包圍之中，數千名學生仍然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尚未結束，但《解放軍報》的這一篇社論中已經有這樣的字句：“（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包括“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包括《解放軍報》的這一篇社論，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好的。

《解放軍報》報社的一位朋友事後透露說，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好多天，《解放軍報》的這一篇社論就已經寫好，並且嚴令《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王唯純第二次打來電話，詢問道：《解放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超琪回答說：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王維純追問道：放在什麼位置？陸超琪回答說：由於上面有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和李鵬的講話稿，社論只能放在下面。王維純又問道：你們如何報導天安門廣場清場？陸超琪回答說：簡單講了一下。王維純想了一下，說：就這麼樣吧。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的稿子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後來也成爲陸超琪的一條罪狀）然後，陸超琪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一個記者這時從天安門廣場打來電話，稱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全部佔領了天安門廣場。陸超琪看了一下手錶，五點鐘整，於是，將稿子的開頭改爲："本報六月四日淩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當局嚴密控制下唯一一個在第一時間向外界報導北京發生屠殺事件的中共"黨報"消息。

值班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北京這一夜》的稿子僅成爲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佈置，在第一版左上方預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後不易調整。陸超琪拍板決定：不管空出多少地方，就這麼刊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

於是，就成了後來讀者們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加了花邊的大框，其中疏疏落落幾行文字，唯有《北京這一夜》的標題十分醒目。看起來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篇文章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爲，乃無奈之爲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四點鐘，《人民日報》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首先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的處理情況，然後突然宣佈：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會議決定向中共中央打報告，請中共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最後，陸超琪又請在座的各位編輯主任、版面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儘量不要

出門，以安全爲要。說到此處，陸超琪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淩晨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四點鐘的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紮了三十八小時。從普通的記者、編輯到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他們都知道，《人民日報》的這一頁歷史即將結束。【注釋 93】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陸超祺在大清查運動中成了重點清查對象，翌年，離開工作了四十一年之久的《人民日報》報社。陸超祺雖然離開了新聞最前線，但仍然念念不忘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爲了保留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他將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從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至《人民日報》報社的領導班子被撤換爲止，六十五天之內，自己在《人民日報》報社內的所見所聞，寫成了《六四內部日記》一書。

《六四內部日記》一書在一九九九年，也就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十周年的時候完稿，但因爲政治原因，延至二零零六年初才在香港出版。陸超祺在題爲《爲了未能忘卻的記憶》的序言中，點名批評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和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當年故意激怒學生，激化矛盾，早有預謀要乘機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拉下臺。陸超祺指出：“中央有兩種不同聲音，有人利用群眾運動作爲權力鬥爭的籌碼以後，他們還沒有把政敵打倒之前，根本就不想讓矛盾緩和下來。”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前後，表現突出，而且廣爲人知的中國新聞工作者，當屬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當紅的女主播杜憲(全國政協委員)和男主播薛飛。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晚上七點鐘開始播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杜憲和薛飛一反常態地身穿深黑色衣服，滿臉戚容，聲音嗚咽，播新聞就像是念悼詞，一副難以掩飾的哀傷悼念之情。爲此，杜憲和薛飛獲得了民眾廣泛的尊敬，但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此消失於主播台和電視熒幕。

薛飛離開中央電視臺主播台後的境遇不是很好，先是被調到中央電視臺社會教育部當編輯，一九九二年辭職，揮一揮衣袖沒有帶走一片雲彩，以個體戶的身份遠赴匈牙利創業謀生，曾經擺地攤賣貨。薛飛在異國他鄉風塵十載，浪跡天涯，多少

事欲說還休。二零零一年，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薛飛回歸故國，像是漂泊的遊子，歸來時已是鬢染飛霜。

杜憲於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是著名演員陳道明（在電視劇《末代皇帝》中扮演溥儀）的妻子，在她離開主播台後，北京民間盛傳有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告誡陳道明，從今以後你更要善待杜憲，一點也不得委屈她，否則北京民眾一人一口唾沫都會將你淹死。稍後有一則以訛傳訛的小道消息傳出："末代皇帝"陳道明要和杜憲鬧離婚了！向來熱血澎湃的北京人聽說後怒不可遏，嚷嚷道："丫的陳道明他敢，咱哥們兒抄傢夥把他給廢了！"幸而陳道明和老婆杜憲的關係"鐵"得很，這才免去被大卸八塊的厄運。

杜憲作爲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的女主播，其端莊高雅的形象深入人心，素有"中國第一女主播"的稱號。杜憲離開主播台後，被分派到中央電視台經濟部當編輯，業餘時間進入經濟管理研究生班進修。

杜憲到經濟部報到的時候，經濟部全體同人離座起立歡迎，鼓掌長達數分鐘，令她熱淚盈眶，不知所措。這則花絮成了上峰爲之皺眉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後來，當薛飛調到社會教育部的時候，中央電視臺高層領導特別下達指示：不得搞任何歡迎儀式類的"小動作"。但據目擊者說，薛飛到社會教育部報到那天，仍然受到了社會教育部同人"熱情而不過份"的歡迎。

無論是當電視台新聞主播還是編輯，杜憲年年都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後來，杜憲出任電視片《中國小城鎮》的主持人，跟隨攝製組走遍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等地。一九九二年六月，杜憲辭職離開了中央電視台，到美國佛羅裏達大學做訪問學者。二零零零年一月，杜憲受聘於香港的鳳凰衛星電視，主持《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穿越風沙線》、《尋找遠去的家園》等節目。

杜憲在美國當訪問學者期間，曾經受邀出演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女主角郭燕，計畫將與夫婿陳道明同台演出。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由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投資拍攝，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導演馮小剛、李曉明是名滿中國大陸電視界的"侃爺"，風靡中國大陸的電視連續劇《渴望》就是他們

一輪胡侃侃出來的。他們為了說服杜憲出演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女主角郭燕，先是沖著陳道明發動攻勢：“我們在戲裏給郭燕辦一場婚禮，讓她風風光光地嫁給你。你們當年沒這氣派吧？這回補辦婚禮，留個盛裝紀念照！”

陳道明先到紐約，看過劇本，對有關郭燕的情節多有不滿。《北京人在紐約》劇組居然二話不說，立馬就改。一切都為了杜憲這尊活觀音降世而讓路。杜憲進入劇組後不久，各種壞消息就追殺而至。原來，《北京人在紐約》一劇未拍已先造勢，中國國內相當關注。而今最不利於劇組的就是杜憲其人——她能有限度地出鏡和獲准赴美，並不意味著她的政治舊案已經了結。她居然從一個被解職的電視台新聞主播，成為一個為大眾引頸企盼的電視劇集的紅角兒，這對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防線是一種惱人的撩撥。所以有傳聞說，只要有杜憲入戲，將來《北京人在紐約》電視連續劇的播出就有數不清的麻煩。真要那樣，劇組上下一幫鐵哥們兒就白折騰了，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貸款也白扔到大西洋裏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還可能因此而破產關門。左右權衡，大局為重，杜憲、陳道明夫婦宣佈退出《北京人在紐約》劇組。

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主任李丹則是一位鮮為中國國內民眾所知的英雄，堪稱當代中國最勇敢的新聞工作者之一。歷史必將記住李丹這個名字。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當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民眾事件發生的時候，李丹正在北京國際廣播電臺現場直播英語新聞，他勇敢地脫稿播音，向全世界的英語聽眾報導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中國的首都北京開槍屠殺市民和學生的暴行。李丹脫稿播報的話音剛落，隨即被接管電臺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抓走，下落不明。

李丹歷史性的廣播內容全文如下：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裝甲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裝甲

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軋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當李丹播完上述廣播內容，北京國際廣播電臺馬上換成另一名播音員的聲音。但是，這歷史性的一瞬間，已經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ＢＢＣ）及時地捕捉到了，全程錄了音，並在播放相關新聞的時候，把這一段來自於北京的“最真實的聲音”重播了一遍。

一位當時身處北京的外國記者也收聽並及時錄下李丹上述的廣播內容，他感慨地表示：“邪惡要想贏得勝利所需要的就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但這位勇敢的中國記者面對恐怖卻沒有沉默。”【注釋 94】

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天安門廣場熄燈之舉，中共當局事後辯解稱，天安門廣場上熄燈之舉，僅僅是作爲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行動開始的一個信號。這真是所謂的欲蓋彌彰！軍隊行動的信號向來是採用發射信號彈的方式，更傳統的方式是吹號，根本毋需採用熄燈的方式。

其實，天安門廣場熄燈的真正目的，是在於進一步製造恐怖氣氛，增加學生和民眾的心理壓力，並借助於黑暗以掩飾血腥清場行動的真相。俗話說：“風高放火天，月黑殺人夜。”指的正是這種情況。可以作爲旁證的是，殺人最多、景況最慘烈的西長安街，屠殺之夜也曾經熄燈。熄燈之舉，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尙昆等人有關武力鎮壓行動的謀劃非常精心細密。

此時，紀念碑底座西側，在距離紀念碑底座不到二、三十米的地方，有學生用棉被、帳篷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火苗在風的吹動下閃爍著，看不清點火者的面貌。點火者可能是爲了驅除熄燈後的恐懼，也可能是爲了表達不屈的抗爭，借此向

屠殺者表示：來吧，清場吧！開槍吧，我就是靶子！陸續有一些人特意趕過去，圍繞著篝火席地而坐。

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也有一團團火焰在閃動著，似乎是先前被民眾放火燃燒的編號爲“零零三”的裝甲車的餘火。

在紀念碑底座周圍，陸續又點燃了幾堆篝火，一些學生不斷添加易燃物，篝火越燃越旺。閃爍不定的火光，輝映著紀念碑底座一帶一面面迎風飄揚的校旗和一張張佈滿堅毅的殉道者似的臉孔。

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過後

就在天安門廣場熄燈之後不久，早已列陣于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的部分裝甲車和坦克開始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實施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

這些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裝甲車，隸屬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這些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坦克，隸屬于陸軍第 38 集團軍屬下的坦克第 6 師。

借助於隱約閃動的火光，只見位於天安門廣場北部中央地帶的“民主女神”塑像首當其衝，在裝甲車或坦克的強烈撞擊下轟然傾倒，然後是一座座的帳篷被裝甲車或坦克碾倒，連同帳篷內爲數不詳的學生，這些疲憊已極的學生尚在夢鄉之中。黑暗遮住了罪惡，裝甲車和坦克的轟鳴掩蓋了學生慘死前所發出的淒厲聲。

我的心也被輾碎了，爲那些在帳篷中酣睡休息的學生。他們實在太疲憊了，從精神到肉體，都已經到了極限。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以來，這些學生爲了堅守住天安門廣場，每個晚上都在經受著“狼來了！狼來了！”的緊張壓力，全神貫注地加以防範，絲毫不敢鬆懈。時至今日，當惡狼真的出現了，並惡狠狠地撲過來的時候，他們卻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下付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許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樣緊張的氣氛下還會有學生在帳篷裏睡覺休息的事實，完全是因爲沒有親身經歷過天安門廣場上那一段艱難困苦的日子的緣故。前面我曾經提到，一些在中國政法大學帳篷中休息睡覺的學生被我強行叫到紀念碑底座一帶與學生隊伍會合，其中我所熟悉的兩位學生雖然也被我強行叫走，但是，一直到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爲止，仍然處在朦朧的睡意之中，只知道自己是被同學們連拖帶拉地弄出天安門廣場的，而對於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具體情形毫無記憶，就連四周持續不斷的槍聲也未能使他倆清醒過來。這兩位學生自從五月十三日參加絕食請願行動以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天安門廣場，已經疲憊得不能再疲憊了。

正如一位香港英文報紙《虎報》的記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說

的那樣："在北京採訪的時候已知道學生不止一日處於緊張狀態，戒嚴令下達之後，隨時準備軍隊沖進（天安門）廣場，因此，他們已習慣於在吵鬧中入睡。六月一日以後，晚晚都有敵情，但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真的'狼來了'。"【注釋 95】

另外還有一些當事人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儘管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當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分別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北側和南側之後，天安門廣場的情勢已經相當緊張，但仍然有一些疲憊已極的學生在帳篷裏休息睡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二點鐘過後，清華大學的青年教師海明、蔡敖、肖冬、賈毅、慈恩、簡雷、高戈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結伴而行，儘管他們此前在天安門廣場以外親身經歷了血腥屠殺場面，也知道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將天安門廣場圍得像鐵桶似的，天安門廣場上空流彈飛舞，最後的武力清場行動在即，稍早在他們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一顆彈頭落到距離他們只有二、三米遠的帳篷上，但因爲四處奔波了一夜，身體極度勞累，他們還是不顧一切地鑽進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座帳篷中睡覺。

幸運的是，他們當中的賈毅一直半睡半醒的，沒有完全入睡，當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全部熄滅的時候，賈毅感覺情形不對，急忙將熟睡中的同伴一一叫醒，一起撤往紀念碑底座的學生隊伍之中。如果不是賈毅及時叫醒大家，一旦遇上裝甲車和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碾壓帳篷，他們的結局可想而知。【注釋 96】

專程赴北京採訪學生運動的香港《星島日報》女記者蔡淑芳，堅持留守在天安門廣場，最後與學生隊伍一起撤離。蔡淑芳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帳篷中仍有學生在休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到四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恐怖的氣氛籠罩住整個天安門廣場，殺機在四周埋伏，我想到我可能會真的死在天安門廣場上，所以摸黑來到一個帳篷前面，問同學可否借一張鋼床（折叠床----作者注）給我坐下，而帳篷內還有同學在休息，我亮起電筒在筆記本上寫下遺言：我的命運已經跟學生聯結在一起，我不怕死，我肯

定自己是做得對的，能夠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個人的生命早已消失在大時代的洪流之中。”【注釋 97】

山東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學生潘強因爲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以後，四處來回奔波了一整夜，勞累過度，因此，在極度緊張的情勢下不顧同行者的好意勸說，執意要小睡一會兒恢復體力。

潘強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左右，我看見一輛救護車從（天安門）廣場內駛向警戒線，然後停了下來，不久以後又折了回去。(後來知道是侯德健等人前去與戒嚴部隊談判）然後戒嚴部隊似乎開始有所行動，先是向我們這邊打了幾個響聲驚人的催淚瓦斯，我趕快用毛巾捂上了口鼻，但已經吸入的毒煙還是讓我頭暈腦漲，眼淚直流。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了，睡意開始止不住地往上湧。

接著一隊防暴警察向我們沖來，我嚇得一下子鑽進歷史博物館邊上的小樹林裏，趴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我聽見腳步聲在我不遠處搜來搜去，然後聽見領頭的喊了聲‘撤’，一隊人迅速撤走了。

過了沒多久，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突然全部熄滅了。一直坐在長安街北面的一排排(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全部站了起來，開始揮舞著棍棒，發出一陣陣打殺聲，在燃燒的坦克（不是坦克，應該是“零零三”號裝甲車。----作者注)火光的照映下，顯得格外恐怖，猙獰。我知道大事不好，看來很快就要開始清場了，便和北大同學開始撤回（天安門）廣場。

在經過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的小樹林時，我由於連續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加上一夜的緊張，頭實在又暈又困，於是決定在小樹林前躺下先休息一小會兒，以便在清場時頭腦清醒些，否則在黑暗中暈暈乎乎反應呆滯，很容易被誤殺。一起的北大學生勸我先回廣場，我告訴他我打一個盹就來。那知這一躺，使我無意中成爲在‘六四’天安門清場中，最後一隊撤離廣場的隊伍中最後一個歸隊的學生！

印象中我只睡了一小會兒便被凍醒了，哪知睜眼一看，天色已經轉亮。(當時我的電子表顯示是七點十分，但我不能確定表是否準確。）然後我便有一種極不祥的感覺，似乎什麼地方

不對頭，突然間明白天安門廣場上往日嘈雜的人聲和喇叭聲完全沒有了，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靜寂。由於被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廁所擋住視線，我站起身來往歷史博物館面向天安門廣場的西大門方向走去，以便繞出小樹林。

非常幸運的是，我看見一個北京市民模樣的人，在樹林邊向天安門廣場內張望（我至今不敢確定他是公安便衣還是普通市民），而歷史博物館西大門的階梯上，坐滿了一排排（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那位市民見我驟然從小樹林冒了出來，顯得非常吃驚。我急忙問他：‘你知道學生都上哪去了嗎？’他指著東南角說：‘學生都從那邊撤走了。剛才那邊還剩下最後一隊，不知道還在不在。’我一聽大為著急，趕快裝著病了捂著肚子向天安門廣場東南博物館前臨時廁所方向走去。

這時我的左手方是博物館前階梯上坐著的虎視耽耽的一排排（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右面是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北面停滿了坦克，南面（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將天安門廣場上的拆毀的帳篷、衣物和雜物堆在一起，燃起了好幾堆大火，濃煙滾滾。（當時我還想：‘完了，我的衣服和錢全被燒掉了。’）而離我不遠處有幾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和士兵正拿著水龍頭沖洗地面。其中一個軍官抬頭見了我，愣了一下，然後有點氣極敗壞地大喊：‘你知不知道天安門廣場已經戒嚴了？’我回答說：‘我知道，我馬上就走。’

走到博物館南段臨時廁所前，我看見一隊學生和一些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約幾十人坐在地上（後來知道以北醫大學生和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為主），其中還包括兩個躺在擔架上的重傷員和好幾個頭部紮著繃帶的學生。我趕緊加快步子走到隊伍中坐下。儘管隊伍的兩旁都是挽著袖子，手握木棍（很多都明顯是從桌子上拆下的桌腿）的惡恨恨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我心裏還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我低頭悄悄地問旁邊的一男生：‘其他的同學呢？’他輕輕地說：‘出去後再說。’顯然當時周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敵意很濃，看樣子一不如意就要對我們棍棒相向。而隊伍中有的學生腦袋還纏著繃帶，上面滲透著新鮮的血跡。有一個穿白大褂的四十歲左右的大夫，鎮定自若地在和一個軍官進行交涉，全然不顧自己身處非常危險的境地。大約過了十來分鐘，

看來終于達成了協議，軍隊讓出了一條通道，我們就在士兵和防暴警察的‘夾道護送’下，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走出了廣場。”【注釋 98】

除了上述當事人的親身經歷之外，還有一些相關的資料也提到，儘管當時的情勢非常緊張，但在天安門廣場的帳篷中仍然還有學生在休息睡覺。例如，中共當局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所攝製、播放的題爲《北京風波真相》的紀錄影片中，就曾經提到這樣一件事：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隊伍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後，有一個名叫吳斌的學生仍然在帳篷裏睡覺，後來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喚醒。

眼看著坦克和裝甲車從北往南，一路碾壓帳篷，向紀念碑底座挺進，血淋淋的現實殘酷得令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痛悔的淚水倏然流下，我爲什麼沒有事先料想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這群殺紅了眼的畜生能夠做出如此獸性的事情，我爲什麼沒有及時提醒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所派遣專人逐一檢查每一座帳篷，喚醒每一位酣睡中的學生，敦促他們撤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隊伍之中。而今，那些帳篷中的學生都已經長眠，再也無法喚醒他們了……我是一個失職的教師，我將終身爲此而痛悔。

紀念碑底座北側不遠處豎立著一排高逾十公尺的鐵旗杆，學生絕食期間曾經掛滿了旗幟，其中一面寫著“絕食”兩個白色大字的黑色旗幟最爲引人注目。轉眼之間，一輛重型坦克已經推進到那裏，撞倒了位於最西側的一根鐵旗杆。粗大而結實的鐵旗杆，在坦克這個鋼鐵龐然大物面前，猶如弱不禁風的嫩芽，輕易地就被折斷了。我都還沒能來得及看清楚碰撞的情形，鐵旗杆就已經折斷了。

我端坐在紀念碑底座北側的最高一級臺階上，眼睁睁地看著鐵旗杆的倒下，也眼看著那一帶的學生面對快速推進的坦克靜坐不動或根本來不及移動。但是，在黑暗和坦克的轟鳴聲中，雖然極力想看清楚、卻依然很難看清楚那一帶學生的最後命運。由於黑暗，加上帳篷的遮擋和心理的極度緊張，這輛坦克出現得非常突然，根本不知道它的行進線路，不知道它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幾乎是在看見鐵旗杆倒下的同時，我才發現這個赫然出現在眼皮底下的鋼鐵龐然大物。

中共當局指令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裝甲車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顯然是爲了威嚇學生和民眾，事實上也確實起到了威嚇的作用。當粗大而結實的鐵旗杆被輕易折斷之際，我就切實地感覺到，在坦克和裝甲車這種鋼鐵龐然大物的面前，血肉之軀是多麼地渺小。

爲了掩蓋坦克和裝甲車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學生的血腥事實，中共當局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通過各種途經和使用各種方式，做了大量的欺騙宣傳工作。中國官方的有關人員和媒體一再聲稱，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在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後，也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三十分之後，經逐一仔細檢查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每一座帳篷，確認其中已經沒有學生之後，才拆除帳篷的。

例如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少將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直到學生和群眾走完之後，我們部隊的幹部戰士逐一地對他們臨時搭起的帳篷進行了檢查，看看裏面有人沒有。在確實弄清這些帳篷沒有人之後，才用車輛把這些帳篷和各種障礙物，還有那個什麼女神像統統推倒。”【注釋 99】

張工少將的這個發言，既改動了坦克和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的時間，又回避了坦克和裝甲車碾壓帳篷和帳篷中的學生，以及撞倒紀念碑底座北側不遠處的鐵旗杆的事實。粗大而結實的鐵旗杆，可不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能夠徒手拆除得了的。此外，爲了儘量減低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血腥程度和震撼性，張工少將在發言中並刻意以“車輛”代替坦克和裝甲車。這說明張工少將和中共當局都十分清楚，坦克和裝甲車與“車輛”相比較，帶給海內外各界人士的感受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而，假話說多了，總會自相矛盾，露出破綻。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有兩則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報導曾經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鐘左右，當學生隊伍被迫開始撤離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坦克和裝甲車已經越過長安街與紀念碑底座之間大約五十米的距離，也就是已經進入天安門廣場北端大約五十米，緊接著，坦

克和裝甲車快速推進到紀念碑底座北側不遠處，然後採用與撤退的學生隊伍相同的速度，尾隨學生撤退隊伍向天安門廣場東南方向移動，始終與學生撤退隊伍末尾保持著大約二十米左右的距離。

根據《人民日報》上述報導所透露的坦克和裝甲車的行進路線，位於紀念碑底座北面和“民主女神”塑像四周的大量帳篷，恰恰正好是坦克和裝甲車由北往南，從天安門城樓前行駛到紀念碑底座北側的必經之地，坦克和裝甲車無法飛躍而過。退一步說，假設真的是象張工少將在記者會上所說的那樣，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逐一檢查過每一座帳篷，那也只能是在學生隊伍被迫撤離之前，而不是在學生隊伍被迫撤離之後，否則，在大量的尾隨學生撤退隊伍的裝甲車和坦克經過之後，還有什麼帳篷可言？

此外，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有一則報導明確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多鐘，“民主女神”塑像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推倒。《人民日報》這則報導所說的推倒時間和推倒方式，與張工少將所說的不同。針對同一件事情，雙方的說法不一，那麼，說法不一的雙方總有一方是說謊者。

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張東旭中尉，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寫了一篇題爲《推倒“女神像”》的署名文章，詳細敍述了自己奉命帶領八名士兵推倒“女神像”的經過。他寫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零六分，我們到達（天安門）廣場西側，向前沒走多遠，在朦朦朧朧的燈光中就看到了那個所謂‘民主女神’像。她像個幽靈似的，矗立在一片帳篷堆裏。

……

我們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停下，面向（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清場任務。

……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時許，團政治處主任王劍和教導員馮書靜來到我們連。王主任嚴肅地對我說：‘團裏奉命派人推倒女神像，這個女神像是高自聯的一面旗幟，他們不

是要和女神（像）共存亡嗎？咱們推倒她，摧毀他們的精神支柱！’

……

經過短時間的準備，四時十一分，我率領由八名精明強幹的戰士組成的小組，攜帶衝鋒槍和木棒，成一路縱隊由東向西進入天安門廣場，在距國旗旗杆三米遠的欄杆前停住。

……

正在這時（指推倒民主女神塑像的時候----作者注），（天安門）廣場華燈重放，清場開始了。學生們見‘神像’倒地，大勢已去，正紛紛向東南方向撤走。隨後，裝甲車開過來，把那個推倒在地的女神像連同底座壓得粉碎。”【注釋 100】

張東旭中尉所說的“推倒女神像”和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時間，與《人民日報》的上述報導和張工少將的說法都不同。張東旭中尉作爲當事人，他的說法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張東旭中尉在署名文章中提到女神像“矗立在一片帳篷堆裏”，“裝甲車開過來，把那個推倒在地的女神像連同底座壓得粉碎”，在這之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並沒有像張工少將所說的那樣，“逐一地對他們（學生）臨時搭起的帳篷進行了檢查，看看裏面有人沒有”。

張東旭中尉在文章中明確提到，裝甲車開到天安門廣場北部中央地帶、碾壓民主女神塑像的時間，是在“（天安門）廣場華燈重放”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鐘。當時，學生隊伍尚未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

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刊登了一篇題爲《一位目擊者談六月四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的文章，其中援引一位匿名的所謂“目擊者”的話說：“（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檢查了每座帳篷後，裝甲車才開過來，我親眼看著帳篷裏沒有人。”

中共當局所找到的這位所謂“目擊者”顯然具有非凡的特異功能，因爲他的目光竟然能在黑夜中穿透厚厚的帆布，洞察帳篷內部的狀況，而且還具有廣角鏡般的視野，因爲憑借他的一雙眼睛就可以看清楚數目眾多的帳篷裏都沒有人。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在紀念碑底座南北兩側共有三百多座帳篷，在“民主女神”塑像四周即有二十座帳篷。

謊言畢竟是謊言，說多了最終無法自圓其說。如上所述，在中共當局攝製、播放的題爲《北京風波真相》的記錄影片中，就曾經提到在學生隊伍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後，有一個名叫吳斌的學生仍然在帳篷裏睡覺，而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喚醒。記錄影片《北京風波真相》中的這個事例，一方面證明了《北京日報》所提到的這位具有"特異功能"的所謂"目擊者"的證詞不可靠，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在當時緊張的情況下確實仍有學生在帳篷內睡覺休息。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的報導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北京日報》的報導，在涉及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時候，都象張工少將的發言一樣，刻意回避了"坦克"的存在。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將被坦克或裝甲車撞倒的"民主女神"塑像說成是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所推倒的，在《北京日報》的報導中，只提到"裝甲車"而沒有提到"坦克"。

這一切，都在在說明中共當局確實很忌諱坦克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事實。其實，動用坦克進行清場或軋人，與動用裝甲車進行清場或軋人，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裝甲車與坦克一樣，都屬於軍用裝備，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裝甲車在和平時期駛入首都北京，並驅逐、碾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市民和學生，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行。難道不使用坦克驅逐、碾壓市民和學生，而使用裝甲車或"車輛"驅逐、碾壓市民和學生就可以嗎？中共當局卻在"車輛"、"裝甲車"、"坦克"這一點上大作文章，恰恰說明他們是做賊心虛。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十分左右，也就是在天安門廣場熄燈後十分鐘左右，侯德健、周舵等一行人急如星火般地趕回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所在地----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南角的"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帳篷裏，侯德健、周舵等人神色凝重地向學生領袖們介紹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情況，並繼續勸導學生領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這時在場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領導成員包括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人。

此時，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與學生隊伍在一起的學生領袖，據我所知，有周峰鎖（清華大學物理系一九八五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梁擎暾、馬少方、張志

清（中國政法大學一九八七級雙學士班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邵江等人。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至六月四日淩晨，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鎮壓之後，有一些學生領袖曾經離開天安門廣場，趕赴西長安街等發生屠殺的地方，與浴血奮戰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在一起，例如，學生領袖熊焱（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碩士研究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就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傷員，邵江兩度趕赴西長安街，曾經在西長安街燕京飯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十九號）一帶搶救中彈的傷員，T 恤上沾有遇難者的鮮血和腦漿。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比較知名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王丹和起過主要作用的學生領袖王超華（女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此時均不在天安門廣場。吾爾開希已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左右在發表廣播講話的時候因過分激動而暈倒，被救護車送往醫院。王丹則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十一點鐘左右因有事，乘坐民營的四通集團公司的車子離開天安門廣場，趕回北京大學校園。

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宣佈以柴玲爲總指揮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成立之後，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就移交了天安門廣場的指揮權，按計劃將總部遷往北京大學，致力於校園的民主建設。王丹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晚上七點鐘在北京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委會廣播站的廣播發言中，對此曾經做過一番說明：“今後，要把鬥爭的注意力放在校園民主建設上，要使學生自治會組織合法化，繼續辦好民主沙龍，還要成立新的社團。” “各界都要成立自己的組織，要成立知識份子同盟、工會、農會，要尋找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式的人物。”

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重新點亮。與此同時，從人民大會堂處的中國官方的廣播中傳出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一則通告。該通告全文如下：

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這則通告如此之簡短，與此前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幾則緊急通告相比，就可發現這則簡短的通告是有心人臨時特地授意起草並播放的。這則簡短通告的播放，純屬中共當局欺世盜名之舉，企圖以此掩蓋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進行血腥清場行動的真相。根據這則簡短通告的內容，似乎中共當局對數千名堅守不撤的學生網開一面，讓他們和平而安全地撤離天安門廣場，做到了仁至義盡，從而根本不存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行動。

而事實上，在這則簡短通告播放之前，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行動早已開始，難道驅逐射殺天安門廣場邊沿地區的學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所在的天安門廣場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天安門廣場北端中央），就不算是清場行動嗎？難道裝甲車和坦克快速推進到紀念碑底座北側前，一路上撞倒“民主女神”塑像、鐵旗杆、碾壓一大批帳篷以及帳篷內酣睡休息的學生，也不算是清場行動嗎？

嚴謹地講，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歷時四個小時左右，開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即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分別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北兩側的時候，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五點三十分左右，即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學生大隊人馬被迫從東南角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時候。

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時間是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在這個階段，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封鎖包圍，阻止趕來聲援的民眾進入天安門廣場，使得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孤立無援。

在這個階段，殺死殺傷民眾最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部

署在天安門廣場北部區域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其次是部署在天安門廣場南部區域的空降兵第 15 軍。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54 集團軍和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63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24 集團軍，基本上沒有殺人。

第二階段：時間是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兩點鐘左右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在這個階段，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清除並佔領除了紀念碑底座以外的天安門廣場區域，爲最後驅逐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完全佔領天安門廣場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在這個階段，在天安門廣場北部區域執行任務的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殺死殺傷民眾最多；在天安門廣場南部區域執行任務的是空降兵第 15 軍，殺死殺傷民眾其次；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54 集團軍和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63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24 集團軍，仍然基本上沒有殺人。

第三階段：時間是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五點三十分左右。在這個階段，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將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驅逐出天安門廣場，完全佔領天安門廣場。

在這個階段，執行任務的主要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陸軍第 27 集團軍奉命派遣一支特緝分隊，執行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任務。陸軍第 54 集團軍和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仍然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 63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24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在學生隊伍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以後，陸軍第 65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的“尖刀營”奉命負責清理紀念碑底座。這個階段的情勢比較混亂，無法辨別那支部隊殺死殺傷民眾比較多

或比較少。

中國官方在播放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上述簡短得只有一句話的通告的同時，還播放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共同署名的“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該通告全文如下：

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的中心，我國舉行政治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新中國的象徵。但是，現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市場。爲了儘快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根據首都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

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後必須立即離開廣場。

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

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

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這項通告無疑是最後一道通牒，在天安門廣場造成了一種非常緊張壓抑的氣氛，又有一些人零零散散地從南面離開了天安門廣場。而在這個時刻選擇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心裏都很清楚，繼續留下來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面。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燈亮之際，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已經從天安門廣場東、西、北三個方向逼近紀念碑底座，黑壓壓的一片，潮水般地湧向紀念碑底座。

由於身後不遠處就是高大的紀念碑，阻隔了視線，我看不見天安門廣場南面的情景，但事後據當時身處紀念碑底座南側的學生反映，同一時間，在紀念碑底座南側也有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向紀念碑底座逼近，並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裝甲車。

那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是從

四個方向同時向集結在紀念碑底座的學生隊伍逼近。

具體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15軍部隊，其中以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爲主。其他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及武裝警察部隊，則擔任後備和警戒任務。

從天安門廣場北端由北往南作爲第一梯隊向紀念碑底座推進的，是陸軍第38集團軍的部隊，包括坦克第6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集團軍直屬工兵團和步兵第112師的四十二輛裝甲車，共計兩千多名官兵。從天安門廣場南端由南往北作爲第一梯隊向紀念碑底座推進的，是空降兵第15軍的部隊，包括空降兵第43旅、空降兵第44旅。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的命令，陸軍第38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15軍部隊同時於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開始向紀念碑底座推進，於六月四日清晨五點三十分在紀念碑底座會師。

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設置在人民大會堂，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中將、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上將等人坐鎮指揮。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陸軍第54集團軍和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的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南側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63集團軍的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北側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39集團軍和陸軍第24集團軍的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擔任警戒任務，陸軍第27集團軍和陸軍第65集團軍的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擔任警戒任務。

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制訂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也應當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但由於該師的裝甲坦克車隊在開進途中一再受阻，第一輛裝甲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五十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已經開始，先頭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十八分，率領先頭部隊的團長羅剛上校說：“此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清場完畢，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所控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二、三分左右，侯德健、周舵等人開始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向在場學生介紹他們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接觸談判的情況，並向學生們發

出主動撤退天安門廣場的呼籲。直到此時，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廣大學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這件事。學生們紛紛議論這件事。很多學生在震驚之餘，公開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

侯德健廣播講話的大意是：在沒有經過廣大同學們的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去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讓學生隊伍主動、和平地撤離天安門廣場，希望大家諒解。血已經流得夠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我相信現在依然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爲了中華民族，爲了民主事業，我們要珍惜生命，保持有生力量，準備爲民主事業作長期的鬥爭。現在我們少流一滴血，將來民主事業就多了一份希望。這次學生運動，這次全民民主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勝利了。

侯德健的廣播講話激起了在場學生們的強烈反響，紀念碑底座四周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怒罵聲，幾乎是侯德健每講一句就被罵一句。許多學生怒不可遏，斥責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軟骨頭。有學生站起來大聲喊叫："侯德健，你快滾蛋吧！別來影響我們了！"這些怒罵的學生原來一直對侯德健充滿敬意，甚至有點崇拜。

一些憤怒的學生甚至沖進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所在地，也就是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帳篷，或是搶奪話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其中一些學生渾身血跡斑斑，顯然是來自於各個血腥屠殺的現場，親手抬過遇難者的遺體或搶救過傷患。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內曾經一度陷於混亂，還是副總指揮李錄較爲沉得住氣，指令糾察隊員們將無關人員一一清出學運之聲廣播站帳篷。

隨後，劉曉波、周舵等人也相繼發表了廣播講話，內容大致與侯德健相同，中心話題都是呼籲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避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鎮壓鋒芒，一方面可以避免發生更大的流血衝突，另一方面可以保存民主的力量。

引起我注意的是，劉曉波在發言的時候首先表示，我同意侯德健和周舵撤離的意見。這也許是爲了強調一下呼籲學生領袖們帶領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本來不是他的主意吧，因爲他原先並不主張撤離，而是表示要死守到底。

周舵在發言中說：“同學們，我們現在多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我們已經答應解放軍戒嚴部隊儘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天安門廣場。

同學們，面臨這最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全副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存我們的有限的力量，必須要在天亮之前撤離，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同學們以學校爲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劉曉波在發言中說：“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現在我們如果想爭取民主，就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市民們冷靜下來，這場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已經爲學生作出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一定要保存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

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下來，撤離廣場，我們已經到了關鍵性時刻，要作出具體的民主形式，少數服從多數，希望你們能呼籲全體市民、同學們，不要製造混亂。我們現在必須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請少數服從多數，全體人民都會感謝你們。”

侯德健再次發言，表示自己會最後一個撤離，他說：“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決定的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不到廣場上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民撤離，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劉曉波立刻跟著發言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們四個人的共同信念，不到最後一人離開，也不會離開，希望大家協助我

們，爲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大家應該有秩序的撤離。”

周舵也再次發言表示：“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和劉曉波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的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著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結成生死之交。”

在劉曉波與周舵發言之間，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邵江宣讀了一份冠以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名義的宣言，宣言的主題也是號召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更大的流血犧牲。

這份宣言實際上是由邵江個人臨時起草的，征得了在場的學生領袖周峰鎖、梁擎暾等人的同意，目的是爲了配合侯德健等人的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呼籲。

一位自稱是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的人也發表了廣播講話，表示贊同和支持侯德健等人的意見，呼籲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爲民主運動保存有生力量。他說：“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剮了一刀，一刀以後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裏只是無謂犧牲。同學們，我認爲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一種幻想的表現，有些同學以爲戒嚴部隊不敢對我們下手，這完全是幻想，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最後，高新也發表了廣播講話：“在這裏，我們四個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面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工人、市民，爲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謝謝大家。”

高新最後又強調說：“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七點鐘之前，戒嚴部隊必須清理天安門廣場，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請大家務必冷靜。”

（以上侯德健等人的廣播講話根據現場錄音記錄整理）

在侯德健等人發表廣播講話的過程中，學生隊伍中不斷發出“不撤”、“不能撤”的呼喊。許多學生怒不可遏，各種怒罵聲不絕於耳。

此時，在紀念碑底座東側，也開始有大批的裝甲車和坦克逼近，發出一陣又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一帶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並齊聲呼喊“快點撤！快點撤！”在這種情況下，集結在紀念碑底座北面和東面的學生有時候很難聽得清楚學運之聲廣播站廣播中的發言。

憤怒和恐怖籠罩著紀念碑底座一帶，氣氛緊張得已經臨近爆炸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和學生雙方都處於極度的憤怒與緊張狀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最怕雙方發生磨擦和衝突，一個小小的摩擦或衝突，都可能會導致大量人員死亡的結局。因此，一直堅持與學生共存亡的北京各高校青年教師，紛紛不約而同地挺身而出，安撫學生們的情緒，呼籲大家始終要保持鎮定和秩序，千萬不能慌亂，不可輕舉妄動，在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到達紀念碑底座的時候，誰也不許有任何過激言行，儘量避免流血衝突。

北京大學哲學系馬列主義教研室的青年教師陳坡，在呼籲學生保持鎮定和秩序的同時，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與學生們生死與共，誓死捍衛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成果，決不向獨裁專制者屈服。他揮舞著緊握拳頭的右手大聲鼓勵說：“同學們，我們的身後就是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能在這裏流血犧牲，這是我們的光榮和驕傲。”

陳坡個子不高，一副書生相，此刻卻給人形象高大的感覺。四周的坦克、裝甲車以及密集的槍聲，進一步襯托出他的豪氣。此情此景，使我感慨萬分。

陳坡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二級碩士研究生，在校讀書期間熱心於社會政治活動，身邊集結了一批熱心改革的青年學生，其中包括我的溫州同鄉孫永平（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三級碩士研究生）、我的鐵杆小弟兄錢立（北京大學自然科學史一九八三級碩士研究生）。陳坡與陳子明、王軍濤等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均有密切的交往與合作。

不知爲何，當年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學位時對陳坡有所誤解，認定他也屬於只動口不動手的空談家之流，以至於不屑與他來往。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在他身陷囚室的那段時間裏，無限的悔意曾時時折磨著我。陳坡後來雖然免於刑事起訴，獲釋出獄，但被北京大學開除了教職，回到故鄉河北省石家莊市。

我和劉蘇里也起身進入學生隊伍做安撫工作，並逐一地叮囑、告誡坐在紀念碑底座北面最高一級臺階上的特別糾察隊員們，無論接下來出現什麼情況，作爲特別糾察隊員，一定要保持鎮靜，堅守崗位，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同時告訴他們，無論是生是死，作爲教師，我一定與他們在一起。

望著眼前這些熟悉而可愛的學生，想到自己身爲教師卻再也無法盡到保護學生的職責，很難抑制複雜的感情衝動，一次次強忍住說不清滋味的淚水，唯一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在生死考驗之際，我與自己的學生們在一起，我沒有恐懼和退縮。

這時候，我發現與特別糾察隊員們一起坐在最高一級臺階上的有一名女學生，經詢問得知她是從天津來的。她有些膽怯地解釋說，與一起赴京聲援的同學們失散了，如今孤立無援，無處可去。我本來想勸她離開，聽了她的話之後只好叮囑她身旁的特別糾察隊員，儘量照顧好她。我還與她聊了一會兒天，因爲我對天津頗有感情，我的堂姐一家人居住在天津，堂姐夫是天津警備區部隊的軍官。每年學校放暑假或寒假，我總是要到堂姐家住一段時間。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快速逼近紀念碑底座的事實說明，中共當局對於通過談判讓學生隊伍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並無誠意，解放軍戒嚴部隊對侯德健等人曾經有過的允諾純屬虛僞的仁慈，因爲並未給侯德健等人說服學生領袖、動員廣大學生，以及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留出應有的時間，甚至都未給侯德健等人留出向學生們介紹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情況的時間。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的計劃蓄謀已久，早已確定了的血腥鎮壓計劃和時間是絕對不會改變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極權專制的歷史，殺人已經成爲維護專制政權必不可缺少的手段，現在他們蓄意要殺一批人以洩憤，以維

護專制體制的權威。

轉眼之間，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逼得很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頭戴鋼盔的特種部隊軍人（應該是偵察兵部隊），他們一律平端衝鋒槍，手指緊緊扣著槍機，如臨大敵，組成戰鬥隊形，彎著腰，以蛇字形向前推進。面對著手無寸鐵、靜坐不動的和平請願學生，他們採用這種戰場上的姿態，實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後是成千上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還有少量的防暴警察，除了一部分人手持盾牌和警棍，也都是全副武裝。最後才是督陣的大量的坦克和裝甲車。

眼看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一步步逼近，數千名學生依然沒有絲毫的慌亂，只是不約而同地伸出右臂，對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做出Ｖ字形手勢，使勁地揮動著。一陣陣悲壯的《國際歌》歌聲再次從學生的隊伍中響起。

唱完《國際歌》,許多學生一遍又一遍地齊聲高喊口號：“團結起來，不怕犧牲！團結起來，不怕流血！……”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抵達紀念碑底座北側，在距離學生隊伍前列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住腳步，然後迅速布好了陣式。最前面是一排機關槍，約二十挺左右，架設在地上，機槍手一律頭朝南腳朝北地趴在地上，槍口緊緊瞄準學生隊伍。其後是一排排衝鋒槍手，第一排蹲著，後面幾排則站著，槍口也緊緊瞄準學生隊伍。最後面是人數眾多、陣容更爲龐大的方陣，其中夾雜著少量手持電警棍和又長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在週邊，集聚著人數更爲龐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軍人沒有持槍，或者拿著木棒，或者拿著銅條。

手拿木棒的軍人，隸屬于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沖出來的陸軍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2 師。由於該師絕大部分的槍支彈藥沒有及時運送進來，整個部隊當時只有二十四支衝鋒槍，只能集中提供給先頭部隊使用，在沖出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東北大門的時候一起鳴槍開道。因此，包括該師的師政治委員張鼎文、師參謀長賴豫福和團長董澤平在內的官兵們，幾乎是人手一根木棒。這些木棒都是臨時從桌椅上拆卸下來的。

手拿銅條的軍人，隸屬于從人民大會堂沖出來的陸軍第 65 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該旅也是因爲一部分槍支彈藥沒有及時運送進來，手中沒有足夠的槍支彈藥，包括旅長任留計、旅參謀長在內，許多官兵都是人手一根銅條。這些銅條都是臨時從人民大會堂內階梯的地毯上拆下來的。

很顯然，這是一付典型的血腥鎮壓的陣式，令人禁不住回想起中國大陸的電影中一幅幅有關當年日本侵略軍屠殺中國平民百姓的場景。

在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知識分子的反復勸說影響下，在四周數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幾乎已經用槍口頂住學生們胸口的形勢下，柴玲、李錄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堅守不撤的決心似乎有所動搖，他們難以承擔數以千計學生安危的重責，終於不得不考慮帶領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對此有所解釋，他認爲，留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都是最優秀、最勇敢的分子，應該保留住這批民主的種子，然後撤向全國各地，開花結果。

從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廣播中傳出封從德的聲音，呼籲在場學生立刻用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是堅守還是撤離。封從德解釋說，在目前危急的情況下，我們已經不可能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決定，只能採用最簡單的口頭表決方式，具體做法是，我在廣播中喊叫“一、二、三”之後，主張撤離的同學就喊“撤離”兩字，主張堅守的同學就喊“堅守”兩字，少數服從多數，以聲音的強弱來決定。

在封從德反復解釋幾遍之後，就開始進行了口頭表決。口頭表決的結果是，“堅守”的聲音遠遠超過“撤離”的聲音，在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隊伍中幾乎聽不到“撤離”的聲音，學生們還在對著面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揮舞著V字形手勢，情緒十分高漲，根本就沒有撤離的意願或跡象。但是，被責任感弄得分寸已亂的學生領袖們還是傾向於撤離，決定分批撤出天安門廣場。

廣播中繼續傳出封從德的講話：“同學們，我們平日在這裏學習民主，現在就少數服從多數，分批撤出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底座北側，一個學生站起來憤怒地大叫：“你們才是

少數，我們堅決不撤！”

不遠處，緊接著又有一位學生挺身而出，對著學生人群大聲呼籲：“我們不能撤離，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支持我們的北京市民一定會非常傷心。我們只要堅持到天亮，北京市民每人一塊磚頭，就可以將戒嚴部隊軍人砸跑。”這個學生的後半部說法雖然難免有些天真幼稚，但確實反映了不少在場學生的心聲。他們認爲，如果堅持到天亮，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

天黑和天亮的情況的確大不相同。在天黑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更容易開槍殺人，因爲他們之所以執行開槍鎮壓的命令，除了被中共當局所煽動起來的仇恨心理和立功心切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爲了壯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絕大多數士兵來自于農村，年紀又輕，初次進入首都北京城，本來就膽怯，又遇上數以萬計的民眾攔截，加上中共當局告訴他們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反革命暴徒手持武器殺害軍人。在天亮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少了一份膽怯，清清楚楚地看見眼前的民眾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手無寸鐵，根本不是什麼反革命暴徒，自然就不需要盲目地開槍壯膽，不會輕易開槍殺人。

事實上，青天白日之下，眼睜睜地開槍殺死毫無抵抗力的人，不要說被殺者是一個無辜的人，即使被殺者是一個罪有應得的死刑犯，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做到的事情。自古以來，劊子手的職業絕不是一般人可以勝任的。在這方面，我有親身的經歷。一九七六年底至一九七八年初，我在公安邊防部隊服役期間，曾經多次擔任刑場警戒任務，親眼目睹擔任行刑槍手的武警士兵，面對五花大綁、毫無抵抗力的死刑犯的時候，自己緊張害怕得面無人色、渾身發抖，遲遲開不了槍。有一次，擔任行刑槍手的武警士兵因爲實在下不了手，指揮官將他一腳踢開，自己動手開了槍。這些擔任行刑槍手的武警士兵，通常都是內定的入黨或提升軍官的對象，一方面說是組織上特意安排的政治考驗，一方面給予具體的好處，以實際利益補償因爲殺人而造成的心理傷害。

針對通過廣播“口頭表決”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一事，封從德後來解釋說，當時很難辨別“堅守”和“撤離”聲音的強

弱，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帳篷內的學生們對此說法不一，有說“堅守”的聲音大的，也有說“撤離”的聲音大的。封從德自己覺得“堅守”的聲音似乎略強於“撤離”的聲音，但他認爲這並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因爲呼喊“堅守”的學生可以理直氣壯地呼喊，而呼喊“撤離”的學生則有顧慮，不敢放聲呼喊，一些在內心裏主張撤離的學生甚至都不敢呼喊“撤離”，怕被周圍的人指斥爲怕死鬼。

封從德的這種說法，只是事後爲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生領袖們最終做出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所作的解釋。我作爲親身經歷者之一，認爲封從德的解釋很勉強，也不符合真實的情況。我所在的紀念碑底座北面，學生人數是最多的，超過紀念碑底座東、西、南面學生人數的總和，當時幾乎聽不到“撤離”的聲音，並不是象封從德所說的“堅守”的聲音似乎略強於“撤離”的聲音。封從德說想撤離的學生不敢放聲呼喊“撤離”，甚至不敢呼喊“撤離”，這僅僅是他的主觀臆測而已，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封從德作爲親身經歷了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過程的當事人之一，應該清楚這一點：當時仍然端坐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約五千名學生和青年教師，都早已做好了流血犧牲的心理準備，下定了堅守到底的決心。主張撤離的人，在此之前的幾個小時內早已經陸續悄悄地走了，不管是出於理性考慮也好，出於恐懼害怕也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之前，也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西長安街等地方開槍屠殺之前，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至少逾十萬。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之前，也就是在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和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前，天安門廣場上至少尚有二、三萬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之前，也就是天安門廣場熄燈之前，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人數仍不少於一萬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熄燈之時，是當日天安門廣場上最恐怖的時刻。燈亮之際，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不走的大概已經不超過五、六千人。從熄燈到亮燈的半個小時內，離開的人數按比例是最多的，連僅有的幾名中外記者也被嚇跑

了，再也顧不得記錄百年不遇的歷史了。

封從德能下結論說這些經過一次次考驗而堅持下來的五、六千人中的多數人是會贊成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嗎？

然而，正當柴玲、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準備具體佈置實施撤退行動之時，一群群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一邊鳴槍一邊沖上了紀念碑底座，因而使得侯德健等人力圖促使學生領袖帶領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良好願望成爲泡影。

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五十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五十分左右，在紀念碑底座的北側，一支人數約四十人左右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特種兵小分隊開始沖入學生隊伍。他們身穿迷彩軍服，頭戴鋼盔，端著衝鋒槍，緊貼著紀念碑底座兩側的漢白玉欄杆的邊沿，跨過坐滿各級臺階的學生人群，沖上紀念碑底座的最高層。

在中國軍方的相關資料中，將這支特種兵小分隊稱爲“偵察分隊”、“特組分隊”或“出擊分隊”。特種兵小分隊不僅配備了衝鋒槍，還配備了機關槍，其成員之一、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直屬偵察連的士兵肖緒明就是端著機關槍，從北側沖上紀念碑底座的。【注釋 101】

這批特種兵小分隊的官兵們異常兇狠，眼中閃爍著仇恨的火焰，一邊不斷地對空鳴槍警告，一邊用槍托猛烈襲擊坐在地上紋絲不動的學生，迅速開出一條通往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通道。他們不斷兇狠地喝斥著：“別動！別動！”“坐下！坐下！”同時搶奪學生手中和身邊的一些物品予以毀壞，其中包括答錄機、照相機、書本和書包等。當場就有數十名學生頭破血流，包括女學生，許多人倒地不起。

事後，中國官方矢口否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過程中開槍，但是，中國軍方的相關宣傳資料中卻在無意中透露了開槍的秘密：特種兵小分隊的成員開槍擊毀學生廣播站的高音喇叭，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剛剛沖上紀念碑底座的時候，就已經有特種兵小分隊的成員開過槍，“一名戰士朝天鳴了槍，槍聲劃破了夜空。緊接著又有兩人開槍把（紀念）碑上的喇叭打啞了。槍聲一響，碑座上、臺階上的學生，本來都是有坐有站的，現在全都趴下了。”【注釋 102】

在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沖上紀念碑底座的過程中，在我的視野之內，學生們沒有任何的暴力反抗行爲，甚至都沒有張嘴呼喊抗議口號，只有個別學生站起來對準沖上紀念碑底座的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拍照，當即引來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的瘋狂吼叫：“不許拍照！”並揮動槍托一陣亂砸，將拍照的學生砸倒在地，將照相機砸爛。

學生們沒有任何暴力反抗行動，這正是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能夠迅速跨過數千名學生的密集隊伍，沖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原因。

與此同時，在紀念碑底座的西側，也有數十名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端槍沖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從穿著打扮來看，他們與從北面沖上紀念碑底座的軍人應當屬於同一支部隊。

據當時身處紀念碑底座南面的學生事後反映，南面也分別有數十名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端槍沖上來，穿著打扮都是一個模樣。

這批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迅速佔據了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四角，首先端槍對準綁在紀念碑上的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兩組喇叭一陣猛射，兩組喇叭當即被打爛了。廣播中呼籲撤退的聲音消失了，侯德健、周舵等人希望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良好願望也隨著槍聲而落空。被槍聲所打斷的學生廣播中的最後一句話，印象中好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官兵們----"

隨後，這批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又迅速扯下懸掛在紀念碑上的橫幅標語，拆除侯德健等人所處的絕食棚。這些軍人的動作相當粗野，拆除絕食棚的時候，雜物四處紛飛，有的落到了我和周圍學生的身上。

從我身後的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南角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所在地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我的心不禁爲之一緊，默默地想：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完了！更擔心的是學生領袖們和堅守在那裏的糾察隊員們的生命安全。

這些沖上紀念碑底座的解放軍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是從人民大會堂中出來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偵察兵。他們真不愧是經歷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對越作戰的軍人，兇狠勇猛，動作敏捷，槍法奇准，幾個點射，就將綁在紀念碑上的兩組廣播喇叭給打了個稀爛。開槍的這一幕，就發生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看得非常真切。我當時依然鎮定地坐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級臺階上。

根據中國軍方的相關資料透露，開槍射擊學生廣播站高音喇叭的命令，直接由設在人民大會堂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下達，最後交由陸軍第 27 集團軍直屬偵察營副營長兼偵察第 1 連連長劉建軍上尉執行，"劉建軍一聲令下，戰士孫濤、

朱躍青舉槍點射，命中了懸掛在紀念碑東南角高處的一個喇叭的芯上；戰士許團輝又是一個點射，西南角的喇叭也當即作啞。”開槍射擊喇叭的三名士兵都是陸軍第 27 集團軍直屬偵察營偵察第 1 連的偵察兵。【注釋 103】劉建軍上尉當時處身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上，就站在我的身後不遠處。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學生們的心目中具有崇高而神聖的地位，因爲從小到大所受的一貫教育使他們知道，巍峨矗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爲了紀念那些自一八四零年中（國）英（國）鴉片戰爭以來，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英勇獻身的先烈們而建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竟然對準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讓學生們感到非常憤怒。一些學生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對著這批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呼喊：“不要對準紀念碑開槍，那是人民共和國英雄的紀念碑呀！”而招來的回應，則是一陣更爲密集的槍聲。

根據《戒嚴一日》一書記載，這批沖上紀念碑底座的特種兵小分隊，由來自於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三個偵察連和一個步兵連的二百零五名官兵所組成，分編爲偵察第 1 連、偵察第 2 連、偵察第 3 連和步兵第 4 連，帶隊的指揮官是陸軍第 27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參謀趙勇明少校。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特種兵小分隊在人民大會堂裏整裝待命，任務是搗毀設立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二十五分，特種兵小分隊奉命出發，從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出去，在天安門廣場熄燈的那一刻，快速到達出發集結地點，並從西、北、南三個方向突入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學生人群，在學生沒有任何暴力抵抗的情況下完成了佔領紀念碑底座的任務。

根據特種兵小分隊的一名成員回憶說，他們的任務中原來還有逮捕“高自聯”（中國官方對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稱呼）領導成員這一項，但根據事態進展，恐怕“節外生枝”，他們臨時放棄了這一行動計劃。

在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軍史中，也有與特種兵小分隊相關的一段記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半，集結在人民大會

堂裏的 27 軍部隊接受了佔領高自聯指揮部的命令。集團軍迅速成立前進指揮所，由集團軍偵察 1 連、第 79 師偵察連、第 80 師偵察連和第 235 團 4 連四個連隊的二百多名官兵組成出擊分隊，由集團軍司令部少校偵察參謀趙勇明帶隊指揮，並制定了三套行動方案和二十餘種處置緊急情況的措施。

（六月）四日淩晨出發前，集團軍錢軍長(錢國梁少將----作者注)、政治部朱主任(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將----作者注)給出擊分隊作動員並提出要求，在場的五名集團軍黨委常委集體爲官兵送行。

與此同時，各師分別對連以上幹部進行了緊急動員，對部隊進行了戰鬥編組。第 79 師刁九健政委還率一個組前出至懷仁堂（在中南海裏面----作者注）附近勘察地形，做好保衛重點目標的準備。

六月四日淩晨，38 軍等部隊已經從東、西長安街等路段強行突進到天安門一帶，並在金水橋一線東、西兩側和廣場西南側集結，對天安門廣場形成了半包圍態勢。天安門廣場四周的高音喇叭反復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清場的緊急通告，要求在場人員迅速離開。廣場上許多圍觀群眾逐漸離去。

（六月四日淩晨）四時三十分許，出擊分隊由大會堂東門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方向出擊。集團軍偵察 1 連和第 79 師偵察連擔任主要突擊，選擇火勢較弱的地點越過火障，沖到紀念碑附近。第 80 師偵察連擔任右翼突擊，迅速進至紀念碑西南側，成一線展開。

出擊分隊接近目標時，紀念碑底座及其四周擠滿了人群。現場總指揮、集團軍偵察處參謀趙勇明指揮出擊分隊迅速從正面和兩翼向‘高自聯’指揮部突擊。集團軍偵察 1 連抵近紀念碑北側，連長劉建軍、指導員李相武分別率尖刀班直插紀念碑基座的‘高自聯’指揮部。尖刀班迅速搭人梯翻過紀念碑欄杆，佔領‘高自聯’指揮部。隨之把綁在紀念碑體上的高音喇叭打啞、沖進‘高自聯’指揮部廣播室，關掉發電機，繳獲全部廣播器材和大批宣傳品。

與此同時，第 79 師、第 80 師兩個偵察連分別打掉了紀念

碑南側和西南側的喇叭。本來出擊分隊還負有抓捕學生領袖的任務，但因爲學生走得很緊密，爲了避免節外生枝就沒有動手。

到（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二十五分，集團軍出擊分隊完成了佔領‘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繳獲八六一電臺一部，發電機三臺，收錄機一臺，擴音機八臺，高音喇叭五個，‘高自聯’指揮部記錄本三個以及大量傳單、標語。”

當時，我與特別糾察隊的成員坐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面的最高一級臺階上，當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沖上來之後，已經從最後一道防線變爲第一線，首當其衝。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端槍分排在我們的身後，槍口幾乎緊貼著我們的後背，生與死之間似乎已經沒有界線。剎那間，我的思維一片空白，隨後腦海中始終迴響著一個聲音：死吧，死吧，給我一梭子子彈，讓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親，想到苦苦愛戀多年的姑娘。

在我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產生了面臨死亡威脅的感覺，過去曾經很多次在書本中接觸到“思維一片空白”這個字眼，如今才真實地體驗到了什麼才是“思維一片空白”，原來這是人類面臨死亡威脅時的精神狀態。

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們不斷地施暴，時而對我們用槍托砸、槍管捅、大腳踢，時而在我們的頭頂端槍一通亂放，槍聲震耳欲聾。在持續不斷的暴力下，幾乎沒有人不受到傷害，我的腰部也受了傷。不少特別糾察隊員先後被砸下或被踢下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最高一級臺階，但都堅強地爬起來，一聲不響地依舊坐回原處，一動不動，甚至都不屑於回頭望一眼特種兵小分隊的軍人。

只有先前那位來自天津市的女學生，不知道是因爲挨了毒打還是忍受不了恐嚇，發出一陣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可是，在這個時候，誰也無法保護她，誰也無力制止特種兵小分隊軍人們的暴力行爲了。暴行令人憤怒，我看到周圍的一些學生擰眉攥拳，硬生生地忍受著，有的學生緊咬牙關，幾乎快要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從佩戴的軍銜標誌來看，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側指揮特種兵小分隊軍人的是一位上尉軍官。根據中國軍方的相關資料記載，這位上尉是陸軍第 27 集團軍直屬偵察營副營長兼偵察第

1 連連長劉建軍。看樣子，劉建軍的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右手拿著五四式手槍，左手拿著對講機。較之士兵，劉建軍的態度還算溫和，始終沒有看見他動用武力。他站在我們的身後，不停焦急地催促："你們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話，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接到了命令，無論如何必須完成清場任務。"語氣中似乎帶有一絲懇求，或許他懷有惻隱之心，不希望見到更多的學生流血。

偵察第 1 連的指導員李相武上尉，當時也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層上，但不在北側。

在此之前，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的政治委員季新國上校在與侯德健、周舵等人接觸的時候，就曾經明確地說過："上級命令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在天亮前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天一亮，市民出來，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一點，你們應該能夠理解。"

我看見身後不遠處有一個特種兵小分隊的士兵在默默地流淚，不知是因爲什麼原因。

相比之下，我們的遭遇還算是幸運的，那些位於紀念碑底座臺階之下的學生們遭遇更悲慘，他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數百人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特遣分隊，而是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在中共當局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兇殘地綁架和殺害解放軍官兵"的欺騙煽動下，早已對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充滿了刻骨仇恨，認爲這些學生才是禍根。此時此刻，這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兇狠地撲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隊伍，用棍棒、槍托和刺刀進行猛烈的襲擊。場面之暴烈，令人終生難忘。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持續使用暴力的過程中，從學生隊伍中不斷傳出許多男女學生委屈而憤怒的抗議聲音："你們打我們？！……""你打呀！讓你打呀！……""……我們……打不死呀！……你們真打啊？……你們，這些當兵的，真有能耐哪！……"最讓人揪心的是一陣陣女學生痛不欲生的哭泣呼喚聲，一個被軍警的暴力驚呆了的女學生呼喊著："媽媽！……"淒厲的聲音撕裂了

拂曉的天空。

針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的兇狠殘暴，外界有傳言說，這是因爲中共當局事前讓他們服用了興奮劑。這個傳言不足爲信。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之所以如此兇狠殘暴，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煽起了他們的仇恨之火。有許多資料和消息來源都表明，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進入北京之後，中共當局就立即將所有的部隊官兵封閉在臨時駐紮處，實行封閉式的管理，除了公務之外，任何人不得步出駐地營房，與外界完全隔絕，除了中國軍方的《解放軍日報》，不許接觸外界的任何資訊，同時，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復向他們灌輸“反革命暴徒兇殘地綁架和殺害解放軍官兵”之類的欺騙宣傳，激起他們的仇恨怒火。

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提交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軍委的一份報告中就寫有這樣一段文字：“指揮部制定了《戒嚴部隊正規化管理規定》，實行了‘全時、全員、全方位’封閉式的管理，對人、槍、車形成了有秩序的三管措施，確保了戒嚴部隊自身的穩定和安全。”“凡是人員都是受控制的，凡是活動都是有組織的，凡是行爲舉止都是符合條令要求的。”【注釋 104】

當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端槍沖上來的時候，坐在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學生隊伍最前列的，大多是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他們在中共當局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之後堅持不離開北京，表明他們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最堅決的一群人，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底的呼聲甚至遠勝於北京學生。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襲擊下，許多學生當即頭破血流，倒地不起。但周圍的學生依然端坐不動，甚至都沒有去扶持或觀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學。如果不是身處其中、身臨其境者，很難理解這種見死不救的現象。因爲在當時的情形下，大家都已抱定必死的信念，認爲反正遲早都免不了一死，無非只是時間有先有後而已，所以對周圍的流血已經近乎麻木。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湧入學生隊伍，此時此刻，在紀念碑底座的臺階下，

學生隊伍依然端坐不動，坐在前幾排的學生不僅受到棍棒、槍托和刺刀的襲擊，而且遭受到蜂擁而來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無情踐踏，慘叫聲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場面益發混亂，誰也無法看清楚到底倒下了多少學生。

傷亡急劇增加，尤其是由於不斷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踐踏，位於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部分學生終於被迫站立起來，但站在原地不動，依然堅持不撤，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襲擊也仍未停止。那些堅持不站起來或根本就來不及站起來的學生，則遭受到更爲嚴重的踐踏，慘叫聲響成了一片，已經無法分清發自何人之口。

此時，我已與幾位特別糾察隊員一起被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強力從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面的最高一級臺階上打下來，但依然堅持坐在稍低幾級的臺階上。我發現劉蘇里也在附近，想起他的妻子曾經有過的囑咐，就奮力擠過去坐在他的身旁。

我坐在臺階上，眼睜睜地看著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學生不斷地先後倒下，但由於人群過於擁擠，情景相當混亂，加上心情緊張和光線昏暗，實在無法看清楚每一個人倒下的具體原因。不過，可以肯定兩點：一是凡是端坐不動而倒下的學生幾乎都是因爲遭到踐踏；二是至少有相當多的學生是由於遭到棍棒的襲擊，由於這些棍棒又粗又長，不停地在學生們的頭頂舞動著，非常引人注目。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鐘都在流血。然而，紀念碑底座北面的數千名學生依然堅守不撤，同時，他們依然堅持著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始終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沒有一個人有過任何過激的言行。

臨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鐘的時候，侯德健、周舵等人從紀念碑底座南側過來，出現在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隊伍中。他們一邊走一邊去拉拽那些依然堅持端坐不動的學生，大聲疾呼趕快走，想儘量地多帶動一些學生撤離。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未引起多大的迴響，只有紀念碑底座東北側的部分學生聽從他們撤離的呼籲，開始從紀念碑底座的東北角往外

撤離。

正當侯德健、周舵督促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趕快撤離的時候，一名堅持不走的學生對周舵表示說，他絕不會和當兵的對打，只等著當兵的來拖走他。周舵回應說："你不動手，怎麼能保證當兵的也不動手？都像你們這樣理智嗎？"這名學生毅然決然地表示說："那也好，就讓我流血犧牲好了，不流血不足以喚起民眾。"

侯德健、周舵好話歹話說盡，嗓子都說啞了，總算才有幾個學生勉強從地上站起來了。可是坐在地上的人群裏馬上有學生大聲喊叫："不許走，誰走誰是叛徒！"站起來的學生於是又坐下了。

周舵趕忙接上去厲聲質問："是誰在說這種話？！同學們出了意外，你是不是準備承擔責任？"在年輕的學生面前，長鬍子的知識份子畢竟還是有些權威，面對周舵的厲聲質問，沒有學生再搭腔了。

接著，一個男學生說："走，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邊說邊站了起來。就這樣，一些學生開始跟著周舵、侯德健動了起來，往東南角移動。

大約也就在此時，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隨著紀念碑底座南側的學生隊伍從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撤離天安門廣場。當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端槍沖上紀念碑底座之時，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隨即撤離了位於學運之聲廣播站帳篷內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當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時候，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已經隱身於紀念碑底座南側的學生隊伍之中。【注釋 105】在這種情況之下，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自然也就無法執行預定的拘捕學生領袖的計畫了。

這時候，我與特別糾察隊員們依然堅持不撤。但是，侯德健、周舵等人的出現，使我聯想到身處紀念碑底座南側的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大概已經撤離了，因爲侯德健、周舵等人原先是與他們在一起的。集聚在紀念碑底座東面、西面、南面三個方向的學生人數較少，也許頂不住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

暴警察的猛烈襲擊，已經開始撤離了。

我心想，先前侯德健等人在廣播中輪番撤退呼籲，或多或少動搖了學生們和平堅守到底的軍心，如今又群龍無首，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人數雖然較多，但在持續不斷的暴力襲擊之下，遲早也得撤離。於是，我不顧一切地站起來，對著特別糾察隊員們大聲疾呼：大家不要慌亂，隨時做好撤離的準備，手挽住手，注意相互間的保護，撤退時決不能丟下身旁任何一位同學，尤其是女同學。

學生領袖邵江當時處身於紀念碑底座東側的學生隊伍之中，據他事後回憶說，在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端槍沖上紀念碑底座不久，紀念碑底座東側和南側的學生隊伍就開始撤離了。至於到底是東側的學生隊伍先撤離的，還是南側的學生隊伍先撤離的，他不能確定，印象中幾乎是同時撤離的。

據調查瞭解，最先撤離的應該是位於紀念碑底座西側和南側的學生隊伍，其次是位於紀念碑底座東側的學生隊伍，最後是位於紀念碑底座北側的學生隊伍。

六月四日淩晨五點鐘

大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鐘左右，天色已經朦朧發亮，視線越來越清晰了。也許是中共當局給解放軍戒嚴部隊所下達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時限快要到了，處在紀念碑底座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也終於紛紛開槍了。從端槍的姿勢看，有的槍口朝天，有的對準人群。頓時，紀念碑底座上下，槍聲響成了一片，全是“噠噠噠”的點射，分辨不清是衝鋒槍還是自動步槍。由於現場極度混亂，我已看不見原先那一排架設在地上的機槍的動向。

於是，紀念碑底座第二層和第三層各級臺階上的部分學生終於站立起來，開始慌亂地向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撤離。時間大約在淩晨五點十分至五點二十分之間。

許多撤離的學生很不情願，紛紛對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大聲喊叫。一個男學生嘶聲力竭地喊叫道：“你們真有能耐呀！你們……你們真偉大啊！……”另有一些男學生大聲哭喊著諷刺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真勇敢哪！真勇敢哪你們！真勇敢！……”“你們戰無不勝！你們戰無不勝呀！……”另有一個男學生終於忍不住哭喊著叫罵：“我回去就去拉隊伍，操你X 的！……”

只見一個男學生哭天搶地，痛不欲生，被兩邊的同學強行架著往外撤。突然間，他爆發出一陣撕心裂肺般的嚎叫：“這個國家完了，中國完了！中國，你完了！”說完，全身癱軟地向地面倒去，但被同伴們死死拽住。

我和特別糾察隊員們此時也先後站立起來，隨著學生隊伍向紀念碑底座東南角緩慢移動。在我們的身旁，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士兵們仍然不時地開槍，但我始終未看見他們直接對準學生隊伍射擊。

一直到我們轉過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擁擠在狹窄的、所謂撤離通道口的時候，處在紀念碑底座第一層各級臺階以及臺階下空地上的學生們仍然站在原地不動，不能向外移動，因爲前方的學生隊伍尚未撤離完畢，正擁擠在紀念碑底座東南角一帶，隊伍移動得極其緩慢。

紀念碑底座上下，槍聲還在密集地響著。據陸軍第 65 集團

軍守備第 3 師第 9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陳曉利在題爲《一個老兵的回憶----真實的 89 年北京動亂》的回憶文章中透露，當時，有一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站在毛主席紀念堂北側朝天鳴槍。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驅逐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隊伍的階段，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指定空降兵第 15 軍空降兵第 44 旅的旅長武運平大校擔任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現場指揮官。武運平大校的代號是“二號”，手握一部報話機，直接與位於人民大會堂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聯絡，清場指揮部指揮官的代號是“一號”。

在紀念碑底座東南角的所謂撤離通道口，學生隊伍仍然遭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襲擊，不時地有學生在大棍棒的襲擊下直挺挺地倒下。在我身邊不遠處，一位學生的頭部裂開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

實際上，學生們撤離紀念碑底座一帶，決不是如中共當局事後所聲稱的，是什麼主動的、和平的、有組織的、沒有任何傷亡，而是在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武力血腥鎮壓下，經受了慘重的流血犧牲，然後才被迫匆匆撤離的，根本談不上什麼主動、和平和有組織。

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就完全可以想像，在當時那種血腥而混亂的情況下，別說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和學運之聲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一開始就已經首當其衝地被摧毀，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們自顧不暇，在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沖上紀念碑底座的那一刻，即已經匆匆撤入紀念碑底座南側的學生隊伍中，即使他們有心組織學生撤離，也已經爲時過晚，全無可能了。自從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沖上紀念碑底座之後，在紀念碑底座的北側既見不到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們的身影，也聽不到他們的任何聲音，而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人數是最多的，超過了東、南、北三個方向學生隊伍人數的總和。

需要指出的是，天安門廣場歷來被中共當局視爲重要的政治活動中心，因此在天安門廣場的各個地方，包括紀念碑底座

四周的每一根燈柱上，中國公安部門早都已經安置了自動攝影鏡頭，那裏的一舉一動，全都即時展現在中國公安部門的視野之中，並全部被錄影存證。

據說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整個過程中，就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人，以及中央和北京市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集聚在臨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南海，通過電視大螢幕觀看天安門廣場清場的現場錄相，及時地下達命令和指示。有知情者透露，楊尚昆、陳希同、周衣冰、劉振華等人是在人民大會堂內觀看，並直接指揮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北京軍區後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題爲《難忘的八天八夜》的署名文章中透露了相關的資訊。傅水生奉命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晚上隨同北京軍區後勤部副部長李中仁少將、北京軍區後勤部衛生部處長閻照榮上校，提前進入人民大會堂，與先期到達的北京軍區後勤部副參謀長管慶仁大校等人會合，爲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部隊提供後勤保障。

傅水生中校在署名文章中寫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時左右，部隊有關首長相繼來到人民大會堂。隨後政府有關領導也來了。一塊決策清場計畫。爲了減少衝突和避免流血，將軍們、領導們徹夜未眠。”【注釋 106】

也就是說，中共當局手中握有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的錄相資料。可是，時至今日，中共當局不敢播放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的錄影資料，而只是有選擇地播放了其中的幾個鏡頭，並抹去了包括槍聲在內的所有現場聲音，以遮掩解放軍戒嚴部隊曾經在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的事實真相。這證明中共當局心中有鬼。

爲了證明學生們是主動的、和平的和有組織地撤離天安門廣場的，中共當局事後播放了一個鏡頭：學生們打著一面旗幟處於紀念碑底座東南角位置。這面有幸被中共當局所選中的紅底黑字的正規校旗，正是我所任教的中國政法大學的旗幟，但集結在這面旗幟下撤離紀念碑底座的學生並非全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也就是說，在當時緊張而混亂的情況下，中國政法

大學的學生象其他學校的學生一樣，並未能夠有組織地集結在自己學校的旗幟下撤離。

當我和特別糾察隊的一些隊員們撤離紀念碑底座一帶、到達“毛主席紀念堂”東側的時候，曾經一度停頓下來用這面旗幟召集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陸續聚集到這面旗幟下的人數僅有二十餘人，不到當晚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在天安門廣場人數的十分之一。就連我們手挽手離開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臺階的數十名特別糾察隊隊員，在撤離的過程中也被衝垮擠散，只有七、八個人緊隨著這面旗幟。此後，我和劉蘇里等人始終打著這面旗幟，一直到撤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爲止。

難道這就是中共當局所說的學生隊伍打著旗幟，有組織、有秩序的和平撤離嗎？既然學生的撤離有現場錄影爲證，中共當局爲什麼不把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的現場錄影資料昭示於天下？只要完整地公佈現場錄影資料，真相自然就會大白於天下，一切“謠言”必將煙消雲散。有選擇地公佈幾個錄影鏡頭，不僅不能證明中共當局所一再聲稱的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沒有死一個人，反而增添了新的疑點。

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政治委員季新國上校曾經對侯德健、周舵等人允諾過的所謂讓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安全通道，中共當局事後也反復如此強調。實際上，在當時的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安全的通道。在這個位置，不僅有大量的裝甲車、坦克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嚴密封鎖和擠迫，而且還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欄杆和被裝甲車、坦克所推倒碾壓的帳篷雜物、草坪欄杆等障礙物。

在撤離紀念碑底座東南角的過程中，學生隊伍擁擠不堪，有時甚至擁擠得令人產生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雖然自始至終與兩旁的特別糾察隊隊員手挽手相互扶持，但依然時不時地連跌帶絆，無法穩住腳步，只是順著擁擠不堪的人流一步步緩慢地向前移動。

大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簇擁在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一帶，繼續用棍棒和槍托襲擊撤退的學生，進一步造成了學生隊伍的混亂和擁擠。不時地有學生被擠倒或絆倒，並被洶湧而來、無法止步的人流所踐踏。

耳邊不時傳來一陣陣女學生尖利而淒厲的慘叫聲，有心相救而無力可及，讓人痛苦得心如刀絞，無以名狀。就我視線所及，被擠倒或絆倒的學生就數以十計。確切地說，我們不是自己走出來的，而是被人流硬擠出來的。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糾察隊負責人楊朝暉，一位在絕食請願活動中數次暈倒送醫的學生領袖，就在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所謂的安全通道處被檜柏綠化帶絆倒，而擁擠的撤離人群或因爲無法停住腳步，或因爲不能細辨腳下是否還有活的人體，接連不斷地從他的身上踩過去。

楊朝暉不斷呼喊求救："拉拉我，救救我！"他掙紮了許久，最後用盡所有的力氣伸出一支手，在空中揮舞著，絕望的呼救近乎聲嘶力竭。就在他快要絕望的時候，幸虧原先與他同行的學生領袖梁擎暾在不遠處終於聽到了他的呼救聲，停住腳步，回頭頂開擁擠的人群，一步步艱難地靠近他，奮力將他拖了起來，救了他一命。

紀念碑底座南側和東、西兩側的學生隊伍因爲撤離稍早一點，人數也相對地較少，在撤離的過程中，情況可能會稍微好一些，但也根本談不上是主動的、有組織的、和平的撤離。試問，如果沒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採取一系列的暴力行動，例如開槍射擊綁在紀念碑上的學生廣播站喇叭，掃射並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對學生大打出手，甚至開槍射擊，學生隊伍會撤離嗎？

在我從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撤離的過程中，我沒有看見學生隊伍中有人遭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射擊的情況，只是有許多人遭受到棍棒和槍托的襲擊。而一些慌不擇路，匆忙中脫離擁擠的學生隊伍，三三兩兩地跑向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方向的學生，則遭到一陣陣槍彈的無情襲擊。有人中彈當場倒下，餘下的人又被迫退回到學生隊伍之中。

此時，在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擔任警戒任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主要來自于空降兵第 15 軍，該部隊的軍人都是持槍的；其次是來自于陸軍第 24 集團軍，該部隊的軍人有一部分持槍，有一部分則手持木棍。

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過程中，究竟有沒有學生被打死打傷？這一直是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中國社會學學者朱

曉陽所提供的一盤現場錄音帶，記錄了一位當時被打傷的同學的見證，可以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執行清場任務的時候，曾經在紀念碑底座北側不遠處的旗杆下確實殘酷地施行了暴力，打死打傷了正準備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朱曉陽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六點鐘左右，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從事現場錄音工作。他所提供的《六月三日晚上十時至六月四日淩晨六時天安門廣場錄音》，其中有這麼一段錄音：

錄音者：你是受什麼傷?

男學生：頭打破了。

錄音者：是被警棍打的?

男學生：是警棍，大木頭棍打的。

錄音者：在哪裡打的?

男學生：就是那邊旗杆下頭。

錄音者：就是這裡?

男學生：對。

錄音者：就是剛纔這會兒打的?

男學生：對。她被人家擠倒了，我去把她扶起來。扶起來……我就倒地下了。

錄音者：你們是不是最後撤離的?

男學生：我是最後撤離的。

錄音者：紀念碑上面還有人嗎?

男學生：已經沒有人了。好多女孩，不是踩死了就是重傷，這些兵真他媽厲害。真是慘啊，真是，這政府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政府還怎麼（不清楚）。說好了撤，還要打。

（過一會兒）

錄音者：受傷的人被拉到板車上。

眾人喊：快拉上車！快上車！

西北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七級學生王磊是學生撤離隊伍中的一員，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他親眼目睹兩名學生在他的身旁中彈受傷。

王磊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開始的時候，他處身於紀念碑底座南側。當學生隊伍開始從東南角撤離的時候，他和一部分學生手

拉手組成一道人牆，阻隔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學生隊伍之間。大概淩晨六點多鐘的時候，學生隊伍基本上都撤完了，他和一部分學生組成的人牆也就解散了，大家紛紛朝前門的方向走。

就在此時，背後一陣槍聲響起，在他身旁四、五米遠和七、八米遠的地方，有兩個學生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被從背後射來的槍彈擊中，向前僕倒在地，身子底下的鮮血迅速溢了出來。他在震驚之餘，急忙和幾個學生一起上去搶救，採用在一輛人力三輪車上面架設木板的方式，將中彈受傷的兩名學生放上去，快速送往附近的前門醫院（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前門大街一七六號）。【注釋 107】

學生隊伍一直到撤出紀念碑底座東南角的範圍，到了“毛主席紀念堂”東南側一帶，才顯得不那麼擁擠。大家紛紛緩過一口氣，自然而然地逐漸走成了一列列整齊的隊伍。相互顧盼之間，才陡然發現許多人已經受傷，有的頭破血流，有的身上有血污。有的人衣服很髒，像是在地上翻滾過，樣子看起來很淒慘。又有許多人衣著不整，光著腳板，鞋子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擠丟了。

看起來，一些受傷的學生傷勢不輕，必須依靠同伴們的攙扶才能勉強行走。爲數不少的學生，大多是女學生，臉色慘白，神情呆滯，其中個別的女學生甚至有一點歇斯底里，顯然是在武力清場的過程中，因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過度地使用武力，而受到了太大的精神刺激。

此時，撤離的學生隊伍仍然行進得非常緩慢，因爲大家都悲憤得近似於麻木。許多人手挽著手、相互攙扶著前行，但多數人都挺起胸膛，顯示出一股不屈的神情。

在整個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上槍聲響個不停，其中，有不少曳光彈從不同方向射向天空，顯然是故意發射給遠處的人們看的，營造出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都是朝天發射的假像，企圖以此掩蓋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真相。

背後的槍聲還在密集地響著，紀念碑底座一帶的血腥鎮壓並未因爲學生隊伍已經開始撤離而停止。直到這個時候，撤出來的學生們方才猶如大夢初醒，開始有所反應，越來越多的人

伸出兩個手指形成 V 字形，對著周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有力地揮舞著，對血腥鎮壓行動表示著無聲而強有力的抗議，也顯示出堅強不屈。

我看到，在紀念碑底座與“毛主席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站立著約四、五百名左右的學生，一聲不吭，打著幾面旗幟，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旗幟。但看樣子，他們大多是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外地學生一般都隨身攜帶著或多或少的日用物品，如水壺、背包之類。）這群學生全都默默無語地看著我們撤離，我們紛紛對著他們打出V字形手勢，但很奇怪，他們竟然毫無回應。這種情形不符常情，讓人納悶，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他們是一群誓死也不願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對我們的撤離非常不滿。

當走過“毛主席紀念堂”的時候，我忍不住再次留戀地回顧天安門廣場，只見學生隊伍還在密集的槍聲中源源不斷地撤出，並不時地有學生退出隊伍，加入到那集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旗幟下的人群之中。我在心裏默默地念叨著：再見了，天安門廣場！只要我還活著，一定會再回來的！儘管心中悲憤異常，但我強忍住淚水，不想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面前示弱。周圍的學生大多與我一樣，緊緊咬住牙關，瞪著燃燒著憤怒火焰的雙眼。但也有學生壓抑不住悲憤，兩頰掛滿了淚水，但始終沒有人哭出聲來。

在“毛主席紀念堂”與前門箭樓之間的開闊地，我們看見還有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集結待命，並配備著大量的裝甲車和坦克，他們並未直接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這批軍人排列整齊地列隊坐在地上，戴著鋼盔，穿著藍褲子，顯然是空降兵第 15 軍的官兵。這批軍人不好惹，只要有學生忍不住向他們叫罵“法西斯！劊子手！”的時候，他們就集體起立，兇狠地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然後就開始對著學生隊伍的上空開槍。

雖然空降兵第 15 軍的官兵當時是抬高槍口開槍，但難免有失誤。絕食請願的知識份子高新正好在現場，親眼看到一個面對著自己的學生被一顆流彈擦到頭皮，受傷流血了。這位受傷的學生是安徽煤炭師範學院的，高新說自己看見並記得這位受傷學生所佩戴的校徽。

這時候，正好有一位憤怒的北京市民駕駛著一輛一三零輕型卡車，沖著不遠處的一輛坦克衝撞過去。高新急忙與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的女學生程真、香港赴京聲援的學生沙濤一起，將這輛輕型卡車攔下來，勸導司機說："你現在的任務是運送受傷者。"隨後將受傷的安徽煤炭師範學院的學生送上這輛卡車。

天啊！參加清場行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人數之眾，已經遠遠超出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數，他們本來完全有能力採用較爲和緩的方式，例如將學生一個個強行架走的方式完成清場任務的，而他們卻採用了包括開槍掃射和動用坦克、裝甲車碾壓在內的最血腥的武力鎮壓方式。

在毛澤東時代，曾經發生過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史稱"四五運動"），面對持續多天的示威抗議人潮，中共當局最後也實施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不過，當時的中共執政者既沒有調動大批的野戰軍部隊進入北京，也沒有動用裝甲車、坦克，更沒有開槍射殺民眾。

近些年來，在中國官方出版的諸多書籍中，有關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記載，內容基本一致。有關記載顯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高潮是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當天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民眾多達兩百萬人次。到了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已經大爲減少。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晚上九點三十分，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發表廣播講話，待人潮逐漸散去之後，出動了一萬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個營的北京衛戍區部隊，人人手持木棍、皮帶實施清場行動，並沒有攜帶任何刀槍武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只有三十八位民眾被捕，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總共被捕的有三百八十八人，沒有造成任何民眾死亡。

中國官方的這個結論，當然是鄧小平等人在平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後的最後結論。鄧小平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也是平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宣導者，按照他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立場和態度，這個結論，只有可能誇張和渲染，不可能掩飾和縮小。

對比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結局，就不難發現，在對付示威抗議群眾方面，鄧小平顯然比毛澤東更狠更強硬。這也可以說明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專政”，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在性質上有所不同。

撤離的學生隊伍行進到前門箭樓附近，街道兩旁才出現群眾，人數大約有三、五千人。他們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滿腔悲傷，淚水掛滿雙頰。一名滿頭銀髮的老奶奶，淚水已經將胸前的衣衫浸濕了一大片，仍然不住地抽泣。她一邊抹淚，一邊將手比劃成“Ｖ”字形，並且不停地舉過頭頂。

等到撤離的學生隊伍經過，見到學生們悲憤的神態和淒慘的形象，數千名群眾強忍住悲傷，反過來勸慰學生們說：“你們沒有失敗，你們總有一天會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上來的！歷史不會忘記你們！人民感謝你們！”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再也止不住淚水。北京人民真的是太好、太偉大了！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中共當局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以來，他們就一直竭盡全力地支持和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屠殺事件發生之後，爲了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他們赤手空拳，前僕後繼，浴血奮戰，付出了比學生更爲慘重的流血犧牲的代價。就在眼前的人群中，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爺一邊悲傷地哭訴著：“我的兒子也死了！我的兒子也死了！……”一邊對著學生隊伍呼喊：“孩子們，不能忘記這筆血債！千萬不能忘記呀，孩子們！……”

面對著這樣的北京民眾，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唯有感激的淚水在不斷地流淌。學生們壓抑已久的悲憤情緒一下子迸發出來，不少人嚎啕大哭。一個學生痛苦地對路旁的民眾說：“我們對不起人民，我們把天安門廣場丟了！”許多民眾當即齊聲呼喊著回應：“你們是好樣的！學生們是好樣的！人民感謝你們！你們一定會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來的！”

一些學生情不自禁地對著路邊的群眾跪下了，泣不成聲地說：“我們對不起大家，我們沒有盡到責任，你們對我們的期望太高了……”然後站起來振臂高呼：“我們決不屈服！我們

還會回來的！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法西斯！打倒李鵬僞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罷課！罷工！罷市！……”路旁的群衆紛紛予以呼應，口號聲此起彼伏，許多人喊得喉嚨都嘶啞了。

學生隊伍行進得非常緩慢，許多學生和民衆相互勉勵著：千萬不能忘了流血犧牲的人們，一定要將深仇大恨牢牢地銘記在心裏。我想此時此刻許多人一定與我一樣，心中只有一個聲音在強烈迴響著：復仇！復仇！復仇！

我突然看到路旁的人群中有人沖著我不斷地招手，口中不斷地叫喊著“小吳！小吳！”定睛一看，原來是我大學畢業後工作單位的同事——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的秘書陳雅，當年我們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關係很熟。多時不見，又是在這種特殊的場合相逢，照理說應該有許多話題可以聊，但我幾乎只是向她簡單打了個招呼，面對她的關切，也僅僅只是說了幾句“我還好，我沒事”之類的話，然後就隨著學生隊伍走了。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舉止言行完全不符合常理，因爲心情實在是壞透了，根本就沒有心思與任何人多說話，心中除了悲憤、悲憤，還是悲憤！

正當我隨著學生撤離隊伍在前門箭樓附近的路口往西，拐向前門西大街之際，從身後的天安門廣場方向又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其間夾雜著一陣又一陣斷斷續續的《國際歌》歌聲和口號聲。時間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點三十分左右。不久，有學生哭著從學生隊伍後面追趕上來報訊，那群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寧死也不撤離的數百名學生慘遭槍殺。

有不少證據顯示，在我和大批的學生撤離紀念碑底座一帶以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確實曾經開槍驅逐不願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不少人傷亡。

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慈恩沒有馬上跟隨學生隊伍撤離，滯留在天安門廣場南端，成爲目擊證人之一。他稍後追上撤退的學生隊伍，告訴同校的青年教師海明等人說，對於最後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不走的學生和市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先是用棍棒驅趕，後來又開了槍。就在他跟前開槍打中了一個人，傷口流了很多血。因爲手頭沒有醫藥用品，慈恩與在場的幾個人只好先用一面紅旗給受傷者做臨時包紮。救護車到來後，志願醫務人員用繃帶包紮受傷者的傷口，然後送往醫院救治。慈恩特意把那面浸透了鮮血的紅旗保留下來。【注釋 108】

赴北京採訪的臺灣《中國時報》著名記者徐宗懋，也是在學生隊伍剛剛撤離紀念碑底座一帶以後不久，在天安門廣場靠近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地方中彈受傷的，一顆子彈從他的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打掉了好幾顆牙齒，顱內也有出血現象。

作爲一名對歷史事件頗爲重視的記者，徐宗懋不顧同行者楊渡（臺灣《中國時報》著名記者）等人的再三勸告，在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後，堅持與數百名學生和市民一起留下來，要目睹和記錄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最後結局。

徐宗懋中彈後僕倒在地，鮮血從傷口湧出。當時，槍聲不斷，人群四散奔逃，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一位來自于江蘇鄉村、正在北京打工的木匠小邵見狀停住腳步，高聲喊叫：“有人中彈了！救人要緊啊！別跑！別跑！”但大家被密集的槍聲驚嚇得只顧逃命，沒有人停下來幫忙。小邵只好獨自將徐宗懋

的身體翻過來，拖抱著拉到路旁的人行道上，才使得徐宗懋免於被狂奔的人群踩傷踩死。

所幸，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並未繼續開槍。小邵身材瘦弱，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五公分，背著徐宗懋，一步一步艱難地來到距離天安門廣場約一公里遠的和平門醫院，但和平門醫院根本沒開門。小邵又背著徐宗懋走了兩公里路，才找到一輛平板車，盡速把徐宗懋送到了同仁醫院。（參見附錄照片）

徐宗懋被送入同仁醫院的時候昏迷不醒，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身份。護士是在徐宗懋初步恢復知覺之後，從他的身上找到幾張沾有血跡的名片，逐一呼叫名片上的名字，在叫到“徐宗懋”的時候，他有所反應，才稍加確定他的姓名、身份。

小邵從徐宗懋的身上找到了一把東方飯店（位於北京市宣武區萬明路十一號）的鑰匙，知道了他的住宿地點，然後才將徐宗懋中彈受傷的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伴楊渡。

幸運的是，當時北京的各個醫院和醫務人員根本不計較任何醫療費用、保證金、身份證等一切手續，而是抱持“救人第一”的宗旨，全力以赴地搶救被送進來的傷患。

楊渡聞訊後迅即趕到同仁醫院，發現徐宗懋早已得到及時的救治。徐宗懋被送入同仁醫院之際，由於受傷者太多，醫院血庫裏的血漿已經全部用完了，醫務人員只能輸自己的血和動員自己的家屬輸血，提供給受傷者使用。一位勞累了一整晚都沒有休息、稍早前已經輸了二百 CC 血液的護士李小姐，義無反顧地將自己二百五十 CC 的血液輸給了徐宗懋，才將徐宗懋從死亡的懸崖拉了回來。

在瞭解搶救徐宗懋的詳情之後，楊渡真切地向醫務人員表示感謝。一位醫務人員對楊渡說：“我們知道你和徐宗懋先生是同事，都是從臺灣來的記者，我們不是要你道謝，我們只求你一件事。”楊渡連忙問：“什麼事？”這位醫務人員回答說：“只求你把北京市民和學生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屠殺的真實情況報導出來，讓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我們只求你要真實地報導出來。”旁邊的一個護士紅著眼睛補充說：“中國的人民太慘了！”

楊渡對徐宗懋及時獲救一事十分感歎：“是的，這就是中國的人民，在槍林彈雨中互相救助，無私的奉獻，才搶回一條

人命。但是，徐宗懋是幸運的，因爲他來得及被搶救，但不知還有幾千老百姓的生命，是在炮火中來不及搶救而喪生。”

同仁醫院的醫務人員一邊全心全意地搶救受傷者，一邊還惦記著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數千名學生的命運。一位女護士得知楊渡剛剛離開天安門廣場不久，急切地拉住他的手詢問：“那些學生呢？那些學生呢？你從天安門廣場來，不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嗎？”她的聲音沙啞、發抖，全身也發抖著。

楊渡握住女護士的手，安慰她說：“你別害怕，學生大部分都撤走了。”女護士繼續追問著：“那剩下的學生呢？到底怎麼樣了？”

這時候，楊渡才突然想起來了，眼前的這位女護士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救護站擔任志願醫務人員，在此之前就已經在天安門廣場與她見過面，於是連忙安慰她說：“學生都撤走了。現在他們已散去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那都散到哪里去了，會不會被殺了？”女護士還是不放心，繼續追問著。“不知道，應該不會的，應該不會的。”楊渡再次安慰她。

“謝謝你啊！謝謝你啊！”女護士一邊轉身離開，一邊喃喃自語：“可憐的學生哪里去了呀？”

楊渡看見同仁醫院所有的醫務人員徹夜未眠地全力搶救受傷者，甚至輸自己的血救人，但人人毫無倦意，連悲憤也深埋心裏，轉化爲一種冷靜。

得知楊渡是從臺灣來的記者，有醫務人員特意帶他去觀看一個醫生給受傷者開刀動手術。躺在手術臺上的受傷者一幅年輕學生的模樣，一顆子彈由他的前胸貫入，從後背穿出，彈頭黏在肉裏，血盆大口開在背上。受傷者昏迷不醒，爲了搶時間挽救他的生命，手術刀只能用酒精擦拭一遍，因爲根本來不及按規定方式消毒了。

主治醫生開刀取出彈頭，拿給身旁的護士看，護士便拉著楊渡的手說：“你看，就是這種銅子彈，就是這種真槍實彈，他們竟然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主治醫生隨後默默地用紙包好帶血的彈頭，放入口袋。而另一個護士也拿出一顆帶血的彈頭對楊渡說：“就是這樣的，全都是這樣的。”

這時候，有人拿著照相機過來拍照，主治醫生沒有說話，

也沒有阻止，只是默默地站立在一旁觀看。醫務人員們彷佛在大悲憤中深埋，而僅僅露出冷靜，這冷靜也只是爲了兩個目的：一是留下人命；二是留下歷史，而且永不遺忘。

在同仁醫院裏，象這樣的受傷者非常多。楊渡望著眼前一個個倒在血泊中的“人民”，每個人的身上都是傷口，每個人都昏迷不醒，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命運是生是死，這些醫務人員從來沒有見識過槍傷，連他們也只能聽天命盡人事，在最匱乏的醫療條件中，不要命般地救人，而且受傷者之多已到了無病床可用的地步。血淋淋的情景，讓楊渡禁不住感歎：中國，如今竟然走到這個地步啊！

楊渡得知同仁醫院的醫務人員爲了救人，一夜無吃無眠，連忙掏錢吩咐一位老三輪車夫出去買回餐點，分給每一個醫務人員，但整個醫院竟然沒有人拿走一份餐點。是的，血泊中的醫院，誰會去吃東西？誰又吃得下東西？

徐宗懋傷勢危急，主要是因爲顱內的受傷情況不明，但同仁醫院不具備檢查和治療顱內傷的條件，必須儘快轉院檢查、治療。醫務人員四處聯絡救護車，在槍林彈雨中，終于將徐宗懋轉送到在腦神經外科領功能變數名稱列亞洲前三名的天壇醫院，使他得到了及時的檢查、治療，幸運地獲救並逐漸康復。

在這個期間以及往後的時間裏，救命恩人小邵一直陪伴著徐宗懋，成爲編外的“特別看護”，但他堅持不要任何酬謝。從此，徐宗懋遂與小邵結成了生死之交。【注釋 109】

那數百名堅守在紀念碑底座與“毛主席紀念堂”之間不走的學生，神秘地從人世間消失，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最終的去向仍是一個秘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完成清場任務、佔領天安門廣場之後，沒有從那裏運出過一具學生遺體或受傷的學生。聯繫到清場行動結束後不久，在天安門廣場上出現連續數小時不熄的幾堆大火，以及頻繁起降的軍用直升機，人們有理由、也不能不懷疑解放軍戒嚴部隊曾經在天安門廣場毀屍滅跡，以掩蓋血腥鎮壓的真相。

據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一則報導透露，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大火燒裂了四十條用花崗石製作的紀念碑底座臺階、二千七百平方米的草坪和一百七十五米長的檜柏綠化帶。而當學生隊伍撤離之前，那一帶並未

出現大火，也不可能出現大火，因爲那一帶佈滿了學生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這些燒裂燒毀紀念碑底座臺階、草坪和檜柏綠化帶的大火，顯然是在學生隊伍撤離之後由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所點燃的。

按理說，像花崗石這樣耐高溫的建築材料，也不是普通的火焰所能燒裂的，而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出現燒裂的情況：一是突如其來的高溫烈火，例如火焰噴射器噴射的火焰；二是在高溫狀態時迅速冷卻，例如用冷水滅火。

這兩件事都不是學生會做或能夠做到的，而只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才能有條件，也有動機去做。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可能需要在天亮之前儘快毀滅天安門廣場上一些暴露其血腥鎮壓行動的殘留物，然後又由於某種需要而急著使用水龍滅火，例如：面臨火勢失控的危險，或者爲了軍用直升機稍後能夠安全地在天安門廣場上著陸。已經有大量的證人證詞和照片錄影資料顯示，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之後，軍用直升機的確曾經頻繁地在天安門廣場起落。

據一些自稱爲現場目擊者的學生和市民說，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之後，他們看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處理過屍體。

針對外界的強烈質疑，中共當局曾經特意解釋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天安門廣場上點火，唯一的目的只是爲了焚燒垃圾。這個解釋不足爲信。如果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天安門廣場點火的目的只是爲了焚燒垃圾，那麼，就應該把垃圾集中堆放在距離紀念碑底座臺階、草坪和檜柏綠化帶較遠的空曠地帶焚燒，這樣做，不但更爲安全可靠，而且合情合理，因爲學生所搭建的帳篷大多位於距離紀念碑底座較遠的地方，根本就不在紀念碑底座的臺階上，無須耗時費力地將被坦克和裝甲車所碾壓的帳篷等垃圾，搬運到紀念碑底座的臺階一帶焚燒，以致於危及紀念碑底座的花崗石臺階、附近的草坪和檜柏綠化帶。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之所以必須在紀念碑底座的臺階一帶放火焚燒，是因爲那裏有不便暴露和難以處理的物體需要儘快地處理，而被坦克或裝甲車碾壓的、被踐踏的和佈滿槍孔的死難學生遺體，恰恰正好具有這些特點。劫後紀念碑底座的臺

階上留下了許多處刀削似的殘痕，也充分證明瞭坦克或裝甲車確實曾經推進到那裏。

就地形而言，紀念碑底座一帶既是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地帶，同時也是整個天安門廣場上最爲隱蔽的地點，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不會被中外記者和有心人從遠方的建築物高處所發現並拍攝下來，成爲解放軍戒嚴部隊血腥鎮壓學生的證據。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帶只有一棟高層建築物，那就是位於東長安街上的北京飯店，一共有十六層樓。北京飯店的門牌號是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三十三號，步行五分鐘左右即可到達天安門廣場，因此，在當時的北京飯店中聚集了大批的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正是這一批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亮之後，用長焦距鏡頭拍攝了大量發生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街南口、天安門城樓附近和天安門廣場北端的有關血腥鎮壓的照片。但是，由於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國歷史博物館等處的建築物擋住了他們的視線，他們無法拍攝到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情景。

中共當局是有心殺人卻無膽承認，十分擔憂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真相暴露於天下。於是，將這批集聚在北京飯店的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視爲眼中釘、肉中刺。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開槍殺人之後不久，中共當局隨即下令派遣大批的公安人員和武裝警察嚴密封鎖了北京飯店，只許進不許出，並警告所有的住客只能待在房間裏，不許到陽臺上觀看、拍攝，否則，人身安全無法保障，一切後果自負。（參見附錄照片）

隨後，又派遣北京市公安局負責外事工作的警察趕往北京飯店，凡是從各個屠殺現場返回北京飯店的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都要逐一予以全身搜查，沒收照片底片、錄音帶和錄影帶，如果不予合作或稍有反抗，不管男女，均遭到粗暴對待，甚至毆打。

奉命趕往北京飯店執行搜查命令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人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鐘整，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值班室的電話機鈴聲突然響了，從中傳來了上級領導機關的命令：“即刻派人去北京飯店收繳外國記者違反戒嚴令非法攝製的錄影帶、膠捲，並對他們違法戒嚴令的行爲

提出警告！”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緊急商議決定：“劉建華副科長帶領六人去北京飯店執行此次任務，全體同志著便裝攜帶警服，穿胡同步行前往。”

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地處北京市東城區北池子大街，與北京飯店相距咫尺，只需穿過南池子和南河沿兩條大街，乘車或騎自行車不消片刻即可抵達。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分，身穿便服的劉建華等人抵達北京飯店大廳，迅速換上警服，立即開始檢查每一個進入北京飯店的外國人。一直到六月四日上午七點三十分，劉建華等人才結束收繳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錄影帶、膠捲的行動，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注釋 110】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四十分到六月四日上午七點三十分，許多從天安門廣場和各個屠殺現場回到北京飯店的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均遭到強制搜身，被沒收了所有的錄影帶和照片膠捲。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爲了保護在槍林彈雨中冒著生命危險所獲得的珍貴新聞資料，不敢返回由中共北京市委管理經營的北京飯店，臨時投宿到中外合資的王府飯店。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如上所述，劫後的紀念碑底座的花崗石臺階上留下了許多處刀削似的痕跡，這無疑是坦克或裝甲車履帶所遺留的“傑作”，充分證明了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坦克或裝甲車確實曾經推進到那裏。而那一帶，正是最後數以千計的學生誓死堅守的地點。這些紀念碑底座花崗石臺階上所殘留的坦克或裝甲車碾壓痕跡，至少說明瞭一個情況：在我和特別糾察隊隊員們撤離紀念碑底座之後，這一帶確實曾經有過一場極爲血腥的鎮壓行動。如果不是鎮壓行動所需，坦克或裝甲車不會無端地碾壓已經空蕩蕩的、毫無學生或只有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存在的紀念碑底座的花崗石臺階。（參見附錄照片）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少將在中南海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在確實弄清楚這些帳篷沒有人之後，才用車輛把這些帳篷和各種障礙物，還有那個所謂的什麼女神像統統推倒。”【注釋 111】

張工少將的這句話透露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車輛”（其

實是坦克或裝甲車）推倒清除天安門廣場上各種障礙物的事實。不論“車輛”（坦克或裝甲車）在遠離紀念碑底座的地方所推倒清除的障礙物是什麼，但是，“車輛”（坦克或裝甲車）在紀念碑底座臺階一帶的行動，決不是推倒清除帳篷之類的障礙物，因爲這一帶根本就沒有這一類障礙物，唯一值得清除的就是堅守不撤的學生或死難學生的遺體。

另有身份可靠的目擊者證明，坦克和裝甲車不僅參與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而且確實碾壓推倒了許多帳篷，並在紀念碑底座前軋死了堅持不撤的學生。這位目擊證人是解放軍三零一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研究生院的女研究生星光（化名）。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屠殺之夜，星光自動趕到西長安街，搶救受傷的學生和民眾，後來又趕到天安門廣場，來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所設立的臨時急救站，參加搶救受傷者的工作。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始最後清場行動的時候，星光與一批志願醫務人員堅持不撤，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

星光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因爲我們沒有參加撤離，所以有機會綜觀了天安門廣場的整個清場過程。只見天安門廣場上的燈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開的十幾輛坦克和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方向緩緩向天安門廣場駛來。學生面前，突然出現了許許多多端槍的士兵，向著學生一點一點靠近，驅趕他們走。

隨著幾下沉悶的撞擊聲，位於天安門廣場北端的‘民主女神’像轟然倒地。坦克和裝甲車繼續向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帳篷等物被碾得粉碎，變成了一片平地。

天安門廣場上的數千人隊伍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集體向天安門廣場的東南角退去。大多數學生都加入了撤離的隊伍，但也有極少數堅持不走的學生。

我記得有一個男生爬上帳篷頂，面對成排壓過來的坦克揮舞著一面紅旗。我們在一邊急得大叫讓他趕快撤離，他就那樣堅持著揮舞著手中的旗幟，直到那個帳篷被坦克碾碎。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年輕的身影！”【注釋 112】

星光和一批志願醫務人員是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行動的重

要目擊證人，他們當時身處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面，面對著天安門廣場，僅僅隔著一條街道。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過後，星光和這一批志願醫務人員就遭到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嚴密監控，失去了行動自由，不僅無法進入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底座一帶搶救受傷的學生，而且不允許將已經被送入臨時救護站的受傷者轉往醫院搶救。

當年，北京醫務人員的表現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西長安街等地開槍殺人之後，眾多的醫務人員本著救死扶傷的天職和人道主義的精神，不顧中共當局的禁令，自動自發地行動起來，有的冒著生命危險趕赴各個屠殺現場搶救受傷的學生和市民，搶救的對象當然也包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受傷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的受傷官兵，有的趕到就近的醫院，投入救人的工作。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濫殺無辜，連救護車也受到掃射，並有醫務人員流血犧牲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不放棄救死扶傷的神聖職責。

爲了搶救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受傷的學生和市民，而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志願醫務人員，就是北京醫務人員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搶救受傷學生和市民的急救車和醫務人員，最多的是來自於北京醫學院（現爲北京大學醫學院）和協和醫院，一是因爲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各高校學生髮起絕食請願行動，這兩所醫院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臨時醫療站，一直堅持沒有撤離；二是因爲這兩所醫院距離天安門廣場較近。

北京市紅十字會在北京各高校學生絕食請願期間也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臨時救護站，當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發生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事件之後，北京市紅十字會臨時救護站的醫務人員違抗上級指令，仍然堅持不撤離。

一位北大醫院五十多歲的女性老醫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參與搶救受傷者的工作，她敍述了當時親身經歷的一些情況：

剛剛開始搶救工作的時候，急救車在運送受傷者的同時連帶著將遇難者的遺體一起拉走，後來因爲受傷者實在太多，便決定凡是證實死亡的遇難者，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因此，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北端國旗杆一帶和中國歷史

博物館前面，都有醫務人員無法帶走的遇難者遺體。中國官方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能欺騙當時不在場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人。

後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陸續到達，嚴密地封鎖了天安門廣場，甚至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志願醫務人員將受傷者運送出去搶救。當時的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志願醫務人員反復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宣傳、交涉，作爲紅十字會組織的成員，有責任搶救任何身份的受傷者。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堅持說這些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幟的急救車開槍。情勢極其緊張，眼看就要發生新的血案，幸虧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隨軍女醫生及時跑步趕來，厲聲制止住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她高喊著："不能向紅十字會人員開槍！就是紅十字會人員在戰場上搶救敵方的受傷者，也不能開槍！你們可以檢查救護車，只要裏面是受傷者，你們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除了志願醫務人員和受傷者所面臨的危險。

這位女性老醫生十分感歎地表示，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想到以救死扶傷爲職責的醫務人員在執行人道救助任務時，竟然會遭遇到這種惡劣的待遇。有些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素質實在太差，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

這位女性老醫生指出，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隊伍都撤走以後，仍然有二、三十名志願醫務人員以及急救車裏的一些受傷者被扣留在天安門廣場，也許是因爲他們看到了太多不該看到的事情，知道了一些中共當局不想讓人民知道的情況。他們一度被集中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直到早晨七點鐘才被允許離開。

這位女性老醫生還說，據她後來從有關人士那裏瞭解到，在北京市所有參加搶救受傷者的醫院中，協和醫院內的遇難者遺體最多，有一百多具，主要都是從天安門廣場到東長安街上的王府井大街南口，在這不到一公里範圍內，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開槍打死的。【注釋 113】

這位女性老醫生所提到的遺留在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帶的遇難者遺體，解放軍戒嚴部隊在佔領天安門廣場以後並沒有送往醫院太平間或火葬場處理，他們擔心這些遇難者遺體一旦外

送，就會證實外界有關天安門廣場上打死了人的說法，因而以各種方式悄悄地予以處理。這個鮮爲人知的秘密，因爲一個偶然發生的案例而洩露。

不幸遇難的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生王楠,他的母親張先玲是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的小姨子，也就是說，王楠是丁關根的外甥。丁關根因爲是鄧小平的橋牌牌友兼紅人，官運亨通，不可一世，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京城人稱“丁八爺”，意思是除了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屬他的權力大了，實際地位超過了所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王楠遇難失蹤後，他的父母決定出去尋找他的下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上，張先玲夫婦的許多朋友和學生都表示願意幫著去尋找。他們從當天晚上到第二天，一共去了二十四家醫院，看到了許多遇難者的遺體，真是慘不忍睹。張先玲的一個侄子從醫院回來，一見到張先玲就放聲大哭：“姑姑呀，太慘啦，我看見有具屍體露在白布外的是一雙裹過的小腳，還有不足一米的孩子！”

王楠的家長、親友連續多天跑遍了全北京市曾經參與搶救受傷者的四十多所醫院，檢查了所有遇難者的遺體、留院治療的受傷者，但都沒發現王楠的蹤跡。有人告訴張先玲，解放軍戒嚴部隊還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關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也許王楠就在其中。好多天過去了，張先玲沒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確切消息，於是向王楠就讀的學校報了案，請求幫助尋找。學校立即向北京市公安局報了失蹤案。

據說北京市公安局十分重視這起失蹤案，因爲失蹤者是中央級大人物的親屬。十幾天後，公安局通知王楠的家長到一所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王楠的遺體。原來王楠的遺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人民大會堂對面的北京第二十八中學(後來改名爲長安中學)大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因爲屍體埋得淺，又被大雨沖刷，死者的衣服都露出來了，且有臭味，因此學校報告了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北京市西城區衛生局，共同將多具遇難者的遺體挖了出來。(參見附錄照片)

由於這些遇難者身上的證件（或死亡說明書）已經被掩埋者拿走，因此都成了無名屍體。幸好王楠因爲剛剛參加軍訓回來，身穿舊軍褲，腰紮一根軍訓時一位解放軍士兵贈送的、新的軍用武裝帶，所以被誤認爲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他的遺體才被送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棉花胡同八十三號的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太平間存放。後經解放軍戒嚴部隊幾次核實，確認王楠不是軍人。

這時候，公安局想起丁關根的外甥王楠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前往認屍。如果王楠不是身穿軍褲，或者如果不是有中共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王楠的遺體與其他同時從同一地點挖出來的遇難者遺體一起秘密火化了，根本就不會通知其家人前往認領。

張先玲有一段相關的回憶，敍述了尋找兒子王楠的遺體以及查訪王楠遇難真相的過程。她的敍述內容感人至深：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我終於接到了月壇中學的電話，說學校接到西城公安分局的通知：護國寺中醫院有一具無名屍，穿著、年紀和體貌很像是王楠，讓我去辨認。那個時期，我先生正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醫院。

在樓下的候診室，醫生們向我述說了事情的經過：這具無名屍是六月七日西城公安分局送來的。因爲當時各醫院的太平間已經滿員，所以送到這個小醫院。送來的時候身上沾滿了泥土，頭部包有繃帶，破了的眼鏡和頭盔上也沾滿泥土。

聽送來的人說：這具屍體是從天安門前二十八中學門前草坪裏挖出來的，在王楠這個坑裏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爲王楠身著軍服，特別是系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爲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裏準備確認身份。自六月七日開始，戒嚴部隊已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學校的。

還說別處還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確認爲老百姓的無名屍已全都送去火化了。這個情況在我們以後尋訪中得到了證實。

找到了王楠的屍體，在那種特別的時候應該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然而，在遺體火化問題上卻不料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刁難：因爲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講話誣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火葬場接到命令，死者必須甄別才能火化。爲此

我們幾經交涉無果，後來，因王楠的父親是‘九三學社’的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面交涉才准許火化，那已經是六月二十二日，離王楠遇難快二十天了。那時的八寶山火化場依然有武裝的戒嚴部隊巡邏，而且運送屍體的車輛仍然擠滿了院子，遇難的人數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王楠是張先玲最小的兒子，他的不幸遇難幾乎讓張先玲精神崩潰。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六月十四日，在焦急地尋找、等待王楠的十天之中，張先玲的心經受著痛苦的煎熬，頭髮開始變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實，那時她的丈夫王范地已經從王楠寄讀過的花園村中學得到了他的死訊，只是還不知下落。王範地怕張先玲受不了，一直瞞著張先玲，一個人強忍著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對於張先玲來說是永生難忘的一天。從這一天起，她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從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淵。那個時候，她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瀕臨崩潰的邊緣。親人，朋友，鄰居，包括素不相識的人們都來看望她，安慰她。從他們的關心和勸慰中，她逐漸冷靜下來。她丈夫對她說：“你不能這樣下去，如果你有個好歹，我們這家怎麼辦？王楠的事還沒搞清楚呢！”張先玲慢慢地清醒過來：“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瘋了。我要搞清楚兒子是怎樣死的；他頭上的綳帶是誰包紮的；爲什麼埋在第二十八中學牆外。兒子爲了記錄下歷史真實遇難了；我作爲母親，要爲追查兒子遇難的真相而活下去。”

最終使張先玲堅強起來的是這樣的一種信念：尋找兒子遇難的真相，爲兒子討還公道。爲此，她走上了一條艱難的尋訪真相之路。張先玲象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中的人物祥林嫂一樣，逢人便訴說兒子遇難的事情：在公共汽車上，在計程車上，在朋友家中，在別人來訪的時候……。終於，她找到了第一個見證人，一位光大計程車公司（現在這個公司已經不存在了）的劉姓司機。他向張先玲描述了當時所發生的情景。

後來，張先玲又陸續找到了兩位見證人，他們所描述的情景與劉姓司機所說的完全相同。可歎的是在中國的政治高壓情勢之下，他們都不敢出來作證。

既然王楠遇難的時間、地點和經過已經得到了證實，那麼

又是誰給他包紮傷口，又怎麼把他的遺體掩埋了呢？張先玲帶著這些問題鍥而不捨地繼續著漫無頭緒的尋找。

俗話說“上天不負苦心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一天，終於有一位朋友來到了張先玲家中，告訴她北京醫學院一位剛剛畢業的姓吳的醫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天淩晨曾經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南長街南口救治過一個名叫王楠的中學生。張先玲得到這個線索很興奮，但當時北京還處於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無法再委託別人去找吳姓醫生，於是就直接給吳姓醫生寫了一封信，沒有想到吳姓醫生居然回了信。

一九九零年一月的一天，吳姓醫生和他的三位北京醫學院同學應約來到張先玲家中，將王楠的學生證、鑰匙交還給了她。同時他們告訴張先玲，今天來她家的四個人，除了其中的一位女同學，其餘三位當時都參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並一直守護到王楠不治身亡。

通過交談張先玲才知道，他們都是北京醫學院的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至六月四日淩晨，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親眼目睹平民百姓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射殺的慘狀，出於義憤，也出於救死扶傷的職責，自願組織起一支臨時醫療隊。當時參加臨時醫療隊的，除了這幾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之外，還有位於西單大街的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的幾個職員，這幾個職員是攜帶著醫藥用品參加進來的。

一位姓張的北京醫學院學生談到當時的情景，十分感慨地對張先玲說：“那時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作‘生死置之度外’。當時長安大街上人潮如湧，人聲鼎沸，民眾一邊高呼‘打倒法西斯！’的口號，一邊組成人牆保護我們救護受傷者。我親眼看到一位人牆中的群眾被槍彈擊中，當場死亡。”

此後，張先玲仍舊不息地追尋。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向她反映：他認識一位原來任職于西長安街公安派出所的警察，這位警察曾經對別人說過：他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接到一個命令，讓該公安派出所的警察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員之外，都帶上鐵鍬等工具去長安街，幫助解放軍戒嚴部隊打掃現場。到了那裏他才知道，所謂的“打掃現場”，就是掩埋倒在長安街上的遇難者遺體。原因據說是當天早上七點鐘有一個衛星啓動，會拍下這些遇難者遺體。

張先玲得知這個訊息，悲憤萬分。原來如此！他們這樣匆匆忙忙地“埋屍滅跡”，是爲了讓中國官員和官方媒體放心地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

關於這件“埋屍滅跡”的罪惡行經，張先玲還從原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看門人那裏得到了證實。據看門人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拂曉，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前來敲門，向他借鐵鍬。

在歷時半年多的艱難尋訪過程中，張先玲上百次的敍述著兒子王楠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經流幹了，但尋訪過程使她深深感到自己的苦難不僅僅是她個人、她一家的，那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苦難。於是，她主動登門拜訪同樣也經歷了喪子之痛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從此，她們就一起開始了艱難的“六四”受難者的尋訪活動，成爲“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

張先玲深有感觸地說：“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中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爲尋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難屬們的友誼、朋友們的支持，是治癒傷痛的良藥。”

作爲“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張先玲表示：“我們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願望，但集中起來，就是這十六個字：‘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共識，我想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注釋 114】

從王楠的案例來看，確實有一些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遇難者遺體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北京公安部門悄悄地處理了。張先玲說，在她和丁子霖等人尋訪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死難者的過程中，就找到十幾戶人家的親人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失蹤者。在丁子霖於一九九五年交由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中，也記載了許多位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死難者，以下是其中的幾位：

1）殷順清：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歲，生前是北京市房屋修理第一公司工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七點多鐘，殷順清獨自騎自行車

離開家門。當天晚上十點多鐘，有人看見殷順清在西長安街上的電報大樓（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十三號）附近。當天午夜時分，有人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看見殷順清頭部中彈，當場死亡。

殷順清的家人至今尚未找到他的遺體。

2)雷廣泰：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三歲，生前是北京市懷柔縣（現爲北京市懷柔區）廟臺上村農民，大隊汽車司機。

一九八九年六月，雷廣泰所在的大隊汽車隊承擔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的北京海關大樓的運土方工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多鐘，雷廣泰與另外兩位司機結伴去天安門廣場觀看“民主女神”塑像。大約晚上十一點多鐘，三個人走到天安門城樓附近的南池子街南口附近，蹲在路邊的紅牆下吸煙，正好遇上解放軍戒嚴部隊（應該是陸軍第 39 集團軍的部隊----作者注）從東長安街一路端槍掃射過來，三個人剛站起身來，雷廣泰即中彈倒下。當時中彈的人很多，在場的民眾隨即用三輪平板車將中彈的雷廣泰拉走，與他同行的兩位司機被沖散，從此再也沒有找到雷廣泰的下落。

3)蘇生機：男性，遇難時年僅四十三歲，生前是北京亞運村《住宅建築》報社記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蘇生機在新街口一位朋友家商談工作。晚上六點鐘左右，看見中央電視臺播放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聯合署名的緊急通告，隨即離開朋友家。晚上十一點鐘，有人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蘇生機，此後再也沒有人見到他。

蘇生機的家人至今沒有找到他的遺體。

4)李長生：男性，生前是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圖書館管理員。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李長生離家出走，說是去天安門廣場，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5)鄭春富：男性，遇難時年僅三十七歲，生前是故宮博物院古建築工程隊工人、班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鄭春富離家後失蹤。事後，鄭春富的家屬找遍北京市所有的醫院太平間及火葬場，未見鄭春富的屍骨，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6)崔林峰：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九歲，生前是北京市三裏河服裝廠工人、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聯防隊隊員。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七點鐘，崔林峰離家去廠裏上班，本應於六月四日淩晨二點鐘下班回家，但是，他的家人等了他兩天仍未見其歸來。崔林峰的家人後來去廠裏尋找，得知崔林峰在六月三日晚上到了工廠之後，與兩位同事一起騎自行車去了長安街方向，後來分手的時候一人往東，一人往南，崔林峰往西，隨後聽到槍聲。當天崔林峰未歸，其餘兩人均安全回家。

事後崔林峰的家人找遍了北京各家醫院，沒有發現他的遺體。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7)林濤：男性，遇難時年僅二十四歲。林濤是復員軍人，一九八一年參加解放軍部隊，在陸軍某部擔任偵察兵。一九八四年復員，分配到北京昆侖飯店工作，一九八九年轉到另一公司任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飯後，林濤準備好第二天午飯，聽說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了，騎自行車離家而去，此後再也沒有回家。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8）劉強：男性，生前是河北師範大學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劉強赴北京參加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後一直未歸，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以上所記錄的八名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遇難者，其中只有河北師範大學的學生劉強是外地人，不在北京上學或工作。其實，按照常理判斷，更多的失蹤者應當是外地的學生和民眾，他們在北京無親無戚，大多是單獨行動，遇難時往往不爲人注意，遇難後又無人及時認領遺體，遠在他鄉的親人或因爲不知詳情，沒能及時赴京尋找，或因爲畏懼於當時令人恐怖的政治情勢，不敢赴京尋找和認領遺體。這些無人認領的外地遇難者遺體，最容易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北京公安部門隨意處理掉。

在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情勢下，尋找、記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遇難者，仍然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並且具有極大的政治風險。“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張先玲、蘇冰嫻等人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長年生活在嚴密的

監控之中，並經常遭到拘捕或軟禁。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她們總共尋找到了一百八十六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遇難者，一一作了記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可謂是她們十多年來的心血結晶。

不幸而令人痛心的是，蘇冰嫻女士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晚上六點三十分，因爲服用了醫生所給的、在藥典裏沒有記錄的、稱作“排毒液”的藥物，突然逝世，終年六十四歲。蘇冰嫻女士退休前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的翻譯，她和她的丈夫趙廷傑先生都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了十幾年之久，而他們的年僅二十一歲的兒子趙龍，卻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慘死在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槍口之下。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到底有多少“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遇難者，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北京公安機關到底秘密處理了多少具遇難者的遺體，也許只能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因爲忠於職守和職業道德而英勇獻身的遇難者，除了新聞記者之外，還有醫務人員。北京市人民醫院婦產科的實習醫生、北京醫科大學應屆畢業的女學生王衛萍，就是爲了搶救受傷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遇難時年僅二十五歲。

王衛萍出生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但只有她取得了大學學歷。王衛萍自幼聰明好學，以總分六百分的高分考入了北京醫科大學，苦讀六年，面臨畢業，遇難時正在北京市人民醫院婦產科當實習醫生，並已決定當年六月下旬大學畢業後留在這家醫院任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王衛萍沒有上班，正在自己家裏休息，當她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並在西長安街一帶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消息後，隨即奔赴距離她家最近的屠殺地點木樨地，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搶救受傷者的行列。

木樨地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過程中，北京市民和學生傷亡最慘重的地點。

據當時的現場目擊者說，王衛萍很勇敢，四處橫飛的子彈密集地從她身邊飛過，在她周圍迸發出火光，但她毫無懼色，

依然奮不顧身地搶救受傷者，給倒在血泊中的一個又一個受傷者包紮傷口。然而，正當她在爲一位受傷者包紮傷口的時候，略一抬頭，一顆子彈擊中了她的頸部。她倒下了，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她被民眾送到北大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王衛萍雖然還只是一個實習醫生，但她用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履行了作爲一個醫學工作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TRATICOATH），一位古希臘醫生爲醫學教師和醫學院學生所制定的誓約及道德准則：醫務人員要盡其所能救死扶傷，要在私生活和醫務方面堪爲楷模。

王衛萍不幸遇難後，丁子霖等六四死難者家屬爲了尋找她的家人，還留下了一個讓人既感動又心痛的故事。

王衛萍的墓地坐落在北京郊區的萬安公墓。墓碑正面鐫刻著“王衛萍女士之墓”的字樣，右上方是死難者的生卒年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遇難身亡”。此外，墓碑上還鐫刻著死難者的學歷和工作經歷。然而，墓碑的左下方卻無任何落款，沒有立碑者的名字，人們也就無從知道死難者的親屬爲何許人。

多年來，這座沒有任何落款與立碑者名字的墓碑始終是個謎。死難者王衛萍有無親屬？家住北京市還是外地？是誰爲她立的碑？每年的清明節和“六四”，總有一些不相識的人們爲她的墓地灑掃、獻花，但似乎都不是她的親屬所爲。幾位六四死難者家屬特別愛憐這位不幸遇難的姑娘，他們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對待，每次來萬安公墓爲自己罹難的親人掃墓，總要把帶來的鮮花、供品分出一份放到姑娘墓前。幾年過去了，他們斷定姑娘一定是外地人，因此無人前來掃墓。他們覺得，怎麼也不能冷落了這位冤死的姑娘。

這件事，丁子霖等六四死難者家屬始終放不下來，心裏總想著要弄個明白。當然，這首先要找到王衛萍的親屬。於是決定循著王衛萍生前就讀的學校去查找她親屬的線索。然而，幾年過去了，卻一直沒有結果。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過了五年之後，一個偶然機會，有一位朋友向丁子霖提供了這樣一條資訊：有一位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幹部，其女兒也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遇難了。丁子霖等六四死難者家屬幾經周折，終於打聽到了這位幹部的家庭地址，

並且與他們夫婦取得了聯系。這才知道，原來罹難的年輕實習女醫生王衛萍就是他們的女兒。謎底終于解開了，王衛萍並非外地人，而是一位北京姑娘。

丁子霖後來與王衛萍的父母相約見面。丁子霖回憶見面的情景說：

“死者的父母文化不高，說起他們死去的女兒，看得出來心情很痛苦。母親一再重複著一句話：‘我們衛萍是北京醫科大學的，本來就要當大夫了……。’在她看來，能上大學本身就是一種榮譽，而當一個大夫又是那麼神聖。

王衛萍的父親是一個黨政幹部，而且是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共建政前----作者注）參加過‘新四軍’的‘老革命’，他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女兒會死在共產黨軍隊的槍口下，更不會想到當年他參加共產黨發動的‘革命’如今竟落下這樣的結果。但是，他非常清楚，在‘政府’裏做事的人，必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與‘黨和政府’保持一致，否則，意想不到的厄運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這就是爲什麼在他們女兒墓碑的落款處不寫上自己名字的原因。

談話間，我說起有幾位同難者父母每逢‘清明’、‘六四’都爲他們的女兒掃墓，幾年如一日，從未有過間斷，這對夫婦不禁失聲慟哭起來。他們這才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每次掃墓與其他難屬碰不上面，是因爲害怕災難再一次落到自己的頭上，所以總是避過‘敏感’時期，另擇時日去爲女兒掃墓。

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這對夫婦始終沒有在‘六四’受難群體的公開信上簽過名。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從壓抑、恐懼中走出來。面對這對質樸、誠實而又怯弱的夫婦，我們不忍心去責備他們，相信將來總會有那麼一天，他們會用自己的手解開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繩索。”【注釋 115】

當年有眾多的醫務人員象王衛萍一樣，自告奮勇地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受傷的學生和市民，其中就包括來自于解放軍三零一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研究生院的女研究生星光。星光當年的經歷也具有代表性，值得大書一筆。

星光雖然身爲解放軍現役軍人，但一直關心和支持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星光得知一個重要的資訊：解

放軍戒嚴部隊奉命於當天晚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並將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此後，星光在宿舍裏始終坐立不安，腦海裏翻來覆去的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晚上會有流血衝突事件發生，我這個學醫的人就應當在最前線救死扶傷。

當天晚上十點鐘左右，當罪惡的槍聲響起，星光再也顧不得上級所下達的禁令，拿上白大褂，騎上自行車，悄悄地溜出了解放軍三零一醫院，奔向槍聲最激烈的西長安街。

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附近，星光目睹了慘烈至極的場面。她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正說著，戒嚴部隊已到了眼前。只見前面由（武裝警察部隊）防暴戰士開路，他們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進。而街上民眾的口號是堅決把他們堵住，絕不放他們到天安門廣場去。只見很多身手矯健的小夥子們爬上長安街南面的平房，將房上的瓦片揭下來摔碎，當作武器砸向戒嚴部隊。但這種抵抗很快就被槍聲和子彈壓下去了，只見一排排子彈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大地，人們被子彈壓的臥倒在地上。但槍聲一停，又會有人大罵著‘打倒法西斯’，奮勇地沖上去。

就這樣，很多人一直尾隨戒嚴部隊推進，只要槍聲一響，就立即臥地。每次槍響後，總有流血、傷亡，而槍聲一停，又有人奮不顧身地沖上去。

在西單路口，有人把點燃的公車橫在馬路中間，試圖阻擋戒嚴部隊坦克及車隊的通過。那尖厲的槍聲和火紅的鮮血讓雙方都拚紅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場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阻擋槍林彈雨、鐵甲戰車的人間慘劇。”

隨著大批受傷者的出現，星光和幾個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應該就是後來搶救王楠的那幾位北京醫學院學生）一起，利用位於西單路口的一家醫療用品商店（應該就是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設立了一個簡易救護站。馬上就源源不斷地有受傷者被送進來，星光他們先用繃帶爲送來的受傷者作簡單的止血固定包紮，再由市民們用平板車或三輪車送往附近的郵電醫院、復興醫院和北京市人民醫院。有的受傷者在抬進來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有的受傷者傷勢太重，讓星光他們根本無從下手救治。

作爲一個醫務人員，星光雖然具有急診室搶救危急病人的經驗，但從未經歷過戰地槍傷救護的訓練，如今一下子面對這麼多形形色色、傷勢輕重不一的槍傷者，真的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學生左胳膊上的動脈被子彈打穿了，被抬進簡易救護站的時候，由幾個護送他的人使勁壓著他的左胳膊上的傷口處，但鮮血還是像噴泉似地向外冒，採用一般的止血方法根本就止不住。星光他們只好從桌子上找到一個墨水瓶，反過來蓋住傷口，再使勁地用紗布層層纏住，但是，鮮血還是很快就滲透了層層紗布。星光心裏明白，如果這樣耽誤下去，僅僅是大量的失血就會要了這位受傷學生的性命，趕緊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醫院去救治。

讓星光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晚上，包括西長安街在內的街道上，到處奔馳著飛速救人的平板三輪車，許多北京市民奮不顧身地在救人。

中彈受傷者被源源不斷地送進簡易救護站，然而，直到這個時候，還有市民詢問星光：“大夫，這傷是被橡皮子彈打的嗎？”星光注視著他們帶有困惑的眼睛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好，大量被真槍實彈打死打傷的民眾就鮮血淋瀝地躺在眼前，他們卻仍然對政府抱著希望，仍然不願相信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星光看著自己滿身滿手的鮮血，只想向那蒼天呼喚：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的政府？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民子弟兵”？

星光所處的西單路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軍民衝突最激烈、民眾傷亡最慘重的地點之一。經過一段時間的激烈拉鋸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和車隊終於沖過了西單路口，繼續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沖著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而去。

此時，星光與攔截失敗的民眾們都非常擔心，在西長安街上就已經打得如此慘烈，那麼，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數以千計的學生將要流多少血呀？星光不敢再想像下去，只是覺得自己作爲一名以救死扶傷爲職責的醫務人員，絕不能在最後關頭當一名逃兵。就這樣，她決定趕到天安門廣場去，繼續搶救受傷者。

星光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突破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所設

置的封鎖線，進入了天安門廣場，並且很快就找到了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星光身上的白大褂血跡斑斑，她的到來，立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很多志願醫務人員紛紛圍上來打聽天安門廣場以外的情況。星光告訴這些志願醫務人員說，在西長安街上打得非常慘烈，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肆無忌憚地開槍，民眾死傷慘重，希望大家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

當時，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急救隊正儘量把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志願醫務人員召集在一起，準備在最後的時刻發揮作用，盡可能的救護受傷者。

接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鐘的時候，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急救隊的一位負責人把侯德健、周舵等人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情況告訴了在場的志願醫務人員，說學生隊伍很可能會撤離天安門廣場，讓大家自願選擇是跟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還是繼續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天安門廣場上搶救受傷者。因爲誰都不能保證一旦局面失控，留下來會面臨什麼樣的結局。

星光記得，當時有將近百名志願醫務人員自願選擇留下來，這些志願醫務人員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打起了紅十字會的會旗，大家儘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紅十字袖標戴上，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當時，天安門廣場臨時急救站的帳篷內還留有一些受傷者，他們也將跟隨著志願醫務人員一起走。志願醫務人員提出的口號是：“人在受傷者在，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及救治受傷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四點三十分過後，星光和志願醫務人員們眼看著一批又一批端槍或揮舞著棍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湧進天安門廣場，加緊了對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學生隊伍的強制驅離。有幾個不知因爲什麼原因掉落在撤離隊伍後面的學生在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夾擊下無路可退，突然轉身向志願醫務人員集聚地點這邊跑過來。志願醫務人員們爲了保護先前收容的幾位受傷者，此時已經手挽著手形成了一個保護圈，這幾名無路可退的學生躲入了保護圈。

看到那幾個學生躲入了志願醫務人員的保護圈，一些打紅了眼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揮舞著手中的棍棒，兇狠地向志願

醫務人員們撲來。志願醫務人員一見情勢不好，大叫著我們是紅十字會的成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同時把手挽得更緊，用自己的身體擋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和學生之間。

看到志願醫務人員身穿的白大褂和紅十字會旗幟，那些追打學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極不情願地停住了腳步，但堅持說那些躲進志願醫務人員保護圈的人是學生領袖，是鬧事的暴徒，必須將他們交出來。而志願醫務人員們則堅決地表示，凡是進入了我們保護圈的人員，就受到我們的保護。我們絕不會交出任何人。

就這樣，志願醫務人員們與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形成對峙，陷入了僵局。其間，星光曾和一個年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面對面的互相怒視了半個多鐘頭之久，誰也不服誰。那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早已被當天晚上所發生的一切沖昏了頭，打紅了眼，他的眼睛裏充滿了怒氣和殺機。星光心裏明白，只要上級指揮官一聲令下，他手中的大棒就會毫不猶豫地向志願醫務人員揮去。但是，星光此時已經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一夜的血腥經歷，讓她悲憤莫名。

這些追打學生、並企圖對志願醫務人員動粗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從他們手持木棍，以及所處位置的情況判斷，應該隸屬于陸軍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2 師，他們是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裏沖出來的。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等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已經基本結束，才有一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官過來處理這批志願醫務人員。這名軍官一開始提出來的條件是：醫務人員可以離開，但要把躲進保護圈的學生和所收容的受傷者留下來，理由是這些學生和受傷者都是暴徒。

這個條件是志願醫務人員們萬萬不會答應的。他們表達了明確而堅定的立場：要抓，就把我們一起抓起來；要放，我們將帶著學生和受傷者一起走。同時正告這位軍官，我們是醫務工作者，屬于紅十字會人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希望他們慎重考慮如果對我們處理不當將會面臨的嚴重後果。

與此同時，志願醫務人員向這位軍官提出了一個要求：你們的清場行動已經結束，我們紅十字會應該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各處巡查，看看有無需要救治的受傷者。

看樣子，怎樣處理這些志願醫務人員，對于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來說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幾經商討，他們最後才不得不同意讓志願醫務人員帶著學生和受傷者集體撤離，但拒絕了志願醫務人員所提出的巡查天安門廣場的要求。這時候，天已大亮，星光和志願醫務人員們看見天安門廣場上一片狼藉，到處是坦克或裝甲車碾壓過的痕跡。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個個火堆，不知道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焚燒什麼東西。

在撤離的過程中，爲了防止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守承諾，乘機來搶奪受傷者和學生，志願醫務人員們手挽著手形成了兩道人牆，讓抬著受傷者的人和幾位學生走在人牆中間，大家一起慢慢的沿著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的人行道往南撤離天安門廣場。

在這些志願醫務人員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整個過程中，持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一直在旁押解著，同時盡一切可能阻斷志願醫務人員觀察天安門廣場的視線。

當這些志願醫務人員走出天安門廣場，來到前門大街，集聚在街道兩邊的市民和學生們熱烈鼓掌歡迎，稱讚他們的英勇行爲。志願醫務人員們深受感動，其中的很多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緒而失聲痛哭。

這些志願醫務人員們先是步行到位於前門西大街上的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將受傷者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後大家一致同意留下一份簽名，等待到了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作爲見證人，大家一起出庭作證，懲罰殺人兇手，還死難者公道。多年以來，星光一直在想，這份寶貴的志願醫務人員簽名名單現在何處？【注釋 116】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北京醫務人員不僅冒著生命危險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受傷者的生命，而且還盡力保護受傷者在日後不受到政治迫害。例如北京市兒童醫院的醫務人員最初還依照規定，對送來的受傷者逐一登記個人資料，以便事後好向受傷者本人或受傷者所在單位收取醫療費用。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二點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中國官方的“告全國人民書”，指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醫務人員們立即意識到“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日後有被指控爲“暴徒”，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性，於是馬上決定將受

傷者名單及其個人資料撕掉，以保護受傷者。

北京市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受傷者即多達二、三百人，死亡者有二十多人。

果然不出所料，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的各機關單位、學校、工廠企業，甚至連街道居民委員會，都成立了所謂的清查辦公室，根據中共當局的統一部署，搞人人過關，對所謂“動亂”、“反革命暴亂”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進行全面清查。

在大清查運動中，中共當局爲了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甚至對那些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遭受了極大痛苦的受傷者或已經不幸喪生的遇難者，也是決不輕易放過，殘酷無情地把他們作爲清查運動中的重點清查對象。爲了達到將一些遇難者定性爲“反革命暴徒”的目的，中共當局不惜逼迫現場目擊者作僞證，在第一線參與搶救工作的志願醫務人員遂成了重要的逼迫對象。

遇難者楊燕聲生前是《中國體育報》編輯部電腦室的職員，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遇難時正當而立之年。（參見附錄照片）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楊燕聲獨自騎著自行車到達與東長安街相交的正義路，正好迎面開來一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用卡車，軍用卡車上的士兵向路邊的人群開槍掃射，人們趕緊都趴下了，楊燕聲也隨之趴在地上。

這時候，前面有個人淒厲地叫喊著：“救命啊！我受傷了！快來救救我啊！……”楊燕聲聞聲站起來，準備去搶救這位受傷者，就在他奔向呼救的受傷者時，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聲音告訴周圍的人：“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

在場的人群中有一位北京醫院的醫生，目睹了這一切，他隨即和周圍的民眾一起，用一輛平板三輪車將楊燕聲送到他工作所在的北京醫院，並立刻將楊燕聲送上手術臺搶救。醫生打開楊燕聲的腹部傷口，發現子彈在他的身體內炸開了，整個肝部都幾乎被炸爛了，這是中了“炸子”(開花彈)！腹腔裏都是血，已經無法搶救了。

楊燕聲不幸遇難的時候，他的兒子年僅一歲零八個月，他的妻子黃金平因爲丈夫突然間被奪走了生命，曾一度喪失了繼續活下去的信心。

在大清查運動中，清查人員企圖將死難者楊燕聲打成“反革命暴徒”，逼迫當時在場參與搶救的北京醫院的醫生作僞證。這位醫生善良而正直，他不能昧著良心誣陷好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清查人員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強加於死難者楊燕聲的誣陷不實之詞。

“難道楊燕聲就沒有一點越軌行爲？”清查人員質問。

“沒有。”醫生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再想想！”

“沒有什麼可想的。”回答仍然是那樣斬釘截鐵。

“沒有暴力行爲，戒嚴部隊怎麼會打死他？”

“我不知道。你應該去問戒嚴部隊。”

再問，醫生保持沉默；又問，醫生還是保持沉默。

作爲一個中國人，要保持那麼一點點做人的良心多難啊！爲了不願作僞證，這位醫生受到了“應得”的懲罰，有半年多的時間，不准他上崗給病人看病，實際上是剝奪了他治病救人的工作權利，精神上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多年後，黃金平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說起這一切，還是那樣的憤憤不平。她說她的丈夫是爲救人而死的，而那位醫生爲救她丈夫又無辜受到牽連。爲什麼共產黨總是和好人過不去？【注釋 117】

六月四日清晨六點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點鐘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數萬名軍人完全控制了天安門廣場。所有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路口全部遭到嚴密封鎖，到處是一輛輛排列成陣的坦克、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凡是企圖接近天安門廣場的民眾，都受到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或端槍恐嚇，或鳴槍警告的死亡危險。儘管如此，在天安門廣場各個方向的週邊地帶仍有大批民眾不願離去。

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邊沿地帶，一群近二十位民眾隔著綠化隔離帶的鐵欄杆，與大約有一個連兵力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近距離對峙著。這支部隊的指揮官四十歲出頭，提著手槍，圍著軍人隊伍轉悠。

人群中有四位北京大姐特別引人注目，她們四十歲上下，中等身材，微微發福的身體因爲過度激動而不停地顫抖。她們挺立在綠化隔離帶的鐵欄杆後，面對近在咫尺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哀訴、數落：“學生有什麼罪，他們都是你們的兄弟……，你們爲什麼對他們下毒手，向他們開槍？……誰讓你們開槍的，就算有人下命令開槍，你們怎麼下得了手？……你們的良心呢？……你們想一想，你們應該向誰開槍？槍是對準敵人的，你們如今又對準了誰？……誰養你們來著，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你們爲什麼對人民開槍……你們穿的軍裝是姐妹們織的，你們吃的糧食是農民們種的，你們的槍彈是工人們生產的……你們是人民的軍隊，爲什麼不保衛人民？……”

她們神態悲愴，情緒激憤，說的話既通俗又在理，深深地感染了在場的其他民眾，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開了。在這種情況下，那名許久沉默不語、來回轉悠的軍官臉面上掛不住了，只見他漲紅了臉，眉頭擰得緊緊的，步子轉悠的更快了。也許他是想裝樣子做個姿態給上司看，避免承擔立場不堅定的責任，也許就是不能接受民眾的說教。他掃視一下周圍，把手槍指向天空，做出鳴槍警告的動作，但最終還是又將手槍放下了。這個鳴槍警告的動作惹惱了民眾，紛紛說：“怎麼，還想開槍？開呀！開呀！”那四位北京大姐更是不依不饒，拍著胸脯頂上

去，大聲叫嚷著："想開槍？好哇，開吧！不怕你！來呀！朝這兒開呀！"

那位軍官的臉更紅了，脖子上的青筋一鼓一鼓的。他咽了一口唾沫，咬緊嘴唇，又把手槍舉向天空晃了晃。"砰！砰！砰！"他終於真的連開了好幾槍。一陣"嘩啦嘩啦"的響聲，有幾個士兵隨即也拉開了槍栓，將子彈頂上了膛，並把黑森森的槍口對準民眾。真傢夥還是有些嚇人的，民眾們一時間安靜了下來，敢怒不敢言，只是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投以更冷漠、輕蔑的目光。

出人意料的是，此時此刻，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勇敢。面對黑森森的槍口，四位北京大姐不僅毫無懼色，而且憤怒的大聲吼叫："好哇，劊子手，敢動真格的！來呀，試試看，人民不會怕你們！來呀，法西斯，開槍吧！人民不怕你們！"她們聲如獅吼，淚如雨下。其中一位北京大姐甚至爬上綠化隔離帶的鐵欄杆，沖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吼叫著："我跟你們拼了！"旁觀的民眾紛紛拍手叫好，吶喊助威。

一看鳴槍警告也嚇不住這些悲憤而潑辣的北京大姐，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顯得有些束手無策。此後，這四位北京大姐依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們則閉口無言，再也無人應聲。

說實話，這應該算是一群克制的，也是良知未泯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他們"忍辱負重"，最終沒有開槍射殺眼前這些不怕死的女人。在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象這樣克制和良知未泯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大有人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點十五分左右，前門東大街附近突然槍聲大作，急促的腳步聲和石塊、磚頭、玻璃瓶子等東西的磕碰聲響成一片。轉眼間，從南側一個路口竄出了四位持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他們個頭不高，神色焦慮，腳步如飛。在這四名士兵的身後，有十幾名被屠殺事件激怒了的青年發瘋似地追趕著，一邊高喊"打死他們！打死他們！"一邊投擲密如冰雹的石塊、磚頭和玻璃瓶子。

不尋常的動靜驚動了附近的民眾，他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手邊有什麼東西就拿什麼東西朝這四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扔過去。同時，道路兩旁建築物原先緊閉的門窗也都張開

了大口，許多雜物沒頭沒腦地從高處朝這四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砸去。

這四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被民眾追的氣喘吁吁，驚惶失措，急得連連朝天上放槍警告，但始終沒有對準民眾開槍射擊。如果他們當時對準密集的人群開槍，肯定會造成許多民眾傷亡，又將是令人痛心的一幕悲劇，但是悲劇沒有發生。

這四名士兵奔跑到大街北側後立即往東疾跑，拐進了前門東大街十一號大院，這個大院門口掛著“北京市公安局”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兩塊大牌子。

開槍屠殺事件實在是太殘酷了，已經徹底激怒了民眾，許多人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痛恨至極，採取了以暴易暴的報復行動。令人歎息和遺憾的是，那些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淩晨，在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肆無忌憚地對著人群開槍，製造了一樁樁殺人慘劇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幾乎沒有人遭受到憤怒民眾的報復，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是那些因故沒有接到開槍命令，或雖然接到了開槍命令而不願執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以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亮以後作爲第二梯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沒有肆無忌憚地對著人群開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承受了憤怒民眾的報復。

客觀地說，遭到憤怒民眾報復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良知未泯、非常克制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他們沒有直接對準民眾開槍，或是朝天鳴槍警告，或是手中根本就沒有槍彈。這些遭到憤怒民眾報復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也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受害者，他們不應該遭到報復，因爲他們不是屠殺事件的製造者或執行者。

臨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點鐘的時候，紀念碑底座一帶冒出了焚燒“物體”的熊熊大火，濃密的黑煙沖天而起，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在撤退的路上，我們不斷地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血腥鎮壓行動所遺留的痕跡，地面血跡斑斑，街道兩旁的建築物槍孔密佈。沿途也不時地遇上大批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記得很清楚的是其中有一支穿著天藍色褲子的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學生們對著這些軍人齊聲怒吼：“畜生！走狗！劊子手！”

爲了鎮壓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爲了對付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數千名和平請願的學生，中共當局竟然出動了除海軍之外的各軍兵種部隊，其中包括裝甲兵、坦克兵、陸軍、空軍和炮兵部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點多鐘，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開始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新華北街路邊的居民住宅都是些老式四合院，居民人口比較密集，一見到學生隊伍過來，大家扶老攜幼出來觀看。

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褲背心，抱著小孩站在家門口，只見他突然把懷中的孩子交給身旁的女人，走上前來，把自己腳上的拖鞋遞給了一位用布包腳的學生。一位年紀稍大些的男子見狀，也隨即跑回自家院子拿來一雙鞋子送給一位赤腳的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倆人都默默的沒有說一句話。

發生在眼前的這一幕，讓我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這時才感覺到愛。

西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裝甲車碾壓得印痕累累，街道兩側商店的牆壁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讓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一些商店的玻璃櫥窗上用鮮血書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回首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望去，在新華門一帶，仍有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堅持不走，與橫跨在長安街上的坦克、裝甲車及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方陣相抗衡，場面壯烈。市民和學生們不斷齊聲高呼著“打倒法西斯！”、“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等口號。

此時，我們中國政法大學大約二十餘名師生打著一面校旗，正處在西長安街上的郵電大樓（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十三號）附近。長安街是中國目前最寬敞的馬路，寬達七、八十米，屬于雙行道，南北兩邊各分爲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學生隊伍當時打著各自學校的旗幟，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就在這個時候，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著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毒氣彈，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隊伍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追輾過來。

一時間，長安大街上彌漫著淡黃色的煙霧。這種淡黃色的煙霧不像是催淚瓦斯，因爲儘管它極富刺激性，但並不催人淚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後，就會讓人當即感到胸悶氣短，透不過氣來。許多學生吸入淡黃色的煙霧後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幹嘔不止，其中有幾位女學生，這時候也根本顧不得女孩子應有的形象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的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爲過多吸入了這種淡黃色的煙霧，當場暈倒在路旁，被學生送往醫院急救。

一位曾經吸入淡黃色煙霧的學生談到感受：讓人掏心扯肺的，一個星期後症狀才完全消失。他覺得這種淡黃色煙霧的味道很熟悉，後來想起來這是中學時期做化學試驗時曾經嗅到過的氯氣。氯氣是強氧化劑，放在水中，可以置換出氧氣來，造成濃鹽酸，氯氣彈會給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死亡，應該屬於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

儘管在天安門廣場上經歷了血腥鎮壓，但是，善良天真的學生們還是料想不到中共當局會殘忍到動用坦克繼續追殺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並正處在返校途中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學生隊伍。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而躲避，不少人被綠色尖頭鐵欄柵刺傷或跌下來摔傷。最可憐的是那些柔弱無力的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只能緊緊地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驚恐之狀讓人心酸。

我和數百名學生在翻越綠色尖頭鐵欄柵後，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逃避毒氣彈的傷害，而那些把門的武裝警察可恨之極，竟然緊閉大門，拒絕讓學生們入內避難。

當時，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正與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輛自行車走在自行車道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他倆不相信如此靠邊行走也會有危險，於是就沒有跟著一起奔逃。沒想到一念之差，兩個人頃刻之間便倒在坦克的履帶之下一死一傷。林仁富當場死亡，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王寬寶身負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做手術。受傷的部位可怕極了，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但他有著不屈的意志，

幾年來強忍著傷痛的折磨，不僅完成了碩士研究生的學業和畢業論文，而且硬是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待坦克過去，比我們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們已慘遭不幸，有十一名學生當場慘死於坦克之下，另有許多學生受傷，其中有兩名學生被軋斷雙腿，雖然已被群眾迅即送往醫院，但因爲受傷過重，估計已經沒有回生的可能。發生慘案的現場位置在六部口。

經過“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多年艱辛的查尋，目前已經尋找到六部口坦克軋人慘案的死難者五人、受傷者九人，一共十四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以及受傷部位、致死原因；有十人已確知籍貫、家庭地址；有一人不願公佈個人資料。

五位遇難的大學生是：

1)林仁富：男性，福建省莆田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博士生，遇難時年僅三十歲，已婚，無子女。

林仁富的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林仁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兄一姐。在林家的眾多子女中，林仁富是唯一進入高等學府的，遇難時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且已聯繫好於當年十月赴日本深造。

林仁富在他的同齡人中本來是個幸運兒，也是林家的驕傲和希望，所有的一切卻頃刻之間在坦克的履帶下化成了灰燼。

2)董曉軍：男性，江蘇省鹽城縣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歲。

董曉軍與林仁富一樣，也是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被那輛瘋狂的坦克軋死的，屍體被軋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狀。

董曉軍遇難後，他的父母將其骨灰盒抱回江蘇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門前小溪對面的岸邊。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爲夢幻，唯有那由母親的淚水匯成的溪流年復一年地嗚咽著，控訴著那場發生在首都北京的慘無人道的殺戮。

3)王培文：男性，陝西省咸陽市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一歲。（參見附錄照片）

王培文不幸遇難後，其家人迫于政治壓力，將悲傷深埋在心裏，一直不敢與外界聯絡。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丁子霖曾經按照友人提供的通訊位址給其家人寫過一封信，也曾經向他們轉交過來自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終沒有收到對方的回信。以後丁子霖又曾經做過努力，但始終沒有結果。丁子霖想，這多半是出於恐懼吧。

4)田道民：男性，湖北省石首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一九八五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二歲。

田道民先被軍用毒瓦斯熏倒在地，隨後又被坦克軋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軋掉。他當時被送往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不治身亡。

田道民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家中兄弟姐妹多達八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貧寒家庭的唯一希望。

田道民遇難後，他的同班同學相約每人每年給他的父母寄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貼。其家人把他的骨灰盒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他的父母至今一提起遇難的兒子仍痛苦萬分。

5)龔紀芳：女性，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生前是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九八八級學生，遇難時年僅十九歲。

受傷的九人是：

1)方正：男性，當時是北京體育學院（現爲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

2)王寬寶：男性，當時是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3)權錫平：男性，當時是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

權錫平在躲避坦克追軋的時候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右腿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枝被打斷，如今右腿呈萎縮狀態。

4)劉華：男性，當時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

劉華與方政同時被坦克軋成重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後來截肢。

5)北京某大學一名不願公佈個人資料的女學生。

這名女學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冒著生命危險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這輛發了瘋的坦克竟然喪心病狂地壓向了這位善良的女學生，將她的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俗話說，子彈不長眼睛，可是，駕駛坦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難道也不長眼睛嗎？！連一個救死扶傷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慘無人道的嗎？！

另外四名受傷者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和單連軍。他們有的被軋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在六部口坦克追殺學生撤離隊伍事件中，因爲當時所處位置的關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首當其衝，所遭受到的傷害最爲嚴重，除了上述名單中的傷亡者，還有一些受傷的學生並不在這份名單上。在整個撤退的學生隊伍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所處的位置比較靠後，跟隨著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國洛杉磯主辦《新聞自由導報》的時候，結識了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也受了傷，幸運的是，他由於個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當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的時候，他的身體正好處在坦克的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他後來寫了一篇題爲《坦克追碾學生事件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登於《新聞自由導報》。

他在回憶文章中敘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三、四十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頭。

大約在清晨七時左右，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三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沖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嗆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

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柵，

這道鐵欄柵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柵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柵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沖進鐵欄柵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淒厲的叫喊聲。

一剎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蘇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柵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我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柵，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在上述這些遇難學生中，北京商學院的女學生龔紀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於坦克碾壓或撞擊的遇難者。她先是左胳膊中彈倒地，繼而因吸入大量的毒氣造成昏迷，被民眾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經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於吸入毒氣造成肺部糜爛。

龔紀芳左胳膊的傷口很大，看樣子像是中了俗稱"炸子"的開花彈（達姆彈），實際上應該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徑槍械（機槍或重機槍）所發射的子彈，因爲當時在學生撤離隊伍的四周並沒有步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彈應該是從坦克上發射出來的。

針對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憤怒地表示：

"我常常想，在戰爭年代兩軍交戰時，對敵方繳械的士兵尚且還得放他一條生路，爲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多少年來，我總想弄清楚這輛坦克所屬的部隊，弄清楚這支部隊的現場指揮員。幾年前，我得到了那輛瘋狂坦克的番號，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轉移存放在家裏的資料時，竟把當時記錄下這個番號的一張紙片丟了。我期望有那麼一天，那輛坦克能

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爲那場血案的罪證。”【注釋 118】

在上述受傷的學生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的經歷最具典型意義，也最讓人感歎。

當坦克向學生撤退隊伍快速追逐碾軋過來的時候，方正沒有只顧自己逃生，而是見義勇爲，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氣和驚嚇過度而暈倒在地的同校女學生向路旁移動。一瞥眼，方正發現身後急速追逐碾軋過來的一輛坦克已經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頭頂，他趕緊將懷抱中的同校女學生奮力推出去，自己卻躲避不及，只好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爲時已晚，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他的腿及褲子，將他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才掙紮著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下來滾落到了路邊，倚靠在尖頭鐵欄柵上，昏迷過去。（參見附錄照片）

方正被好心的民眾及時地包紮了傷口，快速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街三十一號）救治。參與救治方正的醫生事後告訴他說，當時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的受傷者很多，血庫非常緊張。方正由於失血過多，已經瀕臨死亡了，經過全力搶救，才保住了生命。方正雖然保住了生命，但雙腿卻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五公分處截肢。

方正的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出院返校之後遭遇到一連串殘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重度傷殘的方正竟然被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列爲重點清查對象。方正按照大清查運動的要求，照實寫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壓的經過。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卻非要他改口說是被汽車或裝甲車碾壓，絕對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裝甲車追軋學生和坦克追軋學生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與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一樣。）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一再要求方正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堅決拒絕。

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始終懷疑方正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發生之時有暴力行爲，否則爲什麼會遭到坦克的碾壓。方正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堅決表示自己所說所

寫的都是事實，不相信的話，可以去調查。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就去找那位被方正所救的同校女學生調查取證，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學生既不願意爲方正作證，也不承認當時與方正在一起。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抓住這一點，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沒有解決方正的問題，原先的畢業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讓他再住在學校的宿舍裏。

北京科技大學的青年女教師吳蓓和一位姓曹的職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數千名學生生死相依，後來跟隨學生隊伍一起撤離，她倆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當她倆得知那位北京體育學院的女學生不願意出面爲方正作證的情況，非常氣憤，主動找到方正表示說，我們願意爲你作證，於是就去找北京體育學院的領導反映情況。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按照個人運動成績，方正理應在全國選拔名單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卻因爲他的傷殘原因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關，被以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朴方擔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協會無理地取消了參加比賽的資格。關於此事，美國《紐約時報》曾經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過一篇詳細的采訪報道。其他的海外新聞媒體也有過報導。

方正身殘心不殘，雖然經歷了一連串的磨難，但仍然自強不息，後來作爲個體戶到海南省海口市謀生，包括擺地攤賣東西。海口市公安部門一直把方正當做監控對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迫使他離開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正截肢後必須依靠輪椅代步，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方正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注釋 119】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太殘酷了！現場的情景太悲慘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現場，我才

真正明白了“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慘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現實是如此之殘酷，而心情是如此之傷痛。

從此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攙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倒在離這具遇難學生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參見附錄照片）

（當我從電報大樓門口重返六部口慘案現場的時候，部分受傷的學生和遇難學生的遺體已經被民眾運走了。）

一些極度悲傷的學生滯留在慘案現場，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運走，免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去毀屍滅跡。於是，有幾個學生走到六部口郵電局西面的一個胡同裏，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現場民眾的幫助下，這幾位學生開始一具具地將遇難學生的遺體抬離現場。

雨源（化名）是這幾位學生中的一位，他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當時坦克就在旁邊轟鳴著，我們流著淚，也顧不得害怕了。我已經記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個腦漿被壓出來的學生。當時由於木板太短，他的頭頂在我的肚子上，腦袋已經空了，但我的襯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腦漿。抬另一個內穿紅背心的學生時，他的一隻右臂和上身只連了幾絲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背心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來，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後把他抬了出去。還有兩個學生已經和自行車碾到了一起，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將一個和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個被壓得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我們實在無法將屍體和車子分開，只好連同壓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去。

記得我們抬最後一個屍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來一批坦克（應當就是先前由東往西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此

時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當時正拿著木板朝東蹲著準備抬屍體，根本沒注意背後的事。突然間，許多市民和學生都沖著我喊叫起來。我回頭一看，一輛最邊上的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了，我條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剛才的木板，約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壓得象麻片一樣，我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了一身冷汗。”

最後，這幾位學生終於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的一個胡同裏。遇難學生的遺體雖然抬離了現場，但擺放在胡同裏總是不妥，這幾位學生正在爲如何處理而發愁的時候，正巧來了一位見義勇爲的個體戶司機，他流著淚建議把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去，以備作爲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其中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雨源等幾位學生也上了小卡車，護送遇難學生的遺體。

由於擔心在大路上行駛會遇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奪遇難學生的遺體，個體戶司機特意駕駛小卡車沿著胡同開了很久，然後才拐上了二環路。

一路上，個體戶司機對雨源等幾位學生講述了他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受傷者和遇難者遺體的所見所聞。

由於小卡車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是迭放上去的，車子只好開得很慢。這時候，車子前後已經跟隨了許多悲憤的民眾，騎自行車或步行。

小卡車拐上了二環路之後，許多民眾騎著自行車前後圍著小卡車，護送著小卡車駛向位於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一路上，騎自行車護送的民眾越聚越多。小卡車的前後左右還跟隨了許多步行的民眾，至少有上千人。

當小卡車到達中國政法大學的時候，已有數千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門口迎接。雨源剛剛跳下小卡車，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年人噙著淚水上前緊緊抱住了他。雨源就象一個出門在外受盡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裏一樣，趴在教授模樣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來。當時整條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哭泣聲。

當時與雨源在西長安街上同行的還有一名王姓的同學，他與雨源跑散後，差一點被快速追來的坦克撞倒。當他跑到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現場的時候，看到一個受傷的學生躺在地上，一支臂膀幾乎被坦克的履帶碾壓下來，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但令人吃驚的是，在王姓學生的慌亂攙扶下，這位受傷的學生竟然站了起來，並能坐上一輛自行車的後座，扶著自己受傷的那支胳膊離開現場，被載往醫院接受治療。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過了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雨源得知了這個胳膊受傷學生的下落。這時候，他已經永遠失去了那支胳膊，而且被迫離開了他所在的大學。【注釋 120】

準確地說，部分死難的學生並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在三輛坦克到達之前，他們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但已經讓開道路，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邊。可是，其中一輛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欄柵，沖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欄柵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從遇難學生遺體的狀況來看，也可證明部分死難的學生確實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

製造了六部口追軋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三輛坦克，隸屬于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該坦克師當時奉命組成一支坦克車隊（共有八輛坦克），由團長羅剛上校（北京人）擔任指揮官，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緊急趕往新華門一帶驅趕集聚在那裏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和市民，然後又一路向前行駛，追逐碾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

《戒嚴一日》一書中有一篇題爲《紅牆外的較量》的署名文章，作者就是親身參與並指揮上述三輛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行動的指揮官羅剛上校。

羅剛在該篇署名文章中寫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五時二十分，上級命令我帶領部分坦克立即去驅散正在衝擊圍攻新華門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眾、學生，以保證中南海的絕對安全。軍令如山，責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隊傳達了上級的命令並作了簡要的動員，迅速按團的部署，八輛坦克一字排開，共四排向西長安街並駕齊驅，以

形成威懾力。

坦克剛行進約兩華里，就遇到了一些暴徒的拼命抵抗。在他們的煽動下，十多米的路面上已橫躺了幾百名學生和群眾，以阻止坦克前進。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坦克離‘人障’越來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來。怎麼辦？當時如果停車，慢慢做疏導工作，就無法解救新華門，但繼續開進，又會誤傷大批群眾和學生。這時我坐在指揮車裏，頭上直冒汗，電臺不時傳來‘新華門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時間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採取一、二、三號方案。……”【注釋 121】

上校團長羅剛在署名文章中所描述的結果是，在沒有向群眾開一槍，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的情況下，他成功地帶領他的部下將坦克一路開往新華門，開往六部口，完成了上級所賦予的驅散群眾的緊急任務。上校團長羅剛所描述的結果太神奇了，有誰會相信呢？

我當時不在新華門前，所以不能斷言羅剛所率領指揮的這些坦克在新華門前是否曾經碾壓民眾，但是，我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親眼目睹了上述三輛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暴行，而且關於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又有那麼多的人證、物證，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的上校團長羅剛作爲該行動的現場指揮官，不可能也休想以一篇充滿謊言的署名文章，輕易地逃脫他應有的責任。

根據上校團長羅剛在署名文章中的敍述，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副團長賈振祿上校也參與了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血腥鎮壓行動。

讓歷史和我們都牢牢記住羅剛和賈振祿這兩個名字，直到有一天將他們送上審判台爲止，只有這樣，那些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慘死的遇難者的在天之靈才能安息，遇難者的親屬以及受傷致殘學生長期受到傷害的心靈才能逐漸平復。

許多學生當場記下了那輛碾壓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的編號，一路上反復放聲背誦著，提醒其他學生和沿路的民眾們千萬要記住。我當時也記住了這輛坦克的編號，一路上不斷地向聚集在街道兩邊的民眾宣講，可惜在長期流亡生涯之後已經有

些記不清了，不敢確定這輛坦克的編號是否就是“一零六”，但我相信在那麼多的目擊者中，一定會有很多學生和市民仍然銘記著。【注釋 122】

五具死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之後，先是並排擺放在教學大樓前的幾張桌子上，後來又移進教學大樓大廳，設置了靈堂。在以後的幾天日子裏，先後曾有數以萬計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其他大學的師生和北京市民親眼目睹了這些死於坦克的遇難學生遺體，他們都是中共當局動用坦克血腥屠殺學生的見證人，歷史必將做出公正的判決，給予屠殺事件的決策者和具體執行者以應有的懲罰。（參見附錄照片）

在這五名死難學生中，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兩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各一名。其中北京科技大學的死難學生是一位博士研究生（應該就是林仁富），身上帶有一張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一位死難學生的校藉不明，很可能是外地赴京聲援的學生，他的遺體遲遲無人認領，在靈臺上擱置了多日，遺體四周放置著冰塊，一直由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一日三餐定時祭供食品，並有學生和教師終日爲之守靈。一位參與守靈的老教授憤怒地說：“這個政府瘋了，也快把我們給逼瘋了！”

動用坦克追軋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這確實是一件令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悲慘而殘酷的事情，真可謂天理不容，人神共憤。中共當局對於血腥屠殺在西長安街等處勸說阻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學生和市民，可以強加以“反革命暴徒”的罪名，中共當局對於血腥鎮壓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靜坐請願的學生，可以誣衊爲“學生佔據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首都北京的政治活動中心”。然而，中共當局對於動用坦克追殺已經和平而有秩序地行進在撤往校園途中的學生隊伍，又能作何解釋呢？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耍流氓手段，撒謊抵賴。

中共當局的確就是這麼做的。例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事後曾刊登一篇署名“藍默”、題爲《如此新聞道德----西方和香港新聞媒體扮演了什麼角色》的文章，文章中聲稱：“柴玲和數千名學生從天安門到北京大學，走了十幾公里，途中竟無一傷亡，這能證明血腥鎮壓民運學生嗎？”

中共當局企圖以所謂的“撤離途中的數千名學生竟無一人傷亡”來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並未血腥鎮壓民運學生，那麼，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現在事實已經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坦克軋死十一名、軋傷許多名撤退途中的學生，中共當局是否應該就此而承認血腥鎮壓民運學生了呢？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慘劇發生之後，學生們群情激憤，許多人怒不可遏地揀起路旁的碎石磚塊，奮力拋向已經遠去的坦克，以泄心頭之恨。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是自屠殺事件發生迄今爲止，在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和平請願行動的學生們所僅有的一起根本算不上暴行的暴行。

當時，我與所有身處六部口事件現場的學生一樣，震驚和憤怒無法以筆墨來形容，心中只有一個簡單而強烈的想法，如果手中有一顆原子彈，我願意與中南海裏的屠殺事件決策者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那群畜生同歸於盡。

至此，即使再堅強的學生，也無法忍住悲痛的眼淚。沿途，我和許多學生紛紛向路旁的市民群眾哭訴坦克在六部口無情追殺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真相和經過，聽者無不傷心欲絕，淚如雨下。大家一路走，一路哭訴，反復不斷地哭訴，聲音嘶啞了，眼淚也快流盡了，個個就像魯迅先生小說《祝福》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一樣。大家當時的確是被坦克追殺事件氣瘋了。這就是中共當局事後所指責的“一些自稱是死裏逃生的目擊者，連哭帶喊地訴說裝甲車（應當是坦克，中共當局始終忌諱“坦克”這個字眼----作者注）沖向人群”。【注釋 123】

在六部口被坦克沖散的學生撤退隊伍經過重整後，繼續沿著西長安街前行，到了西單路口，北拐轉向西單大街，然後又轉向新街口。

在新街口，學生隊伍分爲兩路大軍，各自返回自己的校園。一路大軍以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爲主，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郵電學院（現爲北京郵電大學）、北京語言學院（現爲北京語言大學）等學校，往北去。另一路大軍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爲主，其中包括北京外交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學院（現爲中央民族大學）等學校，往東去。

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人行走在往東去的學生隊伍之中。

在兩路大軍分手之際，我在北京大學的隊伍中意外地發現了我的溫州老鄉、北京大學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孫永平，沒想到他也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們生死相依。在這種情景下重逢，不能不讓人百感交集，兩個人臉上掛滿的淚痕尚未消失，淚水又溢出了眼眶。

我和孫永平都是北京大學一九八三級的碩士研究生，當年同住在三十四號學生宿舍樓的二樓。他的腳本來就有殘疾，走路一拐一瘸的，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又將鞋子擠丟了，此時走起路來就顯得更爲艱難了。很難想像他是如何花費好幾個小時赤腳走回北京大學校園的。事後只要回想起孫永平光著腳板艱難行走的情形，我就感到非常難過，總是要在心裏狠狠地責怪自己，爲什麼當時沒有想到將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給他，或者向路旁的民眾爲他要一雙鞋子，沿途曾經有不少民眾主動地將鞋子脫下來送給光著腳板的學生。我想不通自己當時爲什麼會那麼冷漠無情，難道真的是已經因爲極度的悲傷和憤怒而失去了正常的思維能力了嗎？

自學生隊伍進入西單大街始，道路兩旁集結的民眾越來越多，情緒也很激烈，紛紛痛斥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屠殺暴行，並熱情地讚頌和鼓勵學生。

在新街口，發生了一段令我難忘的小插曲，那位在六月三日下午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出發前與女朋友依依道別的特別糾察隊隊員，遇上了通宵達旦尋找等待他的女朋友，淚流滿面的姑娘小鳥似地飛撲上來，倆人在大街上當眾緊緊相擁親吻，以中國人罕見的方式慶賀劫後重逢。【注釋 124】

在爲他倆慶幸的同時，我不禁想起那些已經長眠在天安門廣場和西長安街等地的學生，他們正值青春年華，前景無限美好，本來可以成爲優秀的教師、科學家、工程師、作家，可以成爲好丈夫、好妻子、好父親、好母親以至於好爺爺、好奶奶，然而，爲了民主和自由的事業，他們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想到此，《血染的風采》歌曲的旋律在腦海中迴旋，我情不自禁地帶頭唱起了這首悲壯的歌曲：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
你是否還要永久地期待；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
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再不能醒來，
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付出的愛。

西單大街與王府井大街一樣，是中國最著名的繁華商業大街之一，道路兩旁商店林立，儘管北京經歷了一整夜的血腥鎮壓事件，民眾和學生們憤怒不已，但這裏的商店卻都完好無缺，不要說沒有遭到焚燒搶劫，就連門窗玻璃也沒有被砸破一塊，這足以反映北京市民和學生心靈的高貴。

自從進入西單大街，一些憤怒的學生開始扯下沿途兩旁建築物上懸掛的中國官方的宣傳橫幅，諸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之類，點火燒毀。學生們最痛恨的，就是寫著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再宣傳的口號的橫幅：“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因爲屠殺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正是高喊著這些口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

在北太平莊的路口處，有一座解放軍總參謀部某部的大院子，大院子中的一棟大樓懸掛著一幅寫在紅布上的大標語“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從四層樓的樓頂一直垂掛到地面。我帶領幾名學生沖進大院子，三五下就將橫幅扯了下來，點一把火將它燒了。在軍隊的大院子裏幹了這件事，感覺上總算出了一口惡氣。

過了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又過了北太平莊，我們自己的校園----中國政法大學已經遙遙在望。於是，我們再次重整了隊形，在一面迎風飄揚的校旗的引導下，數十名師生排成整齊的四路縱隊，儘管大家都已經極度疲憊和悲傷，也不敢自詡爲勝利之師、威武之師，但還是相互鼓勵，積聚起最後的精神和體

力，願以不屈的形象出現在母校師生的面前。

身爲教師的我和劉蘇里共同在前頭帶隊，一時間，口號震天，“殺氣”騰騰，絲毫看不出是一支“敗退”的隊伍，沿途有不少民眾還以爲我們是一支開往“前線”的增援隊伍，紛紛予以勸阻：“同學們，別去了，千萬別去了！那些畜生殺人都殺紅了眼呀！……”

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左右，我們終於活著回到了自己的校園----中國政法大學。

聽了北京城內響了一夜的槍聲，在學校東門口翹首等待已久的數千名中國政法大學師生，一擁而上，緊緊地擁抱著我們這些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事件的倖存者。與我同一個工作單位的一位中年女教師看見走在隊伍最前列的我，剛剛撲上前來喊了一聲“小吳……”，就再也說不下去了，一把緊緊抱住我，放聲大哭。

校園內外，一片哭聲。

我們還活著，我們是倖存者，但是，我們沒有絲毫的欣喜和慶幸。一進學校東門，就看見在教學大樓前的幾張桌子上並排躺著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面對著這五具在六部口坦克追軋事件中遇難學生的遺體，我們這些倖存者齊唰唰地跪倒在地，第一次放聲痛哭。

淚眼朦朧中，那五具死難學生的遺體尚在不停地滴血。一名死難學生的頭顱被坦克軋爆，綁在額頭上的紅布條此刻已經深深地嵌入右側面頰，另一名死難學生的右半部身軀已被坦克擠扁……

哭聲中，一陣陣口號聲沖天而起：“打倒李鵬僞政權！”“血債血還！”“我們不會屈服！”……國際法專業的李姓研究生跳上桌子，淚流滿面地帶頭呼喊口號，他揮舞拳頭，一臉悲憤，平日的斯文形象早已蕩然無存。

師生們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已沿著學校東大門前的學院路由北往南挺進過來，向北京城內開進，沿途不斷開槍射擊，並對準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門上方横掃了一梭子子彈。

這些沿著學院路向北京城內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隸屬于陸軍第 64 集團軍。

北京城槍聲密集，血腥屠殺還在繼續！

(全文完)

注釋

【注釋 1】有關“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詳情，參見王軍濤題爲《獨立、民主、自由與進步----“六四”十五周年的回顧、反思與回顧》的回憶文章，收錄於《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一書，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二零零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注釋 2】見於《迷失在閱讀中---北大考研日記》一書，作者許曉輝，北京出版社出版，二零零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注釋 3】參見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某團副團長黃小平中校題爲《“虎穴”歷險記》的署名文章，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42 頁至第 47 頁。

【注釋 4】出處同上。

【注釋 5】參見潘強題爲《從山東大學到天安門廣場》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中文網路雜誌《大參考》總第二二七五期，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刊。

【注釋 6】封從德在相關的“批註”中稱：“召開這個記者會，主要是向全世界展示學生的‘非暴力’原則。(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張華傑（北京電影學院學生----作者注）回到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作者注）來，說公安局開始時不願接收槍支，後來在同學們義正詞嚴的再三要求下，終於收了，並開了收據，列了清單，蓋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大紅圖章。傍晚，柴玲帶著這張收據和一些軍人棄下的物件，召開了這個記者會。我不記得參加了這次記者會。”見于海外中文網站《六四檔案》所刊載的《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作者吳仁華）一文“批註”。

【注釋 7】臺灣《聯合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有關報導稱是“國家測繪出版社的職員鄭魯兵”。

【注釋 8】參見梁擎暾題爲《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經歷》的回憶文章，刊載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出版、總第八十期的美國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

【注釋 9】封從德在相關的“批註”中稱：“（吾爾開希發表廣播講話）應在一、兩個小時之前。吾爾開希是傍晚隨我和

林耀強從北大到廣場的。”見于海外中文網站《六四檔案》所刊載的《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作者吳仁華）一文“批註”。

一個香港學生（陳清華----作者注）在見證中說：“（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半，廣播宣佈有學生中槍，之後有人讀了一首詩，之後我們離開紀念碑，聽到吾爾開希的廣播，他的聲音很激動，表示‘要和平守衛廣場’、‘我們共和國的兒女’、‘不讓軍隊入來’、‘要保衛廣場’，講完後，像暈了似的。我們再去找吾爾開希，C C C（一位香港學生的化名----作者注）和 B B B（一位香港學生的化名----作者注）入內，之後 B B B 說吾爾開希暈了，入了醫院，但我只見救護車駛入和聽見那車聲音離開似的。”見於《六四見證----四十八名目擊證人的報告》一書第 367 頁，Grassy Plan Ltd 出版，一九九零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香港記者梁宙然在題爲《公厠頂上》的回憶文章中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時三十分，廣播傳出吾爾開希因心肌炎發作，需要找救護車送醫院治療的消息。”見於《人民不會忘記》一書第 161 頁，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10】事後查明，這名死難者是中國航空航天部的幹部，而中國航空航天部部長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卻無視自己部下被殺害的事實，仍然聲稱解放軍戒嚴部隊沒有殺人。

【注釋 11】參見丁子霖題爲《刺刀下的冤魂----人民大學學生吳國鋒的慘死》的文章，刊載於香港《開放》雜誌二零零五年六月號。

【注釋 12】參見題爲《十六年前那個腥風血雨的長夜----六四回憶》的回憶文章，作者佚名，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三六期，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13】參見邢村題爲《她是誰？她活著嗎？她在哪兒？》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八零期，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刊。

【注釋 14】參見題爲《回憶南池子的“血牆”》的回憶文章，作者佚名，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小參考》總第四四四期，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15】參見李紀婉題爲《我死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的回憶文章，刊載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美國中文報紙《多維月刊》。

【注釋 16】參見鍾羅白題爲《白色黎明》的回憶文章，刊載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出版的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世界週刊》。

【注釋 17】參見小鹿題爲《六•三----六•四慘案目擊記》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第六八八期，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18】參見施繩題爲《我忘不了那年的那一天----兩顆子彈擊中了我》、寫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的回憶文章，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刊載於《天下論壇》。

【注釋 19】參見王曉明題爲《目擊實錄》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20】參見飛龍題爲《死於“六•四”的兩個兒童----清明節致丁子霖》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21】參見王德邦寫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題爲《不死的懷念----八九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快遞》。

【注釋 22】參見痳子題爲《關於六四之夜的回憶》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八五期，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23】參見申雪題爲《睹戒嚴部隊槍擊少年》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總第四一九期，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注釋 24】參見《浴血金水橋》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108 頁至 109 頁。

【注釋 25】《戒嚴一日》一書分上下兩集，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第一次印刷。

該書總共收錄了一百八十九篇入選徵文，其作者基本上都是參加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上至集團軍軍

長、軍政治委員，下至普通士兵，有名有姓、有軍銜，只是一律略去了部隊的番號和代號。

該書因爲無意中洩露了太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及血腥鎮壓的秘密，出版一個月即被列爲“禁書”，予以收繳，但已有少部分流傳到海外。此書必將成爲研究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真相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

翌年再版的該書所謂的精選本，收錄的文章已經由一百八十九篇減少到八十篇，存留的文章也由中國官方有關部門對原文進行過大量的刪除和潤飾。精選本的字數不到全本的一半，不久後也絕版。

【注釋 26】參見《肩負著人民的希望----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參謀趙勇明》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82 頁至第 87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九九零年八月第一版。

【注釋 27】參見《鐵流東進第一車----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助理員李勃》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88 頁至第 99 頁。

【注釋 28】參見《太陽系裏一顆星----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幹事王強》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00 頁至第 111 頁。

【注釋 29】參見《山東好漢----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政治指導員廖開喜》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12 頁至第 123 頁。

【注釋 30】參見《鋼鐵戰士----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班長張震》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24 頁至第 135 頁。

【注釋 31】參見《五角星的夢----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參謀安衛平》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36 頁至第 141 頁。

【注釋 32】參見《責任----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教導員沈運田》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54 頁至第 165 頁。

【注釋 33】參見《鋼鐵衛士----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班長余愛軍》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66 頁至第 176 頁。

【注釋 34】參見《一切爲了祖國----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營長周家柱》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77 頁至第 186 頁。

【注釋 35】參見《共和國的旗幟上有他付出的愛----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排長游德高》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87 頁至第 196 頁。

【注釋 36】參見《生命的讚歌》一文，作者王占魁，刊載於《京都血火》一書第 224 頁至第 228 頁。

【注釋 37】參見《平暴英雄譜》一書。

【注釋 38】參見《平暴英雄譜》一書。

【注釋 39】參見《壯士神威----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戰士劉加林》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17 頁至第 226 頁。

【注釋 40】參見《熱血映丹心----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營長劉閣雲》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06 頁至第 216 頁。

【注釋 41】參見《巾幗賦----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北京軍區總醫院醫師楊蓉婭》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51 頁至第 262 頁。

【注釋 42】參見《血染的風采----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班長李樹存》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27 頁至第 238 頁。

【注釋 43】參見《人在密件在----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報務員葛明軍》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39 頁至第 250 頁。

【注釋 44】參見《傅勇之勇----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營長傅勇》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63 頁至第 267 頁。

【注釋 45】參見《血灑學院路----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股長種振慶》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

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68 頁至第 271 頁。

【注釋 46】參見《英雄本色----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衛生員樂立成》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72 頁至第 279 頁。

【注釋 47】參見《子夜雄歌----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連長袁寶華》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80 頁至第 290 頁。

【注釋 48】參見丁子霖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題爲《無端被殺的調停者段昌隆》的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

【注釋 49】參見劉曉波題爲《由段祺瑞的侄孫死于六四屠殺而想到的》的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大參考》總第二二四七期，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出刊）、傅國湧題爲《三•一八槍響之後》的文章（刊載于《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題爲《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的文章（刊載於《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六月號），以及《“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輯，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50】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左右，我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後，即著手查詢這位“某某”學生的下落，意外地發現，“某某”學生並未在西長安街中彈身亡，那位死難者是撿到了他遺失的學生證。

郵電醫院最初公佈的死亡者名單上有這樣的一條記錄：“吳忠，男，十九歲，政法大學政治系，上海人。”據我所知，中國政法大學並沒有學生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遇難，這位遇難者應當是撿到了吳忠的學生證，而吳忠就是被我們誤以爲已經遇難的特別糾察隊隊員。

【注釋 51】參見史鑒題爲《血夜----寫給歷史，寫給良心》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中文報紙《大紀元》，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出刊。

【注釋 52】據查，“51010”是陸軍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1 師的代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在天安門城樓附近開槍殺人的，應該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人，而不是陸軍第 27 集團軍軍人。如果這位醫學院學生的記憶無誤，那就是

在這些醫學院學生抵達此地的時候，開槍殺人的陸軍第 38 集團軍部隊已將此處的警戒任務移交給了從人民大會堂出來的陸軍第 27 集團軍部隊。

【注釋 53】參見張先玲題爲《爲了記錄歷史的真實》的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二零零四年第五期。

【注釋 54】參見張結鳳題爲《血，灑在天安門下》的回憶文章，收錄於《人民不會忘記》一書，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注釋 55】參見香港《蘋果日報》電子版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題爲《外國記者天安門廣場死裏逃生》的報導。

【注釋 56】參見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專訪張健的節目。

【注釋 57】參見易京兵題爲《38 軍徐軍長走上軍事法庭》的文章，刊載于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號。

【注釋 58】這本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由“38 軍軍史”編審委員會編寫，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印刷。此書注明是“內部發行”，印數僅三千冊。

【注釋 59】有消息稱，中國軍方準備組建第二個空降軍，番號爲空降兵第 16 軍。

【注釋 60】參見題爲《中國人民解放軍英雄團隊之七：機械化步兵第 380 團》的文章，刊載於奇虎網站(www.ju.qihoo.com)。

【注釋 61】參見丁子霖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題爲《家破人亡的一戶難屬》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

【注釋 62】參見丁子霖寫於二零零四年、題爲《三赴天津衛》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

【注釋 63】參見丁子霖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題爲《六四死難者調查：一位清華學子遇難之後》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

【注釋 64】見于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

【注釋 65】參見題爲《我們好好活著回來作證----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的文章，刊載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號。

【注釋 66】參見《聖殿軼事》一文，作者：上尉幹事崔維，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56 頁至第 59 頁。

【注釋 67】中國人民解放軍號稱擁有四大王牌師。

第一王牌師是陸軍第 54 集團軍的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127 師最早的前身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的孫中山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北伐戰爭中改編爲著名的"葉挺獨立團"，贏得"鐵軍"美譽。"大革命失敗"後，經歷了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是號稱"朱（德）毛（澤東）紅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4 軍、中國工農紅軍第 1 軍團的骨幹部隊。

第二王牌師是陸軍第 39 集團軍的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116 師最早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 26 軍和中國工農第 27 軍，這兩支部隊是中國工農紅軍名將劉志丹、謝子長所建立的陝北紅軍，他們建立了陝北根據地，爲逃離江西中央蘇維埃地區的中央紅軍的到來準備了一個諾亞方舟。

第三王牌師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113 師最早的前身是吳煥先、徐海東、程子華等人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25 軍，從安徽大別山長征到達陝北後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 15 軍團第 75 師第 223 團（現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 338 團）。

第四王牌師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2 師最早的前身是一九二八年湖南平江起義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5 軍一部，屬于彭德懷的舊部，長征到達陝北後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 1 軍團第 4 師第 10 團（現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 334 團）。

【注釋 68】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十三年後，正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工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曾參與當年鎮壓行動的前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2 連雷達站站長李曉明中尉，在美國紐約的記者會上公開了相關的情況。

李曉明是一名軍事院校畢業的學生軍官，當年對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非常不滿。據他透露，與他同樣身份的學生軍官大都據有相同的看法，甚至有學生軍官憤怒地以離隊出走表示抗議，事後受到嚴厲的處置。

參見《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寫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題爲《參與六四鎮壓軍官公開事件真相》的專題報導。

【注釋 69】參見高新題爲《“六四”之後仍在開槍》的文章，刊載於一九九一年七月號的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之春》。

【注釋 70】北京衛戍區是擔負首都北京警衛和守備勤務的、相當於省軍區級別的軍隊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當局於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平津衛戍司令部。一九五九年一月，平津衛戍司令部改編爲北京衛戍區和天津警備區。

北京衛戍區屬於北京軍區建制，同時是中共北京市委員會的軍事工作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機構，接受北京軍區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雙重領導。

北京衛戍區設有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等領導機關，下轄衛戍部隊，領導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負責北京地區的軍事警衛、守備任務，開展民兵、兵役和動員工作，維護軍容風紀，協助地方維護治安等。

北京衛戍區的主力部隊是兩個警衛師：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

【注釋 71】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駐紮在北京市通縣的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2 團副連長田明建，乘部隊出操之機打死團政治委員等多名軍官後，駕車闖進北京市區，在建國門立交橋附近與圍堵的軍警發生激烈槍戰，多名軍警喪生，田明建被當場擊斃。伊朗駐中國大使館政務秘書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納裏及其兒子正好乘車路過槍戰現場，父子倆一同遇難。

由於發生田明建事件，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何道泉、北京衛戍區政治委員張寶康、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秦濤、佟喜剛等人被免職。

【注釋 72】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84 頁。

【注釋 73】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92 頁。

【注釋 74】參見題爲《不堪回首憶“清場”，中央警衛團管收屍》的文章，作者佚名，刊載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香港《星島日報》電子版。

【注釋 75】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252 頁至第 253 頁。

【注釋 76】參見范琦勇題爲《程仁興：“六•四”淩晨死在

天安門廣場》的文章，原載美國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

【注釋 77】參見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一書，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二零零五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78】參見《孫維世的故事》一文，作者張郎郎，刊載于文化先鋒網 www.whxf.net。

【注釋 79】參見鍾一知題爲《“企圖焚燒天安門城樓”事件真相》的文章，刊載於總第二一零期、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出版的美國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

【注釋 80】參見尹進題爲《六四凡人小事----記山西八九民運小人物》的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文庫。

【注釋 81】參見《熱血映丹心----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營長劉閣雲》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215 頁。

【注釋 82】參見美國中文報紙《大紀元》記者馮長樂寫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題爲《六四淩晨我爬出了天安門廣場》的採訪報導。

【注釋 83】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情報部部長、蘭州大學學生辛苦否認劉曉波曾有毀槍行動，他說：“在海外聽到許多民運人士因爲對一些細節的談話來證實自己的身份，這樣就可以進行一些誇張。比如說象絕食四君子的行爲，高新出來之後談到一些情況，然後就對學生領袖進行批評。有些批評是中肯的，但是實際上也是一種誤會，彼此之間的不理解。

我最後就想講一件事實，就是劉曉波最後砸機槍，借此來證實他們理性和平的爭取，這純粹是胡扯八道。這個機槍是我自己作的處理，我非常明白。

那天晚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作者注）我已經累的很，因爲三天沒有睡覺，最後大概睡了三十分鐘被我的保鏢踢起來了，因爲實在是叫不醒。我起來之後發覺我的頭下面硬硬的，我問是什麼，他們說是機槍。我一聽，開始還挺高興，盡管我在晚上的時候收繳了三批武器交給公安局。

這個機槍我一檢查沒有槍拴，我說這玩意兒留著我們都活不了命，又不敢抬下去，因爲下面已經站滿了軍人。這個時候

我就用我們那個小帳蓬，是我跟李錄的那個小帳蓬裏面的一個小被子把那個機槍裹起來，李錄的保鏢，我的保鏢和我自己抬著到紀念碑南面下去直到毛主席紀念堂前，喊一二三，扔到花木叢裏面。因爲旁邊兩邊已經站了軍警，我們害怕起誤解活不了。具體時間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三點四十分左右。”

（辛苦的以上文字見於《回顧與反思》一書第 318 頁至第 319 頁，德國萊茵筆會、德國亞琛八九學社編輯出版，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其實，辛苦所說的槍與劉曉波所毀的槍不是同一支槍。辛苦犯了與高新等人同樣的一個錯誤，把個人的所見所聞看成是所有人的所見所聞。侯德健等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在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臺上講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有人到了海外，仍然堅持這個說法。問題是，那麼大的天安門廣場（面積有五十萬平方米），那麼長的清場時間，又是在視線不明、情勢緊張的情況下，怎麼可以憑一個人的所見，就得出這麼一個“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結論？每個當事人最多只能說自己沒有看見死人而已。

【注釋 84】譚嗣同（一八六五年----一八九八年），湖南瀏陽人，一八九八年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後堅持不逃亡，後被捕遇害，爲“戊戌六君子”之一。臨刑前留下一首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注釋 85】見于羅峪平（又名“羅點點”）所著的《點點記憶》一書中的有關章節“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故事”，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一九九九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86】參見孫立勇所著的《走過冰山----一個中國良心犯的獄中回憶》一書第十二章第三節，刊載於美國中文報紙《大紀元》二零零五年九月八日。

【注釋 87】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注釋 88】刊載於臺灣《時代週刊》第二二六期。

【注釋 89】“51048”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

第 336 團的部隊代號，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定興縣。

【注釋 90】參見《清場前的談判》一文，作者：上校團政委季新國，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263 頁至第 268 頁。

【注釋 91】參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文獻研究所公佈的三十五篇一九八九年美國國務院與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解密檔案。

【注釋 92】參見林青題爲《十年沉默：六•三----六•四慘案》的文章，出處不明。

【注釋 93】參見子夜題爲《人民日報：三十八小時的掙紮----不是昨天的回憶，而是不滅的希望》的文章，刊載於一九九三年的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和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世界週刊》。

【注釋 94】參見曾慧燕題爲《勇敢的播音員李丹》的文章，刊載于香港《百姓》雜誌第一百九十六期。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美國洛杉磯創刊的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曾經在第三期鄭重推薦“當代中國最勇敢的人”，選出最勇敢的記者----李丹，最勇敢的知識份子——劉曉波，最勇敢的中國青年——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十八輛坦克的王維林。

【注釋 95】見于香港《解放》月刊（《開放》月刊的前身）一九八九年七月號。

【注釋 96】參見海明題爲《清華教師的六四回憶》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八零期，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刊。

【注釋 97】參見蔡淑芳題爲《再見，廣場》的回憶文章，收錄於《人民不會忘記》一書，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注釋 98】參見潘強題爲《從山東大學到天安門廣場》的回憶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通訊》，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出刊。

【注釋 99】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注釋 100】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259 頁至第 262 頁。

【注釋 101】參見《從老山主峰到天安門廣場----記榮立集體三等功的某師》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彙編》一書第 547 頁。

【注釋 102】出處同上。

【注釋 103】參見《爲了天安門廣場的尊嚴----記獲“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的某部偵察一連》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373 頁至第 379 頁。

【注釋 104】見於加拿大明鏡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第 865 頁至 868 頁。

【注釋 105】封從德在相關的“批註”中稱：“我們撤到紀念碑二層時，紀念碑三層已經被軍人佔領，槍就在我們頭頂兩三米遠。這時學生隊伍大約撤走了一半。我們出廣場後走到隊伍前列，一路告訴大家指揮部與大家在一起，以便穩定軍心。”見於海外中文網站《六四檔案》所刊載的《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作者吳仁華）一文的“批註”。

封從德的這個說法不確，他和柴玲、李錄等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是隨著紀念碑底座南面的學生撤離的，是最早撤離的，其次撤離的是紀念碑底座東面和西面的學生，我所在的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是最後撤離的，人數也是最多的，超過紀念碑底座南面、東面和西面學生人數的總和。

【注釋 106】見於《難忘的八天八夜》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237 頁至第 248 頁。

【注釋 107】參見《王磊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見於海外中文網站《六四檔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二日刊出。

【注釋 108】參見海明題爲《清華教師的六四回憶》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八零期，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刊。

【注釋 109】參見楊渡題爲《在歷史慘劇中一起流血》的文章，收錄于《歷史的創傷》一書，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110】參見《沒有硝煙的戰鬥》一文，作者：北京市公安局劉成社，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295 頁至第 300 頁。

【注釋 111】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注釋 112】參見星光題爲《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爲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的回憶文章，刊載於二零零五年的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

【注釋 113】參見林彬題爲《歷歷在目驚心動魄的“六四”》的文章，刊載于加拿大網路中文雜誌《楓華園》增刊，總第三十五期。

【注釋 114】參見張先玲題爲《爲了記錄歷史的真實》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二零零四年第五期。

【注釋 115】參見丁子霖寫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題爲《搶救中被射殺的實習醫生》的文章，刊載於二零零四年的美國網路中文雜誌《民主中國》。

【注釋 116】參見星光題爲《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爲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的回憶文章，刊載於二零零五年的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

【注釋 117】參見丁子霖所著的《“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印刷。

【注釋 118】參見丁子霖題爲《瘋狂的坦克》的文章，刊載於香港《開放》雜誌二零零五年六月號。

【注釋 119】參見《專訪方正：六四坦克從我雙腿碾過》一文，美國中文報紙《大紀元》記者馮長樂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採訪報導。

【注釋 120】參見雨源題爲《“六四”坦克碾人真相》的回憶文章，刊載于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七六期，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出刊。

【注釋 121】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269 頁至第 270 頁。

【注釋 122】我記得六部口碾壓學生撤退隊伍坦克的編號是“一零六”(或“一零七”)。中央社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發自加拿大渥太華（溫哥華）、題爲“坦克屠城照片十年後曝光，加國媒體刊登六四屠殺新證據當事人憶述歷史”的一則消息或許可作爲佐證，全文如下：

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全國性大報《環球郵報》今天刊載了兩幅從未發表的黑白照片，頭版大標題是“天安門暴露了中國（政府）的大謊言。”

這兩張照片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照片右下角的日期）一位當時擔任報社記者、現已轉業經商的中國男人所拍攝，經一位女友轉交給《環球郵報》發表，目的是要“只相信政府”的年輕一代，看看當年解放軍坦克屠城後的歷史鏡頭。

登在頭版的照片上，一堆淩亂的腳踏車上橫躺著至少三、四具年輕人的屍體，一隊戴鋼盔手提槍的解放軍從旁邊走過，另一側人行道上民眾倚著欄杆觀看。

另一張刊在內頁的照片主題也是看似被坦克車輾過的腳踏車和街頭橫屍，一名左肩背著旅行包的年輕人望著眼前的慘狀和前方不遠處一隊坦克車，第一輛編號一零七號清晰可辨。

提供照片及底片的這位女性現在已取得加拿大國籍。她告訴《郵報》她本來想等到屠殺“主犯”李鵬接受審判時再拿出來當作證據，今年確實也有一百多名被害者家屬向北京陳情，籲請政府進行刑事調查，但她對正義能否彰顯很悲觀，又看到年輕一代不相信十年前的“故事”，老是挑戰目擊者“拿出照片來”，她遂決定將她帶出來的珍貴鏡頭公諸報端。

當時，軍隊看到任何人拍攝屠殺現場影像都毫不客氣朝鏡頭開槍，因此這兩幅照片等於是冒死拍下的。那位記者回到報社，請暗房技工沖洗出來後，記者同事和資深編輯都看到了，但是最資深的編輯說，“你們都不准把照片的事講出去，忘掉算了。”

拍攝者當場慌了，第二天就和這位女朋友（當時當老師）溜出北京，逃到很遠的一省，投靠另一位記者朋友。六月五日，他們出城那天，“軍人還在街上開槍射擊”，她說。一九九零年，她拿到加拿大的簽證，要出國的時候，記者男友把幾張珍貴的底片交給她。她把這些底片夾在信裏，又把信夾在書裏，帶著上飛機，十年來，就這麼保存了下來。

【注釋 123】見於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政治教育司編輯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釋本）一書，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複校計劃香港籌備處出版，一九九零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注釋 124】我記得這位特別糾察隊員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

系一九八六級的學生甄頌育，他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成爲重點清查對象。記憶中，他的父親是解放軍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校級軍人。甄頌育曾對我提到過，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當局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後，許多解放軍三總部的校級軍官身穿便裝上街，與學生和市民一起攔截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 年 6 月 2 日 16 時，紀念碑底座，正在接受採訪的侯德健。



1989 年 6 月 2 日下午，紀念碑底座北側，絕食四君子（右起）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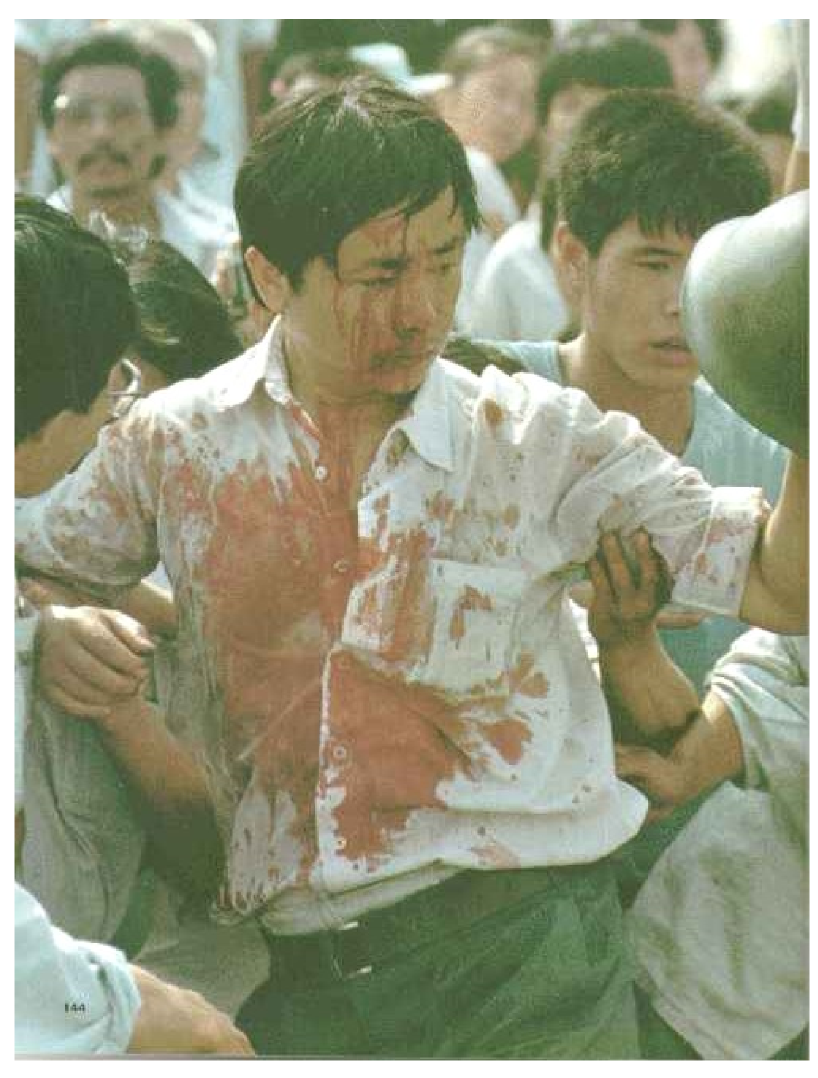


1989 年 6 月 3 日，六部口，被民眾截獲的“軍火車”。



1989 年 6 月 3 日，六部口，武警用電棒、催淚瓦斯等驅散人群。（路透社照片）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濱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前被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軍人打得頭破血流。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濱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前被陸軍第 65 集團軍的軍人打得頭破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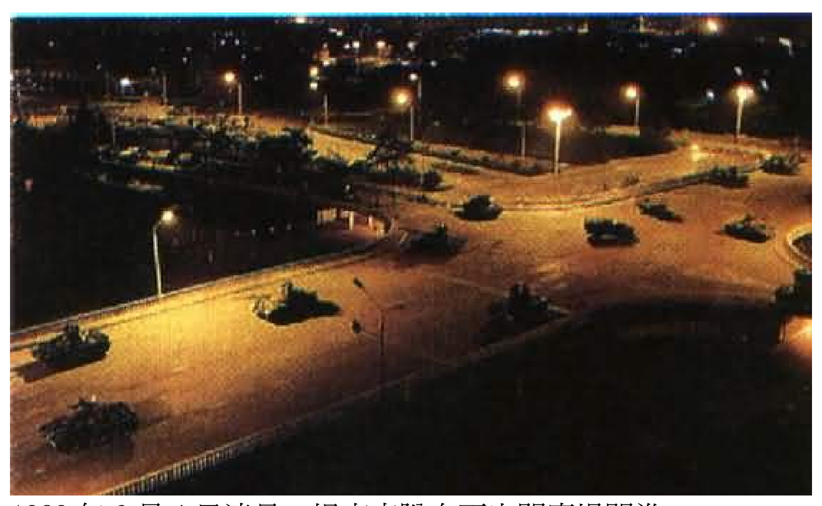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一名男子在人民大會堂西門被眾多軍人包圍，打得渾身是血。



同上


1989 年 5 月，紀念碑底座北側，（右起）劉蘇里、老木、王丹。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坦克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坦克碾過路障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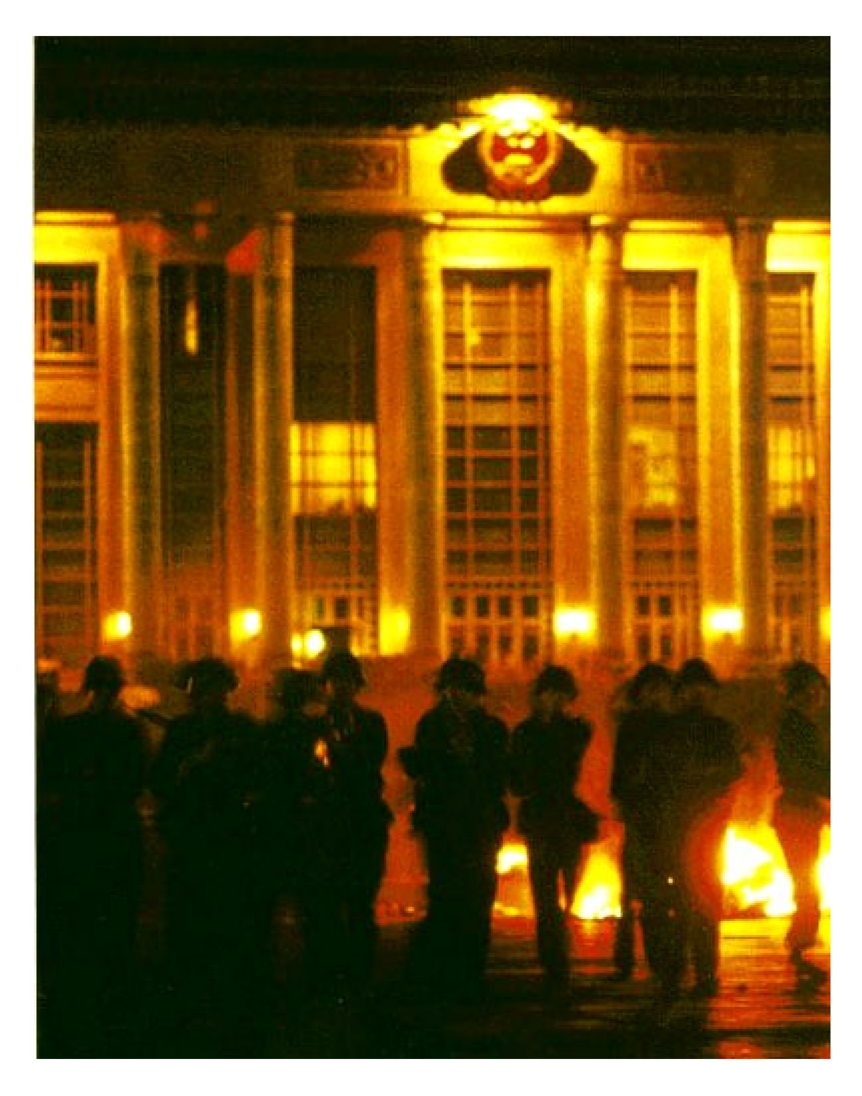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北端與軍隊對峙。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民眾在長安街上用石塊反擊武裝軍人。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 4 點鐘，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軍人端槍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前沖向集結在紀念碑底座的學生隊伍。照片中可見一名軍人的槍口閃著火光。軍人背後的建築物是人民大會堂。

攝影：今枝弘一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003 號裝甲指揮車在金水橋前遭燒毀。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339 號裝甲車在新華門附近遭燒毀。


在新華門附近遭燒毀的 339 號裝甲車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受阻軍人撤退。



民主女神塑像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天安門廣場，被裝甲車碾過的民主女神塑像。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天安門廣場，被裝甲車碾過的民主女神塑像。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
攝影：陳清華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
攝影：今枝弘一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軍人端槍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前。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 4 點 30 分，紀念碑底座北側的學生對端槍抵達的軍人揮動Ｖ字形手勢，高喊口號：“團結起來，不怕犧牲！團結起來，不怕流血！……”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沖上紀念碑底座。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軍人在天安門廣場放火焚燒。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紀念碑底座北側的軍人。



1989 年 6 月 4 日，坦克撞開擋道的公共汽車挺進天安門廣場。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 5 點 30 分許，學生含淚撤離天安門廣場。
攝影：大塚敦子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兩位學生架著受傷的女同學撤離天安門廣場。路透社照片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天安門城樓東側南池子大街北口附近，第 38 集團軍部隊時不時向抗議的民眾開槍射擊，每一次都造成一些死傷民眾倒臥在東長安街上。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陸軍第 28 集團軍車隊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陸軍第 28 集團軍的 74 輛軍車，其中包括 31 輛裝甲車、2 輛通訊車燒毀。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坦克車隊在六部口設置了警戒線。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
攝影者：美聯社駐京記者劉香成

6 月 4 日淩晨天安門廣場上抬受傷同學去醫院。K&W 圖片社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現場景象之一。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現場景象之一。

六部口坦克追軋景象之一。Amnesty Action,1989 年 5—6 月號。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西長安街六部口，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坦克車隊一邊投擲軍用瓦斯彈，一邊追軋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學生們緊急躲避，現場彌漫軍用瓦斯彈煙霧。圖片來自時代雜誌(Time), 89/6/19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現場景象之一。圖片來自時代雜誌(Time), 89/6/19



Il a les jambes broyées par un tank

64memo.com

1. 4 JUIN
6 H 15 : LE PIÈGE
Un cortège d'étudiants a quitté Tian Anmen par le sud et tente de rejoindre l'avenue Chang'An. Arrivé au carrefour Liu Bu Kou, à 50 mètres d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et du Parti, il tombe sur trois chars qui sortent de la place. Un tir très nourri de gaz lacrymogènes enfume l'air. Des étudiants tentent d'éviter les chars qui foncent dans le tas en escaladant les barrières.

2. 6 H 20 :
L'HORREUR
Les trois chars sont partis, les gaz se dissipent. Des témoins se précipitent sur un blessé qui s'accroche à la barrière. Sur la chaussée, il y a onze morts.

3. 6 H 20-25 :
LES MARTYRS DE LIU BU KOU
Deux hommes tentent de poser des garrots sur les jambes arrachées d'un des étudiants piégés à Liu Bu Kou.

117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現場景象之一，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被壓斷雙腿，掛靠在路邊的欄杆上，民眾在救護方正。



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



遭坦克碾軋的遇難者遺體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的死難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學生王培文（前排右一）



遇難者被坦克碾軋成肉醬
圖片來自“驚天動地的一百天”，《亞洲週刊》1989 年出版。



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周德平遺體（同仁醫院）圖片來自“英雄史頁——北京民運悲壯的五十天彩圖集”（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



1989 年 6 月 4 日，10 名軍人用槍托、棍棒圍毆一被捕學生。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剛剛結束，一些不願離去的學生在廣場上遭到拘捕。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血跡。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街道上的血跡。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圖片來自 1989 年 6 月 19 日出版的《新聞週刊》(Newsweek)。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


被開花子彈奪去生命的遇難者


死難者王建平


死難者王建平留下的一對孿生女。



1989 年 6 月 3 日深夜，北京民眾搶救中彈者。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北京民眾搶運受傷女學生。



一名傷重不治者被醫務人員送往停屍房。圖片來自 1989 年 7 月 6 日出刊的《洛杉磯時報雜誌》(La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法新社圖片



北京市民救護死傷者



北京市民救護死傷者


北京市民救護死傷者


北京市民救護受傷者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被裝甲車撞死的遇難者。美聯社照片，圖片來自 1989 年 6 月 12 日出刊的《時代雜誌》。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路透社照片）



拋屍街頭的遇難者遺體



停屍間。圖片來自 1989 年 6 月 12 日出刊的《Village Voice》。



1989 年 6 月 4 日，民眾在醫院認領死難者。圖片來自《血洗京華實錄----香港文匯報記者組直擊報導》，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



痛哭的死難者母親。1989 年 6 月 19 日《新聞週刊》(Newsweek)



1989 年 6 月 5 日，郵電醫院外，北大死難學生的親人哀痛欲絕。


最後的告別


醫院房間躺滿了死傷者



復興醫院死難者眾多，自行車棚內也放有十多具遺體。



郵電醫院臨時停屍房的死難者遺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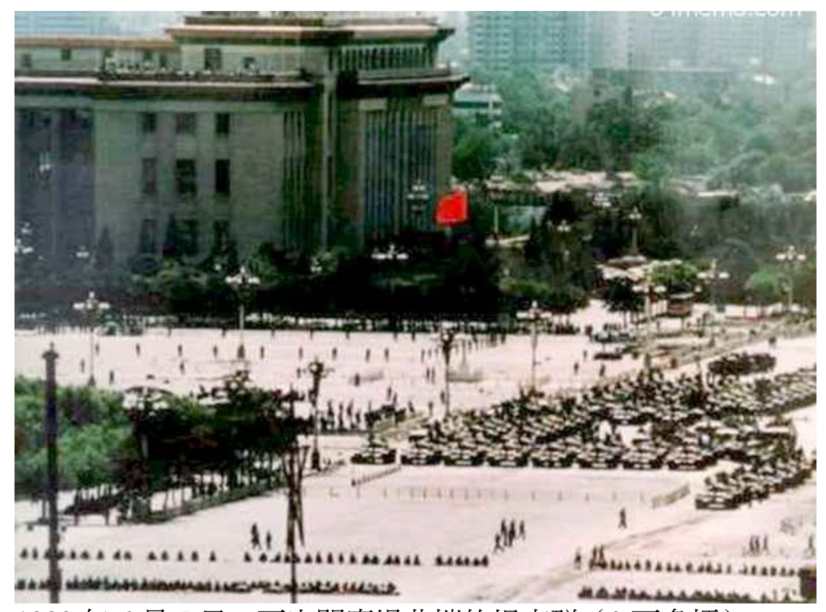
死不瞑目的遇難者。圖片來自 1989 年 6 月 12 日出刊的《Village V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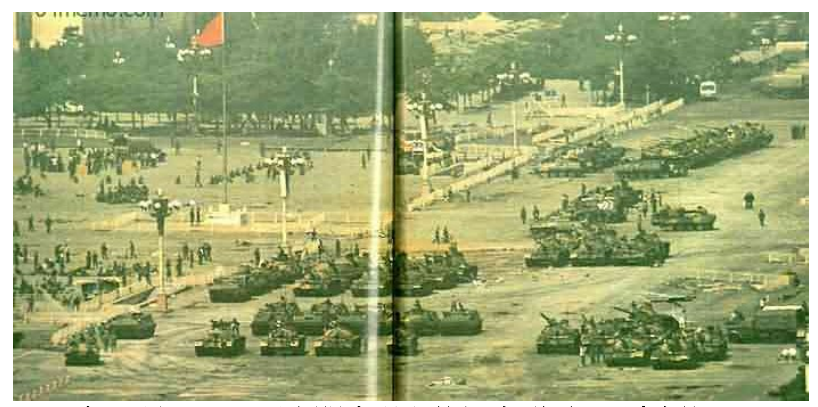


1989 年 6 月 4 日，被打爆頭顱的死難者。


中學生王楠生前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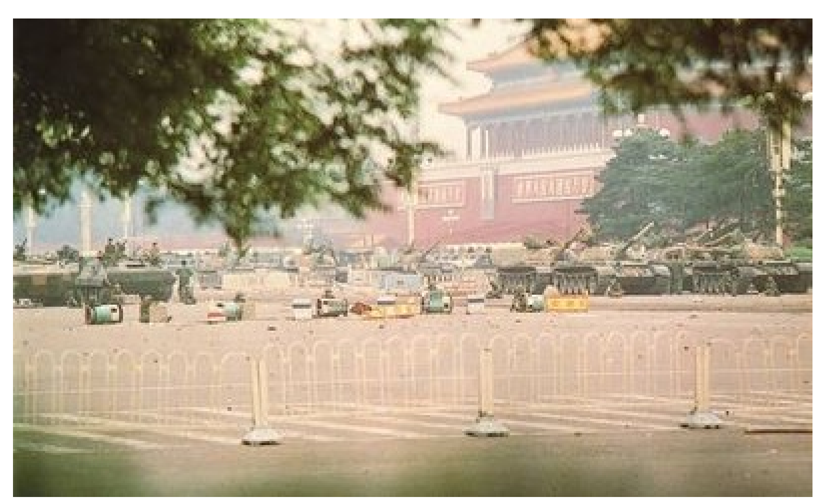

王楠尸体掩埋地点：天安门城楼西侧北京第 28 中学墙外绿地，现已种上灌木。


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北端的坦克群（2 百多輛）。


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群（2 百多輛）。


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群。


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北面長安街上的坦克和軍人。



1989 年 6 月 6 日，天安門城樓前的坦克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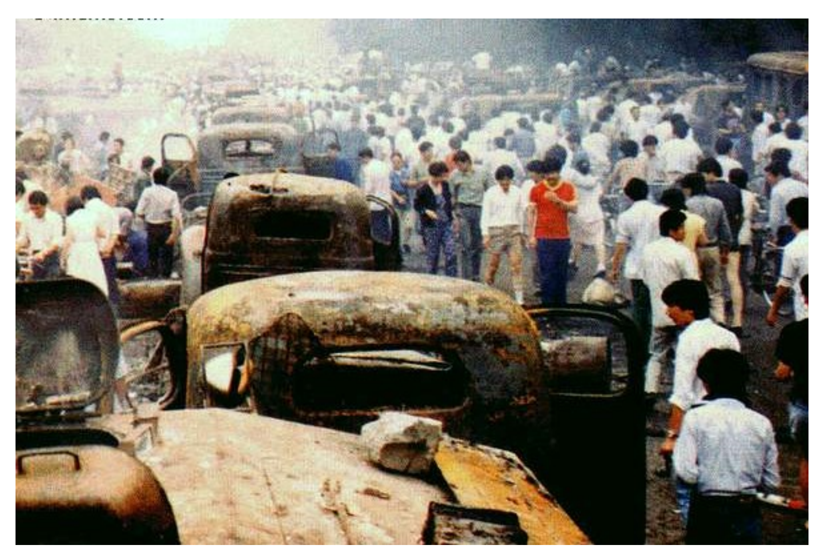
1989 年 6 月 7 日，天安門廣場重兵駐守，一些市民在遠處觀看。



1989 年 6 月 7 日，北京燕京飯店的房子彈痕累累。



1989 年 6 月 8 日，軍人在北京市交通要道站崗。 。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西長安街，被燒毀的第 28 集團軍軍車。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在西長安街中南海新華門設防的坦克。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市民展示撿到的子彈殼和彈頭。
攝影：今枝弘一



1989 年 6 月 4 日，同仁醫院，在天安門廣場中彈受傷的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躺在病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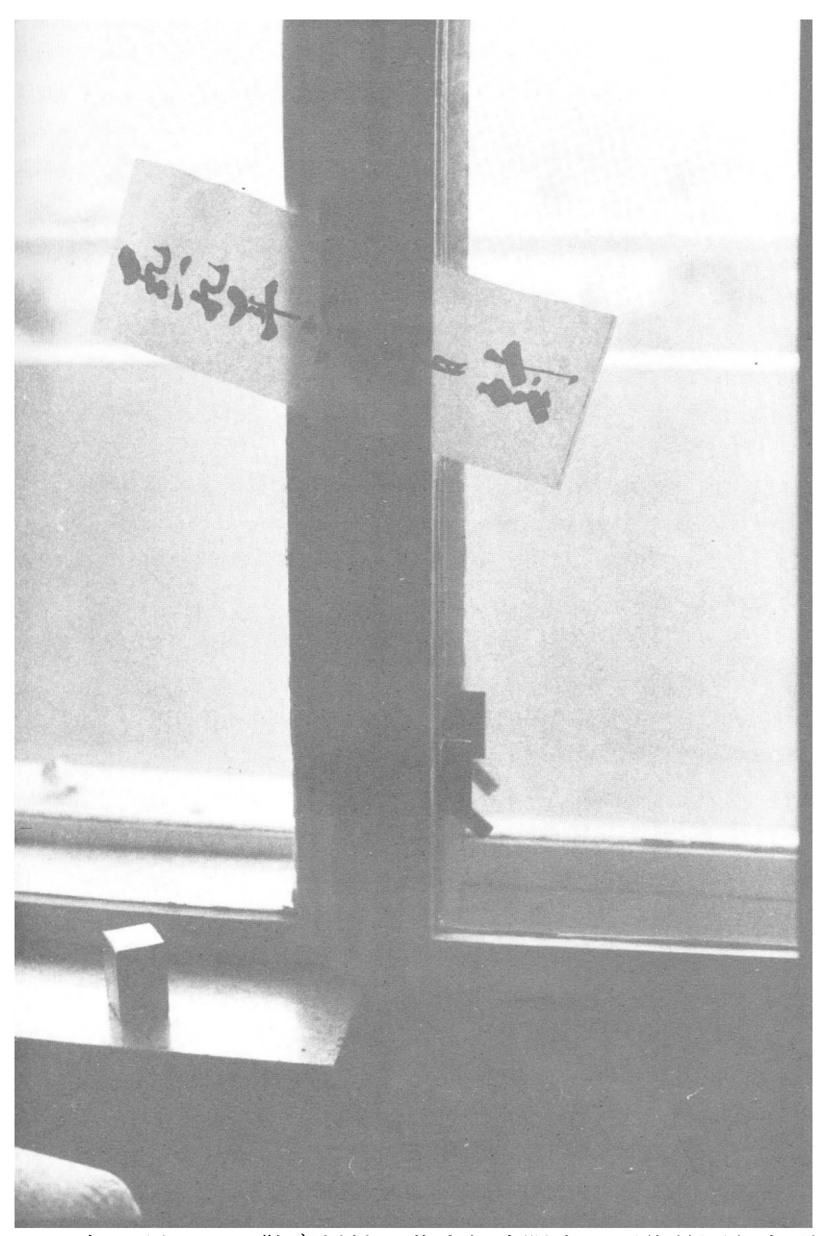
基本傷癒的徐宗懋回到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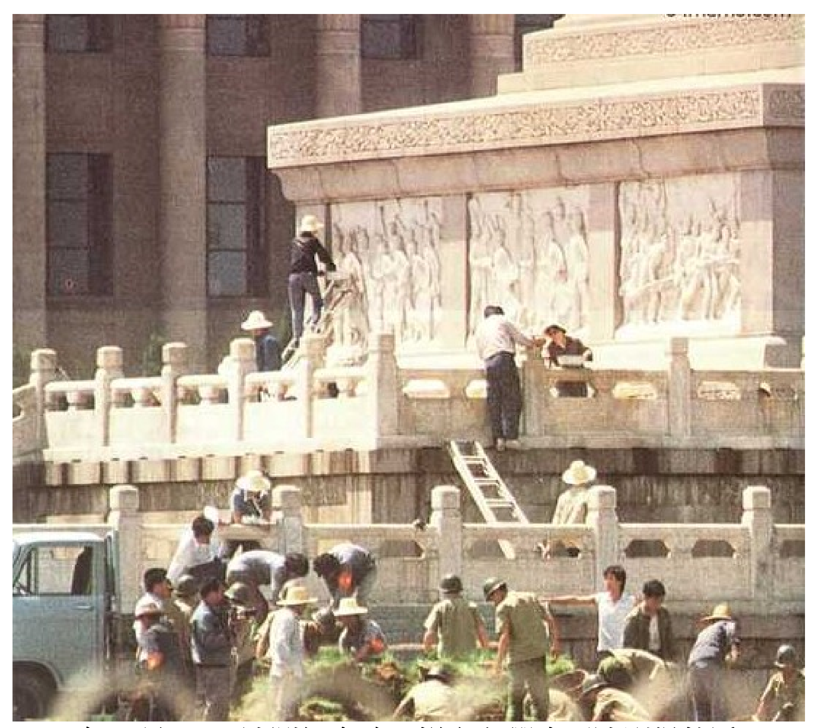
張健在天安門廣場雙腿挨了三槍，右腿在同仁醫院吊了 128 天。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一位受傷者在北京建國門外交公寓前講述被軍人用刺刀刺傷的經過。



1989 年 6 月 4 日，警察封鎖了北京飯店陽臺，不許外國記者到陽臺上觀看、拍攝，否則，人身安全無法保障。



1989 年 6 月 15 日洗涮紀念碑。鮮血和彈痕可洗刷得乾淨？



六月，天安門城樓前的坦克和軍人。


诗人海子，大学期间赴西藏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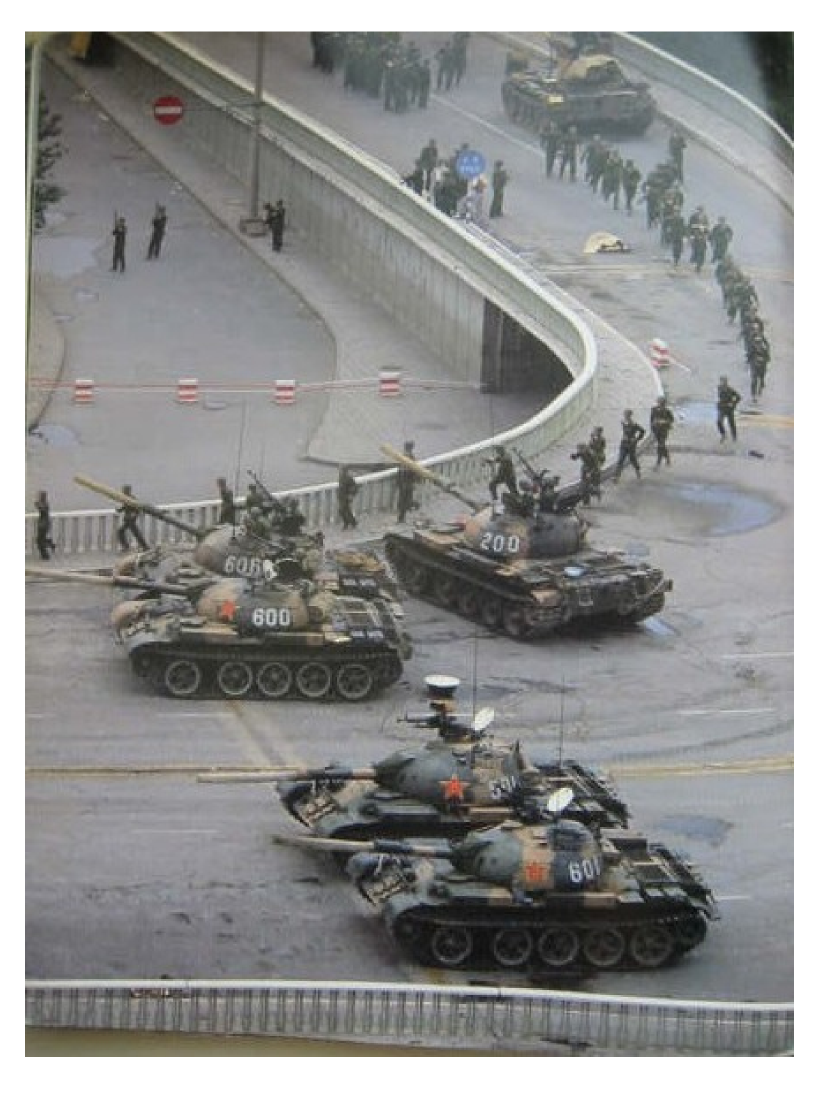

诗人骆一禾



六四傷殘者齊志勇（左）和龐梅青 2005 年 4 月於北京合影。齊志勇左腿中彈，截肢。龐梅青被子彈打中腰脊髓，導致下半身癱瘓。



1989 年 6 月 7 日，戒嚴部隊軍人駐守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底座，紀念碑底座臺階上坦克碾過的損毀痕跡依然歷歷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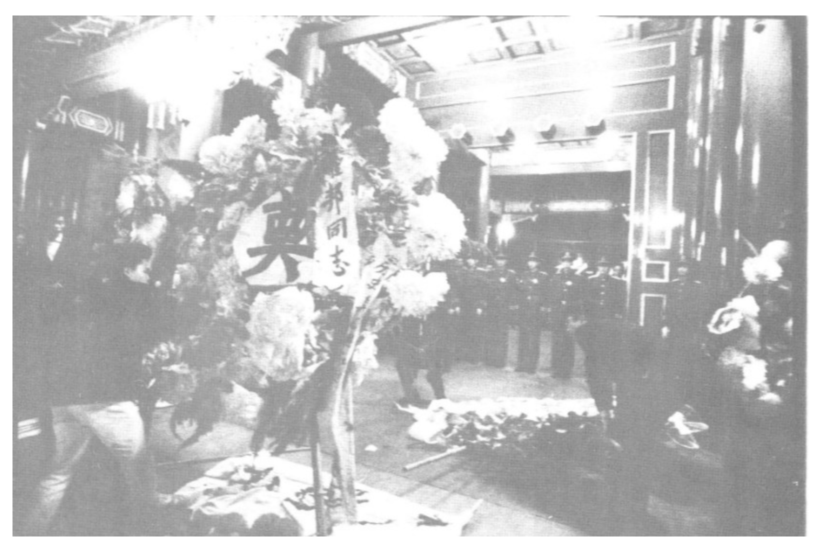
建國門立交橋上。相片的左面是東。在立交橋的牆壁上還有墨寫的“粉碎軍管，保衛北京”的大字。



1999 年的杜憲，離開中央電視臺新聞主播台 10 年後風姿依然，亭亭玉立，身材苗條，眼睛明亮，熟悉的短髮，是她典型的形象。



1989 年 4 月 17 日，中國政法大學師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



1989 年 4 月 19 日晚，新華門前的大花圈，作者曾参与制作。



1989 年 4 月 21 日晚，十萬北京各高校學生遊行去天安門，準備參加翌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這是 1949 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非官方遊行。圖爲中國政法大校隊伍。



1989 年 4 月 22 日清晨，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隊伍。



1989 年 4 月 22 日上午，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爲胡耀邦默哀。



1989 年 4 月 22 日淩晨，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師生擁著胡耀邦遺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板，徹夜等候。



1989 年 4 月中旬，中國政法大學，北高聯記者會。首任主席周勇軍（右 3）、王丹（右 4）。



4·27 大遊行


1989 年 5 月 4 日的天安門廣場，擠滿了學生隊伍。這張相片是美國記者爬到立在廣場上的巨幅孫中山畫像之上拍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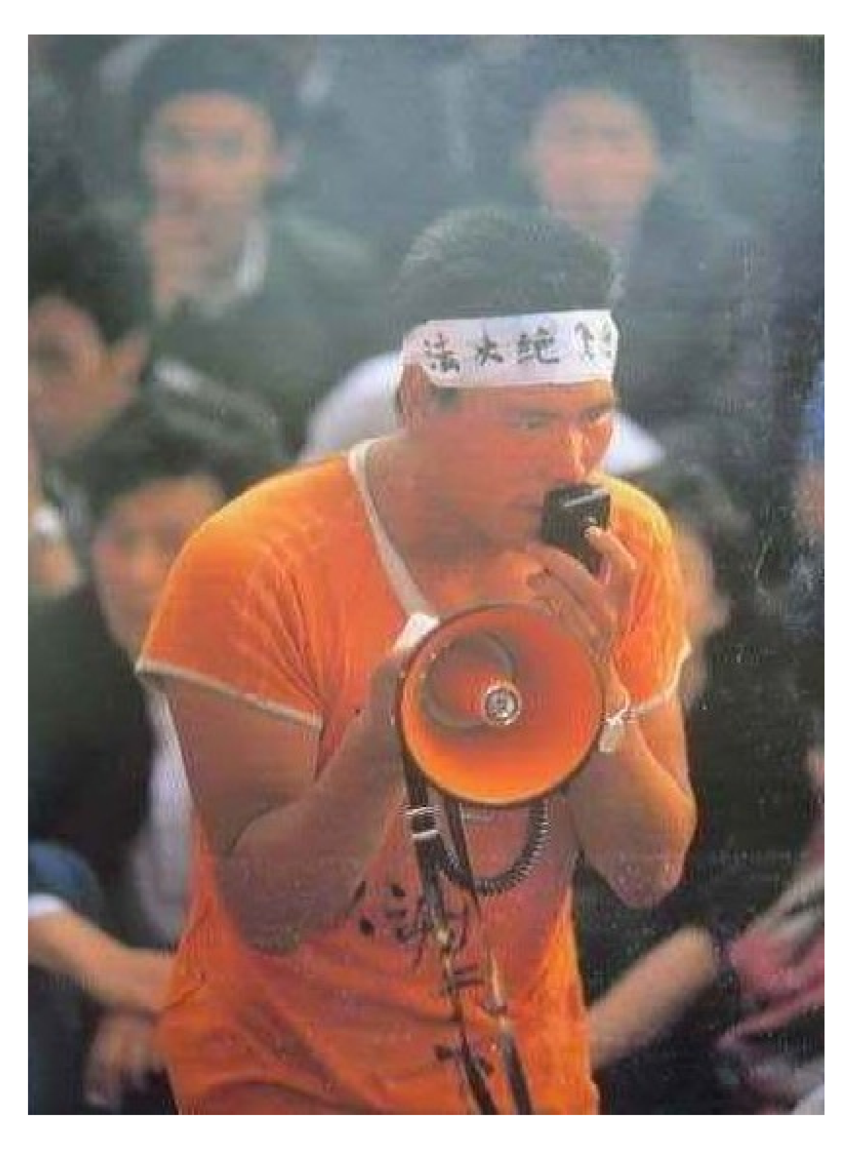


1989 年 5 月 13 日下午，中國政法大學絕食學生。浦志強（中）



1989 年 5 月 17 日,新華門前,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絕食請願。

參加絕食的中國政法大校研究生浦志強在天安門廣場



參加絕食的中國政法大校研究生浦志強在天安門廣場



1990 年 5 月，作者在香港。



1991 年 5 月，作者在加拿大。

書名：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
作者：吳仁華
出版：真相出版社
電子郵件：yenhua2000@yahoo.com
通訊地址：P.O.BOX 6159
Alhambra,CA 91801
U.S.A
電話：(626)3278855(美國)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78-0-9795273-6-4
定價：HK$128
版次：2007 年 5 月第一版
2009 年 5 月第二版